

##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

主 编 戴庆厦

副主编 丁石庆

李炳泽

编写组成员(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戴庆厦	傅爱兰	覃小航
李炳泽	王会银	李绍尼
李锦芳	季永海	丁石庆
张铁山	赵福荣	曾思奇
崔宰宇	白立元	关辛秋
周国炎	赵 加	喻 捷

## 内容提要

汉语与民族语言的相互关系，是我国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书探索的问题主要有：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二、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三、少数民族转用汉语；四、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本书力求在分析综合语言现象的基础上做些可能的理论概括，总结一些普通语言学原理。

## Description of Contents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relations among Chines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a. This book explores several topics in the field, (a)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Sino-Tibetan language groups, (b)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minority languages, (c) the adoption of Chinese by ethnic minorities, and (d) the influence of minority languages on (individual variet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phenomena discussed, this book also attempts to make possible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s about language.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
第一节	语言关系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1 )
第二节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	( 13 )
第二章	汉藏语系语言的亲属关系	( 19 )
第一节	汉语与藏缅语的亲属关系	( 19 )
第二节	汉语与壮侗语的亲属关系	( 45 )
第三节	汉语与苗瑶语的亲属关系	( 57 )
第三章	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 73 )
第一节	汉语对藏缅语的影响	( 73 )
第二节	汉语对壮侗语的影响	( 113 )
第三节	汉语对苗瑶语的影响	( 138 )
第四节	汉语对满一通古斯语的影响	( 154 )
第五节	汉语对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	( 172 )
第六节	汉语对突厥语的影响	( 197 )
第七节	汉语对孟高棉语的影响	( 219 )
第八节	汉语对高山语的影响	( 225 )
第九节	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	( 240 )

<b>第四章</b>	<b>少数民族转用汉语</b> ·····	(255)
第一节	满族转用汉语·····	(255)
第二节	回族转用汉语·····	(278)
第三节	土家族转用汉语·····	(287)
第四节	畲族转用汉语·····	(300)
第五节	仡佬族转用汉语·····	(310)
第六节	高山族转用汉语·····	(319)
<b>第五章</b>	<b>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b> ·····	(327)
第一节	粤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327)
第二节	闽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343)
第三节	贵州汉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357)
第四节	突厥语对汉语的影响·····	(360)
<b>附录</b> ·····		(377)
一、	中国语言系属表·····	(377)
二、	中国的语言与文字简表·····	(378)
三、	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分布表·····	(382)
<b>后记</b> ·····		(383)

# Table of Contents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 Language relations; An important topic of linguistics research
2.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 Chapter 2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Sino-Tibetan groups

1. Chinese and the Tibeto-Burman Group
2. Chinese and the Kam-Tai (or Kadai) Group
3. Chinese and the Miao-Yao Group

## Chapter 3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minority languages

1. Tibeto-Burman
2. Kam-Tai (or Kadai)
3. Miao-Yao
4. Manchu-Tungus
5. Mogolian
6. Turkic
7. Mon-Khmer
8. Gaoshan Languages (eg. Amls& Bunun)
9. Korean

**Chapter 4 The adoption of Chinese by ethnic minorities**

1. Manchus
2. Moslems(Hui)
3. Tujia Natinality
4. She Nationality
5. Gelao Nationality
6. Gaoshan Nationality

**Chapter 5 The influence of minority language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Cantonese
2. The Min variety of Chinese
3. The Chinese spoken in Guizhou Province
4. Turkic influence

**Postscript**

Hoa văn Saigon/RSK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语言关系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一、语言关系的概念及研究内容

这里所说的语言关系 (language relationship)，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社会、文化的相互接触、影响，而在语言上出现的种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语言结构的变异上，即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特点发生某些变化，而且还表现在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上。

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与别的民族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接触和联系，并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变化。而做为民族主要特征之一的语言，由于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的工具，并与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等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伴随着民族关系的存在，语言之间也会出现种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不与别的民族语言发生任何关系，或不受他族语言的影响的“纯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是说，一种语言的发展变化，除该语言本身的因素在起作用外，还存在外族语言影响的力量。特别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不同民族的语言相互存在密切的关系，其语言特点在一些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语言影响的烙印，其影响力量最甚者能使一种语言发生巨大变化，或改变其语言类型，或使其主要特点发生变化。所以，研究语言的发展变化，除了从一种语言的内

部进行研究外，还要研究与别的语言的关系。如果不考虑语言的相互关系，就会对语言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理不清线索。

我们提出语言关系这一概念，是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提出的。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语言关系，是与民族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由于民族关系的存在而引起的一种语言现象。民族关系与语言关系之间，既有从属关系，又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民族关系是一个总体，其中包括民族之间在社会文化、物质文化以及语言、心理等方面的关系，而语言又是构成民族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关系是从属于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从属关系，民族关系的状况决定语言关系的方向和特点，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往往制约语言关系变化的发展。反之，语言关系又能影响民族关系。由于语言特征是民族特征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部分，而且语言又与民族的其它一些特征存在密切的联系，因而民族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如民族平等、民族交流等，都要在语言关系上反映出来。语言关系的状况能直接影响民族关系，从语言关系上也能看到民族关系的状况。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语言关系的研究应有其特定范围，其界限应以是否与民族关系相联系为准。

语言关系主要包括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等方面的内容。前者表现为语言结构特点的变化，后二者是语言功能的变化。语言亲属关系也是一种语言关系，属语言关系的研究内容。

### (一) 语言影响 (language in fluence)

指某一语言受另一语言的影响。语言影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从影响范围上看，语言影响涉及语音、词汇各个领域，其中以词汇影响为显著。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接触，总是先出现词汇借用。为了表达新概念、新事物，一个语言就会从另一个语言里吸收自己所没有的语词。词汇借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反映。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几乎没有不向汉语借词的，其中有些语言的汉语借词高达基本词的一半以上（如白语、

朝鲜语、东乡语等)。随着借词的不断积累,语言影响还会触及语音、语法领域。在语音上的表现主要是借用少量本族语音位系统中没有的音位和音位结合的规则。如我国藏缅语的许多语言(景颇语、哈尼语等)都没有唇齿音 f,通过汉语借词增加了 f 音位;彝语、苗语大多数语言没有鼻音韵尾,有些语言通过汉语借词增加了鼻音韵尾(如嘎卓语、哈尼语碧约话),从而使韵母系统由纯一的元音型变成了元音加辅音型。声调也是能借入的,如哈尼语绿春话原只有高平、中平、低降三个调,随着汉语词的借入,又增加了一个中升调。在语法上的表现主要是增加新的语序。壮语就从汉语引进了一些新语序,如名词修饰名词时,名词定语在名词中心语之后(房+草=草房),由于受汉语影响增加了名词定语在名词中心语之前的语序(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当一个语言受另一个语言的强烈影响时,其语法形式中的形态也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如满语的祈使式原是加后缀表示,但现代三家子满语中这一形态变化已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加动词“请”。语言影响还能使一些语言增加虚词,丰富其语法手段。除了语音、语法、词汇外,语言影响还会波及一种语言的用词造句特点和话语表述特点,其影响的范围是由影响的程度决定的。影响小的,只涉及少量词的借用,影响大的,则能引起语言结构的变化。我国海南岛三亚回语原是粘着型语言,由于长期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已由粘着型转换成孤立型。这一质的变化,是人们过去没有想到的。①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影响的范围存在表层和深层的差别。表层指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量的借用,这比较容易觉察到。深层指结构系统的变化和表达功能的变化,它是建立在量的借用基础上,涉及语言系统的调整 and 变化,不容易被人们所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影响。②

① 参看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② 这里使用“表层、深层”术语属于一般概念,不同于生成语法理论用语的概念。

从受什么语言影响上看，语言影响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在一个多民族语言的国家内，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受主体民族语言的影响，如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无一不受主体民族语言汉语的影响，缅甸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如克伦语、克钦语、泰语等都受缅甸语的影响。但是，少数民族语言也会影响主体语言，只不过是相对说来影响较弱罢了。如汉语词汇系统里有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少数民族语言除了受主体民族语言的影响外，有的还受邻近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自己高的民族语言的影响。如：在云南南部地区，与傣族居住在一起的景颇、阿昌、德昂、拉祜、傈僳等民族，其语言都受傣语影响；西藏自治区的门巴、珞巴、僜等语言，受藏语的影响；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独龙、怒、白等语言，受傈僳语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瑶、毛难等语言，受壮语的影响。分布在边疆的民族语言，有的还受境外语言的影响。如：分布在与缅甸接壤的西南边疆的傣族、景颇族、佤族、傈僳族、拉祜族等，其语言或多或少地都受缅甸语的影响。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等语言，过去曾受过俄语的影响。有的语言只受一种语言影响，如凉山彝语只受汉语影响，而有的语言则受多种语言影响，如景颇语受汉语、缅甸语、傣语等语言的影响。多种语言影响一种语言，存在着不同的层次，表现为多种不同的特点。

从时间上看，有些语言受影响的时间较早，堆积起来的语言影响沉淀比较复杂。早期语言影响留下的陈迹，往往与本语固有成分难以划清，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难题。如苗瑶语、壮侗语中的一些词，是早期汉语借词还是本语固有的、与汉语同源的词，很难划分清楚，成为至今困惑语言学家的一个难解之谜。但早期的语言影响反映了早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交流，包含了重要的文化价值，能为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早期的语言影响是有历史层次的，若能把不同历史层次加以区别，就能为语言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但

要做到这点难度很大。近期的语言影响容易识别，因为它与近期社会特点密切相关。

从影响的方式上看，大多数情况是由于不同民族的广泛接触通过口语借入的，也有先从书面语借入后再普及到口语的。从书面语到口语这种方式只出现在有文字的语言中，先由少数双语人引进，后经社会认可。引进的成分中，有的可能被接受，有的可能不被接受。朝鲜语吸收汉语词，主要是通过汉字词这一途径吸收的。我们还能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语言受另一种语言的影响是通过第三种语言为媒介而实现的。如达斡尔族曾与满族发生于广泛的接触，满语在影响达斡尔语的同时，也把汉语对满语的影响带给了达斡尔语。<sup>①</sup>

制约语言影响的因素不外是两个：一是语言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另一是语言本身的成分。

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力量、文化特征、人口多少、民族心理、民族关系等。一般说来，两个民族发生接触时，其中政治经济力量强的民族使用的语言很容易影响另一种语言；文化水平高的民族，其语言很容易通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渠道影响另一民族的语言。人口少的民族语言易于接受人口多的民族语言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其重要性则高于经济文化的力量。如：云南怒族傈僳族自治州的怒族，其经济水平高于傈僳族，但由于人口少于傈僳族，其语言受傈僳语的一些影响。民族关系对语言影响也有较强的制约力。当两个民族的关系融洽时，语言影响的范围就会大些，影响的速度也会快些；反之亦然。当然我们也看到历史上有的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同时，还在语言上影响被统治民族的语言。但是这种影响往往会遇到抵制，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宗教文化的力量也会对语言影响产生一定的作用。当一个民族信仰的宗教传入另一个民族的时候，其语言中有关宗教文化

<sup>①</sup> 参看丁石庆《达斡尔语早期汉语借词的特点》，中央民族学报增刊，1990·11。

的部分词语也会随着宗教进入另一语言。蒙语历史上借入了一些藏语词，就与藏族的喇嘛教传入蒙族有关。

语言本身的特点，指语言类型的异同、相互之间有无亲属关系、有无书面语及书面语历史的长短、接受语言影响能力强弱、语言表达能力如何等。由于语言本身特点不同，语言影响的规律及特点也不会相同，这当中有规律性可寻。一般说来，语言类型相同、相近的语言或存在亲属关系的语言，相互影响有其天然的便利，影响成分比较容易进入。汉语对其亲属语言的影响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我们还能看到，有的语言虽属于不同类型，而且无亲属关系，但也能在某一方面发生较大的影响。如属于粘着型的朝鲜语，也能大量吸收属于孤立型的汉语的词汇。没有文字的语言，特别是没有历史较长的文字的语言，容易受到有文字的语言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有了文字，语言就有可以进行规范，也有可能开展依赖本族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并使其语言地位相对得到提高。云南傣语影响周围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如德昂语、阿昌语、布朗语等，除社会经济、人口分布等条件外，还与傣族有传统文字有关。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接受语言影响能力强弱不同的情况，即有的语言比较能吸收外来语成分，而有的语言则比较封闭，外来语成分不易进入。这种差别必定有其语言本身的原因，但究竟是何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研究语言影响，必须探讨制约语言影响的因素，分清主次，找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因为语言影响往往不是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几个因素共同起作用。在几个因素中，往往有一个因素最重要，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其他因素是从属的。究竟哪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则因不同的语言而异。

研究语言影响，还要区分语言影响的不同类型，确定不同类型的主要标志。研究语言影响还遇到一些理论问题：语言影响会不会引起语言质变，会不会产生混合语，一个语言受另一个语言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转变为混合语等。

## (二) 语言兼用，即双语现象 (bilingualism)

指一个民族除使用本族语言外，还兼用邻近一种或数种民族的语言。语言兼用是随着民族接触(语言接触)而产生的。一个民族当他与另一个民族发生密切接触时，就会感到有必要使用对方语言直接进行交际，就会自觉地从实际生活中学会掌握另一民族的语言。因而可以说，双语现象是在语言关系中诞生的，是随着语言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双语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还同民族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双语的概念，学术界曾有过以下一些提法。英国学者R·R·K·Hartmann和F·C·Stork 1972年出版的《语言和语言学词典》，认为双语是“个人或语言集团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1981年出版的《新韦氏英语词典》认为双语是“具有同等熟练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1957年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的《俄语词典》对双语的解释是：“在一个国家里，两种语言平等存在，通晓和使用两种语言。”1960年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的《语言学名词解释》一书对“双重语言制”的解释是：“指人们经常地、同样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以上论述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兼用另一语言究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称得上双语现象，是同等熟练，还是不同等，是通晓，还是基本掌握。二是指个人还是指一个语言集团，究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称得上是双语现象。

怎样划分双语类型？怎样确定某一民族的双语现象属何类型？由于民族的特点不同，语言特点不同，双语现象呈现出众多的类型，而且不同类型之间又有交叉，很难划分清楚。一般说来，双语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从范围上分，主要可分为全民型和局部型两种：全民型是指一个民族的全部或大部操用双语，如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属于这一类型。这个民族的大部分人都能操用基诺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局部型是指一个民族的部分

人操用双语，如彝族中有一部分人操用彝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纳西族中有部分人操用纳西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从程度上分，主要可分为熟练型和半熟练型两种。半熟练型是指掌握兼用语仅能达到对付日常生活一般用语的水平，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双语者属这一类型的占相当比例。如果从是否掌握文字来分，双语者又可分为双语和双语文两种类型。双语是指仅会另一民族的语言而不会文字，而双语文则指既会语言又会文字。从双语到双语文，这是一大进步，在教育质量上属于不同的范畴。在多民族国家里，还可按兼用什么语言划分双语类型。我国各民族兼用语言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少数民族兼用汉语型，属于这一类型的在各少数民族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兼用汉语的。二是少数民族兼用另一少数民族语言型，如新疆的哈萨克、蒙、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中都有一些人兼用当地使用人口较多的维吾尔语。三是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言型。如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的汉族，部分人兼用当地的藏语、羌语，云南省潞西县芒市镇附近的汉族居民有不少人兼用傣语。由于各民族交错杂居，所以有些民族内部双语使用的情况不同，分别兼用不同的语言。如内蒙古境内的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居住在牧区的多兼用蒙语，居住在城镇或与汉族杂居的多兼用汉语。蒙族分布在青海的，有是兼用藏语，分布在新疆的，有的兼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仡佬族居住在贵州省与彝族杂居的，兼用彝语，而分布在广西与壮族、苗族杂居的则兼用壮语或苗语。此外，双语类型还可以从时间上来划分。有的民族有较长的双语历史，如白族、壮族等；而有些民族双语历史较短，如景颇族。从地区上看，聚居区和杂居区不同，内地和边疆不同，城镇与农村不同，先进地区与后进地区不同。划分双语现象的不同类型，从中认识不同类型的特点，是研究双语现象的必要前提。

还要研究形成双语的客观条件。双语的形成，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其中主要有民族杂居、民族接触、移民、文化交流、语

言观念等。要探索不同民族形成双语的具体条件，并区分其中的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一般的规律。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少的少数民族为了更好地发展本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往往愿意兼用人口较多的民族的语言，形成一种普遍的双语现象。要探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制约双语发展的因素。①

### (三) 语言转用 (language shift)

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放弃母语而转用另一语言的现象称语言转用。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多民族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语言转用的现象。语言转用是由语言接触引起的，并与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存在密切的关系，因而是语言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②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语言转用存在不同的类型，它可以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分类。从转用的程度和范围上分，可分为整体转用型、主体转用型和局部转用型三种。整体转用型是指一个民族全部转用另一民族语言。如我国的回族历史上曾使用过阿拉伯、波斯等多种语言，七世纪陆续迁移到中国后，逐渐放弃原有的语言而转用汉语。主体转用型指一个民族大部分转用另一语言。语言转用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各地有先有后，从少到多，待大部分人已转用另一种语言时，即进入主体转用型。如畚族、土家族属这一类型，95%以上的人都已转用汉语。又如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中除少数老人能用本族语外，大多数人已转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局部转用型指一个民族的部分地区发生语言转用。这类例子很多，如东北的柯尔克孜族除少数老人外，都已转用汉语，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柯尔克孜乡的哈萨克族，年轻

① 马学良、戴庆厦《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4，4期。

② 参看戴庆厦、王新远《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载《语文建设》1987，4期。

人已转用柯尔克孜语。语言转用还可以从语言转用的对象来划分。在我国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少数民族转用汉语，少数民族转用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汉族转用少数民族语言。

造成语言转用的因素主要在社会方面，包括分布变迁、民族融合等。满族转用汉语是因为在分布上由原来的大块聚居变为同其他民族杂居，撒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中。畚族从14世纪起向闽东、浙南迁移，大部分人与汉族杂居，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促使他们发生语言转用。云南蒙古族转用彝语是因为离开了民族的主体与彝族居住在一起并相互通婚的缘故。至于转用什么民族的语言，则与人的多少、经济文化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多数情况是人口少的转用人口多的语言，经济文化水平低的转用水平高的语言。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军事的优势往往不能使语言成为优胜者。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少的一些民族曾在政治、军事上统治汉族，但其语言则被同化了，转用了被统治民族的语言——汉语。如南北朝的鲜卑族在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但鲜卑族语丧失了。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在历史上也曾建立过政权，但也都丧失其语言而转用汉语。满族曾统治了整个中国，但其语言却被汉语所代替。一般说来，一个民族放弃使用本族语言而转用另一民族的语言，都由其客观需要决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语言发展史上，使用强制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一部分）转用语言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就多数情况而言，语言转用则是由于民族之间的密切往来、杂居、移民、婚配等引起的，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强硬使已转用语言的民族恢复使用原有的语言，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

还要研究语言转用对语言的影响。一个民族转用另一种新语言，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地带进原有语言的一些特点，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轻者出现土语色彩，重者出现新的方言或新的语言。回族所说的汉语，夹杂了少量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语词，带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畚族所说的汉语客家方言与

当地所说的客家方言有些不同，表现在语音、语法、词汇各个方面，其中有些词与瑶族布努语、广东博罗畲语接近。<sup>①</sup>云南蒙古族转用彝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与当地彝族使用的语言都有一些不同，可以视为接近彝语的一种独立语言。<sup>②</sup>

#### （四）语言亲属关系

构成语言关系的语言，既可以是有亲属关系的，又可以是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亲属关系是发生学上的语言关系，反映了不同民族语言早期的相互关系。但存在亲属关系的语言，由于地理分布的相近性，语言之间容易出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就出现一些问题：语言亲缘关系的共同点和早期的语言影响不易区分。所以，只有科学地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才有可能进一步区分语言亲属关系和语言影响的界线。对于存在语言相互影响的亲属语言，要研究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特点和规律。

## 二、语言关系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

人类对语言的认识是从一个个具体语言到一般语言的。最初，人们只对古代文献语言如古印度语、古希腊语进行分析，于是产生了古代语文学。到了18世纪，随着对语言事实认识的不断增加，人们开始进行不同语言的比较，使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786年英国学者W·琼斯指出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存在系统的对应关系，于是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19世纪初，一些学者对各种语言的特征进行了分类，把世界诸语言分为孤立型、粘着型、屈折型和多式综合型四类，建立了类型语言学。在语言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中，人们认识到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对语言结构特点和语言发展变化存在一定的影

①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畲语概述》，载《民族语文》1982，1期。

②参看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云南蒙古族嘎卓语研究》，载《语言研究》1987，1期。

响。克里奥耳语或洋泾浜语言的发现，语言学家对混合语的研究产生了兴趣。从本世纪起，随着科学、教育的进步，因语言接触而引起的双语现象成为语言学家、教育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双语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课题。

语言学家通过语言事实的不断积累，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除了受内部本身因素制约外，还受外部因素制约，包括语言关系对语言的影响。语言关系所研究的内容、方法虽与历史语言学 and 描写语言学有一定的联系，但它自成体系，不属于二者。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以亲属语言的比较为基础的，它虽然也要联系语言的社会历史，但主要是研究语言自身的历史变化。描写语言学研究的是一个个语言的横断面特征，虽然也包括语言影响带来的语言变异，但主要是研究语言自身固有的结构特征。语言关系所研究的是民族接触、社会影响在语言上的反映，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当然，语言关系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语言描写基础上，同时要参考语言历史研究的成果。

我国各民族语言由于语言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种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自三十年代以来，探讨语言影响（主要是语词的借用）的论文不断出现。1984年，喻世长先生发表了《应该重视语言互相影响的研究》的重要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开展语言相互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喻氏认为：“语言互相影响的研究和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互相补充的。后者揭示语言分化的进程，前者揭示语言互相影响的进程。弄清了这两个进程在历史上如何先后交错出现，才能全面地认识语言发展规律。”“语言互相影响的研究和类型学的研究是互为表里的。通过类型观察到某些语言结构的改变，通过语言影响的研究推究引起改变的原因。两者结合起来，由表及里和由里及表，取得了认识的一致性。”“语言互相影响的研究结果为文化互相影响提供了证明，在语言史和文化史之间系上了一条纽带。”这些话精辟地论述了

语言关系研究在语言学中的重要地位。<sup>①</sup>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展了“语言关系”课题的研究,并于1988年主办了全国性的“语言关系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的论文编成了《语言关系与语言工作》一书,于1990年5月出版。在这本论文集里,论述了语言关系的概念、内容及我国语言关系的特点。在这同一时期,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还开展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课题的研究,于1990年出版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研究》一书,书中分析了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中的许多现象,并在理论上做了一些探讨。<sup>②</sup>近几年来,对语言关系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探索的问题越来越广,出现了一批论文。可以认为,语言关系这一概念已被语言学界所接受,今后必将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有所深化。<sup>③</sup>

## 第二节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 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

### 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关系 历史长,涉及语言关系的各个方面

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从零星的历史文献记载中能够看到,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很早就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西汉刘向《说苑》用汉字记载的《越人

<sup>①</sup>见《民族语文》1984年,2期。

<sup>②</sup>该书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增刊》形式于1990年11月出版。

<sup>③</sup>如李克郁《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载《民族语文》1987年3期,喜词嘉错的《语言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载《民族语文》1991年4期,欧阳觉亚的《运用底层理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载《民族语文》1991·6期。

歌》，经学者研究与壮侗语有关，歌中已有大量汉语借词。<sup>①</sup>

《后汉书》中记载的一段属于藏缅语族语言的一种古代语言的《白狼歌》歌辞中就出现了一些汉语借词，如“圣、德、臣、仆、危、险、言、仁、传、万、匹”等。<sup>②</sup>从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和18世纪的《五体清文鉴》等历史中能够看到当时的维吾尔语就已借用了一些汉语借词，如“皇历、大唐、龙、将军、道人、公主、大帅、弟子、桌子、铺子、珍珠、甲、升”等。<sup>③</sup>朝鲜语受汉语影响开始于公元前后。双语现象在我国也有很长的历史。据史料记载，魏晋以来进入中原的匈奴、氐、巴、羌等民族，不仅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不少人已学会汉语。《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氐族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多知中国语，由中国杂居故也。”又据金代史籍记载，辽代契丹境内的不同的民族，由于语言不同，相互交际“则各为汉语为证，方能辨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可见，当时的少数民族已有不少双语人。在我国历史上，语言转用时有发生，西夏人转用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就是一个例子。西夏王朝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所辖地区以古代党项族为主体还包括汉、藏、契丹、回鹘等民族。西夏文创制于西夏王朝建立前夕，曾有过一段广泛使用的时期，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献。但随着西夏王朝的灭亡，西夏人逐渐转用了其他民族的语言。

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关系，涉及语言关系的各个方面，如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等。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如语言兼用中既有全民型，又有局部型，既有熟练型，又有半熟练型等。从总体上看，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是双向的、

<sup>①</sup> 丰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初探”，载《民族语文论集》198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up>②</sup> 马学良、戴庆夏《白狼歌研究》，载《民族语文》。

<sup>③</sup> 此材料取自陈宗振《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周汉语借词的探讨》，载《民族语言研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

相互的。即不管什么语言，它既能影响别的语言，也会受别的语言影响，这个民族能兼用那个民族的语言，那个民族也能兼用这个民族的语言。小民族可能转用大民族的语言，大民族也可能转用小民族的语言。汉语虽然曾广泛地影响过少数民族语言，但也曾不断地从少数民族语言里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如汉语里的“站、可汗、喇嘛、哈达、坎土曼、馕、巴乌、桑、摆、勐”等都是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借来的。汉语的一些方言如粤方言、闽方言、青海汉语、新疆汉语里都能找到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成分。当然，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向关系中，存在着主次之分，即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一般大于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人数多于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数。

## 二、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关系 是由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决定的

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布局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形成。据考古学发现，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就已明显地反映出不同民族集团的地理分布，这就是：“在仰韶文化及其反映出来的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夏或华夏民族集团；在大汶口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东夷民族集团；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南蛮民族集团；在新乐下层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北方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北狄和东北地区的民族集团；在马家窑文化和西部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和相互关系中，逐渐形成新的民族集团。”<sup>①</sup>

<sup>①</sup>引自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

在众多的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夏族或华夏族文化较高、发展较快，最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族因地位居中，称其四方之民族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些民族集团是我国现代诸民族的先民，每一个名称都包含多种民族成分。那时，各民族之间，已经相互影响，形成了民族关系，而夏族或华夏族在这种民族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秦统一中国，我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了汉朝，夏族改称汉族。从那时起，汉族的活动地域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中心，并扩展至全国各地，汉族与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尽管朝代不断更替，汉族在一个时期处于被统治地位，但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仍然不变，成为民族关系中的一条主线延续了下来。

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关系始终制约着各民族语言的发展。自秦以来，汉语文也是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已出现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后汉明帝永平（58—75年）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大力宣传汉朝政策，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白狼王、唐菽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诗中歌颂了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表达了他们心向汉朝的决心。这首诗曾由一个叫田恭的官员“译其辞语”，并由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到当时的都城洛阳，在朝廷的一次宴会上唱出。这就是史籍记载的流传至今的《白狼歌》。明清两代，由会同馆和四夷馆（清初改为四译馆）编纂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的辞书，总称华夷译语。少数民族语言中有蒙古、女真、高昌（畏兀儿）、西番（藏）、保保（彝）、壮、百夷（傣）等。<sup>①</sup>清代又编印了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种对照的分类词汇集《五体清义鉴》。

---

<sup>①</sup> 还包括一些外国语言，如缅、越南、日本等语言。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语言关系随着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的不断加强，客观上需要有一种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工具。汉语实际上已成为这样一种交际工具。近几十年，各民族兼用汉语的人数大幅度地增长，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双语人已成为普遍现象。在一些杂居区，年青一代转用汉语的现象比过去有所增加。在语言影响上，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各少数民族语言都以汉语做为丰富自己的主要源泉。过去，一些曾以其他语种为吸收对象的语言，解放后，逐渐改变为以汉语为主要吸收对象。如分布在我国西南边疆的景颇族语言，解放前主要从缅甸语、傣语里吸收词汇来丰富自己，解放后改变了这个方向，主要从汉语吸收借词，汉语借词大量增加。布朗、德昂、佤等语言也有类似情况：过去借傣语词多，近几年开始转为借汉语。这个共同的趋势，今后将会随着民族团结的加强以及四化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出现新的内容。

### 三、制约语言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制约语言关系的因素有人口多少、分布特点、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文化、民族心理、宗教等，其中人口多少是主要的，常常是决定的因素。人口少的语言，易受人口多的语言影响，前者容易兼用、转用后者的语言。在广西，壮族是一个人口最多的民族，与壮族分布在一起的瑶族、毛南族、苗族等有些人兼用或转用壮语。青海境内的保安语、土族语，都受使用人口较多的藏语的影响。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由于傈僳族人口最多，居住在这里的怒族、独龙族、白族、景颇族等，许多人都兼用傈僳语，傈僳语成为这个地区各民族之间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之一。

在我国，就多数情况而言，人口多的民族，在社会发展上比人口少的民族快，即人口多少与社会发展快慢成正比。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人口少的民族，在社会发展上反而比人口多的民族

快。在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下，人口多少的因素往往比社会发展快慢更有影响力。如上所述，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统治过全国或一部分地区，但却未能扩大其语言使用范围，更没有可能使其语言成为各族的族际语，甚至有的还经不起人口多的语言的包围，经不起语言功能竞争的考验，逐渐走向消亡。满族统治阶级统治了汉族，不可不谓强大，但其语言则被汉语所代替了。清王朝顺、康、雍、乾前四朝，满语文兴盛发达，到了乾隆末期开始走向衰落，而与到清末则已基本消亡。从兴盛到消亡，前后不过二百多年历史。清朝统治者曾称满语文为“国语”、“国书”，在清初曾想使满语文成为全国通用的语文字，但这一政策由于违反客观规律，不久就失去作用。在一些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如果那里的少数民族较多，长期在那里定居的汉族则会因为人口少而兼用少数民族语言。如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的汉族，在那里定居已有较长的历史，不仅生活习俗已与当地的藏族、羌族相同，而且还兼用藏语、羌语。新疆伊犁自治州的锡伯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比周围的民族高，但由于人口少加上经济活动对外开放的需要，大部分都会兼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

## 第二章 汉藏语系语言的亲属关系

### 第一节 汉语与藏缅语的亲属关系

在“汉藏语系”这一仍有待于科学证明的假说中，汉语与藏缅语的关系似乎不同于汉语与苗瑶语、侗台语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语言、人文等方面对汉语与苗瑶语、侗台语的亲缘关系提出了怀疑，甚至明确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亲缘关系。而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学者对汉语与藏缅语的亲缘关系提出过怀疑。尽管目前语言学界尚未对这种亲缘关系提供过全面而系统的科学论证，但大家在考虑这一问题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汉语和藏缅语之间虽然缺乏像汉语与苗瑶语、侗台语之间那种显而易见的类型上的共同性（如相同的语序、单音节性、关系词有语音对应），但在貌似疏远的共时关系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密切的历时关系。而这种历时关系的古老特征，用于证明其远古的亲缘关系似乎更为合理、更为有力。

一百年来藏缅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寻找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历时关系是十分艰难的。众所周知，藏缅语绝大多数语言都没有反映古代语言特征的历史文献，可供我们了解这些语言的历史面貌的材料很少，所以我们只能侧重于分析这些语言的现状特征，从共时的比较研究中向前追溯它们的发展规律、发展倾向上的异同，并对它们的历史渊源关系做些可能的推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套方法，对研究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有的适用，有的则不适用。我们应当从具体语言实际出发，探求适合汉—藏缅语研究的方法。汉藏语言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探求

汉语与藏缅语的亲缘关系提供可靠的科学论据，并建立适合这些语言特点的方法论。

对汉语和藏缅语共时特征作详尽系统的描写，是了解二者历时关系的先导和基础，也是研究汉语和藏缅语关系的必经之路。相同的共时特征中，有些可能只是类型上的相同，而有些则可能是亲缘关系的反映。下面主要根据已有的众家研究成果，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对汉语和藏缅语的亲缘关系作一科学探讨，力图从诸多要素的关系中证明其亲缘关系。

## 一、语音

汉语和藏缅语的音节一般都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极少数语言除外），声、韵、调三位一体，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构成独特的语言系统。一群亲属语言，往往都在一些主要的语音特点上体现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根据这些特点进行比较，能较清楚地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汉语和藏缅语在声母清浊、复辅音、韵尾等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和相同的发展规律。

1. 清浊：声母分清浊是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特征。清浊由对立发展为不对立也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的演变规律。从发展特点来看，塞音、塞擦音、擦音与鼻音、边音的清浊有所不同。

塞音、塞擦音、擦音：现代汉语大多数方言中，除少量擦音上有清浊对立外，清浊对立大多已消失，只有吴方言和湘方言的老湘语仍存在全浊声母。如“爬”，苏州话念 $\text{pbo}$ ，湖南双峰话念 $\text{pbo}$ ，再如“时”，苏州话念 $\text{ʑz1}$ ，湖南双峰话念 $\text{ʑdz1}$ 。清浊对立消失后，在北方方言和粤方言中依声调的平仄不同而转换为送气不送气的对立，浊音清化后，平声变送气，仄声变不送气；在客、赣方言中，不论平仄，浊音大多变为送气清音；而在闽方言和新湘语中则大多变为不送气清音。如：

北京 广州 梅县 南昌 福州 长沙 汉字

ɔpʰa ɔpʰa ɔpʰa ɔpʰa ɔpʰa ɔpa 爬

tiŋ<sup>0</sup> tliŋ<sup>0</sup> t'in<sup>0</sup> t'en<sup>0</sup> tiŋ<sup>0</sup> tin<sup>0</sup> 定

ctɕi kik<sub>0</sub> k'it<sub>0</sub> tɕ'i<sub>0</sub> kik<sub>0</sub> tɕi 急

藏缅语族语言中，清浊对立分布很不平衡，藏、羌、景颇、彝几个语支绝大多数语言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都保留清浊对立，而缅语支语言（缅语除外）、景颇语支的景颇语以及藏语支的拉萨藏语，在塞音、塞擦音上浊音已清化，只在少量擦音上保留清浊对立。清浊对立消失后，有的转变为送气、不送气或声调高低的对立。如拉萨藏语：

康方言（德格话）	卫藏方言（拉萨话）	汉义
ko <sup>13</sup>	kho <sup>12</sup>	听见
go <sup>13</sup>	ko <sup>12</sup>	门
so <sup>53</sup>	so <sup>54</sup>	养
zo <sup>13</sup>	so <sup>12</sup>	制

有的则转化为元音松紧的对立，浊声母使元音变松，清声母使元音变紧。如载瓦语：

彝语	哈尼语	载瓦语	汉义
dzu <sup>33</sup>	dza <sup>31</sup>	tso <sup>21</sup>	吃
do <sup>33</sup>	dɛ <sup>33</sup>	to <sup>221</sup>	上
tɕo <sup>56</sup>	tɕa <sup>31</sup>	tʃo <sup>255</sup>	煮
tu <sup>31</sup>	thu <sup>56</sup>	to <sup>256</sup>	起

鼻音、边音：现代汉语各方言中，绝大多数土语没有鼻音、边音的清浊对立，一般有浊无清，只有少数土语中还保留清边音l。如粤方言的部分地区，古“心”母字都念l。南宁话将“所”念为<sup>c</sup>lɔ， “新”念为c|an。然而，据古音韵学家的研究，上古汉语中很可能存在套清鼻音（\*hm-、\*hn-、\*hng-、\*hngw-）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

以及清边音 (\*hl-, \*hlj-)。<sup>①</sup>构拟这一套清音的主要依据是声母互谐的规律，互谐的例证以清音的演变规律可归纳如下表：

清声母拟音	例 证	清声母演变规律
*hm-	每 muâi——悔 xuâi 勿 mjuət——忽 xuət 民 mjien——昏 xuən 墨 mək——黑 xək	上古 *hm- > 中古“晓” 母 x-
*hn-	能 nəng——恣 thâi 难 nân——推 thân 纽 njəu——丑 thjəu 馁 nuai——妥 thua	上古 *hn- > 中古“透” 母 t- 中古“徹” 母 t-
*hng- *hngw-	午 nguə——许 xjwo 讹 nguə——化 xwa 虐 ngjak——谗 xjak 羲 ngjə——牺 xjə	上古 *hng-, *hngw- > 中古“晓”母 x-
*hl- *hlj-	赖 lai——賴 that 礼 liei——体 thiei 林 liəm——緜 thjəm 留 ljəm——溜(同抽) thjəu	上古 *hl-(一、三、四 等字) > 中古“透”母 t'- 上古 *hlj-(三等字) > 中古“彻”母 t'j

藏缅语中一部分语言的鼻音、边音还保留着清浊对立。如缅甸语、阿昌语、怒语、彝语、普米语、藏语(昌都、德格)。清鼻音一般有  $m$ 、 $p$ 、 $ɸ$ 、 $ŋ$ ，它们出现的频率高低可依次排列为  $p > m > ɸ > ŋ$ 。至于清鼻音的来源，据研究，很可能源于古代的“s + 浊鼻音”，在一些语言中仍可发现这一对应规律。如：

古代藏语	道孚话	德格话	阿昌话	汉义
sna	sha	pa <sup>55</sup>	paŋ <sup>55</sup>	鼻子

snɿŋ                      snoŋ    ɲi<sup>55</sup>                      ʔa<sup>55</sup>lum<sup>31</sup>                      心

有些语言中，还利用鼻音清浊的交替来区别“自动”和“使动”。如阿昌语：ɲɔp<sup>55</sup>“沉”→ʔɔp<sup>55</sup>“使沉”，ne<sup>31</sup>“似”→ɲe<sup>31</sup>“使近”。藏缅语中动词“态”的范畴是古老特征的遗留，由此也可见到清浊鼻音对立的古老性。

保留清浊鼻音对立的语言均保留清浊边音的对立，反之则不然。在有些藏缅语中，有清边音，但没有清鼻音。清边音似乎比清鼻音消失得晚一些。如基诺语和哈尼语部分方言已没有清鼻音，但还保留较多的清边音：

基诺语	哈尼语 (豪尼)	汉义
lɔe <sup>55</sup>	la <sup>31</sup>	晒
lʌ <sup>44</sup>	lv <sup>31</sup>	船
lʌ <sup>33</sup> tsho <sup>33</sup>	lo <sup>31</sup>	裤子

从亲属语言的语音对应看，边音清浊对立的消失，有的转化为声调的高低（清高浊低），如傈僳语；有的则转变为浊边音和清擦音的对立，如拉祜语。例如：

怒语	傈僳语	拉祜语	汉义
la <sup>53</sup>	le <sup>55</sup>	xu <sup>35</sup>	晒
lu <sup>53</sup>	lo <sup>55</sup>	xɔ <sup>35</sup>	牧
liw <sup>33</sup>	lu <sup>31</sup>	lo <sup>53</sup>	龙
la <sup>33</sup>	la <sup>33</sup>	la <sup>31</sup>	来

而鼻音清浊对立的消失，有些转化为声调的高低，如拉祜语（例一），有些则转化为元音的松紧，如载瓦语（例二）。例如：

例一：

彝语	拉祜语	汉义
na <sup>33</sup>	na <sup>31</sup>	病
mu <sup>33</sup>	no <sup>31</sup>	你
ŋa <sup>33</sup>	na <sup>33</sup>	问
a <sup>33</sup> pi <sup>33</sup>	ni <sup>33</sup>	红

例二：

阿昌语	载瓦语	汉语
no <sup>21</sup>	no <sup>21</sup>	停
ŋo <sup>21</sup>	iŋo <sup>21</sup>	五
ŋap <sup>55</sup>	nap <sup>55</sup>	鼻涕
ŋot <sup>55</sup>	nut <sup>55</sup>	嘴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与藏缅语各语言在清浊对立上有些共同点：清浊对立由少到多；塞音、塞擦音、擦音留清失浊，而鼻音、边音则留浊失清；清浊对立消失后，部分转化为送气、不送气的对立，并且与声调高低密切相关。但是，二者也有许多差异：藏缅语的清浊对立比汉语更普遍，保留浊音系统更完整，尤其是清鼻音、清边音；清浊对立消失后，转化为松紧元音的对立，这是藏缅语部分语言特有的现象。至于在清浊特征上汉语与藏缅语是否有同源关系，则有赖于进一步寻找二者的语音对应规律。

## 2. 复辅音

现代汉语各方言中，除个别土语保留少量的“鼻音+塞音”的复辅音(如粤方言四邑片的mb-、ŋg-)外，一般只有单辅音声母，研究古音的学者认为，中古汉语也没有复辅音，上古汉语则可能有复辅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上古拟音系统中虽没有复辅音声母，但为有些字拟音时却出现复辅音。如“律”的拟音声母为\*bl-李方桂先生对上古声母复辅音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对“来”母字谐声的研究，他认为“来母字的谐声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来母字常跟舌音谐声，像：篮l——监k，很早便有人注意到这种谐声的情形，这大概是代表古代汉语有一个复声母，它既不是k-，也不是l-而是kl-那一类的音。此外，l-也有跟唇音声母字谐声的，有些人也认为上古有bl-、pl-、ml-等复声母。这种情形也有可能。”<sup>①</sup>

<sup>①</sup>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02页。

藏缅语族诸语言复辅音发展很不平衡，羌语支语言复辅音十分丰富，如嘉戎语有202个，而道孚语则有252个，不仅有pt-、sk-、ɣp-、kl-之类的二合复辅音，还有spr-、zgr-、mbr-、wzd-之类的三合复辅音。彝语支语言（如彝语、纳西语）保留mb-、nd-、ndz-、ɲdz-、ŋg-等带前置鼻音的复辅音（其中的鼻音常被称为“鼻冠音”，发音部位与后面的辅音相同）。景颇语支和緬语支语言则保留pr-、khr-、mr-、pl-、khl-、ml-这两类复辅音（景颇语、阿昌语将pr-这类复辅音处理为带卷舌的单辅音）。现代藏语各方言的复辅音趋于简化，而公元8世纪前后的藏文中却保留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复辅音。在1000余年的时间内，由于前缀音的大量脱落和音素的合并，使得藏语的声母系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古今藏语复辅音简化的主要规律如下表：①

古 代 藏 语	现代藏语拉萨方言
dm-、rm-、sm-、smr-	m
gn-、mn-、rn、sn-、bm-、bsn-、	n
gt-、bt-、rt-、lt-、st-、brt-、 blt-、bst-、gd-、bd-、md-、fd-、 rd-、ld-、sd-、brd-、bld-、bsd-、 zl-、bzl-	k
kw-、dk-、bk-、rk-、lk-、sk- brk-、bsk-、bg-、dg-、mg-、fg-、 rg-、lg-、sg-、brg-、bsg-	k

① 《汉藏语概论》第1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复辅音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甚至完全消失。演变的具体方式非常复杂,主要有脱落、合并、分化三种。①脱落是复辅音发展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方式,从亲属语言在一些基本词汇的语音对应上可发现这一点。如:

古代藏语	拉萨藏语	木雅	缅	独龙	汉义
dgul	ŋy <sup>55</sup>	ŋu <sup>53</sup>	ŋwe <sup>22</sup>	ŋül <sup>55</sup>	银
ltags	tḥa <sup>253</sup>	ḥe <sup>53</sup>	tḥä <sup>22</sup>	ḥäm <sup>53</sup>	铁
rku	ku <sup>53</sup>	ku <sup>55</sup>	kho <sup>55</sup>	ku <sup>55</sup>	偷
skar ma	ka <sup>55</sup> ma <sup>13</sup>	dzi <sup>55</sup> vu <sup>33</sup>	tḥe <sup>22</sup>	güt <sup>55</sup> mät <sup>55</sup>	星星

“合并”这一方式主要出现在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这种类型中。如从11世纪的缅甸碑文到现代仰光话所发生的音变:kl、kr→tḥ, gl、gr→dz, khl、khr→tḥh, gl、gr→ŋ。例词如下:

缅文	缅语 (仰光)	汉义
klam <sup>55</sup>	tḥä <sup>55</sup>	经典
krak <sup>55</sup>	tḥe <sup>255</sup>	鸡
groh <sup>53</sup>	dzo <sup>53</sup>	星辰
ŋrim <sup>55</sup>	ŋi <sup>55</sup>	安静

“分化”是指复辅音各自形成新的音节。最常见的是二合复辅音单音节分化为双音节。如:

藏文	独龙语	景颇语	汉义
dgu	ḍu <sup>31</sup> gu <sup>53</sup>	tḥä <sup>31</sup> khu <sup>31</sup>	九
gsum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mä <sup>31</sup> sum <sup>31</sup>	三
sram	su <sup>31</sup> ḥäm	ḥä <sup>31</sup> zam <sup>33</sup>	水獭
mkhris pa	tḥi <sup>31</sup> ḥpi <sup>55</sup>	sä <sup>31</sup> kzi <sup>31</sup>	苦胆

现代汉语和现代藏缅语在保留复辅音这一特征上差异极大,比较一下中古汉语和公元8世纪左右的藏文,同样可看到这种迥

① 参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第5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异的情况。以数目字“一”至“十”为例：“一”：iət（中古拟音，下同）—gtəig（藏文转写，下同），“二”：nɛi—gnis，“三”：səm—gsum，“四”：siet—bzi，“五”：ŋa—lŋa，“六”：liəuk—drug，“七”：tshiət—bdun，“八”：pət—brgjad，“九”：kiəu—dgu，“十”：ziəp—btəu。这10个数目字中，古藏语全部是复辅音，而中古汉语则一律是单辅音，除“一”、“七”外，其它8个词的声母有对应关系，其中，除“四”和“十”外，其它6个词的韵尾是舒声对舒声，促声对促声，同源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以推测，中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比当时的藏缅语的声母系统简单得多。从古音学家的拟音来看，①上古和中古汉语的声母拟音与藏缅语复辅音的历时、共时面貌悬殊的差别，是很难解释的，也是主张汉—藏缅同源的论点需要予以说明的问题。

### 3、辅音韵尾

在辅音韵尾上，汉语与藏缅语存在较多的共同性，不仅有共同的发展趋势而且能找出一部分同源词及语音对应规律。这是证明汉—藏缅同源的一个重要证据。

现代汉语各方言中，粤方言大部分地区和闽南方言部分地区（如厦门话）还完整保留-m、-n、-ŋ、-p、-t、-k6个韵尾，闽南方言还有-ʔ韵尾。如广州话：cɿam“心”、cɿan“新”，cɿɛŋ“声”、jipɿ“叶”、kitɿ“杰”、likɿ“力”。厦门话：clam“南”、cpun“本”、ctaŋ“东”、tsapɿ“十”、tsit“植（一）”、pakɿ“北”、peɿ“佰”。分布在粤、台、桂等省的客家话也保留得比较完整。如梅县话：ckam“甘”、ethən“团”、csiəŋ“醒”、kapɿ“鸽”、thotɿ“夺”、siak“锡”。湘方言和北方方言消失得最快，只保留-n、-ŋ两个韵尾。吴方言和一部分闽方言的塞音韵尾只保留-ʔ。赣方言韵尾保留情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12页。

况很不平衡，与客家话、闽方言并存地区的赣方言还保留-m、-n、-ŋ、-p、-t、-k(-ʔ)韵尾，其中南平话还保留-l尾，如kul<sub>o</sub>“骨”。

藏缅语族语言的辅音韵尾分布很不平衡，羌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语言一般都保留塞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其中，羌语的麻窝话是整个语族中保留韵尾最多的一种，共有44个，除-p、-l、-r、-tʂ、-ʂ、-x之类的单辅音韵尾外，还有-st、-zd、-rb、-rg、-ʂp、-ʂk、-xs、-xtʂ、-xtʃ、-yz、-yl、-ydz、-yz、-xp、-xs、-xl、-xʂ、-ɛdz、-ɛz、-ɛdz、-ɛl等22个复辅音韵尾。如tʂəyz“沙子”、pəʂk“今年”。藏语中，安多方言久治话保留8个，而康方言只保留一个-ʔ。彝语支语言基本上脱落了所有辅音韵尾，成为“开音节语言”。

由上可知，汉语和藏缅语辅音韵尾的分布都不平衡，也都存在着由繁到简、由多到少的发展趋势，并且还具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即发音部位的“后移”，塞音韵尾的“后移”表现为-p、-t、-k转化为喉塞音-ʔ，鼻音韵尾的后移则体现为鼻韵尾向鼻化元音转化（发鼻化元音时软腭起主要作用）。

塞音韵尾：中古汉语的-p、-t、-k韵尾到现代汉语吴方言中变为-ʔ。如上海话：loʔ“绿”、oʔ“屋”、soʔ“叔”、tʂiəʔ“七”、siəʔ“息”。闽南方言厦门话虽保留-p、-t、-k韵尾，但据罗常培先生研究，也存在着向-ʔ转化的趋势。如文读改白读时，多数情况下都改为-ʔ。古代缅甸语的-p、-t、-k韵尾到现代仰光话中也变成了-ʔ。如“针”：ap→a<sup>ʔ66</sup>、“站”：rap→ja<sup>ʔ66</sup>、“杀”：sat→tθa<sup>ʔ66</sup>、“黑”：nak→ha<sup>ʔ66</sup>。

古代藏语的-p、-t、-k韵尾到现代藏语各方言中，有的还保留（如阿力克话），有的则只有-p、-ʔ（如拉萨话），有的则全部转化为-ʔ（如德格话）。例如：

古代藏语	阿力克话	拉萨话	德格话	汉义
khab	khap	khəp <sup>64</sup>	kha <sup>ʔ64</sup>	针

skad	rkat	kɛ <sup>ʔ64</sup>	kɛ <sup>ʔ64</sup>	话
srog	sok	so <sup>ʔ64</sup>	so <sup>ʔ64</sup>	生命

古代的塞音韵尾在现代各语言或方言中，有些简化，有的则完全脱落，脱落后，主要有三种情况：①促声特征仍保留，并自成一个入声调类；②转化为元音的松紧；③不保留任何促声特征，完全融入舒声韵之中。如北京话的“入派三声”。三种情况中，第一种最能体现汉语与藏缅语塞音韵尾发展的共同规律。汉语的湘方言、闽北方言及藏缅语族中的怒语都具有这一特征。如，长沙话和福建建瓯话的入声调都对应于中古汉语的促声韵尾：

中古汉语	长沙话	建瓯话	汉义
lap	na	la	腊
kəp	ko	kɔ	鸽
kăt	ko	kɔ	割
thuăt	tho	tho	脱
kăk	ko	kɔ	各
thăk	tho	thɔ	托

怒语的53调只出现在紧元音上，而紧元音基本上来源于古藏缅语的塞音韵尾，与古藏文和保留塞音韵尾较多的现代语言（如独龙语）相比，大多也与促声韵尾对应。怒语的促声韵尾尽管完全消失，但促声特征却通过紧元音和促声调保留下来。如：

古藏文	独龙语	怒语	汉义
srub	sɔp <sup>55</sup>	suɕɿ <sup>53</sup>	擦
khab	ap <sup>55</sup>	ʎa <sup>53</sup>	针
brɣjad	cat <sup>55</sup>	βɔɿ <sup>53</sup>	八
mig	mɛ <sup>ʔ55</sup>	mɿɔ <sup>53</sup>	眼

至于塞音韵尾转化为紧音，则是藏缅语独有的特征。该语族中有塞音韵尾的语言（如古藏语、载瓦语）同无塞音韵尾的彝语支语言（如哈尼语、傣语）相比，一般是塞音韵尾与紧元音相对，舒声韵尾与松元音相对。如：

古藏语	载瓦语	哈尼语	傈僳语	汉语
bsad	sat <sup>65</sup>	se <sup>31</sup>	se <sup>31</sup>	杀
drgjad	ʃit <sup>65</sup>	ɕe <sup>31</sup>	he <sup>31</sup>	儿
nag	no <sup>231</sup>	na <sup>31</sup>	ne <sup>33</sup>	黑
phag	va <sup>221</sup>	a <sup>31</sup> ra <sup>31</sup>	a <sup>55</sup> ve <sup>31</sup>	猪
dgu	kau <sup>21</sup>	yɿ <sup>31</sup>	ku <sup>33</sup>	九
rku	khau <sup>21</sup>	xy <sup>31</sup>	khu <sup>31</sup>	偷

戴庆厦先生在《藏缅语辅音韵尾的发展》一文中归纳出藏缅语塞音韵尾的演化公式：“多种塞音韵尾(-p、-t、-k)→单一塞音韵尾(-ʔ)→-ʔ与紧喉元音共存→无塞音尾(元音或为紧元音)”<sup>①</sup>。汉语塞音韵尾的演化公式则大致可归纳为：

以单一的入声调存在(有的保留-ʔ)

-p、-t、-k→-ʔ→

-ʔ消失，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

**鼻音韵尾：**现代汉语各方言中，多少都保留一定的鼻音韵尾。其中，北方方言和吴、湘、赣等方言中只保留-n、-ŋ尾，m已消失，并入-n中，但-n和-ŋ在许多地方都有合流的现象。吴、湘、赣方言中普遍存在-ən和-əŋ不分、-in和-iŋ不分的现象。粤、客家、闽南方言中则完整保留着-m、-n、-ŋ三个韵尾。

藏缅语族诸语言的鼻音韵尾分布很不平衡，归纳起来有5种类型：①保留-m、-n、-ŋ，如景颇语、载瓦语、独龙语、阿昌语；②保留-m、-ŋ，如藏语拉萨话；③保留-m、-n、-ŋ，并有一套鼻化元音，如波拉语；④没有鼻韵尾，只有鼻化元音，如缅甸语；⑤没有鼻韵尾，也没有鼻化元音，只有纯粹的口元音，如彝语、哈尼、傈僳语(少数方言例外)。

一般看来，-m、-n、-ŋ三个韵尾中，-m消失得较快，其次是-n，-ŋ则相对稳定一些。如汉语赣方言的南昌话只保留-n和

<sup>①</sup> 《藏缅语语言研究》第42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

-ŋ, 古以的-m已并入-n, “感”念kon<sup>213</sup>、“监”念kan<sup>42</sup>。闽方言仙游话只保留-ŋ, 古代的-m、-n部分转化为-ŋ, 部分演变为元音的鼻化成分, 如naŋ<sup>24</sup>“南”、thaŋ<sup>55</sup>“贪”、tɕ<sup>55</sup>“担”。但也有-n、-ŋ先消失, 变为鼻化元音, 保留-m的情况。如藏语拉萨话, “三”: gsum(古代藏语一下略)→sum<sup>55</sup>(拉萨话一下略)、“七”: bdun→tɿ<sup>14</sup>、“千”: stoŋ→tō<sup>55</sup>。不管-m、-n、-ŋ中哪个先消失, 消失的快慢如何, 都要经过元音鼻化这一阶段, 这是汉语和藏缅语鼻音韵尾发展的共同规律。“多种鼻韵尾(-m、-n、-ŋ)→鼻音韵尾简化→鼻音尾和元音的鼻化共存→元音鼻化→口元音(鼻化消失)”<sup>①</sup>这一演变公式既适合于藏缅语, 也适合于汉语(汉语还未出现鼻化元音完全转化为口元音的方言)。

例一:

古代缅语	载瓦语	现代缅语	傣傣语	汉义
im	jum <sup>51</sup>	ēi <sup>11</sup>	hi <sup>33</sup>	房屋
khjon	tʃhun <sup>51</sup>	tɕhũ <sup>22</sup>	tshe <sup>36</sup>	尖
khjaŋ	tʃin <sup>51</sup>	tɕhĩ <sup>22</sup>	tʃu <sup>44</sup>	酸
mraŋ	mjaŋ <sup>51</sup>	mji <sup>53</sup>	mo <sup>44</sup>	高

例二:

中古汉语	厦门话	北京话	兰州话	汉义
kam	kam	kan	ɕkē	甘
kiwam	kiam	tɕian	tɕiǎ	剑
pean	pan	pan	pē	班
nien	dian	nian	liē	年
nian	diŋ	nian	liǎ	娘
kuaŋ	kuŋ	kuaŋ	kuǎ	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汉语与藏缅语族语言在辅音韵尾的发展上有许多共同性。通过比较一些基本词汇可以发现, 尽管在

① 戴庆厦《藏缅语族语言研究》第49页。

一些具体词上有例外，但也存在着下面的主要对应规律。中古汉语的促声韵、阳声韵、舒声韵分别对应于藏缅语族语言的促声韵、阳声韵和舒声韵。如：

中古汉语	古代藏语	景颇语	阿昌语	汉义
pət	brgjad	mă <sup>31</sup> tsāt <sup>55</sup>	ōet <sup>55</sup>	八
jeāt	grod	sat <sup>31</sup>	sat <sup>55</sup>	杀
siək	srog	n <sup>31</sup> sa <sup>231</sup>	sɔ <sup>255</sup>	(气)息
miəuk	myig	mji <sup>231</sup>	ŋɔ <sup>255</sup> tsi <sup>231</sup>	自
sam	gsum	mă <sup>31</sup> sum <sup>53</sup>	sum <sup>31</sup>	三
ɬiam	tshwa	tʃum <sup>31</sup>	tɕhɔ <sup>31</sup>	盐
ðiwɔŋ	rdzog	thu <sup>31</sup>	thoŋ <sup>31</sup>	春
dian	riŋ-po	kă <sup>31</sup> lu <sup>31</sup>	seŋ <sup>55</sup>	长
ŋa	ŋa	ŋai <sup>33</sup>	ŋɔ <sup>55</sup>	我
slei	ɕi	si <sup>33</sup>	ʃi <sup>55</sup>	死

这里再谈谈声调问题。汉语和藏缅语族绝大多数语言都以声调作为区别意义的重要手段。过去，人们总把声调的存在作为汉藏语同源关系的重要证据，但近期的研究证明，二者在声调的来源及其发展上差异很大，似无共同来源。

汉语声调的研究比较深入，但也只停留在上古阶段。一般认为，上古汉语已有了声调，但到底有几个声调，则没有一致的看法。清代顾炎武认为古有四声，“四声一贯”；段玉裁认为无去声，只有平、上、入三声；周祖谟先生也主张有四声；王力先生则认为上古声调分平、入两类，每类各分长短，舒而长的是平声，舒而短的是上声，长入到中古变去声。到了中古汉语，一般认为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发展到现代各方言，普遍都经历了分阴阳的过程，但四声演变则很不整齐。总的看来，北方方言声调演变的主流是入声消失，声调数目减少，一般有4个，有的减少到3个，如银川话。其余的6个方言都因保留古入声，又

以声母的清浊和送气、不送气为条件进行分化，所以声调数一般在6个左右，甚至更多。如广西博白话有10个声调（入声分为4个调），广州话有9个声调（入声分为3个调）。

藏缅语族语言的声调情况更为复杂，更不平衡。从现状来看，绝大多数语言都有声调，一般是3到4个，少数也有8个的，如白语。少数语言还没有独立区别意义的声调，只有一种习惯的音高。如门巴语、珞巴语、羌语。从历史发展看，影响声调产生和分化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声母的清浊，复辅音前置辅音脱落，韵尾的变化。但具体语言的情况也不一致。目前，有些语言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较清楚，如藏语。一般认为，现代藏语的声调来源于古藏语，声母的清浊，即古清浊声母对立的消失导致高低调对立的产生，声调的进一步分化则与韵尾的舒促有关。至于声调产生的原因，则认为声调是前置辅音和辅音韵尾大量脱落后的一种补偿手段。

亲属语言之间声调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同语支的语言之间声调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有的甚至有很严整的对应规律，但却很难找到清楚的分化条件。所以，语支的调类尚未求出，以怒语的4个声调为例，它们与缅甸语、载瓦语、哈尼语、傣傣语、彝语的声调对应如下：

语言 舒 促	怒	缅	载瓦	哈尼	傣傣	彝
促声调	53	55	55 22	31 33	31 55/33	55 33
舒声调	55	53	21	31	31	33
	33	53	51	55	33	33
	31	55 33	55 51	33 55 31	33	31 33

通过比较研究怒语和缅、彝语支语言的声调得出下列结论：

1、声调因韵尾舒促而分化，促声调在缅语支语言中与塞音韵尾共存，在彝语支语言和怒语中则依附于紧元音上，而舒声调则与缅语支语言的舒声和彝语支语言的松元音联系在一起，这是彝、缅语声调分化的主要规律。2、各语言舒、促两调分化不一致，怒语、缅语的促声调仍未分化，还自成一调，而其它语言都已分化为2到3个调，分化条件不清楚。3、各语言之间没有像汉语“四声各分阴阳”那样的规律，高调可对应于低调，低调也可对应于高调。怒语、缅语的许多清声母出现在低调上，而许多浊声母却出现在高调上，不同于一般语言的“清高浊低”的规律。这很可能说明在声调分化的某一阶段复辅音脱落的影响大于清浊的影响。

既然语支的调类都难以确定，整个语族的调类就更难寻求了。如前所述，有些语言至今仍未有声调，有声调的语言声调发展很不平衡，各自分化的条件也不一致，甚至有些语言，声调分化的条件都找不出来，同语支内部诸语言还存在着一定的声调对应关系，跨语支语言之间的声调对应关系都不清楚，所以有些人认为，原始藏缅语阶段还没有声调，声调是语族进一步分化的产物。由此看来，几乎不可能假设在声调上汉语与藏缅语有同源关系。从先秦时计算的话，汉语的声调至少有2千多年的历史，经过“四声、八类”这一成熟的阶段之后逐渐趋于简化，而藏缅语的声调至多也只有1千年左右的历史，公元8世纪前后的藏文所记载的语言还没有声调。

汉语和藏缅语声调的差异，启发我们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汉语和藏缅语同源的话，那么，原始汉藏母语应该没有声调；既然先秦时汉语已有声调，那么，汉语和藏缅语的分化至少也是上古之前的事情。这也表明寻求汉语和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是何等艰难。

## 二、词汇

由于汉语和藏缅语分化已久，词汇上的语音对应关系零散，语音对应的条件已不易确定，所以，给确定同源词带来重重障碍，但二者之间在一些基本词汇上有某种“亲密的关系”，人们“心照不宣”地认同二者的亲缘关系。如：

中古汉语	古代藏语	景颇语	普米语
ŋa	lŋa	mã <sup>31</sup> ŋa <sup>53</sup>	ɣuã <sup>55</sup>
ŋa	ŋa	ŋai <sup>33</sup>	ɛ <sup>55</sup>
ŋiə	rna	na <sup>57</sup>	na <sup>55</sup> dzo <sup>55</sup>
ko	khji	kui <sup>31</sup>	tʃhə <sup>13</sup>
piwəi	ɸphur	pjen <sup>33</sup>	khə <sup>13</sup> bʒɛ <sup>13</sup>
səm	gsum	mã <sup>31</sup> sum <sup>33</sup>	səu <sup>13</sup>
ʃeāt	bsad	sat <sup>31</sup>	thə <sup>13</sup> se <sup>15</sup>
ɕiǎk	za	ʃa <sup>55</sup>	dze <sup>55</sup>
kiǎk	rkaŋ	lǎ <sup>31</sup> ko <sup>33</sup>	tʃhə <sup>55</sup>
miǎuk	mjig	mji <sup>231</sup>	mja <sup>55</sup>
哈尼语	缅语	载瓦语	汉义
ŋa <sup>31</sup>	ŋa <sup>53</sup>	ŋo <sup>21</sup>	五
ŋa <sup>55</sup>	ŋa <sup>11</sup>	ŋo <sup>51</sup>	吾
na <sup>31</sup> bo <sup>55</sup>	ŋa <sup>53</sup>	lo <sup>231</sup>	耳
a <sup>31</sup> khu <sup>51</sup>	khui <sup>53</sup>	khui <sup>21</sup>	狗
bjo <sup>55</sup>	pjã <sup>11</sup>	taŋ <sup>11</sup>	飞
so <sup>55</sup>	tθō <sup>53</sup>	sum <sup>21</sup>	三
se <sup>51</sup>	tθa <sup>255</sup>	sat <sup>55</sup>	杀
dza <sup>31</sup>	sa <sup>53</sup>	tso <sup>21</sup>	吃
a <sup>31</sup> khu <sup>55</sup>	tʃhe <sup>11</sup>	khji <sup>51</sup>	脚
mja <sup>33</sup>	mje <sup>255</sup>	mjo <sup>21</sup>	眼

在寻找同源词的工作中，由于藏语具有较古老的文献材料，所以有些学者将注意力放在汉藏对音研究及其同源词的确定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王静如先生在30年代使用数字“一”至“十”和人称代词我、吾、女的汉语、藏语词音对比证明汉藏同源。此外，德国的康拉德（1894—1952）、劳佛（1874—1934）、英国的西门华德也作过一些研究。①俞敏先生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最系统、最深入，他的《汉藏同源字谱稿》②通过比较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藏文拼法和中古汉语拟音，③从相应的“韵”的关系来确定同源关系。下面将韵母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大类列举俞先生找出的一些同源字。

#### 阳声韵

中古汉语拟音	汉字	藏文拼法	汉义
kiou	九	dgu	九
ko	钩	kyu	钩
do	头	ḍbu	头
ŋa	吾	ṅa	我
ŋa	五	lṅa	五
ŋa	唔寤	sṅa	早前
slei	死	śi	死
tsiwāt	醉	bzi	醉、晕
slāt	四	bzi	四
tsiei	姊	tshe	姐姐
ŋoiei	迩	ṅe	近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189—19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② 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1期、第2期，原名《汉藏韵轨》，发表于1949年的《燕京学报》，共收600左右个字，在此基础上进行增订删改，便形成《汉藏同源谱稿》。

③ 中古拟音采用王力先生的拟音系统，出自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

piwəi	飞	aphir	飞
ts'iei	次	tshir	次序、班次
ɣiwei	帷	gar	帐棚
ɳiei	贰	gāis	二
kiəi	饥	bkres	饿(敬语)
k'ua	科	khral	税罚款
tsua	挫	brtsal	禁止
ʃie	灑	bs'al	洗
biei	比	dpe	比喻

阳声韵

中古汉语	汉字	藏文拼法	汉义
keoŋ	江	kluñ	大河
k'oŋ	孔	khun	窟窿
toŋ	栋	gduñ	房梁
meaŋ	盲	rmoñ	看不见
miwaŋ	妄	rmoñ	愚昧
p'iwoŋ	蜂	bun	蜂
ɕieŋ	胫	rkān	腿
ɣien	贤	sgrin	巧、能干
dzien	尽	zin	完了
puən	奔	pun	跑
piəŋ	粪	brun	屎
*tsuən	尊	btsun	高贵
pean	颁	aphul	给
duən	钝	rtul	钝、笨
niəm	念	sñam	想、思维
tʃeam	斩	mtsharn	分隔、断
tsiam	歼	tshoms	降伏
ðəm	撼	skyom	振动、摇荡

səm	三	gsum	三
k'əm	戮	kguni	除、杀
入声韵			
中古汉语	汉字	藏文拼法	汉义
keap	甲	kgrab	铠甲
kiap	医	kheb	盖、罩子、斗笠
xeəp	洽	grub	完美、好
ɣap	鬲	rgyab	不和、背
diap	堞	ldebs	山崖子
ɬiab	噉噉	ɕibs	耳语
köət	吉	skid	愉快
piēt	秘	sbəd	藏、秘密
piēt	界	sprod	给交付
suēt	碎	zed	破裂
duət	突	dud	烟通
piət	笔	bris	写
slət	悉	śes	心思
təuk	笃	athug	厚
ɬiəuk	粥	thug	粥
kəuk	搅	dkrug	搅
dəuk	毒	sdug	毒
miəuk	目	mig	眼睛
k'iwok	曲	khug	弯曲

从上面列举的例字可看出，汉藏两种语言在许多基本词汇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语音对应规律，这种规律在“韵”的对应上比较明显，阴声、阳声、入声三大类基本上能对应。至于“声”的对应关系则复杂一些，由于古藏语有大量的前置辅音，导致声母对应规律不严整，但也能找到一些规律。如：

①中古汉语的疑母 (ŋ-) 大多对应于古藏语的 ŋ- (=ŋ-)：

中古汉语	汉字	古藏语	汉义
ŋo	偶	n̄o	面容
ŋa	吾	n̄a	我
ŋa	五	l̄n̄a	五
ŋa	晤	s̄n̄a	早
ŋa	饿	nal	疲劳
ŋya	鱼	ŋa	鱼
ŋua	卧	ŋal	睡眠
ŋōk	剝	nogs	边缘

②中古汉语的匣母字 (ɣ-) 多对应于古藏语的g或前置辅音 +k (kh) :

中古汉语	汉字	古藏语	汉义
ɣa	何	gal	为什么
ɣiwei	帷	gur	帐棚
ɣāt	害	gas	裂
ɣeəuk	敦	agugs	招唤
ɣiwəi	围	skor	园、转
ɣap	盍	bkab	复盖
ɣ'uat	话	skad	声、话
ɣeŋ	茎	rkan	干、本

③中古汉语的来母 (l-) 多对应于古藏语的r-:

中古汉语	汉字	古藏语	汉义
lia	勑	rogs	助
liwōk	录	rug	收
lam	蓝	ram	兰靛
liəm	凛	rim	侍奉、尊敬
liəm	林	rim	次第、品级
lieŋ	录	riñ	长

由于要全面解决语音的对应十分困难，所以一些有经验的学

者试图用一些基本词作为突破口，寻求汉藏同源关系。张琨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他在《汉藏语系的“针”字》<sup>①</sup>、《汉藏语系的“铁”字》<sup>②</sup>这两篇文章中比较了汉语和十几种藏缅语，发现：1、尽管“针”在汉语中以-m结尾，而在藏缅语中以-p结尾，但在汉语、藏语、缅语中都存在着鼻音韵尾和同部位的塞音韵尾交替的现象，并通过“缝”、“立”、“睡”、“家”这几个字的旁证，说明“针”很可能是汉语与藏缅语的同源词。2、古汉语的 ie t |“铁”与藏语的 *Itsags*“铁”有同源关系，都可能是“一个较早期的送气软腭塞音在发音部位上被跟随在其后的舌位偏前的 *l* 同化而变成了齿音： $*qhl \rightarrow *thl$ ”。<sup>③</sup>而其余十几种藏缅语的“铁”原来很可能是“刀”的意思，因此与汉语不同源。

从前辈们寻找同源词的探索中可以看出，这一项工作是十分艰辛的，但却说明这正是论证汉语与藏缅语同源的关键所在。正如张琨先生曾说过的：我们建立汉藏语系的成败与否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够找出的同源词的数量。同源词只有在同其他呈现相似语音对应的例字比较之后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

### 三、语法

在语法上，汉语和藏缅语有一些共同点，但也有一些不同点。有些不同点反映了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同，具有内在的承接关系，也许可以作为同源的证据。

汉语和藏缅语族语言大多以虚词和语序做为表达意义的主要

---

① 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秘书处合编，1980年，北京。

② 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③ 《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第167页。

手段，但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一些形态变化，尤其是藏缅语族某些语言，有比较丰富的形态变化，除使用语音屈折外，还大量使用附加成分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如羌语支各语言的动词系统形态变化十分复杂，有趋向、人称、数、时、体、语气、式、语态等语法范畴，这些范畴主要通过附加成分来表示。总的看来，形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1、人称代词的“数”和“格”：

藏缅语族语言的人称代词大多都有“数”或“格”的范畴，现代汉语有些方言也保留这些范畴，如闽方言，主要通过声调交替、韵尾变化及附加成分表示。声调交替：汉语北方方言区的陕西商县话利用53调和21调的交替表示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如ŋɿ<sup>53</sup>“我”→ŋɿ<sup>21</sup>“我们”，ni<sup>53</sup>“你”→ni<sup>21</sup>“你们”，tha<sup>53</sup>“他”→tha<sup>21</sup>“他们”。藏缅语族缅语支语言中的载瓦语和阿昌语利用声调变化表示人称代词的“格”范畴。如载瓦语：ŋo<sup>51</sup>“我(主格)”→ŋo<sup>51</sup>“我(宾格)”→ŋa<sup>55</sup>“我的(领格)”，naŋ<sup>51</sup>“你(主格)”→naŋ<sup>21</sup>“你(宾格)”→naŋ<sup>55</sup>“你的(领格)”。阿昌语：ŋo<sup>55</sup>“我(不定格)”→ŋo<sup>51</sup>“我的(领格)”，nuan<sup>55</sup>“你(不定格)”→nuan<sup>51</sup>“你的(领格)”。②韵尾变化：闽方言的闽南话以有无鼻音尾(-n和-ŋ)来区别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如厦门话：gua<sup>53</sup>“我”→gu(a)n<sup>53</sup>“我们”，di<sup>53</sup>“你”→din<sup>53</sup>“你们”，i<sup>45</sup>“伊”→in<sup>44</sup>“伊们”。藏缅语族景颇语的口语用有无鼻音尾或韵尾-n、-ŋ交替来表示人称的单数和双数。如：ŋai<sup>33</sup>“我”→jan<sup>55</sup>“我俩”，naŋ<sup>33</sup>“你”→nan<sup>55</sup>“你俩”，khji<sup>33</sup>“他”→khan<sup>55</sup>“他俩”。③加后加成分：现代汉语大多数方言利用词尾来表示多数，如北方方言中的“你”、吴方言苏州话的“笃”、粤方言中的“哋”、客家方言的“兜”，但“笃”、“哋”、“兜”的使用范围越来越窄，并出现日益被“们”取代的趋势。藏缅语族语言大多都通过加后加成分来区分人称代词的“数”，如怒语：ŋa<sup>33</sup>“我”→ŋa<sup>33</sup>ku<sup>31</sup>“我俩”→ŋa<sup>33</sup>du<sup>31</sup>“我们”，ŋo<sup>55</sup>“你”

→no<sup>55</sup> ku<sup>31</sup> “你俩” →no<sup>55</sup> du<sup>31</sup> “你们”。藏缅语族一些语言表示复数的后加成分很可能有同源关系。如怒语的du<sup>31</sup>、阿昌语的tu<sup>31</sup>、缅语的do<sup>55</sup>、景颇语的the<sup>33</sup>、哈尼语的du<sup>33</sup>（用于包括式）。这些语音形式与汉语的“笃”、“哧”、“兜”很可能有同源关系。

2、指示代词的近指和远指：汉语某些方言和藏缅语族一些语言用声调交替或声母交替来表示近指和远指的区别。①声调交替。如客家话：<sup>c</sup>ke <sup>c</sup>teu “这些” →ke<sup>o</sup> <sup>c</sup>teu “那些”、<sup>c</sup>ke ke<sup>o</sup> “这个” →ke<sup>o</sup>ke<sup>o</sup> “那个”。②声母交替。如部分闽方言用ts—h(x)的交替区分近指和远指：

福州语	厦门话	湖州话	汉义		
tsi <sup>31</sup>	tsi <sup>32</sup>	tsi <sup>53</sup>	这		
xi <sup>31</sup>	hi <sup>32</sup>	ɬhu <sup>53</sup>	那		
tsi <sup>31</sup> ~ <sup>44</sup>	zie <sup>23</sup>	tsit <sup>32</sup> ~ <sup>52</sup>	e <sup>24</sup>	tsia <sup>53</sup> ·kai	这个
xi <sup>31</sup> ~ <sup>44</sup>	zie <sup>23</sup>	hit <sup>32</sup> ~ <sup>52</sup>	e <sup>24</sup>	hia <sup>53</sup> ·kai	那个

羌语支语言也存在这种方式。如：

羌语	道孚语	扎坝语	史兴语	纳木义语	汉义	
tse:	əde	kū <sup>33</sup>	z <sup>65</sup>	he <sup>33</sup> r <sup>1</sup> <sup>55</sup>	te <sup>65</sup>	这
the:	əthe	ŋo <sup>55</sup>	z <sup>65</sup>	the <sup>33</sup> r <sup>1</sup> <sup>55</sup>	he <sup>15</sup>	那

3、动词的“使动”范畴：“使动”范畴由自动态和使动态构成。藏缅语族多数语言中还多少不一地保留着这一范畴，并通过语音交替和分析形式来表达。语音交替主要有以下种形式。①清浊交替：清声母表使动、浊声母表自动。如缅语：lu<sup>266</sup> “解说” →lu<sup>255</sup> “使解脱”、mjo<sup>255</sup> “沉没” →mjo<sup>255</sup> “使沉没”。②送气不送气交替：有些语言用不送气表自动、送气表使动，如阿昌语：tap<sup>35</sup> “粘合” →thap<sup>35</sup> “使粘合”、p<sup>z</sup>au<sup>56</sup> “垮” →ph<sup>z</sup>au<sup>55</sup> “使垮”；有些语言则用送气表自动、不送气表使动，如藏语拉萨话：thum<sup>64</sup> “闷” →tum<sup>64</sup> “使闷”、t<sup>h</sup>he<sup>64</sup> “断” →t<sup>h</sup>he<sup>264</sup> “使断”。③松紧元音交替：松元音表自动、紧元音表使

动。如浪速语: kau<sup>55</sup> “渡” → kau<sup>55</sup> “使渡”、tsauŋ<sup>31</sup> “坐” → tsauŋ<sup>31</sup> “使坐”。④不同元音的交替: 如普米语: gui<sup>13</sup> “穿” → gu<sup>13</sup> “使穿”、ɕa<sup>13</sup> “笑” → ɕɛ<sup>13</sup> “使笑”。⑤用单辅音和复辅音表示: 单辅音表自动、复辅音表使动。如玛曲藏语: ɕək “毁溃” → fɕek “拆毁”、kək “弯曲” → fkək “使弯”。分析形式是在自动词后加含有“弄、搞、让”等意义的词表示。如阿昌语: tse<sup>255</sup> “破” → tse<sup>255</sup> xu<sup>55</sup> “使破”, 缅甸语: ŋo<sup>33</sup> “哭” → ŋo<sup>33</sup> khaiŋ<sup>53</sup> “使哭”。有时分析形式还能加在用语音交替构成的使动词后。如载瓦语: pju<sup>221</sup> “消失” → phju<sup>255</sup> 或者 lo<sup>255</sup> phju<sup>255</sup> “使消失”, ɣun<sup>21</sup> “垂” → ɣun<sup>21</sup> 或 lo<sup>255</sup> ɣun<sup>21</sup> “使下垂”。

总的看来, 分析形式使用得越来越普遍, 而语音交替(屈折形式)则日益减少, 在有些语言(傣语)则残留在几个词上, 成为一种“存古特征”。屈折形式一般保留在基本的常用动词上, 这类具有使动变化的动词往往是亲属语言之间的同源词, 这些同源词对研究藏缅语使动范畴本身以及语音演变规律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

古藏语	彝语	载瓦语	缅甸语	汉义
chad	ge <sup>33</sup>	kju <sup>31</sup>	tjo <sup>53</sup>	断
bcad	khe <sup>33</sup>	khju <sup>31</sup>	tjho <sup>53</sup>	使断
chag	dzi <sup>33</sup>	tje <sup>231</sup>	tje <sup>11</sup>	破
bcag	tʂhi <sup>33</sup>	tjhe <sup>231</sup>	tjhe <sup>11</sup>	使破
hidrog	gn <sup>33</sup>	kju <sup>231</sup>	tjau <sup>255</sup>	惊
dkrog	ku <sup>33</sup>	kjn <sup>55</sup>	tjhau <sup>255</sup>	使惊

有些学者认为古代汉语也有使动范畴。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提到: “上古有一种致动用法, 它的作用是和使成式相似的……。由致动发展成使成式, 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王先生所谓的“致动”, 很接近我们所说的“使动”。如果古汉语有使动范畴的话, 它通过什么形式表示呢? 使动词有什么语音特点

呢？严学窘先生在《古汉语自动使动的变化》<sup>①</sup>一文中认为古汉语利用形态变化来表示使动意义。如：败，自毁曰败，薄迈切，并母；毁他曰败，音拜，帮母。他认为这两处的“败”是bal和pal的区别。现在将这两个“败”与藏缅语族一些语言相同或相关意义的词进行比较：

中古汉语	景颇语	基诺语	载瓦语
bal 败(白)	pja <sup>255</sup> 垮	pja <sup>81</sup> 塌	pju <sup>231</sup> 消失
pal 败(使)	phja <sup>255</sup> 使垮	phja <sup>81</sup> 拆	phju <sup>255</sup> 使消失
缅语	怒语		阿昌语
pjau <sup>255</sup> 消失	biu <sup>55</sup> 消失		pu <sup>255</sup> 炸毁
phju <sup>255</sup> 使消失	phiu <sup>55</sup> 使消失		phu <sup>255</sup> 使炸毁

“垮”、“消失”、“炸毁”、“塌”都与古汉语的“败”意义相近，上面的例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语音对应，很可能是同源词。如果我们在汉语和藏缅语中能找到更多的意义相关、语音有对应的使动词，那将为汉语与藏缅语同源说提供最有力的证据。

再谈谈语序的问题。汉语和藏缅语在语法结构上最大的差异便在于语序。汉语的基本语序是S—V—O，而藏缅语的基本语序是S—O—V，极少数语言是S—V—O语序，如克伦语：

a<sup>31</sup> we<sup>55</sup> o<sup>31</sup> di<sup>255</sup> me<sup>33</sup> “他正吃着饭”。

他 吃着 饭

有的语言两种语序并存，如白语，白族老年人的口语以及诗歌语言所用语序为S—V—O，而学生、年青人、干部多用S—O—V。尽管现代汉语的语序是S—V—O，但古代汉语中却存在“宾语前置”的现象，即，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时，宾语提前到谓语前。如“客何好？”（《战国策·齐策》）、“吾谁欺？”（《论语·子罕》）。有些学者认为，古汉语这类特指疑

① 载《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1963年。

问句与藏缅语的同类型疑问句有同源关系，如孙宏开先生的《藏缅语疑问代词分析》（国际藏缅语学术会议文）。但我们很难知道，上古之前的“宾动”式是否比“动宾”式更主要，后者是否在前者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所以很难从语序这一特征来确认汉语与藏缅语的亲缘关系。

小结：汉语和藏缅语的亲缘关系比较复杂，需要语言学家不断进行探索才能解决。这当中涉及语料的储存、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创新等问题。已有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已不足以对付这种“云遮雾掩”的语言关系。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汉语和藏缅确实存在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反映在一些最本质的语言特征上，它既体现出相似性，也表现为差异性，而有些差异性往往更能反映同一事物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异中有同”现象的反映。汉语和藏缅语之间分化久远，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所以，共时特征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是正常的，如果不是这种状况反而是不正常的。我们的任务是拨开各种遮挡我们视线的“迷雾”，逐渐认识其庐山真面目，确认其内在的亲缘关系。

## 第二节 汉语与壮侗语的亲属关系

汉语和侗壮语(下简称“汉台语”<sup>①</sup>)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欧洲学者就发现了汉台语之间的关系，18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斯克纳在他的《暹罗语和汉语》一书中，指出汉语官话、福建话和暹罗话之间存在着关系词。继他之后，另一个德国学者孔好古对汉台语的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汉语和侗台语有亲属关系。于是，他提出了“印度支那语族”的谱系划分。孔好古的观点得到了法国学者马伯乐和丹麦学者吴克

<sup>①</sup> 国内一般称“壮侗语”或“侗傣语”、“侗泰语”以及“侗台语”、“黔台语”。

德的赞同。其中，马伯乐还提出了三国以前的汉语跟原始语有密切关系的具体看法。汉台语同源说（下简称“同源说”）被欧洲学者一锤定音之后，遂为世人所接受。

中国学者接受并继承了“同源说”的观点。他们苦心孤诣，矢志不渝，以大量的汉台语古音构拟以及两种语言现状和历史的比较，为“同源说”提供了可靠佐证。在这方面，赫然出众的应首推李方桂和邢公畹。他们不仅是汉语研究领域的巨匠，也是侗台语研究方面的泰斗。由于他们谙练两种语言的特点，因而易于发现两者间的相通之处，大量的研究使他们的信心更足，观点无可动摇。

李方桂早在30年代就已经把汉语和侗台语当作一个支系（语族）划入汉藏语系。他在《藏汉系语言研究法》<sup>①</sup>一文中说：“这一系（即汉藏语系）普通分作三大支系：1. 藏缅系，2. 台汉系，3. 叶尼塞系。”美国学者白保罗提出“汉台非同源说”（下简称‘非同源说’）之后，李方桂又写了专题文章，进一步证明汉台语的亲属关系。他在《汉一台语考》<sup>②</sup>中列举140多个泰语、藏语词并与相应的上古汉语词作比较，得出了这些汉、泰、藏语词之间有同源关系的结论。

邢公畹评价说，文中所举的字“初步地显示了汉语台语之间音韵上的严格对应规则。其价值在于：第一，用汉语上古音构拟形式来跟原始台语构拟形式比较，意味着汉台语共同形式是一种‘前上古音’形式；第二，在比较工作上动用了韵书以外的汉语古代文献。”<sup>③</sup>

邢公畹从四十年代起就致力于汉台语关系的研究，发表了一

① 1939年12月29日，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② Fang—Kui Li, Sino—Tai, Papers for the 1st Japan—US Joint Seminar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pp. 230—239, 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Tokyo, 1976.

③ 《论汉台语“关系字”的研究》《民族语文》，1989，1。

系列论著。<sup>①</sup>不仅旗帜鲜明地树立自己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中，他认为汉台语的亲属关系可以以语言结构的本质和语言发展的趋向两方面来，观察经研究，汉台语在这两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他直言不讳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台语跟汉语在亲属关系上是最为密切的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应该是从一种原始汉台语中分化出来的。”在《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一文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侗台语群中的各种语言，在亲属关系上跟汉语尤为靠近。”在《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一文中，他提出了“汉台族”和“汉台语”两个概念。为了使“同源说”的观点能够立足于坚实根基上，他还创立了“同源体系”的学说和方法论。他说：“一些字在意义上或者语音上相关联，我们就说它们有同源关系。两个或多个有同源关系的字构成一个同源体系。这个体系如果在另一语言里也有同样反映，就说明两者有同源体系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查找是在一般对应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还把“同源体系”分为两种：两个或多个字同义不同音的叫同义组，能跟另一语言对应的叫同义对应组。下面举两组例子。

---

<sup>①</sup>收入《语言论集》一书，商务印书馆，1983。四十年代有《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六十年代有《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七十年代有《论汉藏系语言的比较法学》《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八十年代《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现代汉语形容词后附字探源》、《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此外还有《“别离”一词在汉语台语里的对应》（《民族语文》，1983，4），《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研究》（《民族语文》，1989，1），《台语-am、-ap韵里的汉语“关系字”研究》（《民族语文》，1990，2）。

- |    |                         |                                       |
|----|-------------------------|---------------------------------------|
| ①著 | tu <sup>6</sup> (潮州)    | tu <sup>6</sup> (剥隘)                  |
|    | 袂kiap(礼记·曲礼)            | ta <sup>7</sup> kiap <sup>7</sup> (泰) |
| ②雾 | bu <sup>6</sup> (厦门)    | mɔ:k <sup>7</sup> (泰)                 |
|    | 蒙 bɔŋ <sup>2</sup> (厦门) | mun <sup>2</sup> (章鲁)                 |

两个或多个字同音或近音、但不同义的叫同音组，能跟另一语言对应的叫同音对应组。下面举三组例子。

- |        |                           |                         |
|--------|---------------------------|-------------------------|
| ①l     | tsy <sup>3</sup> (广州)     | tɕut <sup>7</sup> (泰)   |
|        | 主 tsy <sup>3</sup> (广州)   | tɕau <sup>3</sup> (泰)   |
|        | 柱 tshy <sup>4</sup> (广州)  | sauu <sup>1</sup> (泰)   |
| ②窠 (门) | tau <sup>6</sup> (广州)     | to <sup>1</sup> (高坝)    |
|        | 豆 tau <sup>6</sup> (广州)   | to <sup>6</sup> (高坝)    |
|        | 喉 hau <sup>2</sup> (广州)   | ʔo <sup>2</sup> (高坝)    |
| ③要 (拿) | i:u <sup>6</sup> (广州)     | ʔa:u <sup>1</sup> (仂佬)  |
|        | 腰 i:u <sup>1</sup> (广州)   | ʔjeu <sup>1</sup> (仂佬)  |
|        | 梟 ki:u <sup>1</sup> (广州)  | kau <sup>1</sup> (仂佬)   |
|        | 敲 kha:u <sup>1</sup> (广州) | kha:u <sup>1</sup> (仂佬) |

邢氏最后认为，查找汉语和侗台语的对应同源体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法。这一理论和方法对汉台语同源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的论作（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论作）大多贯穿了“同源体系”的思想脉络，直至近期的《台语-am、-ap韵里的汉语“关系字”研究》中，他还运用了“同源体系”方法论去验证汉台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可以说，邢的“同源体系”论为汉台语同源关系的研究探索了新的途径。

此外，他还指出了声调在汉台语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在《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中强调：声调的体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的方法论上跟印欧语里头的语法成分有同等价值。这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汉台语声调的对应规律普遍成为人们用以印证汉台语亲属关系的主要依据。

除了李方桂和邢公畹之外，坚持“同源说”并发表了专论的

学者还有张元生、王伟，他们对汉台语同源的说法深信不疑。所以，长期以来，他们亦专注于汉台语关系的研究，其成果主要反映在《壮侗语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一文中。<sup>①</sup>在这篇论作里，他们认为壮侗语（即侗台语）和汉语不仅在类型上有共同的特点，而且在发生学上也可能有共同的来源。因此，他们以词汇为重点，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论证了汉台语之间的同源关系。

首先在语音方面，他们认为壮侗语（以壮语为例）在声、韵、调上都保留了古代汉语的一些特点。例如中古汉语的疑母字在现代壮侗语中仍读ŋ，如“银”、“五”等字。中上古汉语轻重唇不分和舌头舌上不分的特点在现代壮侗语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广韵》中的非母字“粪”在壮侗语中是pwn<sup>6</sup>（粪），敷母字“拂”是pat<sup>7</sup>（扫），奉母字“肥”是pi<sup>2</sup>（肥），微母字“网”是mu:ŋ<sup>4</sup>（网），澄母字“杖”是tuŋ<sup>4</sup>（拐杖）等。此外，现代壮侗语还存在复辅音pl-、ml-、kl-，这些复辅音对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的问题有一定启示。现代壮侗语还保留着中古汉语-m、-n、-p、-t、-k收尾的特点，而且其入声韵和阳声韵的配合也与中古汉语的一致。同时，壮侗语的声调与汉语四声的调类对应相当整齐。据此，他们认为“壮侗语和汉语在语音上的共同特征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他们是同属一个语系的语言。”

在语法方面，他们认为壮侗语和汉语都缺乏形态，都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这样，两者在语法结构上必然有很大的一致性。如两者“主—谓—宾”词序的一致性，方位名词和名词组合的相似性（如壮侗语:dau<sup>1</sup> ra:n<sup>2</sup>“里屋”，汉语“里屋”），“类名+专名”形式的同一性（如壮侗语:fai<sup>4</sup> soŋ<sup>2</sup>“松树”，汉语：“树杞”）以及两者在量词上的共同特点都“说明了壮侗语和汉语之间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

①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增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研究》。

在词汇方面，他们认为“所谓同源词，就是亲属语言里有共同来源的语词，它们或者是语音相似语义相通，或者是语音相同、语义相近的词语。但是，壮侗语和汉语的同源词必须联系到古代汉语的读音和词义来考察，这个词必须出自古代汉语，而且在壮侗语诸语言中也还普遍存在与古汉语在读音和词义上密切关系的基本词。这是我们考察同源词的最起码的一些条件。”根据这个条件，他们将汉文古籍中的70多个词与壮侗语有关语词进行比较。例如：

溪——苦奚切。ker/kisi

《说文》：“水注川曰溪”。

	壮	布依	傣	侗	泰
溪	ri <sup>3</sup>	zi <sup>3</sup>	hoi <sup>3</sup>	kui <sup>3</sup>	huai <sup>3</sup>

潭——徒含切。dəm/dəm

深水坑。《楚辞·九章·抽思》：“长濑湍流，溯江潭兮。”

	壮	布依	侗	水
池塘	tam <sup>2</sup>	tam <sup>2</sup>	tam <sup>2</sup>	dam <sup>1</sup>

啼——杜奚切。der/disi

放声哭。《史记·循吏列传》：“丁壮号哭，老人儿啼。”《说文》：“涕，泣也。”

	壮	布依	傣	侗	水	黎
哭	tai <sup>3</sup>	tai <sup>3</sup>	hai <sup>3</sup>	ne <sup>3</sup>	ʔne <sup>3</sup>	ŋai <sup>3</sup>

通过上述两种语言“关系词”的比较，他们“认识到壮侗语诸语言和汉语作为不同的独立的语言，尽管它们各自沿着自己发展的道路，到了今天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但是追根寻源，仍然可以发现不少有共同来源的语言因素，其中有关的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传统“同源说”是囿于“亲属语言”的定义去理解汉台语的亲缘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汉语和侗台语都是从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然而，最近几年，持“同源

说”者中出现了一种新颖的见解：汉台语的亲属关系不是先天性的，而是后天性的。代表这一新见解的主要学者是戴庆厦和罗美珍，他们在宏观认识上与传统“同源说”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都承认汉台语是亲属语言；但在微观认识上，他们与传统说法又有一定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早期侗台语的归属和后来侗台语的形成问题上。传统“同源说”认为，早期侗台语应归属汉藏语系，它的形成是汉藏母语分化的结果。而戴氏和罗氏则认为，早期侗台语的系属与南岛语系语言有关，侗台语的形成是语言影响所致。戴氏和罗氏在某些具体问题如侗台语的具体形成过程上亦各执一词。戴氏认为，古越人（侗台语先民）操的是与印尼语有关的南岛语系语言，后来这种语言长时间地、大面积地受到汉语的影响而发生巨变，但它还保留原有语言的某些词语及其它特点，逐渐形成今天的壮侗语。<sup>①</sup>罗氏认为，古越人操的是原始马来语，后来为操汉藏母语的人所同化，放弃了原始马来语，使用汉藏母语，原始马来语只是作为一种残存现象或者作为“底层”在地区性的汉藏母语中保存下来。汉藏母语分化后，这种地区性的汉藏母语即发展成为现今的台语诸语言。<sup>②</sup>戴氏和罗氏的这些分歧也仅仅是细微差别，他们在“语言影响”论的总认识上仍然是一致的。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戴氏和罗氏都运用了某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并从中引出新的见解。戴氏在他的论作中从一个新角度的观察，即藏缅语和汉语的关系去揭示壮侗语与汉语的关系。他认为，语言系属是一个既有纵向关系又有横向关系的系统，横向关系包括不同语言间存在的各种复杂的语言关系。所以，从一个语言群内部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关系中，能够窥见语言相互关系的性

① 《从藏缅语看壮侗语与汉语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增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研究》。

② 《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83，2。

质、特点。戴氏正是以这一方面进行了他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经过对三种语言的异同比较，他得出如下结果：在现状上，壮侗语与汉语比较接近，而藏缅语与汉语则比较远。例如：

#### 壮侗语和汉语

①关系词（包括同源词和借词）多，老借词与同源词界线难区分。

②语音结构相近，语音对应关系明显。

③语法特点较接近，无形态变化，动词的语法范畴不太丰富。

④壮侗语受汉语影响大，涉及词汇、语音、语法各个方面，已从表层进入深层。

#### 藏缅语和汉语

①关系词少，老借词与同源词界线可区分。

②语音结构差别大，语音对应关系较远。

③语法特点差别较大，藏缅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动词的语法范畴相当丰富。

④藏缅语受汉语影响少，影响面主要在词汇上。

戴氏认为，现状的这种差异是顺着亲缘关系分化的，而不是无亲缘关系的差异。而现状的相似则未必表明其间有亲缘关系。因此，他指出：“藏缅语与汉语，貌异则源近；壮侗语与汉语，貌似则源远。”据此可知，壮侗语与汉语的相似点不是从原始母语继承下来，而是语言影响所造成的。壮侗语与汉语的关系，可以视为亲属关系，因为语言影响已导致语言的质变，而与影响的语言有机地构通后形成亲缘关系。根据这一特殊的语言形成的现象，戴氏对“亲属语言”的概念作出了新的注释：亲属语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原始母语分化出来的亲属语言；二是由语言影响形成的亲属语言。

罗氏的研究素以民族史材料和语言学材料相结合见长。所以，她运用民族史材料去印证早期侗台语的系属以及侗台语的形成过程。她根据历史上南洋的马来族是从我国东南地区古越人中迁出的族群，因而与我国古代百越族有密切关系的记载，认为：

“印尼人原是我国古代南方‘百越’族群中的一支，由于他们撤离大陆迁徙南洋群岛较早，受汉藏母语的影响少，因此还保留粘着型语言，而操台语人的先民原也属马来人种，是留在大陆上的‘百越’族群中的一支，他们操的是原始马来语。”但是，由于侗台语与汉藏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许多共同点，保留着大量的同源词，因此，罗氏推断：“早在汉藏母语未分化前，今天操台语人的先民在汉藏母语强大影响下就已放弃了原始马来语而使用汉藏母语。汉藏母语分化后，台语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罗氏最后的结论是：“台语是在汉藏母语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应属于汉藏语系。”按照罗氏的看法，侗台语可依年代的不同而分属不同的语系，早期属马来语，晚期属汉藏语。

戴氏和罗氏在侗台语的形成问题上所提出的“语言影响论”对解决“同源说”中的疑难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在侗台语与印尼语中有关系的词被发现之后，“同源说”者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要对这些“关系词”的来源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就会铸成论上说的空档，这种空档如果得不到及时填补，势必会动摇“同源说”的思想基石，而戴氏和罗氏的“语言影响论”正好填补了这一空档。然而，“同源说”仍有某些不尽完备的地方，最突出的问题是同源词与老借词之间的界限长期未能得到解决。我们知道，同源词是衡量语言间亲属关系的最重要的标准尺，而侗台语“老借词和民族词的语音构造已是水乳交融，它们在方言间的对应也跟民族词一样，非常整齐”。<sup>①</sup>因此，侗台语同源词和老借词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这种困难已为侗台语学术界所一致公认。就连李方桂和邢公畹这样的语言学家，谈到侗台语的同源词和汉借词的区分时也不得不慎重其言。李氏在《龙州土语》一书中说过：“还有一层更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些字我们很难决定它是汉语借词，还

<sup>①</sup> 王均等编著：《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前言》，民族出版社，1984。

是台语原来的字。”邢氏在60年代初就说过：“在目前汉台语研究的水平上，想把原始汉台语基本词汇里的字跟汉语借字明确地区别开来是相当困难的”（《语言论集》P142—172），到了80年代末（1989）他仍然说类似的话：“台语里有许多字都能跟汉语同一词项的字在音韵上相合或相对应。但目前要确定这些字是汉借字还是台语原有的字还有困难”。可见，要划出同源词与汉借词的界限并非易事。当然，也有不少的学者为突破这一难关作出了努力，但他们各有各的划分方法，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标准，所以，人们依然感到困难重重。李方桂曾为侗台语中的汉借词的划分制定了这样的标准：“凡台语的字，其声、韵、调之系统与中古汉语声、韵、调之系统能相对应的，才是汉语借字，有一方面不能相对应的，就不算借字”。而邢公畹却说：“事实上，能相对应的不一定是借字，也可能是原始汉台语基本词汇里的字，而有一方面不能相对应的也可能是借字。”（《语言论集》P142—172）罗美珍（1983）也曾为同源词划定了一些范围：“在汉台语的关系词中那些至今仍保留上古汉语某些语音特征的，应看作是同源词，那些在意义上与汉语古义或古汉字意义相同的，又与汉藏语系亲属语言也相近或对应的词，也应看作是同源词。”尽管如此，罗氏仍然感到“由于一部分老借词借入的时间较早，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早已与本族语融为一体，原先的语言特点已被‘消磨掉’这就给区别同源或借用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在现有研究和掌握资料的水平上，想通过方言、语言、语族的逐级比较寻求语音演变程式以确定同源词，其难度也是很大的”（1983）。

由于侗台语中至关重要的同源词与汉借词之间的界限长期悬而未决，这就很容易引发人们对“同源说”的疑惑，使“同源说”形成一个有懈可击的缺口。

首先突破这个缺口的是美国的本尼迪克特（白保罗），他认为侗台语与汉语对应的词如数词、身体部位、动物名称的共同词根等都不是同源词而是借词，只有侗台语和印尼语有对应的词“才

是真正的基本对应词”。<sup>①</sup>为了证实这一点，本氏例举了台语与南岛语系语言有发生学关系的400个同源词（见《Austro—Thai》）。经罗美珍验证，其中与印尼语有关系的台语词是可信的（1983）。所以，本氏断言：“台语和加岱语、印尼语有一种真正发生的关系，而不是和汉语、藏缅语（汉藏语系）有这种关系，不过在汉语影响下有很大的变化罢了。”（1942）由于侗台语言学界没有彻底解决同源词和汉借词之间的分界限问题，致使汉台语中的“关系词”处于两可之间，即可能是同源词，也可能是汉语借词。这样，人们就有理由在这两者中任选一种，只要能言之成理。所以，本氏将汉台语中的“关系词”一律看作汉借词正是汉台语“关系词”的两可性所使然。

本氏的观点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如法国的奥德里古尔和美国的马蒂索夫都赞同本氏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氏的观点已经无懈可击，诸如理论上的缺陷、构拟上的任意性（罗美珍，1983）都是他明显的漏洞。所以，否定本氏观点的外国学者也不乏其人，如李方桂、张琨、威廉·格德内诺专家。

本氏的观点在中国也引起了反映，但是，由于传统“同源说”的思想在中国已根深蒂固，因此，中国学者的“反响”中更多的是反驳的声浪。虽然也有少数人受本氏观点的启迪而对“同源说”产生了怀疑，但终归苦于手头没有足够的材料和充分的理由去阐明自己的看法，因而只好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仅仅是暂时的，1986年，中国学者倪大白深入海南岛专门调查回辉话，获得了重要的成果。他发现，海南岛三亚回辉话与印尼语同出一源，而三亚一地操回辉话的回族又是操越南占语（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人的后裔，今天的三亚回辉话是占语在汉语影响下长期演变的结果。倪氏把这一粘着语（占

<sup>①</sup>《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1942，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3。

语)演变为词根语(回辉话)的过程称为“语言[的]类型转换”

(简称“类型转换”)。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不仅丰富了语言学理论,而且更重要的使壮侗台语的由南岛语型演变为汉语型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可以印证的历史事例和理论依据,从中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倪氏1988年发表的《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一文,<sup>①</sup>“选用了壮傣、侗水、黎三个语支中的几个主要语言跟南岛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并参考台湾高山族的阿眉斯语、布嫩语,还有海南岛的三亚回族语言作一些语源比较。对比的材料约二千四百多词条;比较结果分为几类:一类是南岛语材料跟三个语支都能相通的;一类是跟三个语支中的两个语支相通的;再一类跟壮傣、侗水中的一个语支相通;最后是只跟壮侗语族中的某个语言有关的。”通过对诸语言的词源比较,他认为,侗台语的形成经历了从多音节简化为单音节,以无声调变为有声调的巨大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已为占语演变为三亚回辉话的“类型转换”现象所印证。<sup>②</sup>尽管倪氏确认“侗台语跟印尼语的亲缘关系应该是可信的”,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把壮侗语归入南岛语系。因为“类型转换”已使侗台语和印尼语形成了质的不同(前者为词根语,后者为粘着语),所以,他认为,目前比较科学的提法,可称为“马来—支那语”,“马来”指语系,“支那”指体系(1988)。

科学的发展,仅仅满足于推广已有的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它要作出新的理论概括,那怕这种概括暂时尚未得到认可。倪文的意义正是在于他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类型转换”,为解释侗台语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台语关系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两派观点的格局,不仅不会削弱汉台语关系的研究,反而会把它推上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两种

① 倪大白,《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3

② 《侗台语概论·语言的类型转换》,第343—354,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对立的观点总是相互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又各自寻找和发掘更充分的论据以弥补他们的不足之处。这样，必然会推进某一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所以，随着汉台语关系问题争鸣的深入，汉台语的“庐山真面目”必然越来越清楚。

### 第三节 汉语与苗瑶语的亲属关系

#### 一、苗瑶语系属的争论

苗瑶语包括苗族使用的苗语、瑶族使用的瑶语和布努语、畲族使用的畲语。这些语言分布在我国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西、广东和海南等省（区），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的北部山区。使用苗瑶语的人口约九百万。<sup>①</sup>

苗瑶语内部关系如下表：

##### 一、苗语支

苗语 黔东南苗语：东部土语、北部土语、南部土语  
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西部次方言  
川黔滇苗语：第一土语、第二土语  
滇东北苗语  
麻山苗语：中部土语、北部土语  
          西部土语、南部土语  
惠水苗语：中部土语、西部土语  
          东部土语、北部土语  
罗泊河苗语

<sup>①</sup> 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字，苗族7398035，瑶族2134013，畲族630378，比1982年分别增长46.89%，52.03%，70.91%。新增加的主要是恢复民族成分的部分，他们多已改用汉语。因此，苗瑶语人口基本上按1982年人口普查数字（约700万），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和东南亚近200万的苗、瑶民族，一共约900万。

重安江苗语

贵阳苗语：北部土语、南部土语、西部土语

布努语 布瓏方言、东努土语、努努土语、布诺土语、  
瓏格劳土语、努茂土语

巴哼方言

唔奈方言

炯奈方言

优诺方言

畲语 莲花方言

罗浮方言

## 二、瑶语支

瑶语 勉金方言：优勉土语、标曼土语  
金门土语

标交方言：标敏土语、交公敏土语

藻敏方言

对于苗瑶语的系属问题，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与孟高棉语、汉藏语、澳泰语等语系（族）有谱系关系。分述如下：

澳泰语说：法国A·T·拉古伯里1887年在《汉人之前的中国语言》一文中认为，泰语与苗语有相似之处。而多隆上校的考察团在后来（1912）发表的报告《中国非汉族的语言》中把仲家语（今布依语）、民家语（今白语）和苗语划在“仲家——苗”语支。美国学者P·本尼迪克特在1942年时把苗瑶语放在他提出的古南方语系之内，1975年把苗瑶语作为一个独立的语族，划在他构建的澳泰语系中。

孟高棉语说：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英国H·R·戴维斯（1909），他把苗瑶语支、民家语（白语）支、佯崩龙语支<sup>①</sup>划在

<sup>①</sup>崩龙语，今改称德昂语。

孟高棉语系之下。不过他认为仅仅是依靠它们的相似之处来划分的，而这种相似之处依赖于接触。他甚至认为苗族的自称Hmong与达拉固人的自称Mon的相似“可能并非偶然”（《云南——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苏联有两个学者也提出类似的观点。1964年第七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会议上，C·A·阿鲁丘诺夫在提供的论文《从民族史看东南亚各民族的语言分类问题》中认为，苗语的孟高棉语属性是汉藏语系到孟高棉语在类型转变上的一个类型。其语言基础是，这两个大语系与马来——波里西亚诸语之间的同源关系。另一位学C·E·雅洪托夫在会上发表《语言起源年表和汉藏语系》一文，认为印尼语、侗泰语、孟高棉语和苗瑶语之间有关系，而苗瑶语是最晚从孟高棉语支分出来的，甚至认为分出来的时间是公元前4—3年间。

汉藏语说：李方桂1937年在《英文中国年鉴》中的《中国语言和方言》里提出这个观点。后来的中国学者多从此说。从1954年罗常培、傅懋勳到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马学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马学良、戴庆厦撰写的《汉藏语系》条和1991马学良、邢公畹等编写的《汉藏语概论》，都持这种观点。陈其光、李永燧在《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sup>①</sup>中列举同源词及其语音对应，王辅世在《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sup>②</sup>一文中批驳了孟高棉语说和澳泰语说，认为把苗瑶语视为汉藏妥当一些。

此外，挪威学者S·科诺（1909）曾认为苗瑶语是一个独立的“蛮语系”（Man Family）。后来法国学者H·马伯乐（1929）也主张有一个独立的苗瑶语系（Miao-Yao Family）。虽然那时对苗瑶语的研究还不够，但这一观点今天看来还是很有见地的。只是本文暂不多谈这个观点。

① 《民族语文》，1981，2。

② 《民族语文》，1986，1。

## 二、汉藏语系说的主要论据

持苗瑶语属汉藏语系的学者大多认为苗瑶语与汉语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同源词，这些同源词有明显的语音对应规律。此外，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共同之处。

### (一) 同源词

陈其光、李永燧(1981)和王辅世(1986, 打星号的为王文列举)所列举的同源词如下(仅以黔东南苗语代表苗瑶语, 缺例时由其他语点补):

父pa<sup>3</sup>、妾(女儿)phi<sup>7</sup>、\*客qha<sup>6</sup>、首fhu<sup>3</sup>、\*目me<sup>6</sup>、自(鼻)  
ε<sup>6</sup>、舌ŋi<sup>6</sup>、\*辨mi<sup>4</sup>、\*耳ze<sup>2</sup>、颈laŋ<sup>1</sup>、指/趾ta<sup>3</sup>、力yəu<sup>6</sup>、\*马  
ma<sup>4</sup>、\*牛ŋen<sup>2</sup>、\*羊zoŋ<sup>2</sup>、\*鸡qei<sup>1</sup>、\*狗la<sup>3</sup>、鸭o<sup>7</sup>、\*鸽(鸽)  
qo<sup>1</sup>、龙yəŋ<sup>2</sup>、\*蝶moŋ<sup>4</sup>、\*鱼ze<sup>4</sup>、\*瓜fa<sup>1</sup>、\*漆shei<sup>7</sup>、\*纒(麻)no<sup>6</sup>、  
豆təu<sup>6</sup>、\*梨ya<sup>2</sup>、蓝ŋi<sup>2</sup>、芥ka<sup>6</sup>、日ŋhe<sup>1</sup>、路ki<sup>3</sup>、棕(柱)  
toŋ<sup>6</sup>、\*孔qhaŋ<sup>3</sup>、索|ha<sup>6</sup>、卤(盐)ei<sup>3</sup>、\*白təu<sup>4</sup>、弩ŋhen<sup>3</sup>、纸  
tu<sup>3</sup>、筒toŋ<sup>2</sup>、粉(湘西mpe<sup>3</sup>)、\*价qa<sup>6</sup>、\*中toŋ<sup>1</sup>、担(川黔滇  
ntaŋ<sup>6</sup>)、\*甘qaŋ<sup>1</sup>、辣za<sup>4</sup>、\*广faŋ<sup>3</sup>、狭ŋi<sup>3</sup>、绿zo<sup>2</sup>、\*黄faŋ<sup>2</sup>、\*老  
l<sup>1</sup>u<sup>4</sup>、故(旧)qo<sup>6</sup>、\*早so<sup>3</sup>、\*利ya<sup>0</sup>、\*渴(湘西Nqhe<sup>7</sup>)、清  
phi<sup>1</sup>、错(乱)sho<sup>3</sup>、\*败(坏)pa<sup>4</sup>、\*过fa<sup>6</sup>、蒸təi<sup>1</sup>、牴斗tu<sup>6</sup>、  
转taŋ<sup>3</sup>、\*下ŋa<sup>4</sup>、劈pha<sup>1</sup>、\*破开pha<sup>6</sup>、夹qei<sup>7</sup>、插thi<sup>7</sup>、\*接  
sei<sup>7</sup>、度(量)na<sup>6</sup>、织to<sup>7</sup>、啄təu<sup>7</sup>、搓fha<sup>1</sup>、\*补pu<sup>2</sup>、沸pu<sup>6</sup>、滑  
fa<sup>6</sup>、守yəu<sup>6</sup>、\*骑təi<sup>2</sup>。

王世辅文中还有如(打星号为陈、李文中认为是汉语借词):  
抱pəu<sup>6</sup>、买me<sup>4</sup>、卖me<sup>6</sup>、麦maŋ<sup>4</sup>、\*豕(猪)pa<sup>6</sup>、\*园子van<sup>2</sup>、\*芋  
vu<sup>6</sup>、母(雌)mi<sup>2</sup>、吹火tsho<sup>1</sup>、\*糯nəu<sup>3</sup>、\*鬓soŋ<sup>1</sup>、\*灶so<sup>6</sup>、  
\*千shaŋ<sup>1</sup>、\*钱(1/10两)saŋ<sup>2</sup>、\*凿so<sup>6</sup>、\*衰sho<sup>1</sup>、\*送shoŋ<sup>6</sup>、\*答ta<sup>1</sup>、  
\*得to<sup>6</sup>、\*断te<sup>6</sup>、\*炭the<sup>6</sup>、\*铜təu<sup>2</sup>、\*人ne<sup>3</sup>、\*两(1/10斤)ljaŋ<sup>4</sup>、\*箬

(筷子) tu<sup>6</sup>、糜(仓)zon<sup>4</sup>、里(村子)yaŋ<sup>4</sup>、镰ljen<sup>2</sup>、量(liang)lji<sup>2</sup>、里(500米)lji<sup>4</sup>、收əhu<sup>1</sup>、升(10合)əhen<sup>1</sup>、酒təu<sup>3</sup>、穿(针)təhaŋ<sup>1</sup>、\*银ni<sup>2</sup>、秧zi<sup>1</sup>、伸əhoŋ<sup>1</sup>、养zi<sup>6</sup>、角ki<sup>1</sup>、\*金təen<sup>1</sup>、鬼ljaŋ<sup>1</sup>、滚ljaŋ<sup>3</sup>、煌(亮)faŋ<sup>2</sup>、喝həu<sup>7</sup>。

陈其光后来(1990)①还在此基础上以苗语和汉语比较,又增加了一部分同源词。如:夕(月亮)lha<sup>6</sup>、风(气)poŋ<sup>5</sup>、石子yi<sup>1</sup>、铁lhəu<sup>6</sup>、桥təu<sup>2</sup>、坪tsaŋ<sup>2</sup>、田li<sup>2</sup>、街qa<sup>1</sup>、娘(niāng嫂)naŋ<sup>1</sup>、枝(儿子)təi<sup>4</sup>、王vaŋ<sup>2</sup>、姓pi<sup>5</sup>、名naŋ<sup>2</sup>、腹(肚脐)pu<sup>7</sup>、心xhi<sup>1</sup>、髓lhə<sup>1</sup>、宰ko<sup>6</sup>、垢təu<sup>3</sup>、声xhəu<sup>1</sup>、骡lu<sup>2</sup>、郎(种公猪)laŋ<sup>2</sup>、猫mo<sup>1</sup>、鹅ŋaŋ<sup>6</sup>、虫kaŋ<sup>1</sup>、粮ljaŋ<sup>2</sup>、莽təu<sup>2</sup>、果tsen<sup>3</sup>、蔬(菜)yo<sup>1</sup>、萝卜paŋ<sup>6</sup>、苋菜ki<sup>6</sup>、芭蕉əu<sup>1</sup>、烟草zen<sup>1</sup>、蕪(茅草)qə<sup>1</sup>、壳qhu<sup>1</sup>、茶təen<sup>4</sup>、瓦ŋi<sup>4</sup>、厅(梯)thaŋ<sup>1</sup>、甑əi<sup>6</sup>、壶ho<sup>1</sup>、凳taŋ<sup>7</sup>、柜təi<sup>6</sup>、袄(衣)u<sup>3</sup>、裤qhəu<sup>5</sup>、针təu<sup>1</sup>、床(织布机)soŋ<sup>2</sup>、粽səu<sup>5</sup>、笼loŋ<sup>4</sup>、帚təu<sup>1</sup>、篲(簸箕)vaŋ<sup>1</sup>、钩qa<sup>1</sup>、船naŋ<sup>2</sup>、车əha<sup>1</sup>、鞍en<sup>1</sup>、桶(风箱)thoŋ<sup>3</sup>、鼓nəu<sup>4</sup>、箫(芦笙)ki<sup>2</sup>、墨maŋ<sup>4</sup>、浆(黄蜡)təaŋ<sup>1</sup>、香烛əhaŋ<sup>1</sup>、工(庄稼)qəu<sup>1</sup>、一i<sup>1</sup>、十təu<sup>6</sup>、石(十斗)taŋ<sup>3</sup>、件təen<sup>6</sup>、根təoŋ<sup>2</sup>、盒ho<sup>6</sup>、新xhi<sup>1</sup>、多no<sup>5</sup>、烂la<sup>2</sup>、穷qhəu<sup>3</sup>、稀əhi<sup>1</sup>、膏loŋ<sup>2</sup>、斜sə<sup>2</sup>、瘦su<sup>6</sup>、粗sha<sup>1</sup>、曲(弯)təhi<sup>7</sup>、枯qha<sup>1</sup>、乖(远,川黔滇tlə<sup>1</sup>、湘西qu<sup>1</sup>)、懒ŋi<sup>4</sup>、崩paŋ<sup>1</sup>、进(射击)paŋ<sup>3</sup>、卜(知)pu<sup>1</sup>、伏(钻)pu<sup>6</sup>、覆(翻)phu<sup>5</sup>、分pə<sup>5</sup>、望(去)moŋ<sup>4</sup>、望moŋ<sup>6</sup>、围və<sup>2</sup>、葬(坟,湘西ntsei<sup>6</sup>)、纵(放)əaŋ<sup>5</sup>、擦sha<sup>1</sup>、锁shu<sup>3</sup>、洗sa<sup>3</sup>、搜xho<sup>1</sup>、熄fhəu<sup>7</sup>、冻toŋ<sup>7</sup>、毒to<sup>6</sup>、等taŋ<sup>4</sup>、赌təu<sup>3</sup>、砺(磨,湘西zə<sup>6</sup>)、捏(湘西ne<sup>3</sup>)、值təen<sup>6</sup>、着(湘西tə<sup>6</sup>)、酌tsa<sup>5</sup>、成təaŋ<sup>1</sup>、识təəu<sup>5</sup>、舐zi<sup>6</sup>、舍得əhi<sup>6</sup>、数(shǔ)xhi<sup>3</sup>、升(高)xhi<sup>1</sup>、失(藏)yi<sup>7</sup>、容zəŋ<sup>2</sup>、溶zəŋ<sup>2</sup>、嫁qha<sup>5</sup>、鸡叫

①《苗汉同源字谱》,《汉语与少数民族语关系研究》,1990《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增刊。

qa<sup>5</sup>、卷tʰaŋ<sup>5</sup>、架qa<sup>5</sup>、假(借。湘西qa<sup>5</sup>)、削təhen<sup>7</sup>、缺(川黔滇ŋki<sup>7</sup>)、怯(怕)ʰhi<sup>1</sup>、悬(挂)fi<sup>2</sup>、挂(川黔滇tʰle<sup>5</sup>)、歇ʰhəu<sup>5</sup>、估qəu<sup>5</sup>、敢qaŋ<sup>5</sup>、瞽(瞎)lju<sup>4</sup>、游zəu<sup>2</sup>、瘰(肿)aq<sup>5</sup>

## (二) 语音对应

苗瑶语和汉语的现代平面在语音上(尤其是声母)相差较大。但其历时的语音对应仍可找到一些。如汉语的唇音和苗瑶语的唇音(包括以本部位为主要成分的复辅音),汉语的齿音和苗瑶语的齿音和少量舌音,汉语的舌音与苗瑶语的齿音和个别唇音、齿音,上古汉语来母字在苗瑶语中分布在边音l-和浊擦音,汉语的牙喉音与苗瑶语的小舌音、舌根音对应,少数与舌面音对应。又如发音方法上,汉语的全清、次清声母分别同苗瑶语的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声母对应;汉语浊音声母和苗瑶语的清声母对应,但分布在阳类调中,在古苗瑶语中属浊声母。韵母方面,苗瑶语的韵母比较少,上古汉语韵母较多,形成苗瑶语与汉语的一对多现象。苗语的-p、-t、-k、-m消失了,但从声调痕迹和瑶语一些方言残迹上也可以看出与汉语的对应。声调方面则有惊人的相同,都是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并存在有规律的对应。阳类调分布在苗瑶语来源于浊声母的音节之中(陈其光、李永燧,1981)。

苗瑶语和汉语几组特殊语音对应情况。

### 1. 苗语鼻冠音与汉语同部位口音

汉语	黔东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瑶语
补	pu <sup>5</sup>	mpa <sup>5</sup>	ntsi <sup>5</sup>	bje <sup>5</sup>
沸	pu <sup>5</sup>	—	mpou <sup>5</sup>	bwei <sup>5</sup>
鼻	ze <sup>5</sup>	mzu <sup>6</sup>	ŋtʂu <sup>6</sup>	bjüt <sup>6</sup>
早	so <sup>5</sup>	ntso <sup>5</sup>	ntso <sup>5</sup>	dzöu <sup>5</sup>
错	sho <sup>5</sup>	ntsho <sup>5</sup>	ntsho <sup>5</sup>	—
辣	za <sup>5</sup>	mzei <sup>6</sup>	ŋtʂi <sup>6</sup>	bjat <sup>6</sup>

中	ɬoŋ <sup>1</sup>	ŋɬoŋ <sup>1</sup>	ŋɬaŋ	döŋ <sup>1</sup>
指/趾	ta <sup>3</sup>	nta <sup>3</sup>	nti <sup>3</sup>	—
织	to <sup>7</sup>	nto <sup>6</sup>	nɔ <sup>7</sup>	dat <sup>7</sup>
价	qa <sup>5</sup>	Nqa <sup>5</sup>	Nqe <sup>5</sup>	—
渴	—	Nqhe <sup>6</sup>	Nqhe <sup>7</sup>	gat <sup>7</sup>
狭	ŋi <sup>8</sup>	ŋa <sup>8</sup>	Nqai <sup>8</sup>	hep <sup>8</sup>

对此，王辅世（1986）说：“不可能从汉语借来一个没鼻冠音声母的词，到苗语以后，在声母上加上一个鼻冠音。”

## 2. 苗语浊擦音与汉语来母

汉语	黔东南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瑶语
利	ɣa <sup>6</sup>	za <sup>6</sup>	zua <sup>6</sup>	lai <sup>6</sup>
梨	ɣa <sup>2</sup>	za <sup>2</sup>	zua <sup>2</sup>	lai <sup>2</sup>
力	ɣəu <sup>6</sup>	zo <sup>6</sup>	zo <sup>6</sup>	—
龙	ɣoŋ <sup>2</sup>	zoŋ <sup>2</sup>	zaŋ <sup>2</sup>	liŋ <sup>2</sup> ①
林	ɣu <sup>8</sup>	zu <sup>2</sup>	zoŋ <sup>3</sup>	lom <sup>6</sup>
廩(仓)	zoŋ <sup>4</sup>	ze <sup>4</sup>	zo <sup>4</sup>	laam <sup>4</sup>
里(村)	ɣaŋ <sup>4</sup>	zaŋ <sup>4</sup>	zau <sup>4</sup>	laŋ <sup>4</sup>

古苗语也有\*l-（老母）和\*ʔl-（短母）。②如果说是借汉语的话，就应该分布在\*l-和\*ʔl-才正常。

## 3. 苗语小舌音与汉语“见”系声母

汉语	黔东南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瑶语
鸡	qei <sup>1</sup>	qa <sup>1</sup>	qai <sup>1</sup>	tɕai <sup>1</sup>
甘	qaŋ <sup>1</sup>	—	qaŋ <sup>1</sup>	kaam <sup>1</sup>
孔	qhaŋ <sup>3</sup>	—	qhau <sup>3</sup>	—
客	qha <sup>5</sup>	qha <sup>5</sup>	qhua <sup>5</sup>	tɕhe <sup>7</sup>
鸽	qo <sup>1</sup>	Nqo <sup>1</sup>	Nqua <sup>1</sup>	kop <sup>7</sup>

①“龙”取自瑶语标敏方言。

②王辅世，《苗语方言的声韵母比较》，1979，油印。

价	qa <sup>5</sup>	Nqa <sup>6</sup>	Nqe <sup>6</sup>	tea <sup>6</sup>
渴	—	Nqhe <sup>7</sup>	Nqhe <sup>7</sup>	gaat <sup>7</sup>
下	qa <sup>4</sup>	—	Nqe <sup>4</sup>	dze <sup>6</sup>
狗	la <sup>3</sup>	qwu <sup>3</sup>	tje <sup>3</sup>	tsu <sup>3</sup>
鬼	ljaŋ <sup>1</sup>	qwei <sup>1</sup>	tjaŋ <sup>1</sup>	—
滚	ljaŋ <sup>3</sup>	—	tjau <sup>3</sup>	dzaŋ <sup>5</sup>
瓜	fa <sup>1</sup>	kwa <sup>1</sup>	tji <sup>1</sup>	kwa <sup>1</sup>
过	fa <sup>5</sup>	kwa <sup>5</sup>	tjua <sup>5</sup>	kwe <sup>5</sup>
黄	faŋ <sup>2</sup>	kwei <sup>2</sup>	tjaŋ <sup>2</sup>	jwaŋ <sup>2</sup>
喝	həu <sup>7</sup>	hu <sup>7</sup>	hou <sup>7</sup>	hop <sup>7</sup>

李永燧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上古汉语有小舌音，后来并入见系声母。①

#### 4. 复辅音②

汉语 青岩苗语 高坡苗语 宗地苗语 复员苗语 标敏瑶语

绿	mpjo <sup>1</sup>	mplu <sup>1</sup>	mpza <sup>1</sup>	m <sup>2</sup> pja <sub>平</sub>	me <sup>1</sup>
辣	mpe <sup>3</sup>	mpla <sup>3</sup>	mpz <sup>4</sup>	mpja <sub>入</sub>	blan <sup>4</sup>
蓝	ŋkəŋ <sup>2</sup>	ŋkoŋ <sup>2</sup>	ŋku <sup>2</sup>	ŋt <sub>平</sub> en <sub>平</sub>	(laam <sup>2</sup> )
路	ka <sup>3</sup>	kæ <sup>3</sup>	kæ <sup>3</sup>	t <sub>上</sub> ei	kla <sup>3</sup>
狗	ʔla <sup>3</sup>	tjæ <sup>3</sup>	ja <sup>3</sup>	qlei <sub>上</sub>	klu <sup>3</sup>
颈	—	—	—	—	klaŋ <sup>1</sup>

汉字“绿”从“录”得声，“剥”也从“录”得声，“辣”在《通俗文》中说辣亦作辣，说明在远古它们来源于类似\*pl-的复辅音。

① 《古汉语有小舌音》，载《中国语文》1990, 3。

② 材料取自王辅世《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1979，（油印），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教研室编，《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另外，邓方贵、盘承乾在《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一文中有另外论述，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增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研究》。

“路”从“各”得声，“洛洛路”也从“各”得声，来源于<sup>o</sup>ki-。

“菘”从“监”得声，也是有来源于类似<sup>o</sup>ki-声母的痕迹。

“颈”在青岩、高坡、宗地、复员材料上未反映出来，但在其他苗语却有反映，如黔东苗语qa<sup>1</sup>laŋ<sup>1</sup>（肩）、川黔滇苗语t|oŋ<sup>1</sup>。

### 5. 声调对应

这里仅以平上去入阴阳分化后保存较完整的黔东苗语和广东潮洲汉语作比较。如：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变化条件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今调类	阴平	阴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阳入	阳入
潮洲汉语	春天	群名	短体	巨抱快	半	共洞	八德	目阳
黔东苗语	ki <sup>1</sup> 螺	ki <sup>2</sup> 笙	ki <sup>3</sup> 路	ki <sup>4</sup> 旱	ki <sup>5</sup> 蛋	ki <sup>6</sup> 显	ki <sup>7</sup> 咬	ki <sup>7</sup> 溪
	tʂen <sup>1</sup> 金	ni <sup>2</sup> 银	to <sup>3</sup> 斗	taŋ <sup>4</sup> 等	ts <sup>5</sup> 断	ten <sup>6</sup> 锻	shei <sup>7</sup> 漆	me <sup>8</sup> 墨

有人认为苗瑶语的声调是受汉语声调影响才产生的。王辅世（1986）说：海南岛回辉话在声调语言的影响之下，声调从无到有，声母与声调的关系也类似汉藏语，但是却与汉藏语没有内在联系，这说明与汉语相邻的语言产生的声调都不是与汉语声调系统相同的。苗瑶语的声调系统与汉语的相同，决不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而是具有同源关系。

### （三）语法

苗瑶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如SVO句型，缺乏形态变化，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都有表示事物类别的量词，有表示动作、性质的细微区别的状词。词汇

方面，单音词相当多，且有相当的并联四字格。这都不是类型学上的问题（王辅世，1986）。现代汉语和苗瑶语的语法相差较大，但和古汉语比较起来，却还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说明它们在远古有密切的关系，①如（黔东苗语）：

### 1. 后定语

苗语 phei<sup>1</sup>qε<sup>3</sup> 初一      tei<sup>4</sup>lao<sup>1</sup>老四  
天 一                      个 四

汉语 册一、卷二

苗语 qa<sup>2</sup>zen<sup>1</sup> 腊肉      pa<sup>3</sup>zu<sup>5</sup>叔叔  
肉 腌                      父 小

汉语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带长铗之陆离分，冠切云之崔嵬。

苗语 o<sup>3</sup>tao<sup>1</sup> 布衣      tsei<sup>3</sup>lei<sup>2</sup> 桃子  
衣 布                      果 桃

汉语 神农、后稷、后羿、帝舜、女娲

### 2. 形名结构

苗语 kau<sup>7</sup>ga<sup>5</sup> 赖帐      zu<sup>5</sup>xhe<sup>1</sup> 小心  
硬 帐                      小 心

汉语 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

楚左尹项伯者，素善留侯张良

苗语 faŋ<sup>2</sup>vi<sup>2</sup> 天亮      nao<sup>5</sup>yi<sup>1</sup> 石头多  
亮 天                      多 石

汉语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  
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

苗语 qaŋ<sup>1</sup>qe<sup>3</sup> 有盐味儿  
甘 盐

①张永祥、曹翠云《从语法看苗语和汉语的密切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1。

	qha' əu' (因无水面) 干
	干 水
汉语	天下苦秦久矣
	苦为何伯娶妇
	养伤、坐月子、养病
苗语	ɣo'o' 把衣服弄湿
	湿衣
	va' pie' 把手弄脏
	脏 手
汉语	春风又绿江南岸
	厚其墙垣
	正其衣冠

总之，苗瑶语和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共同点充分说明了它们的渊源关系。

但是，苗瑶语和汉语之间在词汇、语音、语法方面仍然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研究。兹举几例如下：

### 1. 是“同源词”还是借词？

有些人以老借词和同源词难以区分为理由，把一些明显是借词的词作为“同源词”对待，如：

纸墨灶街香瓦里价买卖钱炭两升

百千万金银铜铁锡石 (dan) 烟

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主要功绩是汉族。而“香”很明显是佛教传入之后才出现的借词。“烟(草)”则是18世纪才从美洲传到中国，通过汉族传到苗族、瑶族地区。

既然认为“一、十、百、千、万”是“同源词”，那么如何解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呢？

## 2. 语音上的几个问题

汉语和苗瑶语之间一大批“同源词”的语音对应，被看作是同源的力证之一。尤其是那些在汉语时语音简单，而在苗瑶语时语音复杂的一些词的对应关系。但我们应该考虑到，古汉语也不是现在各家构拟出来的那么简单明白，尤其是表意的方块汉字掩盖了许多词的原始读音。

### 1) . 汉语的舌根音与苗语的小舌音。

苗瑶语中只有苗语有小舌声，属于苗语支的布努语、畲语没有。苗语的小舌音与布努语、畲语、瑶语的舌根音对应。这说明古苗瑶语也许没有小舌音。如：

	黔东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布努语	畲语	瑶语
屎	qa <sup>3</sup>	qa <sup>3</sup>	qua <sup>3</sup>	ko <sup>3</sup>	ka <sup>3</sup>	gai <sup>3</sup>
蛙	qaŋ <sup>3</sup>	ku <sup>3</sup>	qua <sup>3</sup>	ken <sup>3</sup>	kwan <sup>3</sup>	keŋ <sup>3</sup>

在苗语中，有些方言是小舌音，有些方言却是舌根音。如：

#### 古苗语\*G (叫母)

	黔东苗语	川黔滇苗语
蒜	qa <sup>2</sup>	qen <sup>2</sup>
哭	ken <sup>2</sup>	qua <sup>2</sup>
矮	ka <sup>4</sup>	qe <sup>4</sup>
倒	ko <sup>6</sup>	qou <sup>6</sup>

#### 古苗语\*Nq (鸽母)

	黔东苗语	川黔滇苗语	麻山苗语
鸽	qo <sup>1</sup>	Nqua <sup>1</sup>	ŋka <sup>1</sup>
价	qa <sup>5</sup>	Nqe <sup>5</sup>	ŋk <sup>5</sup>
钩	qa <sup>5</sup>	Nqe <sup>5</sup>	ŋkæ <sup>5</sup>

#### 古苗语\*NG (肉母)

	川黔滇苗语	麻山苗语
肉	Nqai <sup>2</sup>	ŋke <sup>2</sup>
下	Nqe <sup>4</sup>	ŋki <sup>4</sup>
梭子	Nqau <sup>4</sup>	ŋkoŋ <sup>4</sup>

勤 Nqua<sup>4</sup>                      ŋkəa<sup>5</sup>

从苗语以及布努语、畲语、瑶语来看，苗语有小舌音只是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的语音特征。更早的时候没有小舌音。关于这一点，藏缅语、壮侗语的一些现象也可以提示我们这样考虑。如一般都认为古藏缅语没有小舌音，但普米语、羌语、拉祜语以及彝语撒尼方言却有小舌音。这些小舌音与同语族其他语言的舌根音应。李方桂（1975）在构拟壮侗语古音时也没有小舌音，但在侗语、水语中却发现与其他语言对应的小舌音。

当历史上一批汉语词进入苗语后，开始也分布在舌根音内，后来才随着变化而变成小舌音。有些词进来得晚，失去了这种机会，没有变成小舌音，而仍读舌根音。如：

汉语	黔东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举	ki <sup>3</sup>	ku <sup>3</sup>	ku <sup>3</sup>
斤	tɕaŋ <sup>1</sup>	kaŋ <sup>1</sup>	ki <sup>1</sup>
金	tɕen <sup>1</sup>	Fe <sup>1</sup>	ko <sup>1</sup>

## 2) 汉语来母字和苗语的浊擦音

构拟古苗语有\*l-和\*ʔl-，仅仅是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状况，而且不一定是借入汉语来母字被分配到浊擦音的时期。现在苗语的浊擦音，在古苗语某一个时期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浊擦音。把眼光扩大到瑶语中，我们就看到，瑶语方言中的边音l-还有与塞音相对应的。如：

	大坪江	金门	标敏	藻敏
石头	lai <sup>1</sup>	gjau <sup>1</sup>	lau <sup>1</sup>	dzu <sup>1</sup>
好	loŋ <sup>5</sup>	gəŋ <sup>5</sup>	loŋ <sup>5</sup>	dzəŋ <sup>5</sup>
斗笠	lap <sup>5</sup>	gjaɸ <sup>5</sup>	ɬan <sup>5</sup>	dzɸp <sup>5</sup>
量	ɬaa <sup>1</sup>	gaa <sup>1</sup>	ɬa <sup>1</sup>	dza <sup>1</sup>
梨	lai <sup>2</sup>	giai <sup>2</sup>	lai <sup>2</sup>	hei <sup>2</sup>
菜	lai <sup>1</sup>	gjai <sup>2</sup>	lai <sup>1</sup>	ʔei <sup>1</sup>
田	liiŋ <sup>2</sup>	gjiiŋ <sup>2</sup>	liɸ <sup>2</sup>	lijaŋ <sup>2</sup>

铁	ɬje <sup>7</sup>	gja <sup>6</sup>	ɬja <sup>7</sup>	lje <sup>7</sup>
天	luŋ <sup>2</sup>	guuŋ <sup>2</sup>	lwə <sup>2</sup>	vaŋ <sup>2</sup>

对此，郑宗泽认为大坪江瑶语的l-和ɬ-有两个来源，一是古勉语的边音\*l和\*ɬ声类，一是古勉语的舌根复辅音\*gl、\*ŋkl和\*ŋkhl声类。<sup>①</sup>

再说，汉语来母字也不纯粹就是一个l-。古汉语复辅音中有许多就连着-l-，如\*pl-、\*kl-、\*ml-。涉及本文要讨论的\*k1-或接近这个音的痕迹如：

柬炼	蓝监	格路	兼廉
隔隔	京凉	剑敛	果裸 考老

因此，不能认为现在汉语的来母在古汉语中就是l-，现在声母为l-的汉语词借入苗瑶语时也是一个复辅音，因此在后来的分化中有不同的反映形式，有的是边音，有的是浊擦音。

### 3) 鼻冠音问题

古汉语也有鼻冠音，只是由汉字的掩盖和语音的发展变化而不明显。<sup>②</sup>谐声字痕迹如：

*mp-	绵帛	密必	陌百
*mph-	脈派	马冯	
*ml-	麦来	万历	满两 龙龙
	卯聊	缪廖	命令
*nt-	淖掉	黏占	碾展
*nth-	能态	馁妥	难排
*nr	乃扔	挠绕	匿若 溺弱
	忍忍	酿壤	褥辱 儒儒

① 《大坪江勉话边音和边擦音的来源》，《民族语文》1990, 5。

② 张琨和张谢蓓蓓对这个问题有《论汉语“稠” \*djaug和“浓” \*njaug的关系》和《苗瑶语藏缅语汉语的鼻冠塞音声母——是扩散的结果呢，还是发生学关系的证据呢？》(1976)两篇讨论论文。他们认为汉字谐声字系统建立之前，古汉语的鼻冠音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章炳麟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指的即是鼻冠音<sup>\*</sup>nr（王力先生原来构拟为<sup>\*</sup>nz）。

既然古汉语有鼻冠音，苗语鼻冠音与汉语的同部位口音对应就不奇怪了，在古汉语时中它们也许是一个鼻冠音。

### 3. 语法上的几个问题

#### 1) 量词

尽管汉语和苗瑶语都有量词，但是汉语和苗瑶语的量词没有“同源”痕迹，就连苗瑶语内部同源的也是少数。苗瑶语和汉语的量词比较：

汉语	黔东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布努语	畲语	瑶语
个(人)(一)	te <sup>4</sup>	—	to <sup>2</sup>	tug <sup>4</sup>	naŋ <sup>1</sup>	tau <sup>2</sup>
(二)	le <sup>2</sup>	le <sup>1</sup>	len <sup>2</sup>	—	—	laan <sup>2</sup>
个(物)	le <sup>1</sup>	le <sup>1</sup>	lo <sup>1</sup>	luŋ <sup>1</sup>	naŋ <sup>1</sup>	noom <sup>1</sup>
棵	tɯ <sup>6</sup>	tu <sup>6</sup>	tɕau <sup>1</sup>	kuŋ <sup>3</sup>	ka <sup>1</sup>	ksuŋ <sup>2</sup>
只(鸟)	te <sup>4</sup>	ŋoŋ <sup>4</sup>	to <sup>2</sup>	tug <sup>4</sup>	thaŋ <sup>4</sup>	noom <sup>1</sup>
把(刀)	taŋ <sup>1</sup>	tei <sup>1</sup>	taŋ <sup>1</sup>	tyŋ <sup>1</sup>	kin <sup>1</sup>	tsuŋ <sup>5</sup>
条(绳)	tɕo <sup>2</sup>	qu <sup>1</sup>	tso <sup>2</sup>	tso <sup>7</sup>	ŋin <sup>2</sup>	tiu <sup>2</sup>
根(棍)	taŋ <sup>1</sup>	te <sup>4</sup>	to <sup>2</sup>	ca <sup>2</sup>	ŋin <sup>2</sup>	tiu <sup>2</sup>
粒(米)	nu <sup>6</sup>	le <sup>1</sup>	ŋtɕa	ŋwig <sup>0</sup>	naŋ <sup>1</sup>	noom <sup>1</sup>
滴(水)	nu <sup>4</sup>	so <sup>5</sup>	ŋto <sup>6</sup>	ŋto <sup>6</sup>	tjen <sup>5</sup>	djop <sup>7</sup>
件(衣)	phaŋ <sup>1</sup>	nthe <sup>1</sup>	phau <sup>1</sup>	peu <sup>6</sup>	tha <sup>2</sup>	tei <sup>5</sup>
双(鞋)	nu <sup>6</sup>	ŋoŋ <sup>4</sup>	ŋkeu <sup>6</sup>	ŋkyu <sup>6</sup>	hjaŋ <sup>0</sup>	leŋŋ <sup>6</sup>

#### 2) 后定语

苗瑶语的构词法中，名词、动词、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位于被修饰名词之后，而汉语则相反。如（黔东苗语为例）：

苗语	fa <sup>1</sup> tɕu <sup>4</sup>	南瓜	yi <sup>1</sup> xhəu <sup>3</sup>	磨刀石
	瓜	汉族	石	磨
汉语	香烟	毛笔	腌肉	

而名词修饰动词和形容词时，苗瑶语和汉语的词序也正好相反，如：

苗语	paŋ <sup>5</sup>	pho <sup>5</sup>	(用枪)射	ɣu <sup>5</sup>	noŋ <sup>5</sup>	被雨淋湿
	射	枪		湿	雨	
汉语	笔谈	口译	头痛			
	墨黑	雪白	棺材悬 <sup>①</sup>			

在古汉语，有名词、数词作后定语的现象。如“神农、帝尧、树桑<sup>②</sup>、木瓜<sup>③</sup>、女媧、卷二、册一”。数词的这种用法现在保存在书面语里，而名词的这种用法只见于古籍和神话传说中。

### 3) 形态问题

古汉语有形态，<sup>④</sup>但现在所见到的是一些零碎的现象。至于古苗瑶语是否也有形态，其形态是否与汉语有关，那已无法证明。如果以现代苗瑶语和古汉语比较，这种比较不在一个历史平面上，所得结论是有条件的。

**结束语** 苗瑶语民族很早就与汉族先民接触，这种接触必然造成语言上的相互影响。苗瑶语和汉语之间是同源关系，或是类型学上的关系，都有一批可供参考的材料。证明苗瑶语和汉语的谱系关系，光从汉语和苗瑶语之间的现象来讨论，似乎显得片面，如果从藏缅语和苗瑶语方面来探讨，可能会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也许，正如有些学者早已假设的那样，苗瑶语是一个独立的语系。

① 闽语，“非常高”的意思，见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P205，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② 《诗·郑风·将种子》中还有“树杞、树檉”。

③ 《诗·卫风·木瓜》中还有“木桃、木李”。

④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第6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

## 第三章 汉语对少数民族 语言的影响

### 第一节 汉语对藏缅语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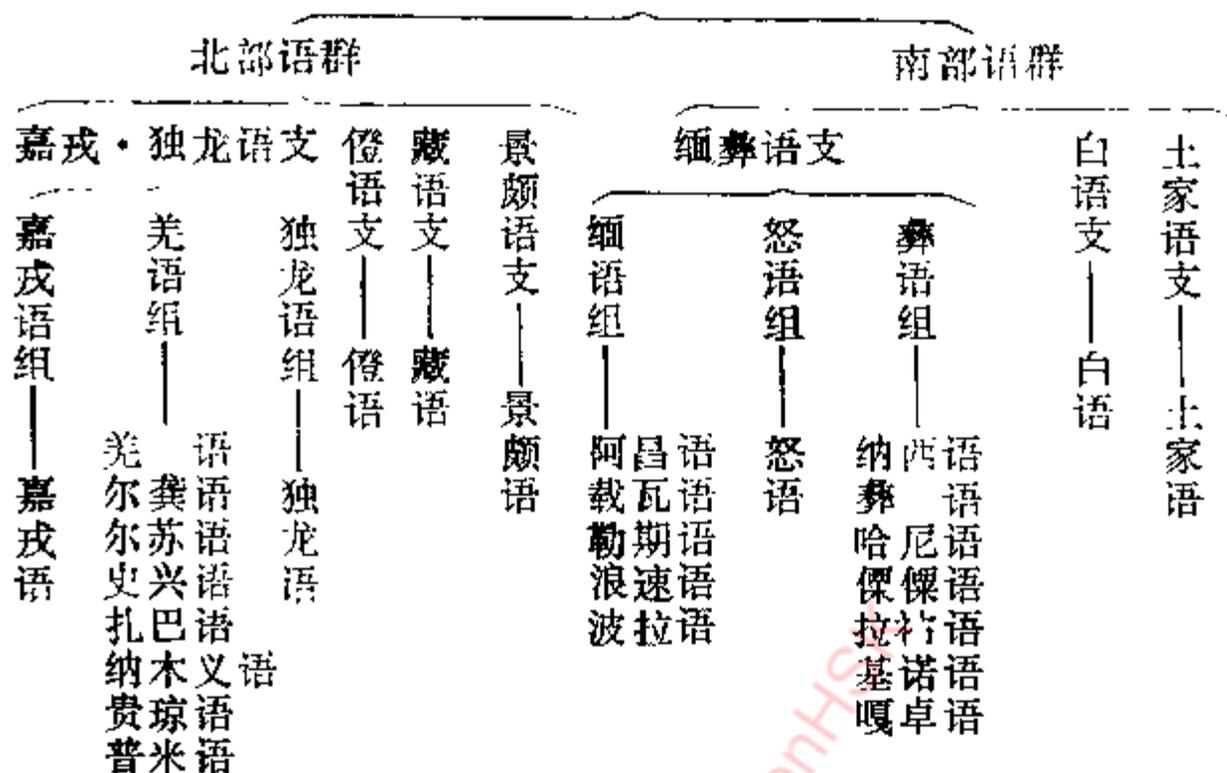
#### 一、概述

藏缅语是汉藏语系的语族之一，与汉语的渊源关系一向为国内外学者所承认。藏缅语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孟加拉、老挝、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等地。就目前所知，属于这一语族的语言有三十种左右，估计还会有一些尚未被发现的新语言。藏缅语的系属分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曾有过不同的分类法。下面是我们在1989年提出的分类表：<sup>①</sup>

藏缅语各族的先民是古代的氐羌人。古代氐羌人主要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甘肃、青海一带，原是游牧民族。战国秦献公时，北方的一部分羌人向南推移，到了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并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氐羌族群会合，这是藏缅语各族的主要来源。考古材料证明，古代氐羌人居住的地区是个多民族地区，他们很早就与汉族有了来往。后来，随着藏缅语各族的南迁、东移，汉族不断进入西部、西南部地区，藏缅语各族与汉族的关系日益密切。

<sup>①</sup> 参看戴庆厦、刘菊贞、博爱兰《关于我国藏缅语族系属分类问题》，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3期。

## 藏缅语族



藏<sup>51</sup>缅语各语言普遍都受到汉语的影响，但受影响的程度大小不一，有的相差很大。影响大的语言，不仅借入了大量的汉语词语，而且在语音、语法上还受到汉语的影响。如嘎卓语受汉语的影响，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汉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韵母上。嘎卓语的韵母以单元音为主，复合元音少，但受汉语的影响增添了ia、io、oi、oe、ao、iao等六个复合元音韵母。由于出现了这些新韵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言原来的语音结构，在音节结构类型中新增加了“辅音+元音+元音+元音”的类型，并大大地增加了“辅音+元音+元音”类型的出现频率。在词汇方面，嘎卓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在所统计的2050个常用词中，完全借汉语的词有552个，占26.9%；本语词与汉语借词并存使用的有7个，占0.3%；本语词与汉语借词构成的词有68个，占3.5%。汉语借词数量多，分布广泛。不仅表示抽象概念的名称借用，而且有些表示具体概念的名称也借用，不仅实词中有汉语借词，而且虚词里也有。姓氏、亲属称谓、宗教用

语等大都借用汉语。如：tsao<sup>323</sup> “赵(氏)”、wa<sup>24</sup> “王(氏)”、ne<sup>33</sup>ne<sup>33</sup> “奶奶”、pa<sup>31</sup>pa<sup>31</sup> “父亲”、sa<sup>33</sup>se<sup>323</sup> “山神”、koa<sup>33</sup>je<sup>33</sup> “观音”。汉语借词进入嘎卓语后，在语音上都顺应嘎卓语的语音特点，发生一些变化。汉语时对嘎卓语语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虚词的借用上。由于嘎卓语原有虚词较少，所以在表达比较复杂的句子结构时，常借用汉语一些虚词来丰富句子的表达功能，使句法特点发生某些变化。借用的虚词主要是连词和副词，如xe<sup>24</sup> “还”、tso<sup>55</sup> “就”、ji<sup>24</sup>……ji<sup>24</sup> “越……”、xoy<sup>33</sup>isy<sup>31</sup> “或者”等。受汉语影响小的语言，只涉及少量词的借用，在语音、语法上未见有影响。如景颇语受汉语影响只出现在借词上，而且大多数的借词历史都不太长，以近几十年借入的为多。例如：pan<sup>31</sup>then<sup>31</sup> “板田(云南汉语)”、to<sup>32</sup> “驮子”、wan<sup>55</sup>tu<sup>33</sup> “豌豆”、san<sup>31</sup>tu<sup>33</sup> “蚕豆”、son<sup>33</sup>phan<sup>31</sup> “算盘”。

一般说来，藏缅语中受汉语影响较大的，是与汉族往来比较密切的一些民族的语言。如白语、土家语、嘎卓语等。这些民族或者与汉语杂居在一起，或者接受汉族文化较早。他们当中兼用汉语的人较多，知识分子的比例也较大。受汉语影响小的，或则有较大的聚居区，如西藏、青海的藏语，或则分布在边疆地区，如景颇语、独龙语。他们当中兼用汉语的也较少。这种不平衡性还出现在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方言之间。如哈尼语三个方言中，哈耶方言受汉语影响小些，而碧卡方言、豪白方言受汉语影响较大。在语音方面，哈雅方言（以绿春大寨话为例，下同）受汉语影响增加了声母f和韵母ie、ia、io、iy、ue、ua，中升调，而豪白方言（以墨江水葵话为例，下同）受汉语影响增加了声母v，复合韵母ia、io、io、iu、ua、ue、ui和鼻化韵母ĩ、ẽ、ã、õ、iẽ、iã、iõ、uẽ、uã，单元音韵母æ，中升调大多出现在汉语借词里。在词汇上，豪白方言的汉语借词比哈雅方言多出几倍，连一些常用词也借用了汉语。如“宽”一词，大寨话是je<sup>55</sup>，水葵话是khuã<sup>53</sup>，“灯”一词，大寨话是a<sup>56</sup>do<sup>31</sup>，水葵话是tẽ<sup>33</sup>。

由于一方借汉语的词，一方使用本语词，扩大了异源词的比例，增加了方言的分歧。

就多数语言的情况来说，藏缅语早期吸收的汉语借词大多是一些文化词的名词。如纳西语的pi<sup>33</sup>li<sup>31</sup>“笛（箏箎）”、mi<sup>31</sup>thu<sup>33</sup>“黄果（撞头）”、za<sup>31</sup>me<sup>33</sup>“衙门”、ndzu<sup>33</sup>“凿子”、lo<sup>31</sup>ko<sup>33</sup>“烙锅”、te<sup>33</sup>lu<sup>33</sup>“灯笼”，哈尼语的la<sup>33</sup>dzi<sup>33</sup>“骡子”、a<sup>55</sup>su<sup>31</sup>“阿叔”、ba<sup>31</sup>dy<sup>55</sup>“板凳”、si<sup>31</sup>sy<sup>33</sup>“时辰”、dzi<sup>55</sup>“斤”。其它词类如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等借入的少。这个特点不同于苗瑶语、壮侗语的汉语借词。一般说来，藏缅语的汉语借词与同源词的界限比较容易划分，能够从语音、语义特点上找出一些区分标准。

有些受汉语影响较大的语言，汉语借词已进入基本词汇的各个领域，甚至连本语里已有的词也向汉语借用。有的名称，本语里虽有相应的词语表达，但还从其它语言里吸收了同样的意义的词来丰富自己，固有词与借词构成了使用特点略有不同的同义词。如土家语：①

固有词	汉语借词	
lo <sup>35</sup> li <sup>55</sup>	tsū <sup>55</sup> kā <sup>35</sup>	中间
je <sup>55</sup> pai <sup>55</sup>	piā <sup>55</sup> sā <sup>55</sup>	边缘
a <sup>55</sup> tsi <sup>55</sup>	tshuā <sup>31</sup> zā <sup>55</sup>	传染
no <sup>55</sup> te <sup>55</sup>	ze <sup>31</sup> me <sup>21</sup>	人们

又如纳西语，一些亲属称谓词，固有词与汉语借词并用。②  
如：

固有词	汉语借词	
a <sup>31</sup> phv <sup>33</sup>	a <sup>66</sup> lo <sup>33</sup>	祖父（阿老）
a <sup>31</sup> dzu <sup>33</sup>	a <sup>55</sup> na <sup>33</sup>	祖母（阿奶）

① 田德生等：《土家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② 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ə <sup>33</sup> su <sup>31</sup>	ə <sup>56</sup> di <sup>33</sup>	父亲 (阿爹)
ə <sup>33</sup> bv <sup>31</sup>	ə <sup>33</sup> ko <sup>33</sup>	哥哥 (阿哥)

藏缅语吸收汉语借词，一般都要按本语的特点加以改造，使借词成为本语词汇里的有机成分。如景颇语里有名词、动词同形的特点，汉语的名词进入景颇语后，有的也能当动词使用：例如：

tsau <sup>31</sup> khai <sup>31</sup>	草鞋	tsau <sup>31</sup> khai <sup>31</sup> khai <sup>31</sup>	穿草鞋
	草鞋		穿
xo <sup>31</sup> tso <sup>31</sup> le <sup>33</sup>	合作社	xo <sup>31</sup> tso <sup>31</sup> je <sup>33</sup> je <sup>33</sup>	办合作社
	合作社		办

藏缅语的一些语言同汉语一样双音节词多，而且双音节词大多是由两个有意义的词根构成的。这些语言往往把单音节汉语借词与固有词单音节词共同组成一个词使用。如阿昌语：

ku <sup>31</sup> zau <sup>31</sup>	稻草	ti <sup>56</sup> thuŋ <sup>56</sup>	水桶
谷(汉)骨(固)		水(固)桶	
kui <sup>31</sup> tso <sup>31</sup>	小柜	te <sup>56</sup> saŋ <sup>31</sup>	谷仓
柜(汉)小(固)		饭(固)仓(汉)	

又如哈尼语：①

jo <sup>31</sup> pha <sup>31</sup>	岳父	dzo <sup>31</sup> za <sup>31</sup>	凿子
岳(汉)父(固)		凿(汉)小(固)	
mo <sup>31</sup> ya <sup>33</sup>	马鞍	w <sup>56</sup> tho <sup>31</sup>	水桶
马(固)鞍(汉)		水(固)桶(借)	

在藏缅语里，汉语借词加固有词注解的形式很常见。如景颇语：

thai <sup>31</sup> jan <sup>56</sup> pum <sup>31</sup>	泰山	tʃhaŋ <sup>31</sup> kjaŋ <sup>56</sup> kha <sup>31</sup>	长江
泰山(汉)山(固)		长 江(汉)水(固)	

① 李永燧 王尔松：《哈尼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又如土家语:

tü<sup>55</sup> piã<sup>55</sup> la<sup>66</sup> kuei<sup>21</sup> 东边 kü<sup>55</sup> lu<sup>35</sup> la<sup>55</sup> 公路  
东 边(汉) 边 (固) 公 路(汉)路(固)

纳西语:

ta<sup>55</sup> me<sup>31</sup> khu<sup>33</sup> 大门 kue<sup>66</sup> xua<sup>33</sup> ba<sup>21</sup> 桂花  
大 门(的) 门(固) 桂 花(汉) 花(固)

嘎卓语:

wa<sup>33</sup> tse<sup>24</sup> 砖 Yu<sup>53</sup> tse<sup>33</sup> 针  
瓦(汉)砖(固) 针(固)针(汉)

在有的语言里,表示同一概念或相近概念的汉语借词有的不止一个,反映借入时间的不同。如纳西语表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借词中,有的是单音节词,有的是双音节词,前者借入的时间早于后者。①例如:

单音节	双音节
pia <sup>55</sup> 变	pia <sup>55</sup> xua <sup>53</sup> 变化
ka <sup>33</sup> 改	ka <sup>33</sup> pia <sup>55</sup> 改变
li <sup>31</sup> 灵	li <sup>31</sup> tcha <sup>33</sup> 灵巧
la <sup>33</sup> 懒	la <sup>55</sup> to <sup>55</sup> 懒惰

总的看来,汉语对藏缅语的影响,词汇比较显著,语音有一些,语法影响很小。语法影响主要表现在有的语言借用了汉语的一些虚词,增加新语序的现象少见。

## 二、汉语对藏语的影响

藏族绝大部分居住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上,总人口 4593330 人(1990年),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有209.6万人),其余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藏语通行于绝大部分

①李永波、王尔松:《哈尼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藏族地区。邻国的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等部分地区也有操藏语的。在地处藏族聚居区的东北部到东南部与汉、蒙古、回、土、撒拉、羌、门巴、珞巴等民族杂居的边缘地区，使用语言情况比较复杂，有其他兄弟民族使用藏语的，也有藏族使用汉语和其他兄弟民族语言的，操双语的人数也比较多。

我国藏语可分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其方言差异较大，突出地表现在语音方面，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语，各地均用自己的方言广播，但书面语基本上是统一的，通行于整个藏族地区。

我国藏族的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生息繁衍在青藏高原上，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隋末唐初时期，它逐步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落，于公元7世纪初建立了吐蕃王朝，从此藏族的活动及交往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是与汉族的政治、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公元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唐朝与吐蕃王室通过使臣往来、王室通婚、唐蕃会盟、茶马互市、教学传艺等等途径，使藏汉两民族发生了空前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唐蕃王室两次和亲，不仅使两族人民“合同一家，普皆安乐”载入史册，而且也为藏汉两族文化、语言广泛接触开创一个极好的时期。其后，自宋代始经元、明至清，由于藏汉两民族相互迁徙定居，茶马互市的扩大，加之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在河陇川康滇一带藏区形成藏汉民族杂居状况，语言接触更为广泛。新中国成立后，藏族与汉族发生了更加紧密友好的联系，其语言的相互影响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就汉语对藏语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词汇上，语音、语法上影响很小。

### （一）藏语中的汉语借词

藏语很早就不断从汉语中吸收许多语词，不同时期的借词具有不同的特点。

#### 1. 汉语借词的分布

1)老借词数量少,范围窄,新借词数量多,范围宽。

在藏语的外来词中,汉语借词最多,大约占90%以上。在汉语借词中,初步统计老借词不超过10%,绝大部分为新借词。老借词主要是日常生活和生产方面表达具体概念的词语,尤以表示事物名称的词语为最多。例如:①

dza tɕha<sup>13</sup>茶 si si<sup>55</sup>丝

dwa tua<sup>13</sup>兑(八卦之一)

hwagte huaŋ<sup>55</sup>te<sup>55</sup>皇帝

以上借词远在唐文成公主嫁到吐蕃时就传入藏区。“皇帝”一词在唐蕃会盟碑的藏译汉音中曾出现六七次之多。这些词是最老的借词。

属于老借词的还有:

tɕog rtse tɕok<sup>55</sup> tse<sup>55</sup>桌子 dzem rtse tɕem<sup>13</sup> tse<sup>55</sup>

剪子

mog mog mo<sup>13</sup> mo<sup>52</sup>馍馍 la phug la<sup>13</sup> pu<sup>52</sup>萝卜

khre tse tɕhe<sup>55</sup> tse<sup>55</sup>尺子 pi tse pi<sup>55</sup> tse<sup>55</sup>杯子

sde rtse te:<sup>55</sup> tse<sup>55</sup>碟子 tshal tshɛ<sup>55</sup>菜

kan khraŋ kɛ<sup>55</sup> tɕaŋ<sup>55</sup>擀面杖

khan sbjar khɛ<sup>55</sup> tɕa:<sup>55</sup>坎肩

这些老借词,已完全融化在藏语之中,和本族固有词一样成为藏语的基本词汇。它不仅为广大群众所使用,而且还可以作为词根与本族语词构制成新词和词组。比如, tɕha<sup>13</sup> (茶), 在拉萨话里能用它构造的词语多达70余个。例如:

dza kha tɕha<sup>13</sup> kha<sup>55</sup> 茶色

dza khaŋ tɕha<sup>13</sup> khaŋ<sup>55</sup> 茶馆儿

dza khog tɕha<sup>13</sup> kho<sup>52</sup> 茶罐

dza khug tɕha<sup>13</sup> khu<sup>52</sup> 茶叶袋

①前边不带声调的为藏文转写,后边带声调的为拉萨话读音。下同。

dza ma tsha<sup>13</sup> ma<sup>56</sup> 煮茶人

dza ston tsha<sup>13</sup> tse<sup>56</sup> 茶会

大量的新借词除表示生活、生产的词语外，更多的是表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新词术语，不仅有表示具体概念的新词，而且有表示抽象概念的新词。例如：

tho la tsis tho<sup>56</sup> la<sup>56</sup> tci<sup>52</sup> 拖拉机

kuŋ si kuŋ<sup>56</sup> si<sup>56</sup> 公司

kuŋ hre kuŋ<sup>56</sup> se<sup>56</sup> 公社

kruŋu zi tšu:<sup>56</sup> qi<sup>56</sup> 主席

guŋ khran taŋ khuŋ<sup>13</sup> tshē<sup>56</sup> taŋ<sup>52</sup> {共产党

kruŋ dbji tšuŋ<sup>56</sup> ji<sup>56</sup> 中医

2)不同地区，汉语借词多少不同。

我国藏区分布面积很广，由于地理自然环境、民族迁移、贸易往来、文化交流、语言力量对比等不同原因，造成了汉语借词在藏语里的不平衡分布。以居住状况而言，一般说杂居区受汉语影响较深，汉语借词高于聚居区。具体说甘川滇一带由于历史上移民杂居，那里的藏汉双语者较多，群众口语中汉语借词远远高于中心腹地的卫藏地区。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各地由于受汉语影响的不同，借词在语言交际中的比重也有所差异。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城市，以及沿青藏、康藏公路附近居住的藏族语言中汉语借词较多。比如，在安多、康方言的一些杂居区，有的概念藏语中虽有相应词义的固有词或新造词，人们在交际时却喜欢直接借用汉语词。例如：

btaiŋs figrol dmag 解放军 gzuŋ lam 公路

gnam gru 飞机 srid dzus 政策

ŋphar mdaŋ 火箭 kruŋu zifi tshogs pa

主席团

《khaŋ tshen dmar poŋi gŋid lam》《红楼梦》

3)文化素质不同，汉语借词的比重不同。

一般地说，受过学校教育，当过干部，跑过生意，与汉语社会接触较多的人，使用汉语借词的较多。反之，文化程度较低（特别是文盲），与外界社会接触较少的人，在他们的语言中表示新事物的汉语借词就较少，象ho tsi gas pa（核裂变）、huŋ waŋe zan fiɔd zer（红外线）等，他们在表述时就可能发生一定的困难。

4)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汉语借词的比重不同。

青年人、公职人员、“闯荡江湖”的人，借词的使用较多。以老中青三代人为例，大致是老年人使用借词少，青年人使用借词多，中年人居中。例如：

汉语	老 年	中 年	青 年
县	tsoŋ <sup>13</sup>	soŋ <sup>13</sup> /ʃɛ̃ <sup>55</sup>	ʃɛ̃ <sup>55</sup>
汽车	laŋ <sup>55</sup> kho: <sup>55</sup>	laŋ <sup>55</sup> kho: <sup>55</sup> / tʃhi <sup>55</sup> tʃhe <sup>55</sup>	tʃhi <sup>55</sup> tʃhe <sup>55</sup>
扇子	luŋ <sup>55</sup> jap <sup>52</sup>	luŋ <sup>55</sup> jap <sup>52</sup> / ʃɛ̃ <sup>55</sup> tse <sup>55</sup>	ʃɛ̃ <sup>55</sup> tse <sup>55</sup>

尽管这种情况因人而异，因交际场合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在老中青三代人中，中年人语库里固有词和借用词并存现象较多，似乎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5) 在书面语和口语中，汉语借词的比重不同。

藏语中的汉语借词比同语族里的其他语言要少得多，大概是文字的约束所致。书面语中借词的运用远远少于口语，只有规范化的词才有资格进入书面语，而口语中容纳借词比较宽容。如口语中的“军”、“解放军”等音译词是不会进入书面语的。

## 2. 汉语借词的方式

### 1) 音译式

这是藏语吸收汉语词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早期和近期的借词中往往多采用这种形式。音译词是现代藏语充实和发展新词术语的主要途径。如：

ko jol ko<sup>56</sup> jo<sup>56</sup> 膏药 kwa tse kua<sup>56</sup> tse<sup>56</sup> 褂子  
 ni luŋ ni<sup>13</sup> luŋ<sup>66</sup> 尼龙 bi tɕi fu phi<sup>13</sup> tɕu<sup>52</sup> 啤酒

### 2) 半音半意译式

这是近期借词的方式之一。如：

mi dmaŋs kuŋ kre mi<sup>13</sup> maŋ<sup>52</sup> kuŋ<sup>66</sup> ʂe<sup>56</sup> 人民公社  
 sku sruŋ thon ku<sup>66</sup> suŋ<sup>52</sup> thə<sup>66</sup> 警卫团

### 3) 意译式

在藏语新借词中数量最多、范围最广。它们依据汉语词义、藏语构词规则和搭配习惯用本族语创造的新词。如：

火箭 me ɕugs ʃiphur mdaŋ me<sup>13</sup> ɕu<sup>52</sup> phū<sup>56</sup> tə<sup>66</sup>  
 大跃进 mdun mtəhoŋ tɕhin po t̃y<sup>13</sup> tɕhoŋ<sup>52</sup> tɕhē<sup>66</sup> po<sup>66</sup>  
 柏油路 snum dreg lam khag num<sup>56</sup> tɕa<sup>52</sup> lam<sup>13</sup> kha<sup>52</sup>  
 彩色影片 tshon khrafi glog brnan  
 tshə<sup>56</sup> tɕhe<sup>66</sup> lo<sup>56</sup> ŋə<sup>66</sup>

### 4) 音译加注式

主要是近期借词。如：

井冈山 tɕin kaŋ kranribo tɕi<sup>56</sup> kaŋ<sup>56</sup> ʂe<sup>56</sup> ri<sup>13</sup> wo<sup>66</sup>  
 海棠 haŋe thaŋ me dog hai<sup>56</sup> thaŋ<sup>56</sup> me<sup>13</sup> to<sup>62</sup>  
 议会 dbji hufi gros tshogs ji<sup>56</sup> hui<sup>66</sup> tɕhə<sup>13</sup> tsho<sup>62</sup>  
 网球 waŋ tɕhi fu polo waŋ<sup>13</sup> tɕhiu<sup>56</sup> po<sup>66</sup> lo<sup>66</sup>

这类借词在口语交际的一定场合可以省略注释部分，变为纯音译词，但书面语中一般不省略。

### 5) 借词后加附加成分式

在某些汉语借词（多为名词），后附加上本族语的附加成分，使之变成与借词有一定关系的具有一种词义或词性的新词。如：

pe<sup>56</sup> tɕi<sup>56</sup> 北京 pe<sup>66</sup> tɕi<sup>56</sup> ŋa<sup>56</sup> 北京人  
 tɕha<sup>13</sup> 茶 tɕha<sup>13</sup> ma<sup>56</sup> 煮茶人  
 ma<sup>13</sup> tɕaŋ<sup>56</sup> 麻将 ma<sup>13</sup> tɕaŋ<sup>56</sup> ca<sup>13</sup> ŋə<sup>44</sup> 打麻将者

thuŋ<sup>56</sup>si<sup>56</sup> 通司      thuŋ<sup>56</sup>si<sup>56</sup> tøhe<sup>132</sup> 当翻译

绝大部分借词保持原义，与现代汉语词也相同。但有少部分则发生词义分工或词义发生某些变化。如：

duŋ ban thuŋ<sup>13</sup>p<sup>56</sup> 脸盆 < “铜盆”

brufu jan ŋui<sup>56</sup>j<sup>56</sup> 水烟袋 < “水烟”

phab tse pha: <sup>56</sup>tse<sup>56</sup> 毛巾、手帕 > “帕子”

jaŋthaŋ jaŋ<sup>13</sup>thaŋ<sup>56</sup> 水果糖 < “糖”

rdah gog ta<sup>13</sup>ko<sup>52</sup> 铁锅 < “大锅”

pan rtse p<sup>56</sup>tse<sup>56</sup> 妇女所戴头饰，用珊瑚等宝石做成(藏北语) < “辫子”

### 3. 汉语借词对藏语的影响

1) 汉语借词源源不断地出现，大大丰富和充实了藏语词汇库，加强和发展了藏语的表达力，扩大了藏语作为文化和信息载体的使用范围和社会交际功能。

在语义表达上，使其更趋准确和完备。如：

(1) jan ?an la ltaskor du joŋ mkhan mi rnamsgis  
riŋgog dmag srid slob grwa tøhe bar lta bar figro rgjur

抗日 军 政 大 学

do snaŋ ha tsaŋ tøhen po bjed pa red. (到延安参观的人们都十分注意去看抗大。)

(2) pha rol pos spreŋu sun wuhu khuŋ sras mo

猴子 孙 悟 空 公 主

thife hran gi khog par fidzul nas……

铁 扇

(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些借词，藏语在语义表达上将会出现多么大的困难。

固有词和借词之间存在一定的同义现象。同义并存，使其能

充分表达复杂思想和细腻的感情。一般来说，固有词多表示生活领域里的事物，多用于口语，藏语气息浓厚，而与之同义的是翻译词，带有庄重文雅的书面语色彩。如部分成语：

固有形式	汉译藏形式
rgja mtsho rdo dbjugs 向海里扔石头	rdzes med sul med 无影无踪
sgog pa gsil brduqs 分瓣捣蒜	khag rere bjas nas gtor ba 各个击破
tsan dan gji gu jog dan gos tshen gji thab phjis 檀木作火棍，锦缎当抹布	rgju tsha tshen po tsh- un sar spjod pa 大材小用
gse boq mnam mthoq 金子和土块不分	na mig mu tig tu rdzus pa 鱼目混珠

近代卫藏方言从英语、印度语借进了一些词，但只在部分城市流行，未在广大群众中生根，有些将逐渐被汉语借词取代。如：

	汉语借词	英语借词
票	phifo phio <sup>55</sup>	kri ki si tʃi <sup>55</sup> ki <sup>55</sup> si <sup>55</sup> (tickets)
汽车	tʃhis khre tʃhi <sup>55</sup> tʃhe <sup>55</sup>	motra mo <sup>13</sup> tʃa <sup>55</sup> (motor)
车站	khre kran tʃhe <sup>55</sup> tʃɛ <sup>55</sup>	kri sriŋ tʃi <sup>55</sup> siŋ <sup>55</sup> (station)
收音机	hru dbjin tʃi ʃu <sup>55</sup> jɪ <sup>55</sup> tʃi <sup>55</sup>	ras kri rɛ <sup>13</sup> tʃi <sup>55</sup> (radio)
跳舞	tʃeŋo ʔu thio <sup>55</sup> u <sup>55</sup>	sgran si tʃɛ <sup>13</sup> si <sup>55</sup> (dance)

此外还有如“衣袋、铅笔、警察、火车、汽油、炸弹、领带、短裤、皮包、手电筒、电影”，以及借自印度语的“毯子、花生、毛背心”等，有逐渐被汉语借词或藏语词所取代的趋势。

#### 4. 借词带来的语音变化

藏语原无声母f, 早期借词中用ph代替。如,

分	phin	phī <sup>55</sup>
粉丝	phiŋ	phiŋ <sup>55</sup>
豆腐	rduŋu phu	to:1 <sup>55</sup> phu <sup>52</sup>

但在近期借词中出现了直接用f的现象。如,

法国	hpha go	fa <sup>55</sup> ko <sup>55</sup>
非洲	hphe gliŋ	fe <sup>55</sup> liŋ <sup>55</sup>
乘方	khreŋ hphaŋ	tʃheŋ <sup>55</sup> faŋ <sup>55</sup>
法西斯	hpha ʒi si	fa <sup>55</sup> ʒi <sup>55</sup> si <sup>55</sup>

借词进入藏语时几个主要元音有大体上的对应。如(藏/汉) a、ə/a, i、e/i, u、o/o, e/e, y/ü。藏语复元音较少, 拉萨话只有ie、iu、uo、əu, 但长元音较多, 因此, 拉萨话往往用长元音来对应借词的复元音。如ε/ai, e:/ei, o:/ao, o:/uo, u:/ou, i:/ie。近几十年来, 汉语的复元音在借入藏语后都得到体现。如ai、ei、ao、ua、io、ou、ui等。

藏语中个别构词特例有可能是在汉语借词的影响下产生的。如偏正结构中藏语只有名词修饰时, 其结构才与汉语相同。如“国旗”(rgjal dar国旗)。形容词修饰名词时, 藏语的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后。如“生菜”(tshal rdzen菜生)。但是, 现在藏语中却有一些特例。如:

ser ʒa	黄菌子	gsum mdo	三岔口
黄色肉		三 谷口	
dmar dmag	红军	graŋ tshal	凉菜
红 军		凉 菜	

这可能是受汉语影响所致。此外, 职务的“副”, 如“副总理”, 藏语原来是“tsuŋ<sub>2</sub>li gzon pa”现在口语中都说成hphu tsuŋ li。

#### (二) 藏汉双语人“杂语”的特点

通晓藏汉语的藏族双语者或懂一点汉语的人，在日常交际时，往往不说纯一色的藏语，而是在藏语中夹杂一定数量的汉语词语。这种夹杂汉语的藏语，有人称之为“杂语”，或“二级藏语”。

这种“杂语”的特点是，用藏语的语法结构和语言习惯穿插混杂汉语的词汇、成语、歇后语、段语等，但以词汇为最多。有时还在同一席对话中两种语言互相穿插，交替使用。使用人数最多的是青年双语者，其次是藏族干部和商人，特别是由于语言接触而自发产生的双语者，在他们的语言里夹用成分最多，使用频率更高，因为他们双语的掌握就是靠在母语中长期夹用汉语而习得的。这种广大双语者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形式，可视为藏族语言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方言”。

第一类，就是在藏语中穿插夹杂原来就属于借词的汉语词语。其中包括上述提及的音译词、音译加注词、半音半译词、借词后加附加成分词等。这一类是借入后被藏语“规范”了的藏语化汉语词语，这些借词不仅有固定的语音形式和语义，而且在书面语中也已具备了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它们已经成为藏语词汇体系中的稳定成员，是藏语词汇海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夹杂的这一类汉语借词，双语人这么说，非双语人也这么说。

例如：

(1) ŋa<sup>13</sup> tɕa<sup>13</sup> thuŋ<sup>55</sup>ki ji. (我要喝茶。)

(2) ŋã<sup>13</sup> tsho<sup>55</sup> ma: 13 le<sup>55</sup> riŋ<sup>13</sup> lu<sup>52</sup> thaŋ mao<sup>13</sup>  
tse<sup>55</sup> tuŋ<sup>55</sup> koŋ<sup>13</sup> pa<sup>55</sup> lop<sup>55</sup> tɕoŋ<sup>52</sup> ja<sup>13</sup> ko<sup>55</sup>  
tɕhe<sup>13</sup> ko<sup>55</sup> re.

(我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第二类，属于一般借词所没有的，这类有三种情况：

1. 某些汉语词语的语义(概念)在藏语中已经按照本族语的构词规则和构词材料创造了新词语，并逐渐被藏族人民所接受，在书面语中也被采用。但是双语者往往不使用其意译词，而是直接使

用原本的汉语词语。例如：

意译词	拉萨话	汉语词
maŋ mjur legs bsri	maŋ <sup>13</sup> ɲur <sup>55</sup> lek <sup>13</sup> si <sup>55</sup>	多快好省
me ɕugs ŋphur mdaŋ	mi <sup>13</sup> ɕu <sup>52</sup> phū <sup>55</sup> tə <sup>55</sup>	火箭
mi dmaŋs kuŋ hre	mi <sup>13</sup> maŋ <sup>52</sup> kuŋ <sup>55</sup> ɕe <sup>55</sup>	人民公社
kroŋ tsa ŋkhor lo	tʂoŋ <sup>55</sup> tʂa <sup>55</sup> khə: <sup>55</sup> lo <sup>55</sup>	装甲车

2. 某些汉语词语,在藏语中原本就有表达相同语义的词语,无需再借入,但藏族双语者在日常交际中视对话环境往往不使用本族固有词语,而喜欢把汉语词语穿插在藏语之中。例如:

固有词	拉萨话	汉语词
dran tho	tʂhē <sup>13</sup> tho <sup>55</sup>	笔记
sdod ɕag	tə <sup>13</sup> ɕa <sup>52</sup>	宿舍
mthun sgril bjed	thŷ <sup>55</sup> tʂi: <sup>55</sup> tʂhe <sup>132</sup>	团结 (动)
mɲaŋ se ko se	ɲa <sup>55</sup> se <sup>55</sup> ko <sup>55</sup> se <sup>55</sup>	婆婆妈妈

3. 在藏语里已有其他语种的外来词,然而双语者往往却不使用这些外来词,而是直接夹用汉语词。例词从略,下面举几个例句。

1) thā<sup>13</sup>ta<sup>55</sup> ho:<sup>55</sup>tʂhe<sup>55</sup> thā tʂhi<sup>55</sup>tʂhe<sup>55</sup> jə<sup>132</sup> tsaŋ, təp<sup>52</sup> te<sup>13</sup>po<sup>55</sup> ɕe<sup>13</sup>tʂa<sup>52</sup> re.

(现在因为有了火车和汽车,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2) wə<sup>55</sup>tʂi<sup>55</sup> sa:<sup>55</sup> pa<sup>55</sup> the<sup>13</sup> ta<sup>13</sup> ji:<sup>55</sup> po<sup>55</sup>po<sup>55</sup> naŋ<sup>13</sup> la ɕe<sup>132</sup>tu.

(新袜子放在大衣口袋里。)

3) khəŋ<sup>55</sup>la ma<sup>13</sup>pe<sup>55</sup>ji<sup>55</sup> tʂik<sup>52</sup> nə<sup>132</sup>pa re.

(他买了一件毛背心。)

例句①中的汉语借词“ho:<sup>55</sup>tʂhe<sup>55</sup>”(火车)和“tʂhi<sup>55</sup>tʂhe<sup>55</sup>”(汽车)分别替代了英语借词“ri<sup>13</sup>li<sup>55</sup>”(火车)和“mo<sup>13</sup>tʂa<sup>55</sup>”(汽车);例②中的汉语借词“wə<sup>55</sup>tʂi<sup>55</sup>”(袜子)和“po<sup>55</sup>-

po<sup>55</sup>”（衣袋）分别替代了蒙语借词“u<sup>55</sup>mu<sup>55</sup>su<sup>55</sup>lu<sup>55</sup>”和英语借词“pa<sup>55</sup>ki:<sup>55</sup>”（衣袋），例3中的汉语借词“mao<sup>13</sup>pe<sup>55</sup>ji<sup>55</sup>”（毛背心）取代了印度语借词“pa<sup>13</sup>le<sup>55</sup>”（毛背心）。

随着国家双语制的实施，藏族地区各类学校双语教育的普及和深入发展，民间自由往来的频繁，双语者的人数将越来越多，双语者所使用的“杂语”必将对其语言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藏族双语人“杂语”的广泛使用和传播，首先是扩大了汉语借词的数量。任何一种语言的借词，开始总是在少数人的语言里使用，之后经过广大群众语言的严格筛选，把那些社会急需的、具有生命力的借词吸收到本族语的词汇中来。在康方言和安多方言的一些藏区，因为长期与汉族毗邻、杂居，双语人数较多，通过“杂语”的传播渠道，那里的汉语借词也较多。如安多方言乐都话，把xe“鞋”、pən-ndzɿ“本子”、po-fu“包袱”、tsɿ-hlaŋ“走廊”、tɕwe-xwi“社会”、tɕən-fy“政府”、thwan-tɕe“团结”、te-pio“代表”、tɕən-tɕhə“政策”、thon-ndzɿ“同志”、tɕy-zɿ“主义”等等，都早已接纳为借词，而卫藏方言目前还未作借词使用。其次，使借词的语音更加接近口语。受过学校正轨教育产生的双语人，他们在使用“杂语”时，有时不按照本族语的语音结构来发音，超越书面语的约束，按照自己所掌握的汉语来发音。比如，他们把“豆腐”rdnɦu phu[to:<sup>13</sup>-phu<sup>55</sup>]读成[tou<sup>52</sup>fu<sup>55</sup>]，“粉”phiŋ[phiŋ<sup>55</sup>]读成[feŋ<sup>214</sup>]，“菜刀”tshal taho[tshɛ<sup>55</sup>to:<sup>55</sup>]读成[tshai<sup>52</sup>tao<sup>55</sup>]，“抽屉”khruth-il[tɕhu<sup>55</sup>thi:<sup>55</sup>]读成[tɕhou<sup>55</sup>thi<sup>52</sup>]等等。这种情况开始属于个别现象，如果长期发展下去，有可能把汉语的某些音韵，引进藏语之中。虽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值得人们注意。另外，有可能使语法结构也发生某些变化。由于藏汉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不同，双语人的“杂语”中在保持藏语结构特点的同时，也会使夹杂在藏语中的汉语词的词性和句法功能发生某些变化。为了适应藏语句式中动词谓语句后总是紧跟着某些语尾的特点，所以夹杂的汉语动

词必先变成名词性成分，再与藏语的动词有t<sup>h</sup>he<sup>132</sup>（或eaŋ<sup>55</sup>.ca<sup>13</sup>）和语尾助词共同构成谓语。比如，“开会”，藏语是tshoŋ<sup>55</sup>tu<sup>55</sup>stho<sup>52</sup>（“会”+“开”），而“杂语”却说成“开会t<sup>h</sup>he<sup>132</sup>”；“打破纪录”，藏语是sī<sup>13</sup>tho<sup>55</sup>le ke<sup>15</sup>（“纪录”+“打破”），而“杂语”却说成“纪录打破t<sup>h</sup>he<sup>132</sup>”，等等。这除了说明本族语对“杂语”中汉语词的改造消融能力之外，不也能透视出“杂语”对藏语结构的某些影响吗？

### 三、汉语对嘎卓语的影响

嘎卓语是云南蒙古族使用的语言。云南蒙古族自称“嘎卓”（ka<sup>55</sup>tso<sup>51</sup>），人口4000多，主要聚居在通海县新蒙乡。700多年前，他们从北方大草原南下征战，而后落籍云南。长期以来，他们与周围民族杂居，语言也受到影响。其中，受汉语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

1. 从语音系统看，嘎卓语有p、ph、m、f、v、t、th、n、i、ts、tsh、s、z、t<sup>h</sup>、t<sup>h</sup>h、ŋ、<sup>h</sup>、j、k、kh、ŋ、x、y、w等24个单辅音声母，有i、i、ε、a、a、o、v、v、u等8个单元音韵母和iε、ia、io、oi、oε、oy、oa、ao、iao等9个复元音韵母，声调有55、44、33、35、323、53、24、31等8个。汉语对嘎卓语语音的影响主要在韵母上。嘎卓语本语词的韵母绝大多数是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很少。在9个复合元音韵母中，iε、oy、oa少量出现在本语词上，其余6个基本上出现在汉语借词上。如：lia<sup>332</sup>“量”、lia<sup>35</sup>“亮”，lio<sup>31</sup>“刘”，xoi<sup>24</sup>“回”、t<sup>h</sup>ao<sup>33</sup>soi<sup>315</sup>“胶水”，khe<sup>35</sup>“怪”、ko<sup>33</sup>“乖”，khao<sup>33</sup>“敲”、thao<sup>3</sup>“套（衣服）”，tiao<sup>35</sup>“钓”、thiao<sup>24</sup>“跳”等等。ia、io、oi、oε、ao、iao这6个汉语借词音位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嘎卓语原来的语音结构，在音节结构类型中新增加了“辅音+元音+元音+元音”的类型，并大大地增加了“辅音+元音+元

音”这一类型出现的频率。

2. 从词汇看，嘎卓语中，汉语借词数量大、分布广。不仅借用表示抽象概念的名称，而且也借用表示具体概念的名称；不仅各类实词中都有汉语借词，而且虚词中也有借汉语的。如：ky<sup>323</sup> tɕa<sup>33</sup> “国家”、ɕo<sup>32</sup> ɕao<sup>35</sup> “学校”、le<sup>35</sup> pa<sup>33</sup> kv<sup>35</sup> “肋骨”、ka<sup>33</sup> “肝”、tɕo<sup>35</sup> “就（走）”、xɛ<sup>24</sup> “还（来）”、ma<sup>31</sup> sa<sup>36</sup> “马上”、thɛ<sup>33</sup> “太”。植物名词多数借汉语，如：tɕa<sup>24</sup> tsɿ<sup>33</sup> “茄子”、na<sup>323</sup> koa<sup>33</sup> “南瓜”、tsɕ<sup>33</sup> tɕa<sup>33</sup> “庄稼”、miɛ<sup>223</sup> xoa<sup>33</sup> “棉花”、tɕi<sup>33</sup> tsv<sup>24</sup> “竹子”。此外，宗教用语、姓氏、亲属称谓大也都借用汉语。如sa<sup>33</sup> sɛ<sup>323</sup> “山神”、koa<sup>33</sup> jɛ<sup>33</sup> “观音”、tsao<sup>323</sup> “赵（氏）”、wa<sup>24</sup> “王（氏）”、nɛ<sup>33</sup> nɛ<sup>33</sup> “奶奶”、pa<sup>31</sup> ipa<sup>31</sup> “父亲”。

大量的汉语借词进入嘎卓语中，一般是整体借入，保持原汉语词的词义和构词方式，少数借词后则要加注本语词，说明词义。

如：

tho <sup>33</sup> ɲ <sup>24</sup> 红铜	sa <sup>24</sup> tha <sup>31</sup> ɲ <sup>21</sup> 红糖
铜红	糖红
mi <sup>223</sup> xoa <sup>33</sup> tho <sup>33</sup> 棉衣	ji <sup>323</sup> tɕa <sup>53</sup> tiɛ <sup>323</sup> 水滴
棉花 衣	水 滴
sɿ <sup>35</sup> ko <sup>35</sup> 树干	tshɿ <sup>33</sup> kv <sup>24</sup> 脚圈
树 干	脚 箍

此外，还有一些汉语借词与本语词并存，二者意义完全相同，使用何者则依说话人和具体环境而定。如：

niɛ <sup>24</sup> jo <sup>36</sup>	niɛ <sup>24</sup> ma <sup>33</sup>
ti <sup>35</sup> ti <sup>35</sup> } 弟弟	mɛ <sup>35</sup> mɛ <sup>35</sup> } 妹妹
m <sup>323</sup> fy <sup>33</sup>	na <sup>323</sup> ɲ <sup>24</sup> la <sup>323</sup> jo <sup>36</sup>
地 干 } 旱地	病 看 的 人 } 医生
ti <sup>35</sup> fy <sup>33</sup>	zɿ <sup>33</sup> sɛ <sup>33</sup>

汉语借词进入嘎卓语后，一般在语音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以顺应嘎卓语的语音系统。具体来看，在声母上，大都采用相同

的音，如果借词的声母在嘎卓语中没有，使用相近的音代替，比如通海汉语的舌尖后音借入嘎卓语后全部变为舌尖前音。如：

汉义	痣	芝	窗	薯	石	声
通海汉语	tʂʅ <sup>514</sup>	tʂʅ <sup>66</sup>	tʂhuā <sup>55</sup>	tʂho <sup>53</sup>	ʂl <sup>31</sup>	ʂā <sup>56</sup>
嘎卓语	tsl <sup>35</sup>	tsl <sup>33</sup>	tsha <sup>33</sup>	tshv <sup>24</sup>	sɿ <sup>24</sup>	sɛ <sup>33</sup>

但在有些词上由于受汉语影响，也出现舌尖音，舌尖后音可与舌尖前音变读。如：kv<sup>24</sup>ʂoi<sup>31</sup>~kv<sup>24</sup>soi<sup>31</sup>“骨髓”。

在韵母上，通海汉语的鼻音韵尾和鼻化韵借入音卓语后全部变为口元音。如：

汉义	亮	洞	棚	碱	面	烟
通海汉语	liɑŋ <sup>214</sup>	toŋ <sup>214</sup>	phɑŋ <sup>53</sup>	tʂɛ̃ <sup>53</sup>	miɛ̃ <sup>35</sup>	jɛ̃ <sup>55</sup>
嘎卓语	lia <sup>35</sup>	to <sup>35</sup>	pko <sup>24</sup>	tʂɛ <sup>31</sup>	mis <sup>35</sup>	jɛ <sup>33</sup>

3. 从语法上看，汉语对嘎卓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虚词的大量借用上。嘎卓语固有的虚词很少，在使用较复杂的句子结构时，常借用汉语的虚词来丰富句子的表达功能，使句法特点发生某些变化。所借用的汉语虚词主要是副词和连词。如“还”、“就”、“全部”、“越…越…”、“不但…而且…”、“因为…所以…”、“如果…就…”、“虽然…但是…”、“或者”。例句如下：

ŋ<sup>31</sup> tʂo<sup>55</sup> ɔ<sup>31</sup> ka<sup>323</sup> wa<sup>33</sup>. 我就走。

我 就 (助) 走 (助)

tʂhɛ<sup>323</sup> pv<sup>35</sup> tɻ<sup>31</sup> sɛ<sup>31</sup> wa<sup>33</sup>. 全部都浇子。

全 部 都 浇 (助)

xoɛ<sup>33</sup> tsɻ<sup>31</sup> sɿ<sup>33</sup> nɛ<sup>33</sup> ma<sup>55</sup>, ŋa<sup>33</sup> ma<sup>55</sup> to<sup>33</sup> tɛ<sup>31</sup> tʂhao<sup>33</sup>.

或 者 是 你 教 我 教 都 一 样

你教或者我教都一样。

jɛ<sup>33</sup> woi<sup>35</sup> ji<sup>33</sup> na<sup>323</sup> wa<sup>33</sup>, so<sup>33</sup> zɿ<sup>53</sup> ji<sup>33</sup> tʂo<sup>35</sup> ma<sup>31</sup>

因 为 他 病 (助) 所 以 他 就 不

li<sup>323</sup> la<sup>31</sup> wa<sup>33</sup>.

去 (助)

因为他病了，所以就不去了。

ji<sup>33</sup> soi<sup>33</sup> za<sup>24</sup> si<sup>33</sup> na<sup>323</sup> la<sup>35</sup> wa<sup>33</sup>, ta<sup>35</sup> si<sup>33</sup> xe<sup>35</sup> li<sup>323</sup>

他 虽 然 是 病 (助) 但 是 还 来

ja<sup>323</sup> se<sup>31</sup>.

了 (助)

他虽然病了，但还是来了。

除虚词外，实词的构成方式也受到汉语的影响。与彝语支其它语言不同，嘎卓语的名词大部分能重叠，①比如：s1<sup>35</sup>tsha<sup>35</sup>

树岔

tsha<sup>35</sup>“树枝”、s1<sup>35</sup>tʂe<sup>33</sup>tʂe<sup>33</sup>“树梢”、s1<sup>35</sup>khu<sup>55</sup>khu<sup>55</sup>

岔

树 尖 尖

树 壳 壳

“树皮”、s1<sup>35</sup>tʂha<sup>31</sup>tʂha<sup>31</sup>“树叶”等显然是受通海汉语的直

树 叶 叶

接影响。

上面所说的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影响主要是指借用。这种借用是量的变化，是易于为人们所觉察的，一般被视为表层的语言影响，其影响的大小往往可以通过量的统计来估价。比如，嘎卓语的韵母有17个，其中6个是借汉语的，占韵母总数的35%。对常用词的统计显示：2050个常用词中，完全借汉语的词有552个，占总统计量的26.9%，与本语词并存的借词有7个，占0.3%，与本语词共同构成新词的汉语词有68个，占3.5%；也就是说，2050个词汇中，不同程度受汉语影响的有627个，占总数的30.6%，将近1/3。从这一比例中可以看出汉语对嘎卓语影响之大。而有的影响是不容易发现的，比如语言结构系统的改变，这是更为深

① 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嘎卓语》，载《藏彝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认为嘎卓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

层的语言影响。如前所述，由于汉语借词复合元音韵母的借入，使嘎卓语的音节结构类型所发生重大变化。此外，还有嘎卓语的构词方式的调整，比如，由于受当地汉语的影响，不仅借用 $si^{35}t\theta\epsilon^{53}t\theta\epsilon^{33}$ “树尖”这种重叠方式，而且出现名词、量词系统性的新的重叠，如： $si^{31}si^{33}$ “牙”、 $lv^{65}lv^{65}$ “珠子”、 $ni^{31}na^{25}pie^{65}pie^{65}$ “嘴唇”、 $t\theta h1^{33}pha^{65}pha^{65}$ “脚”、 $ta^{35}khoa^{31}thi^{31}thi^{31}$ “大腿”、 $ta^{34}khv^{33}t\theta\epsilon t\theta\epsilon^{33}$ “鼻涕”、 $xa^{65}po^{24}po^{24}$ “木梳”等，这种重叠在周围的汉语和其它少数民族语中都是罕见的，是嘎卓语受汉语某些重叠方式影响后产生并扩大的新的方式。汉语虚词尤其是复合连词的大量借用，也使嘎卓语的话语结构更加严谨、复杂，出现大量的复合句，从而导致嘎卓语句子结构类型的变化。除语言结构出现新的特点外，由于汉语的深入影响，嘎卓人的语言使用也呈现在一些特点，比如在口语中，语音两读的现象很丰富，“滴”可读为 $ti^{53}$ ，也可读为 $ti\epsilon^{24}$ ；“鸚鵡”可读为 $je^{33}kv^{33}$ ，也可读为 $je^{33}k\upsilon^{33}$ ；“汗毛”可读为 $xa^{328}mao^{24}$ ，也可读为 $xa^{323}mo^{24}$ 。嘎卓语中，有时使用本语词，有时使用借词的现象也很多。如：

汉语借词	本语词	汉义
$si^{33}tsa^{323}me^{33}$	$\eta^{35}ma^{33}me^{33}$	心脏
$\theta o^{65}se^{33}jo^{35}$	$so^{33}so^{31}la^{323}jo^{35}$	学生
$xo^{323}sa^{55}$	$a^{31}si^{35}pha^{31}$	和尚
$ni^{323}kv^{33}$	$a^{31}si^{65}ma^{33}$	尼姑

无论是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量的借用而言，还是从语言结构的变化和语言使用的特点来看，汉语对嘎卓语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不仅影响范围广，而且影响程度也比较深。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和云南蒙古族所具备的特定历史背景及政治经济环境，汉文化的渗透及开放的心理特征，转用语言的特殊性及其双语使用的特点等因素密切相关的，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1. 与特定历史条件及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元朝时，文化比较落后的蒙古族一跃而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必须学习比较先进的汉族文化，这便促使他们逐渐学会了汉语和汉字。据记载，坐镇云南曲陀关的蒙古元帅阿剌帖木耳及其儿子都擅长作汉文诗词，甚至连蒙古贵族妇女也习汉文、汉语，并能赋诗作词。<sup>①</sup>如果说云南的蒙古贵族学习汉语，汉文是出于统治的需要的活，那么，落籍通海的普通蒙古士兵则是为了生存。据史料记载，元朝覆灭后，结束了战事的蒙古族不再有军饷，只得自食其力，另寻生活出路。他们起先居住在曲陀关上，后随杞麓湖的涨落而辗转迁徙，由于在政治上处于受歧视、受压迫的境地，不可能定期耕种当地罕有的水田，只能漂泊在杞麓湖上，靠捕鱼捞虾、然后去集市上换取米、盐等必需品勉强度日。他们的交换对象主要是汉族、回族，交换时共同使用的语言当然只能是汉语。这种生存的需要是学习汉语最根本的动力。此外，普通士兵一般不能带家眷，他们定居通海后，为了繁衍后代，必须与附近别的民族通婚，在一些墓志中发现的董氏、罗氏、刘氏等姓氏显然是与汉族通婚的标志。可见正是蒙古官兵南下并落籍通海这一特点历史原因及其后来所处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方式等因素决定了云南蒙古族必须长期使用汉语，嘎卓语必然受到汉语多方面的影响。

2. 与文化的渗透以及开放的民族心理特征的关系：语言不仅是构成文化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一个文化共同体与它所使用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两个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往往伴随着两种语言的互相影响。云南蒙古族脱离了北方大草原的畜牧文化共同体，进入特点迥异的南方农耕文化共同体，这种文化共同体环境的变更本身就潜藏着要受

---

<sup>①</sup>参见杜玉亭、陈吕范的《云南省蒙古族历史简述》（初稿），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7年。

到新文化共同体语言影响的必然性。史实证明，云南蒙古族在7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与彝、汉、回等民族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在文化等方面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其中由于汉文化的特定地位，云南蒙古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这种影响在他们保留至今的一些风土人情、娱乐形式及宗教信仰中还可能看到一些。比如，为了纪念汉族历史上有名的工匠鲁班，家家户户都过鲁班节，视鲁班为他们尊敬的神匠；家家都喜欢张贴用汉文书写的对联，接受并乐于演唱云南的地方戏——“滇戏”，演唱时主要用当地汉语，有时也夹带着少量云南蒙古语；信奉众神，如观音菩萨、山神、水神、灶神等……云南蒙古族乐于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不仅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而且也培养了一种乐观自信、开放进取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反映在“语言观”上，他们既热爱自己的母语，也乐于学习汉语。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可以自然而流利地用汉语与外来的客人热情交谈，稚气未脱的小孩子也可以用母语同亲人、伙伴交流、嬉戏，没有任何偏见，一切合乎需要、顺其自然。有了这种开放的“语言观”，在与汉语长期的接触中渐渐吸收一些汉语成分，丰富母语的表达能力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所以，如果说最初时云南蒙古族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或迫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学习汉语、接受汉语影响的话，那么，在后来与汉族等民族和睦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是自然而自愿地接受汉文化以及汉语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双语的繁荣局面，也不会出现那么丰富的汉语词与本族语词交替使用的现象。云南蒙古族由“不得不学汉语”转变为“乐意学习汉语”，这种语言观念和语言态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嘎卓语受汉语影响的范围和深度。

3. 语言特点的关系：嘎卓语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尤其是通海彝语相近，这种相近，不仅反映在二者具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比彝语不同方言间的同源词还多）以及基本语法特点

相同上，而且在语音方面还有比较种整的对应关系。<sup>①</sup>但是，它与彝语也有许多差别，如声母简单，塞音、塞擦音有清无浊；元音不分松紧；声调数量多；名词后加成分丰富；施受者语序灵活；大量借用汉语词汇等。通过语言及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表明，嘎卓语是在云南蒙古族所转用的彝语的基础上、受到汉语较大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言。嘎卓语的语言事实表明，作为一种转用的语言，它似乎更具有开放性、更容易接受别的语言影响。因为它的语音结构相对简单，日常生活、交际之外的本语词汇也相对贫乏，文化中其它的要素对语言的制约也相对小些（脱离了原来的文化共同体，再重新建立新的文化共同体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文化要素之间的联系由不确定到确定，由松散到密切，相互的制约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所以，在与汉语长期而密切的接触中，很容易吸收必要的语音成分、词汇来丰富母语、语言系统，加强自己的表达能力，提高母语的交际功能。

4. 与双语使用特点的关系：如前所述，云南蒙古族不仅以嘎卓语作为主要通用语，而且还普遍掌握汉语。在其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等领域中都普遍存在着双语现象。他们的双语使用具有以下两个特点：①双语使用的普遍性。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人人都掌握双语，不管是在学校、乡政府，还是在家里，处处使用双语，属典型的全民双语型。②双语之间的渗透性。在双语使用中，两种语言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常常交替使用，互相渗透。在唱歌、唱戏、做诗时，常常是一段汉语、一段嘎卓语，有些复杂的句子，单用嘎卓语词难以完全表述，于是夹带着汉语词。比如，使用复句时一般夹带汉语的关联词和一些副词（例见语法部分）。有时候，一句话一半用嘎卓语，一半用汉语。如果说全民使用双语为语言的影响提供了间接

<sup>①</sup> 详见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的《嘎卓语》，同上。

的条件的话，双语之间的互相渗透便为语言提供了直接的条件，有时甚至就是语言影响的具体表现，汉语借词不管是与同义的本语词在不同场合的交替使用，还是与其它本语词在同一句话中共同使用，都标志着这些汉语成分已经为嘎卓语所接受，并真正为云南蒙古族发挥一定的交际功能。此外，双语之间的渗透性还能深化语言的影响，使新借入的语言成分通过大量反复的使用而逐渐为人所熟悉、逐渐与本语成分协调并最终融入本语的语言系统之中。

#### 四、汉语对白语的影响

白族总人口159万多人（1990年），其中百万人口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此外在省内的怒江、丽江、保山、临沧、昭通、曲靖、玉溪、思茅、德宏、文山、昆明等地也有分布。白族是长期以来生息繁衍在以洱海周边为核心区域的土著民族。史籍记载中的僰人、滇僰、叟、西爨、爨獫、白蛮、白尼、白伙、民家、勒墨、那马等皆为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对白族先民和现代白族的称谓。

远在两千多年前，白族先民就与汉族先民有了密切的交往。公元前三世纪，楚庄跻数万将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sup>①</sup>后，其相当多的成员与白族先民通婚，成为白族先民中的一部分。因征战西汉王朝来自西北和巴蜀的士兵，以及来“南夷地区垦荒”<sup>②</sup>的内地“豪民”大都融合到汉代白族先民之中。此后还有隋唐以及元、明时期，都有江浙闽粤的大量汉族屯兵与白族通婚融合。唐朝南诏国时代，白族王公贵族子弟数千人被派往四川成都“教以书数”，<sup>③</sup>其中不少人回乡“归教乡里”，皆能吟诗作

①②③ 《白族简史》9页、49页、10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第1版。

赋，有的力作被选入《全唐诗》。南诏时期，白族文人曾创制了“汉字型白文”，至今还在民间艺人中流行。白族的学校教育一直使用汉语文。白族知识分子开创了“汉字白读”的读书音，广泛流传汉族名著《水浒》、《三国》、《西游记》等长篇故事和诗歌。

元朝以来，参加“开科取士”，培植了一些掌握汉文化的文人学士。这些文人一直操用汉、白双语。由于白族广泛接触汉文化，白语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

白语有三个方言：以大理为中心的南部方言、以剑川为中心的中部方言、和以碧江、维西一带的勐墨、那马为中心的北部方言。白语的系属，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属于彝语支，有的认为应独立为一个白语支，也有学者主张把白语归为汉语的一个方言。本节从词汇、语音、语法三方面简述汉语对白语的影响。

### (一) 词汇方面

这里以新中国建立为界，把白语中的汉语借词分为老借词和新借词两类。

老借词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借词涉及基本词汇，广泛分布于各类实词和虚词之中。

(以下例子凡不注明者，均以中部方言剑川县马登话为例)。

名词：ʒi<sup>55</sup>衣，kuā<sup>55</sup>裤，ŋe<sup>42</sup>鞋，ka<sup>31</sup>草鞋，mo<sup>33</sup>tsl<sup>31</sup>帽子，  
me<sup>33</sup>米，mə<sup>33</sup>麦，ko<sup>42</sup>稻谷，tse<sup>42</sup>(财)钱，  
phio<sup>33</sup>tsl<sup>31</sup>票子。

动词：ʒə<sup>33</sup>食、吃，ɔ̃<sup>33</sup>饮、喝，pe<sup>33</sup>(步)行，suā<sup>33</sup>说，  
tə̃<sup>31</sup>讲，tā<sup>33</sup>打，khā<sup>33</sup>砍，tso<sup>33</sup>凿。

形容词：tsha<sup>33</sup>(赤)红，pa<sup>31</sup>白，xə<sup>33</sup>黑，təhā<sup>55</sup>青，to<sup>31</sup>大，  
se<sup>31</sup>小，sā<sup>55</sup>深，təhī<sup>33</sup>浅，kā<sup>55</sup>高。

数词：ʒi<sup>33</sup>/ʒi<sup>35</sup>一，ni<sup>31</sup>/a<sup>55</sup>二，sā<sup>55</sup>/sā<sup>33</sup>三，

ɛi<sup>33</sup>/sl<sup>55</sup>四，ŋo<sup>33</sup>/wu<sup>31</sup>五，lu<sup>35</sup>六，təhi<sup>33</sup>/təhi<sup>35</sup>七，  
pie<sup>33</sup>/pa<sup>35</sup>八，təa<sup>33</sup>/təo<sup>31</sup>九，tse<sup>31</sup>/sa<sup>35</sup>十。

基数词“一”至“十”中，除“二”（kō<sup>33</sup>）、“六”

（fɿ<sup>33</sup>）还使用本语词外，其余全借汉语。①

量词：ka<sup>31</sup>个，pi<sup>31</sup>个（人），khō<sup>55</sup>件，tiē<sup>31</sup>顶，tse<sup>53</sup>节，  
təhyē<sup>55</sup>圈，tiə<sup>42</sup>头，thu<sup>55</sup>端。

代词：ŋo<sup>31</sup>吾、我，no<sup>31</sup>你，ta<sup>35</sup>那

介词：ka<sup>33</sup>将，sā<sup>33</sup>使，tə<sup>33</sup>同（“搭”）。

副词：tshu<sup>33</sup>就，tsa<sup>35</sup>sɿ<sup>55</sup>扎实，tse<sup>33</sup>再，mə<sup>33</sup>没。

连词：pi<sup>55</sup>与，tsɿ<sup>55</sup>则，ko<sup>55</sup>和，xua<sup>55</sup>ti<sup>55</sup>或者……

助词：tsā<sup>42</sup>成，sɿ<sup>55</sup>尽，sō<sup>33</sup>从

白语中汉语老借词，以单音节词为主，但也有少数是双音节词。如：

pi<sup>42</sup> po<sup>42</sup>蚍蜉，ku<sup>55</sup>tiə<sup>33</sup>蝌蚪，ko<sup>55</sup>le<sup>33</sup>蝴蝶，kho<sup>55</sup>sɿ<sup>31</sup>  
咳嗽，təhɿ<sup>55</sup>təa<sup>55</sup>亲家，zō<sup>55</sup>thi<sup>33</sup>兄弟。

2. 单音节汉语借词进入白语后，有一部分自行组成新词。

如：

pi<sup>55</sup> pa<sup>31</sup>作弄、作怪      tshu<sup>55</sup> tsho<sup>33</sup>讥讽

逼   拌                      擦   搓

sa<sup>33</sup> sa<sup>33</sup>实在，              ka<sup>31</sup> to<sup>31</sup>贵重、值钱

实   实                      价   大

3. 部分老借词反映了古汉语读音。以北部方言维西县维登白语为例（汉语上古、中古音拟音以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为依据）。

（1）维登白语保存古代照母（t）、穿母（t'）、神母（d）、日母（n）读音：

汉字	古音	维西白语
帚	tiau	ty <sup>33</sup>
（一）串	t'iwan	t'uq <sup>33</sup>

① 李绍尼：《白语基数词与汉语、藏缅语关系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舌            qíat            tǎ<sup>31</sup>  
 船            qíwan          ni<sup>35</sup>ɕy<sup>31</sup>  
 日 nǐǎt      nǐ<sup>33</sup> (大理: nǐ<sup>33</sup>)

(2) 保存了汉语现今读擦音，古代读塞音的古音。如：

汉字            古音            马登白语  
 风              piwəm          pi<sup>55</sup>sɿ<sup>55</sup>  
 敷(药)        p<sup>6</sup>iwa          pu<sup>42</sup>

(3) 见溪群疑匣母各地白语至今仍读为舌根音。如：

见母：江kō<sup>55</sup>，居kū<sup>31</sup>，鸡ke<sup>55</sup>，kē<sup>31</sup>见。

溪母：曲khy<sup>33</sup>，起khe<sup>33</sup>

群母：穷ku<sup>42</sup>，忌kə<sup>31</sup>，群kua<sup>42</sup>，翘ka<sup>31</sup>。

疑母：疑ŋə<sup>42</sup>，鱼ŋo<sup>55</sup>语ŋo<sup>31</sup>，眼ŋue<sup>33</sup>。

匣母：学ɣə<sup>31</sup>，话ɣo<sup>31</sup>，滑ɣuo<sup>31</sup>和(泥)ɣo<sup>42</sup>。

(4) 不同时期借入的词(字同音不同)并存并用。如：

非  $\begin{cases} \text{pio}^{33} \text{非、不} \\ \text{非} \\ (\text{sa}^{33}) \text{fe}^{55} \\ \text{是} \quad \text{非} \end{cases}$       肺  $\begin{cases} \text{phia}^{33} \text{kha}^{33} \text{肺叶} \\ \text{肺} \quad (\text{景}) \\ \text{fe}^{55}(\text{təhi}^{55} \text{tsō}^{31}) \text{肺(气肿)} \end{cases}$

敷  $\begin{cases} \text{pu}^{42}(\text{zə}^{33}) \text{敷(药)} \\ \text{fv}^{33} (\text{ni}^{31} \text{lio}^{51} \text{sɿ}^{55}) \\ \text{敷} \quad \text{衍} \quad \text{了} \quad \text{事} \end{cases}$   
 桃  $\begin{cases} \text{ta}^{42} \text{桃(子)} \\ \text{桃} \\ \text{tho}^{31} \text{li}^{31} \text{me}^{31} \text{thī}^{33} \text{qə}^{55} \\ \text{桃} \quad \text{李} \quad \text{满} \quad \text{天} \quad \text{下} \end{cases}$

前  $\begin{cases} t\theta_i^{31} (m_i^{31}) \\ \text{前 面} \\ t\theta h_i^{31} (t\theta\tilde{e}^{56}) \\ \text{前 进} \end{cases}$

城  $\begin{cases} ts\tilde{a}^{42} (x\tilde{e}^{31}) \\ \text{城 内} \\ ts^{42} \tilde{a}^{31} s_l^{56} \\ \text{城 市} \end{cases}$

盆  $\begin{cases} th\tilde{o}^{33} p\tilde{a}^{42} (\text{送礼用的}) \\ \text{托 盆} \\ ph\tilde{e}^{31} t_i^{56} \\ \text{盆 地} \end{cases}$

疯  $\begin{cases} vv^{42} \text{疯(动)} \\ f\tilde{e}^{33} (khu\tilde{a}^{31}) \\ \text{疯 狂} \end{cases}$

剩  $\begin{cases} z\tilde{e}^{31} (tsh_l^{31}) \\ \text{剩 菜} \\ s\tilde{e}^{56} (z\tilde{y}^{31} t\theta\tilde{a}^{56} ts_l^{56}) \\ \text{剩 余 价 值} \end{cases}$

挤  $\begin{cases} tsue^{33} (p\tilde{o}^{31}) \\ \text{挤 奶} \\ t\theta_i^{33} (n_i^{33}) \\ \text{(挤) 入} \end{cases}$

妻  $\begin{cases} fv^{56} (tshe^{55}) \\ \text{夫 妻} \\ fv^{33} t\theta hi^{33} \end{cases}$

江  $\begin{cases} k\tilde{o}^{56} \text{江} \\ (tsh\tilde{a}^{31}) t\theta\tilde{a}^{33} \\ \text{长 江} \end{cases}$

见  $\begin{cases} (x\tilde{a}^{56}) k\tilde{e}^{31} \\ \text{看 见} \\ t\theta\tilde{e}^{56} (\theta_i^{56}) s\tilde{e}^{56} \\ \text{见 习 生} \end{cases}$

新借词有如下特点：

新中国建立后，上汉语文学校和懂得白、汉双语的人数大大超过建国以前，借入的汉语词更多，其特点有四：

1. 大量借入具有时代特征的上层建筑和科学技术词汇。

如：

$f\tilde{a}^{33} s\tilde{e}^{33}$  翻身

$khu^{33} \theta u^{35} t\theta_i^{56} su^{36}$  科学技术

$thu^{31} ke^{31}$  土改

$se^{56} xue^{56} tsu^{31} z_i^{56}$  社会主义

$t\theta_i^{56} sa^{36}$  建设

$z\tilde{e}^{31} mi\tilde{e}^{31} t\tilde{e}^{56} pio^{31}$  人民代表

v̄v<sup>55</sup> li<sup>21</sup> 物理 t̄hȳ<sup>21</sup> kua<sup>35</sup> ts̄<sup>55</sup> ɕi<sup>25</sup> 全国政协

xuq<sup>55</sup> ɕu<sup>35</sup> 化学 fe<sup>22</sup> t̄ɕi<sup>22</sup> to<sup>55</sup> t̄<sup>55</sup> 飞机导弹

2. 音译现代汉语滇西汉话。

3. 新借词逐步代替老借词。如：

ts̄<sup>55</sup> fv<sup>31</sup> → ŋa<sup>42</sup> me<sup>42</sup> pa<sup>35</sup> t̄ɕ̄<sup>33</sup> → t̄ɕ̄i<sup>55</sup> ts̄<sup>42</sup>

政 府 衙 门 北 京 京 城

ɕu<sup>35</sup> ɕo<sup>55</sup> → ɕu<sup>55</sup> th̄<sup>55</sup> no<sup>31</sup> tsuē<sup>33</sup> → ɕo<sup>55</sup> z̄<sup>22</sup>

学 校 学 堂 农 村 乡 邑

t̄ɕyē<sup>33</sup> tue<sup>55</sup> → kua<sup>55</sup> ma<sup>22</sup> lo<sup>31</sup> s̄<sup>55</sup> → s̄<sup>55</sup> ts̄<sup>22</sup>

军 队 兵 马 老 师 书 主

4. 汉语的成语、俗语、谚语、格言整个地借入。

成语：pu<sup>35</sup> v̄v<sup>55</sup> ts̄<sup>55</sup> ni<sup>35</sup> sue<sup>31</sup> to<sup>55</sup> t̄ɕy<sup>31</sup> ts̄<sup>21</sup>

不 务 正 业 水 到 渠 成

sue<sup>31</sup> ɕ̄<sup>33</sup> sua<sup>31</sup> zu<sup>25</sup> t̄ɕy<sup>31</sup> z̄i<sup>35</sup> f̄<sup>31</sup> s̄<sup>22</sup>

随 心 所 欲 举 一 反 三

俗语：pu<sup>35</sup> kuē<sup>21</sup> s̄<sup>33</sup> t̄ɕhi<sup>25</sup> a<sup>55</sup> s̄<sup>22</sup> z̄i<sup>35</sup>

不 管 三 七 二 十 一

t̄ɕhi<sup>25</sup> t̄ɕhi<sup>35</sup> pa<sup>35</sup> pa<sup>35</sup> no<sup>22</sup> mo<sup>31</sup> t̄ɕ̄<sup>21</sup>

七 七 八 八 用 不 讲

别讲七七八八的话。

z̄i<sup>35</sup> ɕ̄<sup>33</sup> pu<sup>35</sup> n̄<sup>31</sup> a<sup>55</sup> z̄o<sup>55</sup>

一 心 不 能 二 用

ts̄<sup>33</sup> fe<sup>33</sup> sa<sup>25</sup> zu<sup>35</sup> fe<sup>33</sup>, sa<sup>35</sup> t̄<sup>35</sup> me<sup>31</sup> th̄<sup>33</sup> fe<sup>22</sup>

张 飞 杀 岳 飞 杀 得 满 天 飞

(此句比喻和讥讽不懂装懂的胡言乱语者。)

大理白语“大本曲”如《本主张忠烈》有一段，所编白语唱词，整句整段借汉语：

ɕo<sup>55</sup> f̄<sup>31</sup> s̄<sup>22</sup> ts̄<sup>31</sup> ɕo<sup>55</sup> ju<sup>31</sup> ju<sup>31</sup>,

下 凡 狮 子 笑 盈 盈

tshə<sup>55</sup> xo<sup>55</sup> pu<sup>31</sup> tsv<sup>31</sup> lv<sup>55</sup> jye<sup>55</sup> ɛ<sup>1</sup> s|<sup>33</sup> ji<sup>33</sup> xo<sup>55</sup>  
庆 贺 本 主 六 月 二 十 一 号  
su<sup>33</sup>,

生

ɣə<sup>55</sup> tsa<sup>33</sup> miu<sup>31</sup> tsu<sup>33</sup> lie<sup>33</sup>,

姓 张 名 忠 烈

ku<sup>55</sup> jye<sup>31</sup> na<sup>31</sup> tɕu<sup>33</sup> su<sup>33</sup>。

根 源 南 京 生

格言: zə<sup>31</sup> thə<sup>31</sup> ts|<sup>55</sup> fv<sup>55</sup> tɕo<sup>33</sup> pə<sup>31</sup> zo<sup>31</sup>,

人 穷 志 富 交 朋 友

tɕa<sup>33</sup> tse<sup>35</sup> ɣə<sup>33</sup> khuē<sup>33</sup> zə<sup>31</sup> tɕa<sup>33</sup> pi<sup>33</sup>。

家 窄 心 宽 迎 嘉 宾

农谚: tɕ<sup>55</sup> pi<sup>55</sup> le<sup>31</sup> sa<sup>31</sup> pu<sup>55</sup> tɕ<sup>31</sup> tɕo<sup>31</sup> zye<sup>35</sup> tɕo<sup>31</sup>,

大 雁 来 时 不 等 九 月 九

xē<sup>55</sup> ō<sup>42</sup> tɕhy<sup>55</sup> sa<sup>31</sup> pu<sup>55</sup> tɕ<sup>31</sup> sū<sup>33</sup> zye<sup>35</sup> sū<sup>33</sup>,

天 鹅 去 时 不 等 三 月 三

借词发展趋势。

1. 汉借词逐步代替民族语词。

ts|<sup>55</sup> ma<sup>55</sup> → v<sup>55</sup> pa<sup>42</sup>      phō<sup>55</sup> zo<sup>31</sup> → fv<sup>55</sup> tɕa<sup>31</sup>

芝 麻 芝 麻      朋 友 男 友

fá<sup>55</sup> (米面食总称) → xɛɿ<sup>55</sup> z|<sup>31</sup>

(大理白语学生语) 米 饭

tshu<sup>33</sup> ~ → ŋuɔ<sup>33</sup> xē<sup>55</sup> ~

初 几 月 生 几

e<sup>31</sup> xe<sup>31</sup> → ko<sup>42</sup> mi<sup>31</sup>      e<sup>31</sup> zye<sup>31</sup> → lo<sup>42</sup> xo<sup>55</sup> ɣi<sup>33</sup>

洱 海 湖 面      洱 源 浪 穹 险

2. 新借词代替老借词。这在白族青年学生中尤为明显。

ɣə<sup>55</sup> kuē<sup>33</sup> → ɣa<sup>33</sup> kua<sup>33</sup>, tshə<sup>31</sup> xo<sup>55</sup> → ku<sup>42</sup> ɣə<sup>33</sup>

下 关 下 关 桥 后 桥 后

ta<sup>3</sup> li<sup>31</sup> → de<sup>31</sup> le<sup>33</sup>

大理大理

sɿ<sup>55</sup> po<sup>31</sup> sē<sup>55</sup> → tso<sup>42</sup> pu<sup>33</sup> sē<sup>55</sup>

石宝山石宝寺

ɕi<sup>55</sup> ɕi<sup>55</sup> (礼貌语) → na<sup>55</sup> uē<sup>55</sup> (含央求之意)

谢谢 难为

li<sup>55</sup> ɕi<sup>35</sup> → mə<sup>55</sup> pə<sup>42</sup>;

利息其俘

no<sup>31</sup> mie<sup>31</sup> → tsu<sup>55</sup> tsuā<sup>55</sup> tʂa<sup>55</sup> xo<sup>33</sup>

农民做庄稼的

3. 在部分词语上普通话语音代替地方汉语音。如:

tʂhə<sup>33</sup> lio<sup>35</sup> → tʂə<sup>33</sup> lu<sup>35</sup>; ʒi<sup>33</sup> ʒyē<sup>55</sup> → ʒi<sup>33</sup> uē<sup>55</sup>

侵略侵略 医院医院

4. 音译词代替意译组合词。

如碧江白语:

fe<sup>33</sup> tʂi<sup>33</sup> → fe<sup>55</sup> xo<sup>42</sup> tʂhi<sup>55</sup> tʂhe<sup>33</sup> → lo<sup>42</sup> xo<sup>42</sup>

飞机 飞房 汽车 滚房

fe<sup>31</sup> tso<sup>55</sup> → tē<sup>33</sup> qu<sup>33</sup> jo<sup>55</sup>; xo<sup>31</sup> tʂhi<sup>31</sup> → tʂhə<sup>33</sup> pā<sup>42</sup>

肥皂 赶垢药 红旗 赤翻

如马登话:

po<sup>35</sup> ɕu<sup>35</sup> → pe<sup>42</sup> khuə<sup>33</sup>

剥削 剥摘除

xuə<sup>33</sup> pi<sup>33</sup> → khuā<sup>55</sup> tso<sup>33</sup> po<sup>33</sup>

花边 狗牙齿

ni<sup>55</sup> e<sup>55</sup> → sā<sup>55</sup> ko<sup>42</sup>; thū<sup>33</sup> u<sup>33</sup> → ta<sup>31</sup> ʒə<sup>33</sup>

恋爱相可 (爱)贪污偷吃

我们做过统计, 在1800个词汇中, 白语固有词只250个左右, 占13.8%, 汉借词1550个, 占86.1%。在10个基数词中, 只有“二”与“六”是固有词, 汉借词占8/10。

### (三) 语音方面

古今汉语的语音对白语的语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 1. f音位的增加。

白语原无[f]，后随汉语词的借入，增加了f。如保山旧寨和洱源腊坪白语把“飞”分别念为pv<sup>66</sup>和kv<sup>66</sup>，而其它地区的白语读成fv<sup>66</sup>或fa<sup>66</sup>了。

2.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汉语普通话的推广，部分青少年借入了tʂ、tʂh、ʂ、ʐ。如：“真诚”读tʂəŋ<sup>33</sup> tʂhəŋ<sup>31</sup>，“输入”读ʂu<sup>33</sup> ʐu<sup>36</sup>。

#### 3. 增加了鼻化韵。

汉语的阳声韵，有的在白语变为口元音韵，有的在白语变为鼻化元音韵。如：

汉字	隋唐音 <sup>①</sup>	大理喜洲白语	剑川马登白语
三	sam	sɑ <sup>66</sup>	sã <sup>66</sup>
甘	kam	ka <sup>36</sup>	kã <sup>66</sup>
店	tiæm	ti <sup>33</sup>	tĩ <sup>33</sup>
间	kan	keɪ <sup>36</sup>	kã <sup>66</sup>
难	nan	na <sup>42</sup>	na <sup>42</sup>
官	kuon	kua <sup>36</sup>	kuã <sup>66</sup>
丈	diaŋ	tsa <sup>31</sup>	tsã <sup>31</sup>
让	ŋiaŋ	zo <sup>31</sup>	zõ <sup>31</sup>
江	kəŋ	kv <sup>36</sup>	kõ <sup>66</sup>

4. 古代汉语带—p、—t、—k入声韵，在白语里读为紧喉韵。如：

汉字	广韵音	马登白语
法	piwap	fa <sup>33</sup>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匣	ɣap	ɣa <sup>31</sup>
塔	t'ap	t'ɑ <sup>33</sup>
舌	dʒiɛt	tse <sup>31</sup>
绝	dziwɛt	tsue <sup>33</sup>
说	ɕiwɛt	suɑ <sup>23</sup>
苗	dzak	tso <sup>33</sup>
革	kæk	kə <sup>33</sup>
恶	ak	o <sup>33</sup>

5. 借词韵母有的有两读，一读单元音韵母，一读复元音韵母。后者借入的时间晚。例如：

爱	e <sup>66</sup>	ai <sup>66</sup> (kuɛ <sup>36</sup> 国)
代	te <sup>66</sup> (pio <sup>31</sup> 表)	tai (pio <sup>31</sup> 表)
派	phe <sup>66</sup>	phai <sup>66</sup> tshu <sup>36</sup> suɑ <sup>31</sup> 派 出 所
欧	o <sup>33</sup>	ou <sup>33</sup> (tsou 州) 欧
逗	to <sup>66</sup>	tou <sup>66</sup> sɿ <sup>66</sup> tsɿ <sup>33</sup> nɛ <sup>33</sup> 逗 小 孩
熬	o <sup>66</sup>	ɑo <sup>66</sup> tɕhi <sup>66</sup> 熬 气
招	tso <sup>66</sup> (xu <sup>66</sup> )	tsao <sup>66</sup> (xu <sup>66</sup> ) 抬 乎 抬 乎

6. 由于大批汉语借词进入白语，使白语产生了两个新的声调，即42调和35调。如：

剥 pe<sup>42</sup>      分 vā<sup>42</sup>      平 pā<sup>42</sup>      长 tsō<sup>42</sup>      除 tci<sup>42</sup>

鸣 ma<sup>42</sup>    胡 (须) ɣu<sup>42</sup>    疯 vɿ<sup>42</sup>    牛 ŋə<sup>42</sup>    横 kuā<sup>42</sup>

汉语入声字，早期借入白语后，变为紧喉音，分布在中平和

中低降两个调上，后期借入白语后，以35调调值来区别于其它声调。如：

沃 yu<sup>35</sup> 觉 tɕa<sup>35</sup> 末 mu<sup>35</sup> 陌 ma<sup>35</sup> 昔 qi<sup>35</sup>  
 德 ta<sup>35</sup> 合 xu<sup>35</sup> 贴 thi<sup>35</sup> 业 ni<sup>35</sup> 乏 fa<sup>35</sup>

解放后，现代汉语51调字借入白语后，又使白语产生了一个新的紧喉高平调。如：

政 tsɛ̃<sup>55</sup> 治 tsɿ̃<sup>55</sup> 进 tɕɿ̃<sup>55</sup> 步 pu<sup>55</sup>  
 干 kã̃<sup>55</sup> 部 pu<sup>55</sup> 任 zɿ̃<sup>55</sup> 务 vỹ<sup>55</sup>

### (三) 语法方面

白语的许多语法现象，如词组的构成，虚词的功能，词序的先后，各种句型特征都与汉语的借入、受汉语的影响有关。

1. 汉语表示“周遍性”的词“见”，借入白语后与白语表示“周遍性”四字格词语并存并用。如：

白语型（只需更换第3个词）

xu<sup>31</sup> tsɿ̃<sup>33</sup> ni<sup>31</sup> tsɿ̃<sup>33</sup> 每人  
 人

xu<sup>31</sup> tsɿ̃<sup>33</sup> ni<sup>33</sup> tsɿ̃<sup>33</sup> 每日  
 日

xu<sup>31</sup> tsɿ̃<sup>33</sup> xo<sup>31</sup> tsɿ̃<sup>33</sup> 每户  
 户

xu<sup>31</sup> tsɿ̃<sup>33</sup> zɛ̃<sup>33</sup> tsɿ̃<sup>33</sup> 每村  
 邑

汉语型

kẽ̃ ni<sup>31</sup> 每人  
 见人

kẽ̃ ni<sup>33</sup> 每日  
 见日

kẽ̃ xo<sup>31</sup> 每户  
 见户

kẽ̃ zɛ̃<sup>33</sup> 每村  
 见邑

2. 有些表示同一意义的汉语借词，词素的秩序不同。如偏正式词，中心成分有的在修饰词前，有的在后。显然，这两个词是不同时期借入的。例如：

早期借入的

tā<sup>31</sup> pi<sup>55</sup>

担 扁

tu<sup>31</sup> ta<sup>55</sup>

独 单

ka<sup>42</sup> ma<sup>31</sup>

贾(卖) 买

xo<sup>35</sup> mi<sup>31</sup> (大理方言)

花 棉

təy<sup>33</sup> tsa<sup>55</sup> (南诏白蛮语)

军 将

后期借入的

pi<sup>31</sup> tā<sup>55</sup>

扁 担

tā<sup>33</sup> tu<sup>35</sup>

单 独

me<sup>31</sup> me<sup>55</sup>

买 卖

mi<sup>55</sup> xuə<sup>55</sup> (剑川方言)

棉 花

təā<sup>33</sup> təyē<sup>33</sup>

将 军

3. 名词与数量词的秩序, 白语是“名十数十量”。随着汉语影响的不断加深, 又借入汉语“数十量十名”的新语序。如:

ka<sup>42</sup> sā<sup>55</sup> tɕi<sup>55</sup> 三斤肉; pa<sup>55</sup> ti<sup>31</sup> tsō<sup>33</sup> 八点钟

肉 三 斤 八 点 钟

pa<sup>33</sup> fy<sup>33</sup> pe<sup>42</sup> 六只大碗; sɿ<sup>35</sup> tɕi<sup>31</sup> ku<sup>55</sup> ɕo<sup>31</sup> sɿ<sup>31</sup>

大碗 六 只 十 几 个 小 时

4. 宾动与动宾

白语有相当一些句子只能用“宾十动”型, 而不能使用“动十宾”型。如:

mə<sup>55</sup> ɲue<sup>33</sup> ta<sup>55</sup>; mə<sup>55</sup> ɕi<sup>55</sup> fa<sup>33</sup> 他(的) 眼 瞎 他(的) 心 翻

ɲə<sup>55</sup> ko<sup>33</sup> khe<sup>33</sup>; ɲə<sup>55</sup> tā<sup>42</sup> khe<sup>33</sup> 我(的) 脚 腐 我(的) 胃 水 起

我(的) 脚 腐 我(的) 胃 水 起

nə<sup>55</sup> ni<sup>33</sup> tiə<sup>42</sup> kuā<sup>55</sup> kō<sup>55</sup> na<sup>55</sup>? 难道你耳聋了吗?

你(的) 耳 朵 廊 聋 吗

mə<sup>55</sup> tsō<sup>42</sup> pə<sup>31</sup> zi<sup>31</sup> khe<sup>33</sup> lə<sup>31</sup> na<sup>55</sup>? 他的肠子扭了吗?

他(的) 肠 条 扭 起 了 吗

这六个句子中的主语代词只能用领属格，不能用主格ŋo<sup>31</sup>（我）、no<sup>31</sup>（你）、mo<sup>31</sup>（他她）。但长期以来由于受汉语“动宾”型的影响，大量的句子也用了“动宾”型。如：

ŋo<sup>31</sup> ue<sup>31</sup> te<sup>31</sup> 我喂猪。no<sup>31</sup> sa<sup>33</sup> tshu<sup>33</sup> 你割草。

我 喂 猪 你 割 草

mo<sup>31</sup> xā<sup>55</sup> ke<sup>55</sup> 他养鸡。ma<sup>65</sup> ɕa<sup>33</sup> ŋə 他们杀牛。

他 养 鸡 他们 杀 牛

a<sup>55</sup> nə<sup>56</sup> kho<sup>33</sup> ŋa<sup>42</sup> yə<sup>31</sup> sɿ<sup>66</sup> 二楞去读书。

二 楞 个 去 读 书

na<sup>55</sup> ɕi<sup>55</sup> zə<sup>33</sup> tshā<sup>55</sup> ua<sup>55</sup> 你们先吃早饭吧。

你们 先 吃 早饭 吧

5. 借入“比”字使用比较句。

北部方言维登话无“比”字句型。汉语“我比你高”的“比较级”，白语使用nə<sup>55</sup> tɕw<sup>42</sup> no<sup>33</sup> ŋə<sup>65</sup> qā<sup>55</sup>句型。后来借入

你（的）头 上 我的 高

“比”字。例如：

ŋw<sup>55</sup> pi<sup>31</sup> no<sup>31</sup> qā<sup>55</sup> 我北你高。

我 比 你 高

qhuā<sup>33</sup> dɕw<sup>36</sup> pi<sup>31</sup> ho<sup>53</sup> lo<sup>35</sup> do<sup>31</sup> 狗比猫大。

狗 只 比 猫 大

剑川中部方言有相当于汉语“比”的两个词“ni<sup>65</sup>”和“li<sup>31</sup>”。如：

tsɿ<sup>33</sup> pə<sup>31</sup> xo<sup>33</sup> ni<sup>33</sup> ni<sup>65</sup> ni<sup>33</sup> no<sup>33</sup> ko<sup>65</sup> to<sup>31</sup>

子 女 伙 日 比 日 地 长 大

儿女们日日长大。

ŋə<sup>65</sup> xā<sup>31</sup> ŋo<sup>31</sup> tsɿ<sup>33</sup> suq<sup>33</sup> li<sup>31</sup> mə<sup>55</sup> mə<sup>65</sup> tuq<sup>31</sup>

我（的）汉 语 子 说 比 他（宾助） 不得  
我的汉话说不过他。

后来借入“比”(pi<sup>31</sup>)，“再比”(tse<sup>33</sup> pi<sup>31</sup>)的比较句型。例如：

ni<sup>33</sup> ɕa<sup>33</sup> ni<sup>33</sup> pi ni<sup>33</sup> ko<sup>31</sup> ɕo<sup>31</sup>

日 子 日 比 日 过 好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

mo<sup>31</sup> tse<sup>33</sup> pi<sup>31</sup> ŋo<sup>31</sup> kã<sup>55</sup> 他还比我高。

他 再 比 我 高

ŋo pi<sup>31</sup> mo<sup>31</sup> fa<sup>33</sup> 我比他胖。

我 比 他 肥

mə<sup>55</sup> ɕu<sup>35</sup> ɕi<sup>35</sup> tse<sup>33</sup> pi<sup>31</sup> ŋo<sup>31</sup> tɕhō<sup>55</sup>

他(的) 学 习 再 比 我 强

他的学习还比我强

现在，无“比”字句和借用“比”字句并存并用。例如：

ŋo<sup>31</sup> to<sup>31</sup> mə<sup>55</sup> tō<sup>33</sup> ɕi<sup>33</sup> suq<sup>33</sup>

我 大 他(的) 上边 四 岁

ŋo<sup>31</sup> pi<sup>31</sup> mo<sup>31</sup> to<sup>31</sup> ɕi<sup>33</sup> suq<sup>33</sup>

我 比 他 大 四 岁

我比他大四岁

zo<sup>31</sup> ni<sup>33</sup> ni<sup>55</sup> ni<sup>33</sup> no<sup>33</sup> tsō<sup>42</sup> khə<sup>33</sup> lq<sup>31</sup>

夜 日 比 日 地 长 起 了

zo<sup>31</sup> a<sup>31</sup> ni<sup>33</sup> pi<sup>31</sup> a<sup>31</sup> ni<sup>33</sup> no<sup>33</sup> tsō<sup>42</sup> lq<sup>31</sup>

夜 一 日 比 一 日 地 长 了

(夜，日比日地长了。)

6. 直接借入汉语递进虚词“不但……而且……”运用递进句型。白语固有语法中缺乏递进复句句型。类似递进关系的意义是通过“不要说……都……”或“ni<sup>31</sup>(连)……, li<sup>55</sup>……”等虚词表达的。如：

a<sup>31</sup> miq<sup>33</sup> suq<sup>33</sup> mə<sup>55</sup> sɿ<sup>55</sup> ye<sup>31</sup> tɕhō<sup>55</sup>, ma<sup>55</sup>

不 要 说 他(的) 书 读 强 他们

ka<sup>55</sup> ts|<sup>31</sup> thi<sup>33</sup> tɔ<sup>31</sup> ko<sup>55</sup> yɛ<sup>31</sup> tʰhō<sup>55</sup>。

儿 (子) 兄 弟 都 读 强

不用说他的书读得好，他们几兄弟的书都读得好。

mo<sup>31</sup> ni<sup>31</sup> mə<sup>55</sup> ti<sup>33</sup> no<sup>31</sup> li<sup>55</sup> za<sup>33</sup> zā<sup>33</sup> lɔ<sup>31</sup>

他，连他的爹 (宾助) 也不认了

他，连他的亲爹也不认了。

后来借入连词“不但 (pu<sup>33</sup> ta<sup>55</sup>)”、“而且 (a<sup>31</sup> tʰhi<sup>31</sup>)”，使复句递进句型同汉语表达法一致起来。例如，

pu<sup>33</sup> ta<sup>55</sup> mə<sup>55</sup> tshā<sup>55</sup> kə<sup>31</sup> ne<sup>42</sup> tʰhō<sup>55</sup>, a<sup>31</sup> tʰhi<sup>31</sup>

不 但 他 (的) 身 体 个 强 而 且

mə<sup>55</sup> pu<sup>33</sup> ɕi<sup>33</sup> li<sup>55</sup> tʰhō<sup>55</sup>

他 (的) 学 习 也 强

不但他的身体强壮，而且他的学习也很好。

7. 直接借入转折复句虚词“虽然” (sue<sup>55</sup> zē) 运用转折复句句型。白语固有语法中虚词“但是 (ɕi<sup>55</sup> tso<sup>31</sup>或 na<sup>33</sup> ɕi<sup>55</sup>)”一词，置于后一复句句首，表示转折复句句型。如：

mə<sup>55</sup> ku<sup>33</sup> pa<sup>31</sup> pi<sup>33</sup>, na<sup>33</sup> ɕi<sup>55</sup> mə<sup>55</sup> tʰhi<sup>33</sup> yɛ<sup>31</sup>

他 (的) 个 把 矮 但 是 他 (的) 气 力

tɔ<sup>31</sup>。

大

他的个头矮，但是他的力气大。

后来直接借入“虽然”一词，置于前一复句之首，与后一复句 na<sup>33</sup> ɕi<sup>55</sup>或 ɕi<sup>55</sup> tso<sup>31</sup> 相互配合构成类似汉语完整的转折复句句型。如：

sue<sup>55</sup> zē<sup>55</sup> mo<sup>31</sup> sē<sup>33</sup> lɔ<sup>31</sup>, na<sup>33</sup> ɕi<sup>33</sup> ɲo<sup>31</sup> tse<sup>33</sup> za<sup>33</sup>

虽 然 她 知道了 但 是 我 再 不

sē<sup>33</sup> sa<sup>31</sup>!

知 道 嘛

虽然她知道了，但是我还不清楚嘛！

mo<sup>21</sup> zɿ<sup>31</sup> ŋo<sup>31</sup> tse<sup>42</sup> lu<sup>21</sup>, ɕi<sup>55</sup> tso<sup>21</sup> ŋo<sup>21</sup> za<sup>25</sup> lo<sup>56</sup>  
他 给 我 钱 了 但 是 我 不 乐  
zi<sup>55</sup>.

意

他给了我钱，但是我不乐意。

8. 直接借用“因果复句”虚词“因为”“所以”运用因果复句句型。

白语固有语法中没有因果复句虚词，表示因果关系，只在后一复句首用la<sup>36</sup>（才）连接。后来借入汉语虚词“因为”、“才”、“所以”位置同于汉语。如：

ŋə<sup>33</sup> ue<sup>55</sup> mə<sup>55</sup> fy<sup>33</sup> ŋə<sup>33</sup> sɔ̃<sup>31</sup>, mo<sup>21</sup> mə<sup>55</sup> tiə<sup>42</sup> tsa<sup>55</sup>  
因 为 他 的 腹 咬 痛 他 才 整  
ŋi<sup>33</sup> tsɿ<sup>33</sup> no<sup>33</sup> kho<sup>33</sup>.

日 子 地 哭

因为他的肚子疼，他才整天地哭。

ŋə<sup>33</sup> ue<sup>33</sup> xuə<sup>33</sup> thi<sup>55</sup> no<sup>31</sup> thi<sup>55</sup> ŋə<sup>33</sup> kuə<sup>33</sup> tɕhi<sup>33</sup>  
因 为 画 帖 这 帖 要 挂 出  
tsa<sup>33</sup> no<sup>33</sup>, sua<sup>31</sup> zi<sup>31</sup> tsɿ<sup>55</sup> ka<sup>42</sup> li<sup>55</sup> ŋə<sup>33</sup> xuə<sup>33</sup> tɕhō<sup>55</sup>  
街 上 所 以 怎 样 也 要 画 好  
mo<sup>31</sup> pi<sup>36</sup>.

它 必

因为这张画要挂到街上，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画好这幅画。

## 第二节 汉语对壮侗语的影响

从先秦的《逸周书》、《国语》等开始，不少古代文献都记载了先秦至秦汉时期活跃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群体——百越（或称百粤）。他们具有共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特征，如从事稻作业、喜食水产、居于栏、善造舟船、善于铸铜、

烧用几何印纹陶、断发文身、崇拜鸟和蛇等。春秋时代的吴、越两国就是以百越为主体民族的，他们称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与其他诸侯国逐鹿中原。公元前4世纪越灭吴，公元前3世纪楚灭越，“而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sup>①</sup>自此东部越族衰微，但西部越族仍很活跃。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原王朝的统治，不得不派几十万大军南伐百越。经过“三年不解甲弛弩”，“伏尸流血数十万”的残酷战争才控制了岭南地区。但百越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两汉时期东南、西南地区的闽越、南越、夜郎、句町、漏卧等王国的主体民族仍是百越。秦汉之后不再有百越活动的记载。

百越在丧失自己的政权之后，可能有些部族外迁，但多数成员留居原地，渐次汇入汉民族阵营。从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三国至唐宋时期活跃于原百越居住地的“山越、乌浒、俚、僚、洞蛮”等族体是未被同化于汉族的百越后裔，后来这些族体也慢慢地融合于汉族，其中部分成员顽强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演化成现代壮侗语族诸民族。

百越有自己的文化，也有自己的语言。《越绝书》、《吴越春秋》、《说苑》等文献对百越语言都有零星记载，这些语言材料说明百越语既不同于华夏语，也不同于与其相邻的楚语。西汉刘向《说苑》中有一篇《善说》，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令尹鄂君晰在游船上欣赏越人唱歌之事，鄂君晰经过翻译才听懂这首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越人歌》。现代壮侗语族诸民族是百越后裔，其语言和百越语也应有一定渊源关系。将散见于各种文献的百越语及俚、僚语言材料汇集并与壮侗语比较，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是相同的。已故学者韦庆稳先生将壮侗语与《越人歌》分析比较，揭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sup>②</sup>以下再用一些例子来补充

①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

② 详见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说明这个问题。

百越首领名称：越人无姓，只有名或号。据《史记》、《吴越春秋》和《华阳国志》等记载，吴国、“越国、勾町三国君王之名多以“夫、无、不、孚、毋”起头。例如：夫差、无译、无余、不寿、孚错枝、毋波等。这些前冠字读音很相近，并且有时可略去，如“无译”也称“译”。所以这些前冠字很可能都是百越语“君王”、“首领”一词的译音。“夫差”即“王差”，意为“差王”，与壮侗语修饰成分后置的语法规则相符。壮侗语“首领”一词分别为：壮语pau<sup>5</sup>、泰语：pu<sup>5</sup>、老挝语：p'o<sup>0</sup>。这些词也可称呼男性尊长者。它们与“夫、不、无、孚、毋”等字的上古音<sup>①</sup>（分别为夫\*piwa、无毋\*miwa、不\*piwə、孚\*p'iəu）很接近，音义相当，可能具有共同来源。<sup>②</sup>

莱：《越绝书》卷三《吴内传》：“宿之于莱。莱，野也。汉语古辞书中“莱”均未作“野”解，当为百越语音译。畲地、野地：壮语rei<sup>0</sup>、lei<sup>0</sup>，泰语rai<sup>0</sup>。与《越绝书》记载的这个“莱”音义相当，很可能有共同来源。

煦：《方言》卷七“煦，干也。吴越曰煦”。煦，上古音\*xiwo。干：壮语hau<sup>5</sup>、k'au<sup>5</sup>，黎语 k'au<sup>2</sup>二者音义相当，可能具有共同来源。

濑：《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臣瓚：“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碛。”碛、濑均指江河中浅滩，壮语称之la:i<sup>5</sup>，与吴越说法相当，可能来源一致。

都老：《隋书》卷三十一“自岭南二十余郡，…其俚人…有铜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都老，中古音tulau。壮侗语指称动物、小孩、菩萨的量词用tu<sup>2</sup>，长者、尊者称la:u<sup>4</sup>。汉藏语言量词的指称，搭配对象不是很稳固，壮侗语的tu<sup>2</sup>过去也可能

① 根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下同。

② 详见李锦芳《百越史三题》，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

用于指称男性尊长者，即tu<sup>2</sup>la:u<sup>4</sup>。（壮侗语量词一般紧靠名词前，构成密不可分的“量名结构”，指称人或物，如“果”称an<sup>1</sup>ma:k<sup>7</sup>，an<sup>1</sup>为称呼、计量水果等用的量词，ma:k<sup>7</sup>为“果”之意。）依此，俚语“都老”与壮侗语tu<sup>2</sup>la:u<sup>4</sup>音义相当，可能来源一致。

近年来已有些论著探讨了吴、闽、粤等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或称百越语成份），<sup>①</sup>这些方言区域恰好是过去百越活动地带，这些方言中与壮侗语相似的成分当为百越民族转用汉语之后存留的原使用语言的痕迹，由此可追溯相距两千多年的百越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百越语与壮侗语的源流关系。

源于古代百越语的现代壮侗语使用人口约近6000万，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及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掸邦等地，其居地呈大弧形状。从语言学、人类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老挝、泰等民族与中国的壮侗语族诸民族具有密切关系，他们当共同发源于百越。但老挝、泰人是印支半岛的土著居民还是迁徙而来，从何处、何时迁来，都还弄不清。假设由别处迁入，是否与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发生的百越史上两件大事“楚灭越”、“秦始皇南征百越”有关呢？目前尚缺乏证据。

壮侗语又称“侗傣语”、“侗泰语”、“侗台语”或“黔台语”。侗或黔指侗语，代表侗水语支。黔即侗族自称k'am<sup>1</sup>。台即该语族另一普遍的自称tai、t'ai（泰、傣及壮族个别支系用，黎、布依和壮部分地区的自称ɬai、jai可能与泰人等的自称同源），代表壮傣语支。该语族英文名称为Zhuang—Dong Languages或Kam—Tai Languages。壮侗语约有20多种语言，按其

<sup>①</sup> 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36；吴安其，《温州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词初探》，《民族语文》1986·4；李锦芳，《粤语中的壮侗语族语言层初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6；赵加，《试探闽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贵州民族研究》1991.1。

亲疏关系分3个语支：

侗水语支——侗语、仡佬语、拉珈语、标语、水语、毛南语、佯僂话、莫话、锦话。分布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后3种语言分布于贵州省境，使用人口较少，目前有些民族成份为布依族。标语是新近得到介绍的一种侗水语支语言，与拉珈语较接近，分布于广东省西部怀集、封开两县，使用人口约7—8万，目前民族成份为汉族。<sup>①</sup>

台语支（或称壮傣语支、壮泰语支）——壮语、布依语、临高话、傣语、泰语、老挝语、石话、掸语、阿含语、侬语、岱语、土语、黑泰语、白泰语等。分布于中国岭南、海南、云贵高原及越南北部向西直至缅甸，居住区域很广。其中阿含语（Ahom）原为印度阿萨姆邦部分居民使用，现已消亡，但留下了语言材料。

黎语支——黎语、村话。分布于海南省。

上述3个语支都有不少共同点，有不少同源词。从基本词汇及语音面貌比较看，侗水语支和台语支较接近，黎语支与另两个语支较远，其内部差异（黎语和村话的差异、黎语方言差异）也较大，这可能反映了其族源的多元性。

仡佬语及新近介绍的拉基语、普标语、布央语、耶容语、木佬话、羿人语<sup>②</sup>等语言之间有密切关系并都与壮侗语有相近之处，操这些语言的人可能也是百越后裔。有学者主张将这些语言划分为一个与壮侗语族并行的语群，称“仡央语群”，两者组成“百越超语族”。<sup>③</sup>

此外还有广西隆林、西林部分居民操的“侬话”，有人主张划入壮侗语，也有人主张划入南亚语系。<sup>④</sup>

① 参见张均如《标语与壮侗语族语言的比较》，《民族语文》1989年第5期。

②③ 这些语言分布于云贵高原及中越边境地带，使用人口不多，见梁敏《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90·6。

④ 见黄才贞《侬话简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梁敏《侬话概况》，《民族语文》1984·4。

以下主要讨论中国境内壮侗语受汉语影响的情况。

根据史书记载及考古发现，百越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或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交往。商周时代中原王朝已逐步控制了东越，也与西越建立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据《逸周书》、《吕氏春秋》等记载，当时岭南越族经常向中原王朝进献“路人大竹”，“苍梧翡翠”、“骆越之菌”、“南海之秬黑黍”等。秦始皇攻略岭南之后在这里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大大地促进了百越与中原的交流，这是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与中原人大规模接触的开始。今天仍有部分壮侗语民族称汉族为“秦人”，如水族称tin<sup>1</sup>，泰族称tɕin<sup>33</sup>。秦汉以后中原文化在百越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僻远的岭南地区也出现了当时全国知名的学者，如汉代苍梧陈钦、陈元父子，合浦张重、尹牙等，虽然我们不能一一考证他们的民族成份，但不能否认其中有越族知识分子。汉越人民的相互接触、汉族文化的传播带来的结果就是汉语对百越语——早期壮侗语的影响。现代壮侗语的部分汉语借词保留了上古汉语的“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的特点，这正是上古汉语和早期壮侗语相互接触的忠实记录。如：分——壮、布依pan<sup>1</sup>；贩——壮pu:n<sup>5</sup>，肥——壮、布依、傣、水、佤佬、毛南pi<sup>2</sup>，侗pui<sup>2</sup>；粪——壮、布依pɯn<sup>6</sup>，箸（筷子）——壮tau<sup>6</sup>，布依tuw<sup>6</sup>，傣t'u<sup>6</sup>；杖——壮tuwŋ<sup>4</sup>。

唐代前后，岭南地区的壮侗语族各族先民就已广泛采用了用汉字统一书写的姓氏：黄、韦、莫、侬、洗等。这是在汉族文化、汉语言文字深刻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sup>①</sup>

壮侗语诸民族过去没有与自己的语言相适应的文字，只能通过汉语、汉字掌握文化知识。存留至今的唐代壮族知识分子所撰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诚洞碑》两篇碑文语句流畅、文风典雅，反映了当时壮族知识分子的汉语文水平。在

① 参考李锦芳《壮族姓氏起源初探》，载《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汉文化的影响下，壮侗语族诸民族中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他们仿造汉字的造字法，自创或利用汉字构件创造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方块壮字、水书等。这些文字大约产生于唐宋时期并一直流传至今。这些文字的使用又为汉语和壮侗语之间的交流搭起了一座桥梁。

广西中南部壮语地区至今仍流传一套独特的“读书音”，它是在古代广西地方官话“平话”<sup>①</sup>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渗入了一些壮语因素。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具有壮语方音特色的汉语来念书”。这种现象表明壮侗语地区很早就已经使用汉语。

近代以来诸语言主要接受普通话及几种汉语方言的影响，用下图表示：

汉语语种	主要影响范围	在壮侗语地区的主要使用功能
普通话	整个壮侗语族	传播媒介、学校教育、社会交际等
西南官话	广东、海南以外的壮侗语族语言	社会交际、学校教育、传播媒介等
粤语（大陆“白话”及海南儋州话）	广东、广西及海南北部的壮侗语族语言	同上
平话	广西境内的壮侗语族语言	社会交际、学校教育等
海南话（属闽南方言）	海南省壮侗语	社会交际、传播媒介等

① 至今仍流行于广西中南部，北部和西部的一支汉语方言，归属未定，接近粤语和客家话。

客家话在两广、海南壮侗语地区也有分布，但因人口少、迁入晚，不具备渗透力。海南军话（属西南官话）与当地壮侗语也有接触，但影响不深。

在汉语的影响下诸语言呈现了诸多共同发展趋势，但由于历史上受汉语影响的程度不同，近代以来又受着不同汉语方言的影响，因此也存在某一语言特有的受汉语影响的因素，比如汉语新借词的读音在不同的语言里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从语言的历时比较和共时对比来看，壮、布依、临高、侗、水、毛南、仡佬、拉珈、标语等语言受汉语影响较深，黎、傣语次之。下面从语言结构的几个方面分析汉语对壮侗族语言的影响。

## 一、壮侗语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

汉语和壮侗语有一部分音义相当的词汇，目前尚弄不清是同源还是借贷关系，一般称为“关系字”。除此之外，在壮侗语族诸语言中能较明显地辨析出的汉语借词仍为数不少。一般来说，常用词汇中汉语借词比例达20%左右。黎语可能低些，它的汉语借词多为近代以来所吸收，使用频率较低。侗族民间传说《人的来源》，用侗语南部方言榕江章鲁话讲述时汉语借词占25%，用北部方言天柱石洞语讲述时，汉语借词占37%。<sup>①</sup>

壮侗语族各语言的基本词汇部分也存在为数不少的汉语借词，以广东西部的标语表现最为突出，在2111常用词中汉语借词超过半数，其中200个最常用的基本词里，汉语借词仍高达36.5%，不少本语族其他语言都用民族语固有词表达的基本词，标语都改用了汉语借词（粤语）：wan<sup>4</sup>云、han<sup>6</sup>睡、ha:ŋ<sup>2</sup>走。除黎语外，各语言都借用了汉语1到10整套数词，有关身体部位的语词也有汉语借词成分。随着汉族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的

<sup>①</sup> 见王均等编著《壮侗语族语言简志》第350页，民族出版社，1984年。

渗透，这些领域的语词也被壮侗语广泛吸收。

尽管借入的时间及所借的汉语方言不同，各语言中的汉语借词仍可分为老借词和新借词两类。老借词读音近似上古、中古汉语，新借词在读音上近似所借的汉语方言。

老借词举例：

	壮语	傣语(西双版纳)	侗语	水语	黎语
一	ʔit <sup>7</sup>	ʔet <sup>7</sup>	ʔət <sup>7</sup>	ʔjat <sup>7</sup>	—
三	sa:m <sup>1</sup>	sam <sup>1</sup>	sa:m <sup>1/</sup>	ha:m <sup>1</sup>	—
七	ʒat <sup>7</sup>	tset <sup>7</sup>	sət <sup>7/</sup>	ʒat <sup>7</sup>	—
心	sim <sup>1</sup>	—	səm <sup>1/</sup>	ʒəm <sup>1</sup>	—
拂(尘)	pat <sup>7</sup>	pat <sup>7</sup>	—	—	—
覆	po:k <sup>7</sup>	pin <sup>3</sup> pok <sup>7</sup>	—	—	—
逢	puŋ <sup>5</sup>	—	po:ŋ <sup>2</sup> 毛南语	—	—
网	mu:ŋ <sup>4</sup>	maŋ <sup>2</sup>	moŋ <sup>4</sup> 毛南语	—	—
骑(马)	kwi <sup>6</sup>	xi <sup>5</sup>	—	—	—
药	ʔju <sup>1</sup>	ʔja <sup>1</sup>	—	ha <sup>2</sup>	za <sup>1</sup>
针	ʒim <sup>1</sup>	xim <sup>1</sup>	ʔ'əm <sup>1/</sup>	səm <sup>1</sup>	—
锣	la <sup>2</sup>	—	la <sup>2</sup>	—	—
镰(刀)	li:m <sup>2</sup>	—	ljim <sup>2</sup>	ljim <sup>4</sup>	li:m <sup>1</sup>
银	ŋan <sup>2</sup>	ŋwn <sup>2</sup>	ŋan <sup>2</sup>	ŋan <sup>2</sup>	kan <sup>1</sup>

新借词举例：

	革命	飞机	共产党
壮语(田林)	kə <sup>31</sup> min <sup>24</sup>	fei <sup>33</sup> tʂi <sup>33</sup>	kuŋ <sup>24</sup> ʒa:n <sup>55</sup> ta:ŋ <sup>55</sup>
西南官话(田林)	kə <sup>42</sup> min <sup>13</sup>	fei <sup>56</sup> tʂi <sup>55</sup>	koŋ <sup>13</sup> ts'an <sup>55</sup> taŋ <sup>55</sup>
	拖拉机	队长	警察
临高话	hə <sup>33</sup> la <sup>55</sup> ki <sup>33</sup>	ʔdəi <sup>55</sup> tʂiaŋ <sup>21</sup>	kiŋ <sup>13</sup> sat <sup>55</sup>
海南话(文昌)	hə <sup>38</sup> la <sup>55</sup> ki <sup>33</sup>	ʔdui <sup>55</sup> tʂiaŋ <sup>21</sup>	keŋ <sup>31</sup> sat <sup>55</sup>

### (一) 汉语借词的构词特点

各语言中的汉语借词使用频率较高，比较活跃，它们能与少数民族语固有词合璧构成新词，有的多音节词按汉语固有语序使用（新借词多属此），有的按壮侗语构词法则重新整序，有的借词是前加有关民族语固有词构成的（前加成分起说明作用）。以下举例说明几种有特色的汉语借词的构词方式：

1. “借词+固有词”式或“固有词+借词”式：

壮语	sim <sup>1</sup> duk <sup>7</sup>	黑心肠	hon <sup>4</sup> ei:ŋ <sup>5</sup>	打仗
	心 朽		打 仗	
侗语	toi <sup>5</sup> na <sup>3</sup>	对面	naŋ <sup>2</sup> toŋ <sup>1</sup>	冬笋
	对面		笋 冬	

2. “整序”式：这种形式多在老借词或按老借词读音吸收新借词时出现。

壮语	koŋ <sup>1</sup> tai <sup>0</sup>	土地公公	kwu:k <sup>7</sup> so <sup>3</sup>	祖国
	公 地		国 祖	
侗语	ʔju <sup>2</sup> ca <sup>2</sup>	茶油	saŋ <sup>0</sup> hai <sup>2</sup>	鞋匠
	油 茶		匠 鞋	

3. “本语词注释”式：按语义分析，即为“大类名（本语词）+小类名（汉语成分）”。汉语借词的这种构词形式的使用越来越多，新借词多不加前注成分。

布依语	za:n <sup>2</sup> miu <sup>0</sup>	庙宇	pja <sup>2</sup> po <sup>6</sup> tsa:i <sup>5</sup> 或po <sup>5</sup> tsa:i <sup>3</sup>	菠菜
	房 庙		菜 菠菜 菠菜	
仫佬语	kra <sup>1</sup> ts'a:n <sup>0</sup> ts'uŋ <sup>0</sup> 或ts'a:n <sup>0</sup> ts'uŋ <sup>0</sup>			蚕虫
	虫 蚕	虫 蚕	虫	
	fa <sup>5</sup> toŋ <sup>1</sup> jep <sup>8</sup> 或toŋ <sup>1</sup> jep <sup>8</sup>			粽叶
	叶 粽 叶	粽 叶		

(二) 汉语借词读音特点及新老借词关系

老借词一般顺应壮侗语族语言语音特点。如壮侗语族原先没有塞擦音，汉语塞擦音字普遍念成塞音或擦音：仫佬语təm<sup>5</sup>浸、tai<sup>5</sup>再（精母），t'əu<sup>7</sup>秋、t'ət<sup>7</sup>漆（清母），ti<sup>6</sup>字、teŋ<sup>2</sup>情（从

母)，壮语 $\theta e:n^1$ 煎（精母）、 $\theta i:n^1$ 千（清母）， $\theta i:\eta^6$ 帐（知母）， $\theta ik^7$ 尺（穿母）。新借词则常超越本民族语固有语音框架，直接按汉语读音吸收（详见下文语音部分）。

老借词一般适应本民族语固有词的语音变化。比如环江壮语的s声类变r，来自“心”母字的老借词同时发生了变化：

	高	抖	心	三	四
环江	$ra:\eta^1$	$ran^6$	$ram^1$	$ra:m^1$	$rei^6$
武鸣	$sa:\eta^1$	$san^6$	$sam^1$	$sa:m^1$	$sei^6$

有的汉语借词在不同的时期被壮侗语反复借用，在壮侗语中构成读音不同的近义词。如壮语 $pan^1$ 分（东西）、 $fan^1$ （一）分（钱）、 $fwn^6$ （工）分； $ho\eta^1$ （做）工、 $ko\eta^1$ （一）工（指一人一天的劳动）、 $ku\eta^6$ 工（人）。各语言中广泛存在新、老借词同时表达一个概念的现象。如壮语“学校”有 $ra:n^2$   $saw^1$ 和 $^?jo^2$

	房	书	学
$a:u^1$ 两种说法，“三月”有 $^?du:n^1$ $sa:m^1$ 和 $sa:m^1$ $\eta i:t^6$ （或			
校	月	三	三 月
$a:n^6$ $^?je^2$ ) 三种说法。新借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有取代老借			
三 月			
词的趋势。			

### （三）汉语借词在壮侗语族语言中的地位

汉语借词是诸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吸收汉语词汇成分是诸语言词汇发展的重要途径。汉语借词数量较少的语言，如黎语等已越来越多地从汉语吸收新的成分，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领域的语汇。

汉语借词丰富了壮侗语族诸语言的语库，加强了表达功能。壮侗语族诸民族的民歌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壮侗语族诸民族民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反复吟咏某事某物来抒发情怀，此法常获益于汉语借词。请看下面一段侗族古歌：

sam <sup>1</sup> mən <sup>1</sup> wa <sup>2</sup> ʔəi <sup>3</sup> p <sup>1</sup> iŋ <sup>3</sup> ʔ,	三天话不完，
三天话不完	
sam <sup>1</sup> fan <sup>1</sup> ʔot <sup>2</sup> ʔəi <sup>3</sup> ljeu <sup>4</sup> ,	三夜说不完，
三夜说不了	
sam <sup>1</sup> nan <sup>1</sup> aŋ <sup>3</sup> ʔəi <sup>3</sup> wən <sup>1</sup> ʔ,	三月讲不完，
三月讲不完	
sam <sup>1</sup> nin <sup>2</sup> lep <sup>3</sup> ʔəi <sup>3</sup> ljeu <sup>4</sup> .	三年诉不完。
三年诉不了	

通过运用“说”和“完”两组汉语借词和固有词所组成的同义词反复吟唱，加强了韵律效果，内容表达更细腻、婉转。

在一些语言里不少汉语借词已经完成了与固有词并用到完全取代固有词的进程。请看下一组壮语词，大部分地区已放弃固有词（上为固有词，下为借词）：

楼	{ pa:m <sup>1</sup> , kja:n <sup>4</sup>	姐	{ pei <sup>4</sup>
	{ lau <sup>2</sup>		{ ʔe <sup>3</sup>
写	{ ra:i <sup>2</sup>	桥	{ ʔa:t <sup>3</sup>
	{ si <sup>2</sup>		{ kiu <sup>2</sup>

## 二、汉语对壮侗语族语音的影响

壮侗语族诸语言在语音上具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主要表现为①声母方面：复辅音向单辅音发展，塞擦音从无到有并且逐步发展，带先喉塞音的声母趋于消失。②韵母方面：元音长短的对立趋于消失，促声韵逐渐减少。③声调方面：部分语言由原来8个调类合并成7个甚至5个调类。

从上述演变看，壮侗语逐步摒弃的是汉语不具备或已经摒弃的因素，壮侗语逐步发展的是汉语所具备的因素。这或许与汉语对壮侗语语音发展的影响有关。

由于汉语借词尤其是新借词的大量渗透，诸语言产生了一些新的声母。如布依语部分地区增加了f、ɣ等声母，壮语部分地区增加了tj、nj、lj、hj等声母，侗语部分地区增加了ts、ts'、tj、t'j、f、wj等声母，水语增加了ts'、ts'j、tsw等声母。

布依语 fa<sup>4</sup> ta<sup>4</sup> 发达 fuŋ<sup>1</sup> (信) 封  
 ɣa<sup>3</sup> 夏 si:ŋ<sup>1</sup> pi:n<sup>1</sup> 相片

侗语 tsa:u<sup>4</sup>ts'a:u<sup>6</sup> 早操 tjeŋ<sup>1</sup> 电  
 t'je<sup>2</sup> 铁(路) fa<sup>2</sup> 发(展) wje<sup>2</sup> 月(刊)

韵母方面诸语言普遍增加了舌尖元音[央元音ə]等，黎语增加了带介音的韵母，布依语增加了ei、ou、ua、ue等韵母：

壮语 ɣl<sup>1</sup>tɣl<sup>1</sup> 自治 tɔ<sup>2</sup> (道) 德  
 布依语 sl<sup>6</sup> 思(想) vei<sup>3</sup> (因) 为 tou<sup>8</sup> 斗(争)  
 xua<sup>8</sup> 化(肥) kue<sup>4</sup> 国(家)

目前这些新增成分还不很稳定，多为青年人或掌握汉语文者所使用。

标语由于长期偏于一隅并受汉语包围，已丢失了许多壮侗语固有的语音特点，如腭化、唇化、前喉塞、浊塞、清鼻音等声母都已消失，却从粤语吸收了一些壮侗语罕见的音素，如圆唇前元音oe、ɸ、y。

### 三、汉语对壮侗语族语法的影响

从语言的共时比较看，汉语和壮侗语的语法结构比较接近，但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壮侗语族诸语言共有或是部分语言特有的一些语法形式是汉语长期影响的产物。由于接受了来自汉语的语法规则，诸语言中普遍出现了原有语法形式与相应的新语法形式并用的局面，这种局面随着汉语影响的深入而扩大。与部分汉语借词取代固有词的现象相似，一些汉语语法形式已经取代或正在逐步占据相应的固有语法形式的地位。

## (一) 中心词与修饰语位置关系的发展

壮侗语族语言的名词、量词、代词都可以接受名词、量词、代词、形容词、动词、数词等的修饰，构成名词性词组，在句子中充当主语成分、宾语成分。动词、形容词可以接受副词等的修饰，构成动词、形容词性词组，在句子中充当谓语成分。早期的壮侗语族语言的名词性修饰词组的语序应该都是比较一致的，除数词外各种修饰成分可能都在中心词之后。受汉语的影响，诸语言中心词的修饰语逐渐前移。

### 1. 名词性修饰词组的语序变化

#### 1) 指示代词作修饰语

壮侗语族语言指示代词可以修饰表示时间、处所的名词(除黎语外，很少直接修饰一般名词)，也可以修饰量词、数量结构或其他名词性词组。这时它们的位置多在中心词或中心词组之后，但广东、海南的部分壮侗语里出现了前移现象。黎语指示代词修饰名词时(不能单独修饰量词)和多数壮侗语族语言一样位置在后，但用来修饰“数量+名词”结构词组时位置可前可后：

ts'ai<sup>1</sup>nei<sup>2</sup>这棵树      plon<sup>3</sup>haw<sup>2</sup>      那间房子

树 这                      房 那

ma<sup>2</sup>tsu<sup>2</sup>hom<sup>2</sup>ts'ia<sup>3</sup>那个字      ɬau<sup>3</sup>laŋ<sup>1</sup>pou<sup>1</sup>nei<sup>2</sup>这两只猪

那 一 个 字                      两 只 猪 这

临高话有两套指示代词，借自汉语的这一套指示代词nia<sup>2</sup>这、nə<sup>4</sup>那<sup>①</sup>单独修饰量词时已经全部移至量词之前，作“数量名”结构修饰语时可以在整个词组之前，也可以在名词之后、量词或数量结构之前：

nia<sup>2</sup> hu<sup>2</sup> 这只(动物)      nə<sup>4</sup>mə<sup>28</sup> 那个(东西)

这 只                      那 个

① “nia<sup>2</sup>这nə<sup>4</sup>那”可能来自汉语南方方言。“nə<sup>4</sup>这、nin<sup>4</sup>那”当为固有词。试比较：壮语nei<sup>4</sup>这、han<sup>4</sup>那，傣语(西双版纳)ni<sup>3</sup>这、nan<sup>4</sup>那，侗语na:i<sup>6</sup>这。

lan<sup>2</sup> nia<sup>2</sup> mɔ<sup>28</sup> 或 nia<sup>2</sup> mɔ<sup>28</sup> lan<sup>2</sup> 这座房子  
房 这 个 这 个 房

leŋ<sup>1</sup>hun<sup>2</sup>nə<sup>4</sup>tam<sup>1</sup>hu<sup>2</sup>或 nə<sup>4</sup>ta:m<sup>1</sup>hu<sup>2</sup>leŋ<sup>1</sup>hun<sup>2</sup> 那三个人  
人 那 三个 那 三个 人

临高话固有的指示代词noi<sup>4</sup> (这), nin<sup>4</sup> (那)的使用频率已不高,一般只放在时间名词或方位名词后组成名词性词组,这种用法反映了早期临高话的面貌:

vən<sup>2</sup>noi<sup>4</sup>今天            keu<sup>2</sup>noi<sup>4</sup>本月  
日 这                      月 这

?dɔu<sup>2</sup>noi<sup>4</sup>这下面            ?jɔu<sup>2</sup>bai<sup>1</sup>hɔi<sup>2</sup>nin<sup>4</sup>在那桌子上  
下面 这                      在 上 台 那

标语也有两套指示代词,一套仍用在中心词之后,而另一套已移至中心词之前。海南西部的村话,指示代词作修饰成分时已经全部移至中心词之前。

## 2) 量词作修饰语

壮侗语族语言的量词用作名词修饰语,表示一个单位时,一般直接放在名词前:

壮语:tu<sup>2</sup>va:i<sup>2</sup>或tu<sup>2</sup>va:i<sup>2</sup>he.一只牛  
只 牛            只 牛 一

侗语:ki<sup>1</sup>na:i<sup>5</sup>me<sup>2</sup>tu<sup>2</sup>kwe<sup>2</sup>.这里有一只水牛。  
处 这 有 只 牛

壮侗语的名量词一般源于名词,名量词本身相当一个“大类名”,所以这种“量+名”结构实际上是“大类名+小类名”结构,体现了壮侗语的传统语法结构。但在临高话里这种结构已发生变化,量词一律放在名词之后:

mak<sup>8</sup>mu<sup>5</sup> 一个果子    kai<sup>1</sup>'həu<sup>5</sup> 一只鸡  
果 个                      鸡 只

## 3) 数词和数量结构作修饰语

从共时比较看,诸语言数词修饰量词、名词或数量结构修饰

名词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中可窥探汉语影响的痕迹。

诸语言的序数词（与基数词基本一致）用在中心词之后，但带借自汉语的词头“第”（壮语ta:i<sup>6</sup>、傣语（西双版纳）ti<sup>6</sup>、侗语ti<sup>6</sup>）的序数词则可后置也可前置（目前多数语言仍以后置为常）：

壮语：<sup>?</sup>du:n<sup>1</sup>si:t<sup>7</sup> 七月份 pou<sup>4</sup>ta:i<sup>6</sup>sei<sup>6</sup>

月 七 个 第 四

或ta:i<sup>6</sup>sei<sup>6</sup>pou<sup>4</sup> 第四个（人）

第 四 个

傣语（西双版纳）：<sup>?</sup>dən<sup>1</sup>pet<sup>6</sup> 八月份

月 八

tsu<sup>2</sup>ti<sup>6</sup>?ji<sup>4</sup> 或ti<sup>6</sup>?ji<sup>4</sup>tsu<sup>2</sup> 第二组

组 第 二 第 二 组

以数量结构修饰名词时，傣、泰、老挝语仍放在名词之后，临高话可后置也可前置，而多数语言已移到名词之前（如果数量结构中的数词为“一”，而且是民族词时可后置）：

傣语（西双版纳）：fun<sup>2</sup>ha<sup>3</sup>mat<sup>6</sup> 五捆柴

柴 五 捆

泰语：p'u<sup>3</sup>?jiŋ<sup>1</sup>so:ŋ<sup>1</sup>k'on<sup>2</sup> 两个女人

女 人 两 个

临高话：nok<sup>7</sup>vən<sup>3</sup>hu<sup>2</sup>或vən<sup>3</sup>hu<sup>2</sup>nok<sup>7</sup> 两只鸟

鸟 二 只 二 只 鸟

#### 4) 其他修饰语

诸语言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作修饰成分时，一般放在中心词之后，但受汉语影响较深的标语，除了形容词仍放在中心词之后外，其他全移到中心词之前：

pan<sup>6</sup>ken<sup>1</sup>tsu<sup>2</sup>mɔ<sup>6</sup> 飞着的那只 lak<sup>3</sup>p'uk<sup>7</sup>tau<sup>4</sup> 鸟窝

飞 着 只 那 鸟 窝

tan<sup>3</sup>jau<sup>5</sup> 新衣

衣 新

tsai<sup>2</sup>luŋ<sup>6</sup> 海碗

碗 大

比较壮语、侬佬语：

壮语：tu<sup>22</sup>bin<sup>1</sup>han<sup>4</sup> 飞着的那只      ro:ŋ<sup>2</sup>rok<sup>5</sup> 鸟窝

只 飞 那

窝 鸟

侬佬语：tən<sup>1</sup>nək<sup>5</sup> 鸟窝

窝 鸟

## 2. 动词、形容词性修饰词组的语序变化

从共时比较看，侬水语支语言的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一般前置，壮傣、黎语支语言有前置、后置两种语序，不同的词类或词组作修饰语时所处的位置前后不同。如傣语动词可接受形容词、动词（设为甲类）和副词、时间名词、代词（设为乙类）的修饰，甲类前置，乙类则有前有后。由于受汉语影响，诸语言中许多本来只可后置或多用于后边的词类或词组出现了前移的趋向。

傣语动词的乙类修饰语和形容词的修饰语（一般只有副词）的位置有前有后，现在多趋于前移。在整个语族中黎语的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后置成分最为丰富：双音或叠音形容词、代词修饰动词时有前置和后置两种语序，而部分副词和所有代词、名词作为形容词修饰语时全部放在中心词（形容词）之后。但是黎语通常只能后置的成分也出现了前移的迹象。诸语言的汉语借词尤其是新借词作修饰语时，通常在中心词之前，并与相应的固有后置形式并存并用，有时候还出现“借词（修饰语）+中心词+固有词”（修饰语）这样的双重修饰格式。

傣语(西双版纳)：ma<sup>2</sup>mu<sup>4</sup>ni<sup>5</sup>      或mu<sup>4</sup>ni<sup>5</sup>ma<sup>2</sup> 今天来

来 今天      今天 来

傣语(德宏)：kau<sup>5</sup>suŋ<sup>1</sup>si<sup>1</sup>man<sup>2</sup>或kau<sup>5</sup>pi<sup>2</sup>man<sup>2</sup>suŋ<sup>1</sup> 我比他高

我 高 比 他      我 比 他 高

kau<sup>0</sup>ta:n<sup>3</sup>ɔn<sup>6</sup>ta:ŋ<sup>2</sup>或kau<sup>0</sup>seŋ<sup>4</sup>ta:n<sup>3</sup>或

我 说 先 我 先 说

kau<sup>0</sup>seŋ<sup>4</sup>ta:n<sup>3</sup>ɔn<sup>6</sup>ta:ŋ<sup>2</sup> 我先说

我 先 说 先

壮语: mɯŋ<sup>2</sup>pai<sup>1</sup>ŋon<sup>2</sup>law<sup>2</sup>? 或mɯŋ<sup>2</sup>ŋon<sup>2</sup>law<sup>2</sup>pai<sup>1</sup>?

你 去 哪 天 你 哪 天 去

你哪一天去?

te<sup>1</sup>kɯn<sup>1</sup>ko:n<sup>5</sup>或te<sup>1</sup>si:n<sup>1</sup>kɯn<sup>1</sup>.

他 吃 先 他 先 吃

或te<sup>1</sup>si:n<sup>1</sup>kɯn<sup>1</sup>ko:n<sup>5</sup>.

他 先 吃 先

他先吃。

黎语 pu:n<sup>1</sup>zɯn<sup>3</sup>zɯn<sup>3</sup>re<sup>1</sup>! 或zɯn<sup>3</sup>zɯn<sup>3</sup>pu:n<sup>1</sup>re<sup>1</sup>!

来 快 快 吧 快 快 来 吧

快来吧!

koŋ<sup>1</sup>nei<sup>2</sup>vu:k<sup>7</sup>doŋ<sup>1</sup>ra<sup>3</sup>? 或koŋ<sup>1</sup>nei<sup>2</sup>doŋ<sup>1</sup>ra<sup>3</sup>vu:k<sup>7</sup>?

工 这 做 怎 样 工 这 怎 样 做

这工作怎样做?

## (二) 表领属关系形式的发展

壮侗语族诸语言表领属关系的形式一般是“被领属者+领主”，不用辅助成分。例如：

壮语: ka:i<sup>5</sup>pit<sup>0</sup>kou<sup>1</sup> 我的笔 tu<sup>2</sup>va:i<sup>2</sup>te<sup>1</sup> 他的牛

枝 笔 我 只 牛 他

水语: ra:n<sup>2</sup>luŋ<sup>2</sup> 伯父的房子 tiu<sup>2</sup>nu<sup>4</sup> 弟弟的那条

房 伯父 条 弟弟

标语、拉珈语已趋同于汉语语序，变成“领主+被领属者”。

标语: a<sup>1</sup>tsɔ<sup>3</sup>ken<sup>0</sup>lɔ:k<sup>10</sup> 伯父的房子

伯父 间 屋

tsi<sup>3</sup> sy<sup>3</sup> tsu<sup>4</sup> liak<sup>4</sup> 支书的儿子

支书 个 儿子

拉珈语: tə<sup>2</sup>lon<sup>6</sup>le:k<sup>10</sup> 伯父的房子

我们 伯父 屋

比较粤语: a<sup>5</sup>pa:k<sup>5</sup>ka:n<sup>1</sup>uk<sup>7</sup> 伯父的房子

阿伯 间 屋 (或伯父的那栋房子)

有些方言、土语已出现了辅助成分,属民族词的放在“领主”之前:

壮语 (来宾): sau<sup>1</sup>tu<sup>6</sup>kou<sup>1</sup> 我的书

书 我

侗语(报京): mjin<sup>6</sup> jo<sup>2</sup> ɬaŋ<sup>1</sup> ten<sup>1</sup> 我的刀

我 把 刀

而从汉语吸收的辅助成分则按汉语格式放在“领主”之后。壮、侗、毛南等语言从汉语西南官话吸收了“的”(读作ti<sup>6</sup>或tji<sup>6</sup>等),壮语、仡佬语、标语等以平话或粤语吸收了ko(或读作ka、ke等),黎语从海南话吸收了ka:i<sup>3</sup>,临高话可能是从粤语吸收kə<sup>3</sup>,构成了各自的领属结构的辅助成分。

壮语: kau<sup>1</sup> ti sau<sup>1</sup> 我的书

我 的 书

毛南语: man<sup>2</sup>tinjan<sup>2</sup>ci<sup>3</sup> 他的年纪

他 的 年 纪

侗语(章鲁): tiu<sup>1</sup> tji<sup>6</sup> tui<sup>1</sup> tsa:ŋ<sup>4</sup> 我们的队长

我 们 的 队 长

侗语(报京): la<sup>4</sup>un<sup>3</sup>ti<sup>3</sup>mun<sup>6</sup>=mjin<sup>6</sup>la<sup>4</sup>un<sup>3</sup>ti<sup>3</sup>mun<sup>6</sup>

小孩 的 猴

小孩 的 猴

孩子 的 猴子

壮语(下榜): kou<sup>1</sup>'kaɬei' hoŋ<sup>1</sup>'kou<sup>1</sup>'kaɬei' 我的书

我 的 书

我 的 书

临高话: kə²kə³lək⁶=lək⁸kə²kə³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儿子他的

黎语: ʔo¹hja:u¹ ka:i³ la:u² ts'e² 学校的老师

学校 的 老师

### (三) “动宾补”句式语序的发展

壮侗语族诸语言中含有动词谓语、宾语、补语的句式的结构一般为“动+宾+补”，受汉语的影响，出现了“动+补+宾”的格式。

壮语里如果动词后带的是被处置的数量宾语和结果补语时，可同时使用两种格式。两个同义的介词或副词，一个是固有词，一个是汉语借词，使用固有词时用固有格式，使用借词时用新格式。有时出现并用的现象，借词作状语，固有词作补语（或称“后状语”）：

mop⁸so:ŋ¹tu²ma¹ta:i¹ 或 mop⁸ta:i¹so:ŋ¹tu²ma¹

打 二 只 狗 死 打 死 二 只 狗

打死了两只狗

kou¹pai¹ko:n⁶ 我先去 或kou¹si:n¹pai¹

我 去 先 我 先 去

或kou¹si:n¹pai¹ko:n⁶

我 先 去 先

傣语目前有“动+宾+补”与“动+补+宾”式并存的格式。“动+补+宾”式正慢慢扩大其领域，“动+宾+补”也继续保持其传统的使用范围。请看傣语（西双版纳）两种格式并存的例子：

kin¹xau³ ʔim⁶ 吃饱饭 tsai⁵ ŋwn² sám⁴ 花完钱

吃 饱 饭 用 银 完

fan²tau⁶ fan²tuŋ⁵ p'ai⁶。打跨反动派。

砍 倒 反 动 派

ʔan<sup>6</sup> p'ai<sup>4</sup> ʔdi<sup>1</sup>kan<sup>1</sup>xáu<sup>8</sup>ju<sup>6</sup> hau<sup>1</sup> kin<sup>1</sup> heŋ<sup>6</sup> tsum<sup>2</sup> lai<sup>1</sup>.  
安 排 好 事 情 生 活 (的) 群 众

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其他语言也同样出现了两种格式并存的局面。如仫佬语和黎语：

仫佬语：həi<sup>2</sup>tʂa:n<sup>1</sup>hu<sup>3</sup>kraŋ<sup>5</sup>lo。或həi<sup>2</sup>tʂa:n<sup>1</sup>kraŋ<sup>5</sup>hu<sup>3</sup>lo。

我 吃 饭 饱 了 我 吃 饱 饭 了  
我吃饱饭了。

黎语：lau<sup>6</sup> t'a<sup>5</sup> ʔba:i<sup>3</sup> 或 lau<sup>6</sup> ʔba:i<sup>3</sup> t'a<sup>5</sup> 吃完饭

吃 饭 完 吃 完 饭

vok<sup>8</sup> koŋ<sup>1</sup> ʔbai<sup>8</sup>或vok<sup>8</sup> ʔba:i<sup>3</sup> koŋ<sup>1</sup> 做完工

做 工 完 做 完 工

#### (四) 疑问句式的发展

壮侗语族诸语言带有宾语的表示肯定否定的疑问句，固有格式为“肯定+宾+否定”，一些语言在汉语的影响下又出现了“肯定+否定+宾”格式（以下例句上为固有格式，下为新格式）。

壮语：muŋ<sup>2</sup> kuŋ<sup>1</sup> hau<sup>4</sup> ʔhou<sup>3</sup> kuŋ<sup>1</sup>?

你 吃 饭 不 吃

muŋ<sup>2</sup> kuŋ<sup>1</sup> ʔhou<sup>3</sup> kuŋ<sup>1</sup> hau<sup>4</sup>?

你 吃 不 吃 饭

(你吃不吃饭?)

仫佬语：ŋa<sup>2</sup>hrai<sup>3</sup>ti<sup>6</sup>(si)ŋ<sup>6</sup>hrai<sup>3</sup>(ja<sup>6</sup>)?

你 买 糍 是 不 买

ŋa<sup>2</sup>hrai<sup>3</sup>ŋ<sup>6</sup>hrai<sup>3</sup>ti<sup>2</sup>(ja<sup>6</sup>)?

你 买 不 买 糍

(你买不买糍粑?)

黎语表示肯定否定的疑问句有三种固有格式：“动词+否定副词”、“动词+连词+否定副词”、“动词+连词+否定副词+

动词”。

保定:  $la, i^3 ta^1?$  看见没有?

见 不

保定:  $hei^1 tsu\omega^3 ta^1?$  去不去?

去 或者 不

西方:  $hei^1 ts'u\omega^1 ta:m^1 hei^1$  去不去?

去 或者 不 去

现在, 汉语的“动词+否定副词+动词”的疑问句格式被引进了黎语:

保定:  $ts\omega\eta^3 ta^1 ts\omega\eta^3?$  坐不坐?

坐 不 坐

通什:  $hei^1 vei^4 hei^1?$  去不去?

去 不 去

#### (五) 判断句式的发展

早期壮侗语判断句都不用判断动词, 而用与主语相同的词或与之有关的量词及其修饰成分充当谓语的方式表达。现在诸语言判断动词差别较大, 没有同源现象, 可以确定是本语族各语言、方言分化之后在汉语影响下各自形成或直接从汉语吸收的。目前诸语言主要使用如下判断动词:

$tu:k^5$  ( $tik^5, tu^?^5$ ) ——壮、布依语部分地区

$te:\eta^1$  (原意“击中”) ——壮、布依语部分地区

$pin^1$  ( $pen^2, pen^5, pan^2$ , 原意“成”) ——傣、泰、老挝语

$ndum^3$  (原意“合”) ——水语

$man^1$  ——黎语

$ta:\eta^3$  ——侗语部分地区

$\phi i\eta^5$  ( $tsi\eta^5$ , 借自汉语“正”) ——侗、毛南语部分地区

$tsu\omega^6$  ( $sei^6, si^6, si^1, \phi i^6$ , 借自汉语“是”)

——壮、布依、侗、毛南、仫佬语部分地区。傣、泰语用于否定判断句中, 念  $tsau^6, tsai^6, ts'ai^3$  (6)。

黎语判断句仍多使用固有句式，但使用判断动词的频率趋于增高，特别是在肯定的判断句中。

布依语：ku<sup>2</sup> ni<sup>4</sup> si<sup>1</sup> ka:i<sup>6</sup> ʔdiŋ<sup>1</sup>。这朵是红的。

朵 这 是 种 类 红

侗语：k'wa:i' ti' qig<sup>6</sup> ja:u<sup>2</sup>。我是会计

会 计 是 我

nu<sup>5</sup> ma:u<sup>0</sup> ɕi<sup>6</sup> kwe<sup>2</sup> ɕi<sup>6</sup> t'onj<sup>2</sup> ʔji<sup>1</sup> la<sup>4</sup>! 就看他是否同意啦!

看 他 是 不 是 同 意 啦

黎语：nei<sup>2</sup> me<sup>3</sup> he<sup>3</sup>? 或 nei<sup>2</sup> man<sup>1</sup> me<sup>3</sup>he<sup>3</sup>? 这是什么?

这 什 么 这 是 什 么

na<sup>1</sup>u<sup>2</sup>a:u<sup>1</sup>ɬen<sup>1</sup>。或 na<sup>1</sup>man<sup>1</sup>u<sup>2</sup>a:u<sup>1</sup>ɬen<sup>1</sup>。他是好人。

他 人 好 他 是 人 好

目前诸语言仍使用固有的判断句式，如壮语ʔan<sup>1</sup> nei<sup>4</sup> ʔan<sup>1</sup>

个 这 个

kou<sup>1</sup>。“这个是我的”，ko<sup>1</sup> nei<sup>4</sup> ko<sup>1</sup> ma:k<sup>7</sup>。“这棵是果  
我 棵 这 棵 果

树”。但在一些语言里固有句式使用频率越来越低，有消失的趋势。

#### (六) 名词、量词、动词重叠式的发展

重叠式是汉语等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的重要语法手段。壮侗语族目前也存在重叠式，但没有汉语丰富，一般说来，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具有重叠式结构，但在诸语言中发展不均衡。有时要加辅助成分，如谐音、后缀音节，才能构成重叠式。与汉语接触密切的语言重叠式丰富，反之不然。以下试分析几种明显的与汉语影响有关的壮侗语重叠式结构的发展。

##### 1. 名词重叠式

傣、黎语的名词不能重叠。壮、布依、侗、水、仡佬、毛南语少部分名词可以重叠，用以加强语气，包括部分时间名词和兼作量词用的名词。

壮语: pi<sup>1</sup> pi<sup>1</sup> mi<sup>2</sup> mou<sup>1</sup> ka<sup>3</sup>. 年年有猪杀。

年 年 有 猪 杀

vun<sup>2</sup> vun<sup>2</sup> eun<sup>3</sup> pai<sup>1</sup> lo. 人人都走了。

人 人 都 去 了

侗语: man<sup>1</sup> man<sup>1</sup> me<sup>2</sup> man<sup>1</sup> mu<sup>3</sup>, 天天有明天,

天 天 有 明 天

nin<sup>2</sup> nin<sup>2</sup> me<sup>2</sup> nin<sup>2</sup> sa<sup>2</sup>. 年年有明年

年 年 有 明 年

?ja<sup>2</sup> n<sup>2</sup> ?ja<sup>2</sup> n<sup>2</sup> me<sup>2</sup> nən<sup>2</sup> tok<sup>3</sup> le<sup>2</sup>. 家家有人读书。

家 家 有 人 读 书

侗语、水语及个别地区的壮语、布依语、仫佬语的方位名词也能重叠。侗、水语方位名词重叠的条件是后加指示代词，此时指示代词已虚化。

水语: te<sup>3</sup> te<sup>4</sup> tsa<sup>5</sup> 那最下面, lan<sup>2</sup> lan<sup>4</sup> tsa<sup>5</sup> 那最后面

下 下 那 后 后 那

壮语(田林): ?i<sup>6</sup> ?i<sup>6</sup> tə la<sup>1</sup> leu<sup>4</sup> ?ja. 每一处都找遍了。

处 处 都 找 完 了

此外，壮、侗、仫佬、水语少数意义相关的名词也能在一定的语境中以AABB的方式重叠表示强调，但不常使用。

## 2. 量词重叠式

壮侗语族诸语言部分量词同源(黎语支除外)，量词用法也有不少共同点，但在重叠这一用法上差别较大，从中可以窥视汉语影响的痕迹。汉语影响较弱的黎、傣、泰语量词一律不能重叠，如需表示“每一”意义时一般与特定的数词或助词相结合。水语和临高话只有少数常用的量词，如“位、个、家”能重叠，其余不能。面壮、布依、侗、仫佬、毛南语的量词一般都可以重叠，表示“全部”、“每一”的意思。例如：

傣语: to<sup>1</sup> ʔdai<sup>1</sup> ko<sup>4</sup> pi<sup>2</sup> sam<sup>4</sup>. 或 pi<sup>2</sup> sam<sup>4</sup> tsu<sup>6</sup> to<sup>1</sup>.  
只 哪 都 肥 全 肥 全 每 只  
每一只都肥。

水语: lam<sup>1</sup> lam<sup>1</sup> 每一个 (东西)

个 人

ʔjən<sup>2</sup> lam<sup>1</sup> 每一个 (东西)

每 个

tsap<sup>8</sup> tiu<sup>2</sup> 每条

布依语: ta,u<sup>5</sup> ta,u<sup>5</sup> ʔdai<sup>4</sup> xuŋ<sup>4</sup> tɕi<sup>4</sup>. 每次得红旗。

回 回 得 红 旗

pu<sup>4</sup> pu<sup>4</sup> ta,ŋ<sup>5</sup> mo<sup>4</sup> fa,n<sup>3</sup>. 人人当模范。

个 个 当 模 范

### 3. 动词重叠式

壮侗语族动词重叠式的发展,布依语走在前边,这和汉语对布依语的深刻影响分不开。其他语言一般只有个别表行为动作的动词能重叠,而且要加上辅助成分。布依语动词一般能单独重叠,或后加辅助成分补充说明或表示动作情态。例如:

壮语: tam<sup>3</sup> ta<sup>1</sup> tam<sup>3</sup> tau<sup>5</sup>! 快织(布)吧!

织 织

侗语: na<sup>2</sup> t'ig<sup>6'</sup> t'ig<sup>5</sup> nu<sup>5</sup>. 你尝尝看。

你 尝 尝 看

布依语: ku<sup>1</sup> pai<sup>1</sup> ɣuan<sup>6</sup> ɣuan<sup>5</sup>. 我去看看。

我 去 看 看

toi<sup>5</sup> toi<sup>5</sup> mi<sup>2</sup> pia<sup>7</sup>. 敲来敲去敲不破。

敲 敲 不 破

ziu<sup>1</sup> ʔdum<sup>4</sup> ʔdum<sup>4</sup> 笑咪咪

笑 咪 咪

有学者认为早期壮侗语为黏着语,与南岛语(如中国台湾高山族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等)有发生学关系,他们还列举了一批

同源词。<sup>①</sup>这些学者认为现代壮侗语与汉语共有的种种相似的形态特征是汉语长期影响壮侗语的结果，如语词多为单音节，有声调、靠语序区别意义等等。如果这个论断成立，就意味着壮侗语经历了一个语言结构类型转换的过程，发生了质的飞跃。一种语言能对另一种语言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在语言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 第三节 汉语对苗瑶语的影响

使用苗瑶语的苗族、瑶族和畲族现在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海南、广东、福建等省区。从文献记载和这些民族的传说表明，他们原来生活在黄河、长江之间，很早就与汉族先民接触。后来才迁到长江中游，再迁到湖南西部后才分散，苗向西、瑶向南，畲向东<sup>②</sup>。苗语称汉族的词反映了这种较早的接触关系，如黔东南苗语和湘西苗语称“汉族”分别是təu<sup>4</sup>和ta<sup>4</sup>，源于对“周”的称呼。另外，苗瑶语民族的自称在汉语中被记作“蛮”，<sup>③</sup>也说明苗瑶语先民与汉族先民很早就有接触<sup>④</sup>。

① 请看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的联盟》，罗美珍译，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1980年。罗美珍《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倪大白《侗台语概论》第七章，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1990年。

② 《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瑶族简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③ 李永燧，《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民族语文》，1983·6。

④“周”的祖先虽然不是汉族，而是“羌”（姜），但是苗瑶语民族所接触的“周”是已经在中原建立政权，并吸收了中原华夏的“周”国人，“蛮”后来泛指南方各民族，与苗瑶语民族的南迁有关，同时，狭义的“蛮”仍然称呼苗瑶语先民，因指称南方其他民族还有“越、夷、僚、濮、俚、巴”等等。他分别是壮侗语和藏缅语民族先民。

苗瑶语民族由北往南迁徙的同时，汉语也随着汉族移民由中原往南方扩散，甚至在苗瑶语先民还没有来到现在的分布地区之前，有些地方已经有汉族人在那里居住。这样，就使得苗瑶语分布的地区东南西北都有汉语分布。苗瑶语除了在中原、长江中游地区接触古汉语之外，后来的迁徙还分别接触了西南官话、湘方言、客家方言、粤语、闽语。各种汉语方言与苗瑶语的接触如下：

古汉语	苗语、瑶语、布努语、畲语
西南官话	苗语、瑶语、布努语
客家话	畲语
粤语	瑶语
湘语	湘西苗语、布努语
闽语	畲语、瑶语（海南）

## 一、苗瑶语中的汉语借词

苗瑶语受汉语影响，借用汉语的方式有音译、意译和音意合译三种。如黔东苗语中的音译借词： $mu^2$ （釜，一种炊具）、 $qen^1$ （庚，天干之一）；音意合译借词： $yi^1hs^1$ （石灰←石+粘）、 $yoŋ^2ten^1$ （龙灯←龙+灯=点灯的龙）；意译借词： $ka^2vaŋ^2$ （御米、玉米→粮+皇）。①音译借词占绝大多数，音意合译和意译很少。

汉语对苗瑶语影响的历史有几千年的时间，而汉语和苗瑶语的语音都在各自发展变化变化，因此，上古借进来的词汇在历来语言变化中也发展变化，现在所见到的古代借词的语音只具有中古汉语的特点。本文所说的“老借词”指那些与新借词的语音不同的借词。另外，老借词单音词多一些，新借词双音词多一些。

① 此外，还有如黔东苗语、湘西苗语、川黔滇苗语的十二生肖。

苗瑶语中的汉语老借词：①

汉语	黔东南 苗语	湘西 苗语	川黔滇 苗语	布努语	畲语	瑶语
中	tɔŋ <sup>1</sup>	ŋtɔŋ <sup>1</sup>	ŋtaŋ <sup>1</sup>	ŋtɔŋ <sup>1</sup>	—	—
千	shaŋ <sup>1</sup>	tshe <sup>1</sup>	tsha <sup>1</sup>	ɕin <sup>1,4</sup>	tshan <sup>1</sup>	tshin <sup>1</sup>
甘	qaŋ <sup>1</sup>	—	qaŋ <sup>1</sup>	ken <sup>1</sup>	kwan <sup>1</sup>	kaam <sup>1</sup>
清	ɕhi <sup>1</sup>	tshen <sup>1</sup>	ŋtɕha <sup>1</sup>	ntshiq <sup>1</sup>	sin <sup>1</sup>	dzaŋ <sup>1</sup>
鸽	qo <sup>1</sup>	Nqo <sup>1</sup>	Nqua <sup>1</sup>	ŋkyu <sup>1</sup>	kap <sup>7</sup>	kop <sup>7</sup>
桥	tɕu <sup>2</sup>	cu <sup>2</sup>	(tɕhau <sup>2</sup> )	cu <sup>2</sup>	khji <sup>2</sup>	tɕiou <sup>2</sup>
羊	zɔŋ <sup>2</sup>	zɔŋ <sup>2</sup>	zɔŋ <sup>2</sup>	joŋ <sup>2</sup>	zuŋ <sup>2</sup>	juŋ <sup>2</sup>
筒	tɔŋ <sup>2</sup>	tɔŋ <sup>2</sup>	taŋ <sup>2</sup>	tɔŋ <sup>2</sup>	—	doŋ <sup>2</sup>
床	soŋ <sup>2</sup>	tsɔŋ <sup>2</sup>	tsɔŋ <sup>2</sup>	—	tshuŋ <sup>2</sup>	tsɔŋ <sup>2</sup>
骑	tɕi <sup>2</sup>	—	tɕai <sup>2</sup>	—	khji <sup>2</sup>	kei <sup>2</sup>
银	ŋi <sup>2</sup>	ŋoŋ <sup>2</sup>	ŋa <sup>2</sup>	ŋiŋ <sup>2</sup>	ŋin <sup>2</sup>	naan <sup>2</sup>
铜	təu <sup>2</sup>	toŋ <sup>2</sup>	toŋ <sup>2</sup>	loŋ <sup>2</sup>	thəŋ <sup>2</sup>	toŋ <sup>2</sup>
钱	sei <sup>2</sup>	—	tɕa <sup>2</sup>	θiŋ <sup>2</sup>	tshin <sup>2</sup>	tsin <sup>2</sup>
孔	qhaŋ <sup>3</sup>	qhu <sup>3</sup>	qhau <sup>3</sup>	khi <sup>3</sup>	—	khot <sup>7</sup>
写	ɕha <sup>3</sup>	—	—	θi <sup>3</sup>	sja <sup>3</sup>	fiə <sup>3</sup>
早	so <sup>3</sup>	ntso <sup>3</sup>	ntso <sup>3</sup>	—	tsu <sup>3</sup>	dziou <sup>3</sup>
斗	to <sup>3</sup>	tu <sup>3</sup>	teu <sup>3</sup>	tu <sup>3</sup>	tau <sup>3</sup>	tə <sup>3</sup>
酒	tɕu <sup>3</sup>	tɕu <sup>3</sup>	tɕeu <sup>3</sup>	cu <sup>3</sup>	tiu <sup>3</sup>	tiu <sup>3</sup>
白	tɕəu <sup>4</sup>	tɕə <sup>4</sup>	dzo <sup>6</sup>	co <sup>4</sup>	—	—
老	lu <sup>4</sup>	—	leu <sup>4</sup>	—	—	lu <sup>4</sup> (旧)
下	ŋa <sup>4</sup>	—	NGen <sup>4</sup>	ŋku <sup>4</sup>	—	—
麦	maŋ <sup>4</sup>	me <sup>4</sup>	mau <sup>4</sup>	mi <sup>4</sup>	(mak <sup>3</sup> )	min <sup>5</sup>

① 材料来源：王辅世主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教研室编《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买	me <sup>4</sup>	—	mua <sup>4</sup>	—	mɔ <sup>4</sup>	maai <sup>4</sup>
马	ma <sup>4</sup>	me <sup>4</sup>	nen <sup>4</sup>	mu <sup>4</sup>	me <sup>4</sup>	mu <sup>4</sup>
价	qa <sup>5</sup>	Nqa <sup>5</sup>	Nqe <sup>5</sup>	(ca <sup>14</sup> )	ka <sup>4</sup>	tɕia <sup>5</sup>
百	pa <sup>5</sup>	pa <sup>5</sup>	pua <sup>5</sup>	pai <sup>5</sup>	pa <sup>5</sup>	pe <sup>7</sup>
故(旧)	qo <sup>5</sup>	qo <sup>5</sup>	qo <sup>5</sup>	keu <sup>5</sup>	ku <sup>5</sup>	ku <sup>5</sup>
送	shoŋ <sup>5</sup>	soŋ <sup>5</sup>	soŋ <sup>5</sup>	θoŋ <sup>5</sup>	—	fuŋ <sup>5</sup>
锯	tɕu <sup>5</sup>	ɕu <sup>3</sup>	keu <sup>5</sup>	cy <sup>5</sup>	ku <sup>5</sup>	dziou <sup>5</sup>
炭	the <sup>5</sup>	the <sup>5</sup>	then <sup>5</sup>	thu <sup>5</sup>	than <sup>5</sup>	thaan <sup>5</sup>
客	qha <sup>5</sup>	qha <sup>5</sup>	qhua <sup>5</sup>	khai <sup>5</sup>	khwei <sup>1</sup>	khe <sup>7</sup>
匠	ɕaŋ <sup>5</sup>	tɕaŋ <sup>5</sup>	—	ɕaŋ <sup>5</sup>	—	tɕaŋ <sup>5</sup>
卖	me <sup>5</sup>	me <sup>5</sup>	mua <sup>5</sup>	moŋ <sup>5</sup>	mɔ <sup>4</sup>	maai <sup>5</sup>
凿	so <sup>5</sup>	—	(tsho <sup>5</sup> )	θau <sup>5</sup>	—	tsu <sup>5</sup>
万	vaŋ <sup>5</sup>	(we <sup>1</sup> )	waŋ <sup>5</sup>	van <sup>5</sup>	van <sup>4</sup>	uaan <sup>5</sup>
帽	mo <sup>5</sup>	(mo <sup>1</sup> )	(mao <sup>4</sup> )	mo <sup>5</sup>	—	muo <sup>5</sup>
箸 <sup>①</sup>	tɕu <sup>5</sup>	tɕu <sup>5</sup>	teu <sup>5</sup>	tɕu <sup>5</sup>	khu <sup>4</sup>	tsou <sup>4</sup>
漆	shei <sup>7</sup>	tshei <sup>3</sup>	tsha <sup>7</sup>	—	tshe <sup>5</sup>	tshjet <sup>7</sup>
鸭	o <sup>7</sup>	—	o <sup>7</sup>	o <sup>7</sup>	oi <sup>5</sup>	aap <sup>7</sup>
蝎	heu <sup>7</sup>	hu <sup>3</sup>	heu <sup>5</sup>	hyu <sup>7</sup>	ho <sup>5</sup>	hop <sup>7</sup>
答	ta <sup>1</sup>	tu <sup>1</sup>	te <sup>1</sup>	te <sup>1</sup>	—	taap <sup>7</sup>
隘	ŋi <sup>5</sup>	ŋa <sup>4</sup>	Nqe <sup>5</sup>	ŋka <sup>5</sup>	kwei <sup>5</sup>	hep <sup>5</sup>

从上例可以看出，由于苗瑶语诸语言分布较广，接触汉语的情况不一样，因此，具体到每一种语言或方言，对某个汉语词借或不借，都很不统一。如川黔滇苗语不借“匠”，仍在使用固有词ku<sup>7</sup>，而湘西苗语不借“买”(nu<sup>4</sup>)，这个词也许还是与藏语no<sup>12</sup>有远古关系。而畲语<sup>2</sup>的kap<sup>7</sup>(鸽)、mak<sup>5</sup>(麦)虽然显示出中古汉语语音特点，却是后来从客家方言中借来的。畲语中汉语

① 筷子。

入声调的老借词已变阳去，如 *tshe<sup>6</sup>*（漆）、*ɔi<sup>6</sup>*（鸭）。

有时，同样的一个词有些语言或方言借，有些则不借。如黔东南苗语、布努语、瑶语借十二地支，而其他语言只见意译的十二生肖。黔东南苗语借天干，其他语言却看不到。黔东南苗语借“线”表示“细长的金属”，如 *ɕən<sup>6</sup>lhəu<sup>5</sup>*（铁丝）、*ɕən<sup>6</sup>təu<sup>2</sup>*（铜丝），而川黔滇苗语用固有词 *so<sup>3</sup>*（线）、滇东北苗语、瑶语分别用 *la<sup>5</sup>*、*ɬia<sup>5</sup>*（绳）来指称。

又如瑶语和畲语在使用固有数词基础上还借汉语数词来表达十以上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借入的时间、地点、方言以及功能不同而形成三套。如畲语：

	一	二	三	四	五
计位	—	—	—	<i>se<sup>6</sup></i>	<i>ŋi<sup>6</sup></i>
计月	<i>tsin<sup>1</sup>①</i>	<i>ŋin<sup>6</sup></i>	<i>saŋ<sup>1</sup></i>	<i>se<sup>6</sup></i>	<i>ŋuŋ<sup>4</sup></i>
计日	<i>zit<sup>7</sup></i>	<i>ŋi<sup>6</sup></i>	<i>san<sup>3</sup></i>	<i>sji<sup>2</sup></i>	<i>ŋu<sup>5</sup></i>
六	<i>niu<sup>6</sup></i>	<i>tshe<sup>6</sup></i>	<i>pi<sup>5</sup></i>	<i>kjə<sup>6</sup></i>	<i>sji<sup>4</sup></i>
	<i>ŋjuŋ<sup>6</sup></i>	<i>tshe<sup>6</sup></i>	<i>paŋ<sup>5</sup></i>	<i>kiəŋ<sup>6</sup></i>	—
	<i>nuk<sup>3</sup></i>	<i>tshit<sup>7</sup></i>	<i>pat<sup>7</sup></i>	<i>kiu<sup>5</sup></i>	<i>sit<sup>3</sup></i>

同一个汉语词，苗瑶语不同语言、方言借入的时间也不一样，如“帽”在湘西苗语属于新词（老借词应是阳去调），“番”在川黔滇苗语（*tsho<sup>3</sup>*）、标敏瑶语（*tshu<sup>4</sup>*）也都不是老借词。“轿子”在湘西苗语（*co<sup>1</sup>*）、川黔滇苗语（*tsau<sup>3</sup>*）、瑶语（*tɕiou<sup>2</sup>*）、标敏瑶语（*tɕieu<sup>2</sup>*）也是新借词。

甚至汉语在不同时期指称同一事物用不同的语词，苗瑶语中都有借入，如黔东南苗语：

	早期	近期
	<i>ɕo<sup>3</sup>thaŋ<sup>6</sup></i> 学堂	<i>ɕo<sup>3</sup>ɕau<sup>6</sup></i> 学校

① 正月的“正”。

ɕɛ¹sen¹ 先生

ʒen¹ 烟 (草)

zi⁶ 邑

ʒaŋ⁶tɕɛ² 洋碱

lau²si¹ 老师

ʒɛ¹ (香) 烟

tshen⁶si⁶ 城市

fei⁶tsau⁶ 肥皂

汉语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意义和不同语音，也在苗瑶语借词中有所反映，如黔东苗语：

	早期	近期
车	ɕha¹ (水) 车	tshɛ¹ (汽) 车
炮	pho⁶ 枪	phau⁶ (大) 炮
墨	maŋ⁴ (锭) 墨	mɛ⁶ 墨 (水)
漆	shei⁷ (生) 漆	tɕhi⁴ (油) 漆

有些借词的意义没有变化，而是随其他种借词的借入而出现。如黔东苗语：

ten⁶	店	tɕɛ⁶
sha⁶	最	tsui⁶
kho³	考	khau³
shen⁶	信 (件)	ɕen⁶
shen⁶	算	sue⁶

## 二、语法上的影响

### (一) 词法

苗瑶语的固有构词法中，名词、动词、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时候位于被修饰名词之后。因受汉语影响，瑶语和畲语中出现一部分合成词的修饰成分移到被修饰成分之前。如：

瑶语

sjaŋ¹naŋ⁵	新年	khurŋ⁵ɕaŋ⁶	白饭
“新”年		“空”饭	

ŋoŋ<sup>2</sup>tsooŋ<sup>1</sup> 牛角

牛 角

djaŋ<sup>5</sup>dooi<sup>2</sup> 木薯

树 薯

gai<sup>3</sup>khot<sup>7</sup> 屁股

屎 洞

pu<sup>2</sup>ŋooi<sup>1</sup>pjaŋ<sup>2</sup> 向日葵

太阳 花

畚语

kwao<sup>4</sup>ka<sup>3</sup> 手纹

手 路

ka<sup>1</sup>ta<sup>1</sup>tuoŋ<sup>6</sup> 长凳

长 凳

pui<sup>5</sup>kwei<sup>2</sup> 猪肉

猪 肉

kje<sup>3</sup>ka<sup>3</sup> 山路

山 路

kv<sup>5</sup>ne<sup>2</sup> 老人

故 人

kjaŋ<sup>1</sup>pui<sup>6</sup> 黑猪

黑 猪

在苗语中除黔东南苗语和川黔滇苗语绞坨话外，作“好”、“坏”讲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位于名词之前。如“好人”，

黔东南苗语 ne<sup>2</sup>vu<sup>5</sup>

川黔滇苗语 zoŋ<sup>5</sup>nen<sup>1</sup>

湘西苗语① ma<sup>2</sup>zoŋ<sup>5</sup>ne<sup>2</sup>

瑶语的“好”、“坏”也必须在前，而其他形容词则在被修饰名词之后。

在讨论少数民族语言受汉语影响而造成构词法的变化时，有一种提法值得商榷。诸如黔东南苗语中的hoŋ<sup>3</sup>tɕhi<sup>6</sup>（红旗）、tɕhe<sup>3</sup>lu<sup>6</sup>（铁路）、fei<sup>1</sup>tɕei<sup>1</sup>（飞机）之类，有人认为是因为汉语影响，使黔东南苗语结词法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则，即名词、动词、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放在名称之前。②这种提法忽视了一个问题，即这些借词的每一个词素并未为人们所理解，它们在汉语中是双音“复合词”，而在黔东南苗语中仅仅是“双音”单纯词罢了。因此，这些复合词借进来之后，还必须加上一个中心成分（有人称之为“大类词”），使这些词易于理解。如黔东南苗语：

①ma<sup>2</sup>,名词化前缀。

②《苗语中的汉语借词》，《中国语文》，1982·5。

yo<sup>1</sup>po<sup>1</sup>tshe<sup>5</sup>波菜

菜 “波菜”

[u<sup>3</sup>mau<sup>5</sup>θɛ<sup>5</sup>zi<sup>1</sup>毛衣

衣 “毛线衣”

有些复合词则已经不再加这种“大类名”，因为有些借词是抽象名词。如“问题”、“法律”，黔东南苗语中没有这类词汇的“大类词”。原来加大类名的借词多限于表示树、花、瓜、果、菜、建筑等的名词。另外，民族语言也有一个“双音节化”的趋势，因此一些不是抽象词汇也不再加大类名，如phin<sup>6</sup>ko<sup>2</sup>（苹果）、θi<sup>1</sup>kua<sup>1</sup>（西瓜）。

## (二) 句法

语法上受汉语影响的另一个现象是大量副词、连词、介词的借入。苗瑶语的介词、连词和部分副词位置在动词、形容词之前，与汉语相同，因此易于借入。如：

### 副词

	黔东南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马上	ma <sup>2</sup> saŋ <sup>5</sup>	maŋ <sup>5</sup> saŋ <sup>1</sup>	mua <sup>1</sup> saŋ <sup>5</sup>
刚刚	—	—	—
立刻	—	—	—
很	—	hen <sup>6</sup>	hen <sup>3</sup>
最	sha <sup>5</sup>	tsei <sup>1</sup>	tsui <sup>4</sup>
又	zəu <sup>5</sup>	za <sup>5</sup>	zəu <sup>5</sup>
就	—	—	tou <sup>6</sup>
再	—	tsa <sup>1</sup>	tsa <sup>5</sup>
一定	zi <sup>4</sup> ten <sup>5</sup>	zi <sup>2</sup> tθin <sup>1</sup>	zi <sup>2</sup> tien <sup>5</sup>
慢	—	—	maŋ <sup>5</sup> maŋ <sup>5</sup>
都	tu <sup>1</sup>	—	—
常常	saŋ <sup>5</sup> saŋ <sup>5</sup>	—	—
	布努语	畲语	瑶语
马上	ma <sup>5</sup> saŋ <sup>5</sup>	—	ma <sup>4</sup> tsaŋ <sup>5</sup>

刚刚	tɕaŋ <sup>1</sup> * <sup>2</sup> tɕaŋ <sup>2</sup>	—	—
立刻	—	nit <sup>6</sup> khit <sup>4</sup>	—
很	hvy <sup>8</sup>	—	hen <sup>3</sup>
最	θei <sup>2</sup>	sui <sup>4</sup>	tsui <sup>5</sup>
又	—	—	ju <sup>6</sup>
就	—	su <sup>6</sup>	tsjou <sup>6</sup>
再	—	—	tsoi <sup>5</sup>
一定	it <sup>1</sup> tiŋ <sup>5</sup>	i <sup>6</sup> thin <sup>4</sup>	jet <sup>3</sup> tiŋ <sup>6</sup>
慢	—	—	man <sup>6</sup> man <sup>6</sup>
都	tu <sup>5</sup>	—	tu <sup>1</sup>
常常	—	sɔŋ <sup>2</sup> sɔŋ <sup>2</sup>	—

介词主要是“比”，畲语还借入“向”、“从”。借入的连词有“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如果”、“假比”、“比配”，“还是”等。副词、介词、连词之所以能在苗瑶语中扎下根来，与固有介词、副词、连词在意义上表达上存在一些局限有关。以黔东南苗语为例：

原来的程度副词va<sup>5</sup>（非常）、poŋ<sup>5</sup>（非常）和poŋ<sup>5</sup>va<sup>5</sup>（非常）置于形容词之后，tɕu<sup>6</sup>tei<sup>2</sup>（确实）在形容词之前，都有表示“极”、“非常”的意思，同时兼有“表示感叹”。如yu<sup>5</sup>va<sup>5</sup>!（太好了！）、tɕu<sup>6</sup>tei<sup>2</sup>yu<sup>5</sup>（确实好啊）。而借来汉语的“最”（sha<sup>6</sup>）放在形容词之前，不再表示感叹，如sha<sup>6</sup>yu<sup>5</sup>（最好）仅仅表示“极”。

又如原有的ka<sup>4</sup>lja<sup>4</sup>多表示“急”、kaŋ<sup>5</sup>ki<sup>5</sup>多表示“快”，意义与之相同的tsha<sup>5</sup>是一个状词，表示“将以‘快’的动作（行事）”借来汉语的ma<sup>2</sup>saŋ<sup>5</sup>（马上）则以一种不带有任坚附带意义的形式出现。如：

ka <sup>4</sup> lja <sup>4</sup> moŋ <sup>4</sup>	急着要去
kaŋ <sup>5</sup> ki <sup>5</sup> moŋ <sup>4</sup>	快一点去
tsha <sup>5</sup> qa <sup>2</sup> moŋ <sup>4</sup>	很快就去

ma<sup>2</sup> saŋ<sup>6</sup> moŋ<sup>4</sup> 马上去

而noŋ<sup>5</sup>与借词zi<sup>2</sup>ten<sup>5</sup>（一定）同义，但是noŋ<sup>5</sup>还有“要，想要”的意思，如moŋ<sup>2</sup> noŋ<sup>5</sup> ta<sup>2</sup>（你要来）。“一定”借进来后常与noŋ<sup>5</sup>连用。如moŋ<sup>2</sup> zi<sup>2</sup> ten<sup>5</sup> noŋ<sup>5</sup> ta<sup>2</sup>（你一定要来），确定了noŋ<sup>5</sup>的“必须”这一意义。

在介词“比”（pi<sup>2</sup>）借来之前，黔东南苗语的比较句是：①  
N<sub>1</sub>/Np<sub>1</sub> + A + əhaŋ<sup>5</sup>/fa<sup>5</sup> + N<sub>2</sub>/Np<sub>2</sub>（əhaŋ<sup>5</sup>/fa<sup>5</sup>超过）。如：  
moŋ<sup>2</sup> xhi<sup>1</sup> əhaŋ<sup>5</sup> vi<sup>4</sup>。你比我高。

你 高 过 我

le<sup>1</sup>noŋ<sup>3</sup>yü<sup>5</sup>əhaŋ<sup>5</sup>le<sup>1</sup>ε<sup>1</sup>。这个比那个好。

这个 好 过 那个

受汉语影响之后则有另外一种形式。如：

N<sub>1</sub>/Np<sub>1</sub> + pi<sup>2</sup> + N<sub>2</sub>/Np<sub>2</sub> + A

moŋ<sup>2</sup> pi<sup>2</sup> vi<sup>1</sup> xhi<sup>1</sup>。

你 比 我 高

le<sup>2</sup> noŋ<sup>3</sup> pi<sup>2</sup> le<sup>1</sup>ε<sup>1</sup> yü<sup>5</sup>。

这个 比 那个 好

黔东南苗语原来的介词kaŋ<sup>4</sup>（从）多局限于指“地点的移动”。如：

kaŋ<sup>4</sup> phi<sup>5</sup>noŋ<sup>3</sup> moŋ<sup>4</sup>。从这边走。

从 这边 走

kaŋ<sup>4</sup> haŋ<sup>3</sup>tei<sup>6</sup> ta<sup>2</sup>? 从哪儿来?

从 哪儿 来

而借词tshoŋ<sup>8</sup>（从）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弥补kaŋ<sup>4</sup>还未具有的意义。如：

tshoŋ<sup>8</sup> moŋ<sup>2</sup> ta<sup>2</sup>lei<sup>5</sup> so<sup>8</sup> tsa<sup>8</sup>noŋ<sup>3</sup>。

从 你 来 到 到 现在

① 苗瑶语许多语言都如此，只是形容词之后的补语用词不同。

(自从你来到以后到现在)

tshoŋ<sup>8</sup> a<sup>2</sup> pu<sup>1</sup>. 从来不知道。

从 不 知

### 三、汉语借词的语音分布、 变化及新老借词的时间界限

借词中的音译式最多，音译借词一般是借出语与借入语的词汇的语音相同或相近。借用时语音大多数相同，只有少数因为借入语语音系统的局限而被“整合”，把借入语的某一类音归入相近的语音中。现在看起来，借入语和借出语之间相差较大，因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另外，如果借词来得太多，往往会迫使借入语突破原来的语音规则，增加出新的规则。

#### (一) 增加音位

苗语支语言的声母比韵母多，汉语新借词使苗语支语言增加了一些韵母。如：

黔东南苗语 au、ai、ue、uai、ui、un、uaŋ

湘西苗语 en、in

布努语 in、on、vn、uaŋ、l

畲语 it、et、ut、ak、uk

黔东南苗语中的汉语老借词被纳入固有语音规则，送气声母音节只出现在阴类调。如果有汉语阳类调的词借入，则让它们变成不送气声母音节，如tɕi<sup>2</sup>骑、to<sup>2</sup>驮、pa<sup>2</sup>排、ta<sup>3</sup>台（桌子）、toŋ<sup>2</sup>筒、tɕa<sup>2</sup>茄、tɕen<sup>2</sup>to<sup>2</sup>拳头、tɕu<sup>2</sup>桥。也可以认为是仅仅是浊音清化。而新借词则突破了这种规则，送气声母的音节也可以分布在阳类调中，如tɕhəu<sup>8</sup>球、tɕhen<sup>2</sup>请、tɕhi<sup>2</sup>旗、tshaŋ<sup>8</sup>（“常”，人名）、khu<sup>2</sup>（辛）苦、phaŋ<sup>2</sup>（轻轻碰）。

#### (二) 舌根音变小舌音

有一部分汉语借词声母原来是舌根音，借入苗语之后变成小舌音声母。如：

汉语	黔东南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鸡	qei <sup>1</sup>	qa <sup>1</sup>	qai <sup>1</sup>
甘	qaŋ <sup>1</sup>	—	qaŋ <sup>1</sup>
孔	qhaŋ <sup>3</sup>	—	qhau <sup>3</sup>
客	qha <sup>5</sup>	qha <sup>5</sup>	qhua <sup>5</sup>
鸽	qo <sup>1</sup>	Nqo <sup>1</sup>	Nqua <sup>1</sup>
价	qa <sup>5</sup>	Nqa <sup>5</sup>	Nqe <sup>5</sup>
渴	—	Nqhe <sup>7</sup>	Nqhe <sup>7</sup>
下	ŋa <sup>4</sup>	—	Nqhe <sup>4</sup>

王辅世构拟的古苗语语音有小舌音声母。如\*q(鸡母)、\*qh(客母)、\*G(叫母)、\*Nq(鸽母)、\*Nqh(渴母)、\*NG(肉母)等。①为解释借词的这种现象，李永燧甚至认为上古汉语有小舌音，后来并到见系声母中去了。②

我们认为古苗语没有小舌音，因为瑶语以及与苗语较近的布努语、畲语也没有。虽然苗语有小舌音声母，但有些汉语“见”母字借入苗语后也分布在舌根音声母中。如：

汉语	黔东南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举	ki <sup>3</sup>	—	ku <sup>3</sup>
斤	tʂaŋ <sup>1</sup>	kaŋ <sup>1</sup>	ki <sup>3</sup>
金	tʂen <sup>1</sup>	ʃe <sup>1</sup>	ko <sup>1</sup>

更古的苗语没有小舌音，后来的小舌音是由舌根音变化而来的，这些词进入苗语之后错过了由舌根音向小舌音变化的机会。另外，有些舌根音词借入苗语后也没有全部变为小舌音。如：

①《苗瑶语的声类和韵类》，《民族语文》，1980.1。

②《古汉语有小舌音》，《中国语文》1990.3。

汉语	黔东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敢	qaŋ <sup>3</sup>	(ce <sup>5</sup> )	kaŋ <sup>3</sup>
街	qa <sup>1</sup>	ca <sup>1</sup>	ka <sup>1</sup>
估	qəu <sup>3</sup>	(ku <sup>5</sup> )	ku <sup>3</sup>

尤其是在黔东苗语中，汉语借词舌根音变为小舌音的现象更为突出，如：叫化子 qəu<sup>6</sup>fha<sup>5</sup>、架（桥）qa<sup>5</sup>、讲qaŋ<sup>3</sup>、够qo<sup>5</sup>、告（状）qo<sup>6</sup>、靠椅qo<sup>1</sup>zi<sup>4</sup>、雇qəu<sup>5</sup>。

### （三）汉语来母和苗瑶语的z-、ɣ-、z-、ŋ-

汉语来母字借入苗瑶语后只有在瑶语一些方言中读l-，在苗语支语言则读为ɣ-、z-、z-、ŋ-。如：

汉语	黔东	湘西	川黔滇	布努语	畲语	瑶语
龙	ɣoŋ <sup>3</sup>	zoŋ <sup>2</sup>	zaŋ <sup>2</sup>	ɣoŋ <sup>3</sup>	ŋuŋ <sup>2</sup>	liŋ <sup>2</sup>
力	ɣəu <sup>6</sup>	zo <sup>6</sup>	zo <sup>6</sup>	—	—	—
利(锐)	ɣa <sup>6</sup>	za <sup>6</sup>	zua <sup>6</sup>	—	ŋa <sup>4</sup>	lai <sup>6</sup>
梨	ɣa <sup>2</sup>	za <sup>2</sup>	zua <sup>2</sup>	li <sup>2</sup>	—	lai <sup>2</sup>
里(村)	ɣaŋ <sup>4</sup>	zaŋ <sup>4</sup>	zau <sup>4</sup>	—	zaŋ <sup>4</sup>	laŋ <sup>4</sup>
廩(仓)	zoŋ <sup>4</sup>	ze <sup>4</sup>	zo <sup>4</sup>	—	—	laam <sup>4</sup>

古苗语中有\*l-（老母）、\*ʔl（短母），为什么来母字在苗语中不读l呢？因此有人认为是苗汉同源词而不是借汉语词。我们认为这是借词，因为有些语言并未借这些词，如布努语“利（锐）”是ntse<sup>5</sup>、畲语的“力”是ma<sup>3</sup>ŋv<sup>3</sup>、瑶语是tʃha<sup>7</sup>，在黔东苗语中，上述词还有固词说法。如：龙en<sup>5</sup>、力ljaŋ<sup>4</sup>（川黔滇苗语也有tlaŋ<sup>4</sup>）村寨faŋ<sup>1</sup>、谷栏la<sup>5</sup>，等等。另外，古汉语“来”母是否就是读l-呢？我们发现，古汉语“来”母实际上有一些是类似\*kl-\*ŋl-等的复辅音，因此借入苗瑶语之后，有的读l-，有的则保留前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本书第一章的有关讨论。

### （四）心母\*s和清母\*tsh在黔东苗语中变为sh

中古汉语心母、清母字借入黔东苗语后声母变l为sh-，也是

进入苗语后才随苗语的变化而变化的。原来它们进入苗语时也分布在\*s（送母）、\*tsh（千母）中，后来苗语的\*s、\*tsh受到其他声母变化的排挤才变为sh。

在黔东苗语中，古苗语\*ntsh > tsh，而tsh排挤\*tsh，使\*tsh变成sh。如：

	黔东苗语	川黔滇苗语
陡	shoŋ <sup>1</sup>	ntshoŋ <sup>1</sup>
干净	sha <sup>1</sup>	—
粗	sha <sup>1</sup>	ntshi <sup>1</sup>
米	she <sup>3</sup>	tsho <sup>3</sup>
骨头	shoŋ <sup>3</sup>	tshoŋ <sup>3</sup>

汉语借词的声母\*tsh > sh的例子如：千疮shaŋ<sup>1</sup>、漆shei<sup>7</sup>、锉错shu<sup>6</sup>、擦sha<sup>1</sup>。

古苗语的\*dz和\*nts在黔东苗语中变s，排挤\*s，使\*s变sh。如：

	黔东苗语	川黔滇苗语
洗涮	sa <sup>3</sup>	ntsua <sup>3</sup>
早	so <sup>3</sup>	ntso <sup>3</sup>
到达	so <sup>6</sup>	tso <sup>6</sup>
会	su <sup>2</sup>	tseu <sup>2</sup>

汉语借词的声母\*s > sh的例子如：伤（口）shaŋ<sup>1</sup>、伞锡shaŋ<sup>6</sup>、信骗蒜算shen<sup>6</sup>、蓑硝销sho<sup>1</sup>、错shu<sup>3</sup>、送shoŋ<sup>6</sup>。

### （五）声调的变化

早期汉语借词的声调在苗瑶语中基本上是平、上、去、入的阴阳对应，例外较少。如（黔东苗语）：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tʂen <sup>1</sup>	ni <sup>2</sup>	to <sup>3</sup>	taŋ <sup>4</sup>	the <sup>5</sup>	ten <sup>6</sup>	shei <sup>7</sup>	təu <sup>8</sup>
金	银	斗	等	炭	缎	漆	豆

例外的情况有几种如：

1. 同一声调的阳变阴（以黔东南苗语为例）。

阳平→阴平 ha<sup>1</sup>鞋 hu<sup>1</sup>壶

阳去→阴去 ha<sup>5</sup>亥 ɣhu<sup>5</sup>受

阳入→阴入 ɣhu<sup>7</sup>赎

2. 阴类调或阳类调内部转换（以黔东南苗语为例）：①

阴上→阴去 shaŋ<sup>5</sup>伞

阳上→阳入 taŋ<sup>5</sup>糖

阳上→阳平 ŋu<sup>2</sup>午（地支）

3. 入声的-k尾消失后在苗语支语言中转入去声。如瑶语“百”是pe<sup>7</sup>，而在苗语支中却是：pa<sup>5</sup>（黔东南苗语、湘西苗语）、pua<sup>5</sup>（川黔滇苗语）、pai<sup>5</sup>（布努语）、pa<sup>5</sup>（畲语）。

4. 湘西苗语的阴入、阳入在自身变化中与阴上、阳上合并，因此汉语借词的阴入和阳入分别与阴上和阳上合并，如tshei<sup>3</sup>漆、ŋa<sup>4</sup>隘。

5. 畲语在失落-p、-t、k之后，因为又借入汉语客家方言带-k、-t<(-p也变为t)的入声词，而使畲语入声在向去声靠拢时，全部排挤阳去声调，使阳去并入阳上，②让客家方言入声调借词并入原来的入声。如：

phat<sup>7</sup>拔（刀） sut<sup>7</sup>撒<sup>7</sup>（网）

sak<sup>8</sup>肾 nuk<sup>8</sup>鹿

畲语中老借词由入声并到阳去，阳去又并到阳上。如：

入声并阳去

oi<sup>8</sup>鸭 tshe<sup>8</sup>漆 kwei<sup>8</sup>狭

阳去并阳上

m<sup>8</sup>卖 miaŋ<sup>8</sup>命 vu<sup>8</sup>芋

6. 贵州凯里老君寨（罗伯河）苗语只有三个声调，因此汉语借词的平、上也不分阴阳，仍然分布在平上两个声调上，而入声

① 《苗语中的汉语借词》。

② 《畲语简志》第23—24页。

与去声分布在去声调内。如：

平	斤 tʂen <sup>31</sup>	千 tʂhen <sup>31</sup>	铜 ɔoŋ <sup>31</sup>	银 ɲen <sup>31</sup>
上	酒 tʂo <sup>56</sup>	买 ma <sup>56</sup>	等 ɔoŋ <sup>56</sup>	老 lau <sup>56</sup>
去	送 soŋ <sup>24</sup>	炭 thaŋ <sup>24</sup>	万 waŋ <sup>24</sup>	匠 zaŋ <sup>24</sup>
(入)	客 qhei <sup>24</sup>	百 pi <sup>24</sup>	凿 zu <sup>24</sup>	麦 mu <sup>24</sup>

#### (六) 新老借词的时间界线

苗瑶语中的汉语新借词的声调，除畲语因为从客家方言借用而在声调上特殊之外，其他语言和方言都与西南官话有关系，声调都只有四个，不过由于借入语的声调调值不同，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在调类上的分布不太一致。如：

汉语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黔东南苗语	阴平	阳入	阳平	阴去
湘西苗语	阴上	阳平/阳入	阴去	阴平
川黔滇苗语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入
瑶语	阴平	阳平	阴上	阴去
布努语	阴平(1′)	阳入	阴上(3′)	阴平(2′)

从新老借词声调的分布的不同，以及声调、韵母的一些变化，并参考汉语的发展史，我们认为苗瑶语（除畲语外）新老借词的时间界线约在明代，即在汉语北方话派三声完成，只有四个声调，尤其是西南官话入声并入阳平之后。在西南官话中阳平调值为31，而汉语中属于阳平字的“（贡）粮”借入黔东南苗语虽然分布在阳平，但声调却是42，与老借词的“骑” tʂi<sup>2</sup>、“驮” to<sup>2</sup>一样，同属于一个时期的语音特征。“粮”借入黔东南苗语不会早于贵州行省（明代）之前。在这之前黔东南苗族地区属“化外”，不入户籍，不纳赋税。而大约是在清代才借入的“（兵）勇”属于上声字，西南官调值为42，而在黔东南苗语中也分布在42调的阳平调内，不再象老借词那样各布在去声调了。这是词借调的语音特点。

结束语 苗瑶语民族的先民从黄河、长江之间的地区南迁到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周围，约在汉晋时出现在今天的湖南西部，属于“武陵蛮”。那时苗瑶语民族由于分布较为集中，影响苗瑶语的汉语也仅仅是一种方言。而从那时起，畚族向东迁徙，畚语受到客家方言的影响，而苗语、布努语和瑶语主要受到西南官话影响。瑶语部分方言还受粤语影响。虽然如此，各种方言和语言由于分布地区不同，杂居或聚居情况不同，因此受到汉语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同时，汉语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一些地区如布努语原来通壮语接受汉语借词，现在则直接受汉语影响了。

## 第四节 汉语对满一通古斯语的影响

### 一、社会、语言概况

中国境内的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共有五种，即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其中满语、锡伯语、赫哲语属满语支，鄂伦春语、鄂温克语属通古斯语支。五个民族都生活在祖国的北方，在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五种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因此在语言方面也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如有大量的同源词，有许多相同的语音特点，都属于使用后加成分的粘着型语言等。

长期以来，五个民族在与汉族的接触中，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深受汉族的影响，在语言方面也是如此。但是，由于每个民族乃至一个民族的若干团体，都因社会发展、居住环境、聚居程度，人口多寡、接触史长短、文化背景、城乡差别等因素的不同，其语言受汉语影响而引起的变异程度也不同。有的民族，如满族和赫哲族，除少数人尚能用本民族语和汉语双语交流外，大多数人已转用汉语。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中的绝大多数人，现在正处在兼用的双语时期（有的还兼用多语），

可是，生活在东北三省的锡伯族，却早已转用汉语了。其差异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1. 满族：现有人口近1,000万。主要居住在我国东北三省、北京、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市自治区，此外，成都、西安、广州、天津等许多大中城市也有居住。满族原称满洲，出现在明末，1635年正式定为满洲。其先人为女真人。满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即满语满文。但是，现在除黑龙江省尚有少量满族人能够用满语进行交流外，其他满族人均先后转用汉语；生活在内蒙古的极少满族人，还可以用蒙古语交际。至于通满文的人，现已很难找到。

我国满—通古斯语族的五个民族中，最先与汉族广泛接触的是满族。满族贵族曾在中国建立过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1644年满族入关前，均居住在东北三省，主要用满语交际。入关后，相当数量的满族人分散到全国各地，与汉族或其他民族形成小聚居、大杂居的局面。

2. 锡伯族：现有人口17万多。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锡伯”这一族称的出现，在16世纪末。对其族源有几种说法，国内学者大都认为是鲜卑人的后裔。传说，锡伯族先人曾有过文字，语言是“吉甫西”语。<sup>①</sup>清初，大部分锡伯人居住在嫩江、松花江流域，并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八旗。1692年，清政府将锡伯人从蒙古八旗内抽出，编设牛录（后亦称佐领），分归满洲八旗，并驻防齐齐哈尔等地。此后，又陆续南迁至沈阳等地。1764年，清政府又从沈阳等地抽调锡伯官兵1000多人，连同眷属，分批迁至新疆伊犁。他们就是今天新疆锡伯族的祖先。现在主要居住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及霍城、巩留、尼勒克等县。人口约占全部锡伯族的三分之一强。

<sup>①</sup>嵇南、吴克尧，《锡伯族》，民族出版社，1990年。

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后，开始改习满语满文，<sup>①</sup>逐渐放弃“吉甫西”语。在今天的锡伯语里，仍然有一些“吉甫西”语的词语遗存。关于锡伯语锡伯文与满语满文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锡伯语与满语没有太多的差异，是清代满语的发展和继续，可以说是满语的一个方言；锡伯文就是满文，只不过有一些不妨碍认读的小小改革。<sup>②</sup>留居在东北本土的锡伯人，早已转用汉语汉文。迁往新疆的锡伯人后裔，今天仍然使用锡伯语锡伯文。他们极富语言才能，除老年人外，很多锡伯人不仅能使用锡伯语、汉语，而且还兼通维吾尔、哈萨克等语言。

3. 赫哲族：现有人口4,000多。主要聚居在黑龙江省境内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同江县街津口两个赫哲族乡和饶河县西林子乡的四排村。“赫哲”这一族称最早出现于清初。其先人为“野人”女真。据传说，赫哲族的祖先是住在北海边的，后来才迁到三江流域。<sup>③</sup>但是，关于赫哲族的源流和族体的形成，学术界的意见尚未统一。赫哲族有自己的语言，并有方言差异，没有文字。关于赫哲族的语言，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混合语，“以本来的赫哲语为主干，加入满洲语，蒙古语，古亚洲语及一小部分汉语而成”。<sup>④</sup>

清初，清统治者在征服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之后，曾将一部分赫哲人迁徙至宁古塔、沈阳、北京等地。1714年赫哲人被编为四旗，从此迁徙更加频繁，居住更加分散。有一部分人加入了满族共同体。有清一代，清政府对赫哲地区的各种公文，多为满文，并曾在大屯、嘎尔当等地设立学校，教授赫哲人满语满文。<sup>⑤</sup>

<sup>①</sup>嵇南、吴克尧：《锡伯族》。

<sup>②</sup>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古籍办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清代满文古籍而且多标记为“锡伯文”。可以看出，有关人士是将满文和锡伯文看成是一回事的。

<sup>③</sup>刘忠波：《赫哲人》，民族出版社，1981年。

<sup>④</sup>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84年。

<sup>⑤</sup>陈伯霖：《黑省满族移民旗屯建制述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2期。

所以，有相当多的赫哲人掌握了满语满文，在很多场合均使用满文。直到现在，还有极少数老人能背诵满文“十二字头”。由于赫哲族长期与汉族人杂居，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把汉语汉文作为日常交际工具，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民族语，而且都是年纪大的老人。<sup>①</sup>

4. 鄂伦春族：现有人口近7,000人。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自治区、布特哈旗、莫力达瓦旗；分布于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则聚居于呼玛县、逊克县、爱辉县。“鄂伦春”这一族称，最早出现在清代初期的文献中，但关于其族源及早期历史，目前尚众说纷纭。清初自1683年起，鄂伦春人就陆续被编入满洲的旗佐组织。1689年又设立布特哈（打牲）总管衙门，专门管理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的事务。此后，清政府对鄂伦春人的统治，曾几经变动。<sup>②</sup>

鄂伦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清代至民国年间，由于“鄂伦春人向习满文为宗旨”，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掌握满语满文，行文或记帐等均用满文，并以满语满文作为与外界的交际工具。直到民国年间，鄂伦春人仍然主要通用满语满文。<sup>③</sup>鄂伦春人学习满语满文，最先是从达斡尔人“安达”（朋友）和商人那里开始的。另外，清政府也大力向鄂伦春等民族传播满族文化，让他们学习“满洲礼法”和满语满文。开设学校是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康熙和乾隆朝时，清政府在黑龙江省的一些大城市开设学校，向鄂伦春等民族的子弟教授满语满文，并且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实行。鄂伦春族第一批文化之士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此后，鄂伦春人世代相传，满语满文就是这样传授下来的，直至民国。<sup>④</sup>

现在，聚居地区的鄂伦春人大部分都使用本民族语言，和其他民族交往时，则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如汉语、达斡尔语等。

① 安俊：《赫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②③ 李瑛：《鄂伦春族教育史稿》，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④ 李瑛：《鄂伦春族教育史稿》。

来往公文和书信，都使用汉文。<sup>①</sup>

5. 鄂温克族：现有人口26,000人。现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左旗。此外，黑龙江省讷河县也有少量鄂温克人。鄂温克族的先人最早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后来逐渐向东发展，其中的一支迁到外兴安岭南北的广袤山林中，这就是今天的鄂温克族。

清代顺治至康熙年间，清政府陆续将鄂温克人迁至大兴安岭嫩江支流的沿岸居住，并组成五个“阿巴”（围场），成为“布特哈打牲部”的主体。1691年清政府将布特哈八个牛录（佐领）的鄂温克等族的500名兵丁及其家属迁往爱辉，并将布特哈打牲鄂温克人编为五个旗。1732年清政府将布特哈打牲部的1,600多名鄂温克士兵移驻呼伦贝尔大草原，与部分达斡尔和鄂伦春人编成五十个牛录（佐领），分隶八旗。<sup>②</sup>

鄂温克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分为三个方言。因居住地的不同，有的还兼用蒙古语、达斡尔语、汉语，没有文字。自治地方的公文、信件一般使用蒙古文或汉文。<sup>③</sup>清代，由于清政府设立学堂教授满语满文，以及鄂温克人与满族人的频繁接触，不少的鄂温克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多通满语满文。政府的各种公文和命令，多用满文，有时也用蒙古文，直至20世纪30年代。

通过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看出，中国满一通古斯语族的五个民族，有如下几个特点：族称出现较晚，大都在明末清初。有的民族的族源和早期历史，目前尚无定论；生活地域基本相同，大都集中在今天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东北部；除满族外，其他四个民族的人口都比较少；满族有语言文字，其他四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清初，先后被编入八旗或旗佐组织；锡伯

① 胡增益：《鄂伦春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② 吕光天：《鄂温克族》，民族出版社，1983年。

③ 胡增益、朝克：《鄂温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族在被编入八旗之后，逐渐转用满语满文，放弃了原有的语言文字。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三个民族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兼通满语满文，在某种意义上说，清代至民国初年，满语满文已成为他们的共通的语言和文字；与汉族相比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文化等，仍处在后进的阶段，有的民族甚至还处在较为原始的氏族部落时期；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

以上特点决定了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个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必然要受到汉族的深刻影响，而语言则是首当其冲的。

下面，我们分词汇、语音、语法三个方面予以简单介绍。

## 二、词汇方面的影响

在现代满一通古斯语族的五种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尤其是反映当代社会发展和新科学技术的词汇。各语言的汉语借词都分为老借词（或称早期借词）和新借词（或称近期借词）两类。

（一）老借词 所谓老借词是指在清代通过满语满文借入的汉语词汇。清初，满族贵族先后征服了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并先后将他们纳入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清朝入关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之后，又对东北三省实施了“封禁”政策，禁止汉族人进入东北三省。“封禁政策”虽然不是很成功，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延缓了汉族人较早地大量地涌入东北地区。这样，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首先广泛接触的是满族，加上这些民族与满族有着许多的共同特征，因此，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不可能不首先受到满族的影响。锡伯族在18世纪转用满语满文，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满一通古斯语族的五个民族中，最先与汉族频繁交流、大面积接触的是满族，特别是在满族形成和发展时期，尤为如此。在早期的满文文献中，就有很多的汉语借词，甚至官名等一度全部借用明朝的。而满语满文在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的通用中，大量的汉语借词又借助满语满文渗透入这些民族的语言中。满语满文不仅是满族文化的传播者，而且也是汉族文化传播的媒介。这些老借词的共同特点，是大都保留了清代书面语的语音面貌。例如：①

汉语	满文	锡伯语	赫哲语	鄂伦春语	鄂温克语
麦子	maise	mais	maisə	maiʃa	majfə
稻(米)	handu	ʎandu	hatapələ②	kandu	xantu
蒜	suwanda	suanda	suanda	suanda	sənda
灯	dengjan	dəŋdʒən	——	dəŋdʒən	dəŋdʒən
糖	ʃatan	satən	ʃatən	ʃatan	ʃatan
汉人	nikan	ikan	niqan	nikan	niʎan
木匠	mujan	mudʒan	mo faxəi③	mudʒan	mudʒan
枪	miaocan	miautʃun	miaoʃan	miwtʃaan	miʃan
工资	caliyan	tʃalin	gundzi	tʃalin	salin
斤	gin	gin	gin	gin	gin

通过满语满文输入汉语借词的，不仅仅是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其他北方民族如达斡尔语、蒙古语、朝鲜语等语言中，也有

① 本文资料凡引自安俊《赫哲语简志》、胡增益：《鄂伦春语简志》、胡增益、朝克：《鄂温克语简志》、李树兰、仲谦：《锡伯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者，以后均不再注明。若再引其他文章者，另加注释。满文用罗马字转写，现代满语用国际音标标音。

② 见《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赫哲的语言》，hatapələ系合成词，pələ义为米。

③ mofaxəi为合成词，mo为木头，faxəi为匠人。满文中亦有此词，为moofaksi，与借词mujan同时使用。在赫哲语中有wadʒan（瓦匠）一词，与满文同。可以想见，赫哲语早期借词中也会有mudʒan一词。

此种现象。老借词在满一通古斯语族各语言中，因各种因素的不同，而保留的多少也不平衡，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总的来说，后来越是与汉语接触早、接触面大，受汉语影响大的语言中，保留的老借词越少。如上表中的“工资”一词，赫哲语就抛弃了老借词，而直接音借现代汉语的词了。

(二) 新借词 是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语言与汉语接触后直接借入的汉语词。清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清末民初，随着大量汉族人涌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满一通古斯语族中的大部分民族，直接和汉族发生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解放后的40年来，这种联系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有些地区已经打破了过去少数民族聚居的格局，逐渐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局面。这种形势的出现和发展，表现在语言上，首先是掌握民族语和汉语双语的少数民族人数猛增，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中的双语人大量增加。有些民族或地区，已经开始或将要完成由双语向单一汉语的转化。如满族和赫哲族。其次，从汉语输入借词，不再经过满语满文或别的民族语言，而是直接从汉语输入。原有的通过满语满文借入的汉语词，已大大减少，被新的口语借词所代替。再次，一些民族语中出现固有词与汉语词并用的现象，甚至有的民族语的固有词已大量减少。

在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满语是受汉语影响最为典型的语言。有清一代将满语定为“国语”，将满文定为“国书”。清朝前、中期满语满文之使用十分广泛，不仅满族人自己用，好多汉族人和北方少数民族也在使用，国内重要的官方文件和外交方面也多使用，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共通语。然而，曾几何时，满语满文急速衰落，到清末民初，绝大多数满族人已放弃满语，而转用汉语，只有少数人可以用满语交流。五个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满族人口最多，入关后因八旗驻防，有一部分人分散聚居在全国各地，这是满语文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留居在东北本土的满族人是多数，而且相对来说居住

比较集中，基本上是聚居，他们的语言文字为什么也很快地消失了呢？类似的情况还有锡伯族。西迁的锡伯族集中地聚居在伊犁河畔，分设八牛录（佐领）统辖，外界影响较小，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完整地保留并发展了满语满文。留在东北本土的锡伯族却早已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早期，满语中就借入了大量的汉语词，这些借词多是按照满语语音特点和构词方式借来的。在现代满语中，大多数早期借词已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直接音借的办法。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新借词的借入方式主要有四种：

1. 音译借词。主要是直接译音汉语借词。① 例如：

汉语	满语	锡伯语	赫哲语	鄂伦春语	鄂温克语	
书记	ʂutʂei	ʂudzi	ʂudzi	ʂuudzi	ʂuudzi	
干部	kampu	gampu	gampu	gampu	xaatar	
电视	tianʂɿ	dianʂi	dianʂi	dEENʂi	dEEʂi	
电话	tianxua	diauXua	djanXua	deenxua	dEENxua	
火车	java	sətʂən	χotʂə	χotʂə	təgətʂərgən	ʂəltəggən
蜡烛	la	la	ajan	laa	laa	
工人	vəili	vəiləi	guŋzən	guŋrən	adʒilʂin	
	vəilirə					
	niama					
立刻	tləiu	nərxind	maʂan	maaʂin	əttoʂʂi	
(马上)						
还(是)	xai	——	xai	xajʂi	——	

2. 半音译半义译词。主要指由本民族语和汉语或由汉语和本民族语结合构成的合成词，其中的汉语采用音译方法。例如：

① 表中的满语指现代满语，本文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的材料。表中非直接借词，有的保留了固有词，如赫哲词的ajan；有的是外来词，如鄂温克语的xaatar（俄语）；有的是新造词，如满语的vəili vəilirə niama。

鄂温克语 gaŋ ʃəl 钢铁 tuup dʒug 土房  
钢 铁 土 坯 房

nifuxun ʃiiʃə 小汽车  
小 汽 车

锡伯语 dzi ʃəli 肌肉 vans ɔxtw 丸药  
肌 肉 丸 药

满语 xuɑzɿn p'ai 纸牌 la pia 腊月  
纸 牌 腊 月

pai soki 白菜 tɕ'ivən xəi 吐沫盒  
白 菜 吐 沫 盒

3. 音译加注。此类词在音译之后用民族语加以说明。例如：

鄂温克语 booʃar nəgə 菠菜 mantuu owon 馒头  
菠 菜 菜 馒 头 饼

tajʃan uré 泰山 baaf tæggen 公共汽车  
泰 山 山 公 共 汽 车 车

锡伯语 tan tɕivəŋ 痰 mantu əvən 馒头  
痰 吐 沫 馒 头 饼 子

4. 音译加附加成分。此类词主要是动词。前边音译部分作为词干，词干和词尾之间大都要加-la、-lə、-lu等附加成分。例如：

锡伯语 fənʃiləm (分析) baulum (包工、包产)

fazələm (发射) baudzələm (爆炸)

鄂伦春语 ʃəŋtʃaalaa- (生产) ʃuanlaa- (选择)

赫哲语 liŋdole- (领导) biaoʃaŋla- (表扬)

鄂温克语 dʒaalaraŋ (爆炸) pipinləreŋ (批评)

满语 tunləmie (墩) p'ianləmie (骗)

通过上述例词可以看出，从汉语借入的词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基本词汇少，新词术语多；实词中动词和名词多，虚词少；鄂伦春和鄂温克语的借词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语音面貌，其他语

言多是直接音借；由于各民族所处的条件不同，借词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同一个词有的语言保留了固有词，有的还保留了外来词（指国外）。

上面所举例子只反映一般情况。在实际运用中，因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因素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有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以年龄为例，一般老年人使用固有的词多，青年人使用借词的多，中年人则介乎二者之间。

通述上面的分析，如果把老、新借词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第一个阶段的老借词特点是，借词大体上保留了民族语的语音面貌；第二个阶段的新借词特点，则多是直接借词。

### 三、语音方面的影响

中国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中，引进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其结果是导致原有语音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引进新的音位，其音值基本上与被借语言的语音相同；其二是增加了一些音位（专门用来拼写借词），这些音位的音值虽然不同于被借语言的语音，但在发音方法或发音部位上发生变化，使其更接近被借语言的语音面貌。有时也用原有的音位来替代借词中原语言没有的语音。

从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满语支三种语言新借词的语音，多保留了被借语言的语音面貌；通古斯语支二种语言的新借词，是经过了一番加工改造的，多保留原有语音的面貌。两个语支语言汉语借词的不平衡性，反映了两个语支语言与汉语接触时间早晚的不同。换句话说，由于满语支语言（特别是满语）与汉语接触的历史相当久远，它们已经经历了通古斯语支还没有经历过的历史阶段，即借词的第一个阶段，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差异。后面要介绍的鄂温克语的一些变化，可作例证。

满语满文衰落之快，除了本民族自身的因素外，还有汉语深

刻影响的原因。满族及其先人女真人在明代末年，就与汉族发生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接触。满族是以明代南迁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为主体，融合了汉族、蒙古族、朝鲜族以及东北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形成的。除满洲八旗外，并于17世纪上半叶分别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足见汉族对满族的形成起过重大的作用。清人萨英额所著《吉林外记》卷三中载：“吉林本为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近数十年（18世纪后期），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有这么多的汉族人加入满族共同体，又有汉语这个底层起作用，满族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放弃满语转用汉语，其速度之快是可想而知的。

1632年达海改进满文时，从文字上所反映的语音来看，舌尖后元音 $\text{ɮ}$ 已经出现在辅音 $\text{ʃ}$ 后了。改进后的满文，不仅增加了三个辅音 $\text{ts}$ 、 $\text{ts}'$ 、 $\text{ʒ}$ ，而且在辅音 $\text{ts}$ 、 $\text{ts}'$ 、 $\text{ʃ}$ 后出现了舌尖前元音 $\text{i}$ ，辅音 $\text{ts}$ 、 $\text{ts}'$ 、 $\text{ʃ}$ 、 $\text{ʒ}$ 后全都出现了舌尖后元音 $\text{ɮ}$ ，和汉语完全一致了。可是，在一些老借词中， $\text{s}$ 代替 $\text{ts}$ 的现象一直保留在满文中。例如 $\text{ise}$ （椅子）、 $\text{hūse}$ （胡子）等借词中，不像现代满语中一律为 $\text{tsi}$ 。另外，从改进满文的前一年（1631）的文献《设立六部档》来看，<sup>①</sup>辅音 $\text{s}$ 不仅能代替 $\text{ts}$ ，而且还可以代替 $\text{ts}'$ 、 $\text{ʃ}$ 。由此看来这些借词显然是更早的。不仅如此，满语中许多早期借词，基本上保持着满语原有的语音面貌。<sup>②</sup>这说明，满语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就已经经历了借词保持自己语音面貌的阶段。锡伯族直至17世纪末才开始习用满语满文，他们很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sup>③</sup>至于赫哲语语音是受满语影响，还是后来与汉族直接接触，而发展成为今天的样子呢？由于缺乏材料，现在很难下结论，很可能两种因素都有。下而，再以赫哲语为例，讨论汉语对其之影响。

① 见李光涛、李学智《明清档案有真选辑》（二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三十八之二。

② 参见季永海《论满语中的汉语借词》，载《满语研究》，1985年创刊号。

③ 参见王小虹、郭美兰《锡伯语口语音位系统》，载《满语研究》，1985年创刊号。

赫哲语中汉语借词相当多，这些借词既丰宝了赫哲语的词汇，也引起赫哲语语音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增加了新的音位和音节结构。

1. 增加辅音 $z$ 。如 $zibən$ （日本）， $zili$ （日历）， $məizən$ （媒人）。

2. 出现舌尖元音 $\imath$ 、 $\text{ɨ}$ 。赫哲语中虽然有辅音 $dz$ 、 $ts$ 、 $s$ 、 $dz$ 、 $tʂ$ 、 $ʂ$ 等音位，但并没有和舌尖元音 $\imath$ 、 $\text{ɨ}$ 结合的音节形式。现在出现了 $dz$ 、 $ts$ 、 $s$ 和 $\imath$ ， $dz$ 、 $tʂ$ 、 $ʂ$ 和 $\text{ɨ}$ 结合的音节形式。如 $sidzi$  [ $s\imath tʂi$ ]（司机）， $tʂidzi$  [ $tʂ' \imath tʂi$ ]（尺子）， $ʂi\imath iŋlə-$  [ $ʂ\imath iŋlə-$ ]（实行）， $tsiwan$  [ $tʂ' \imath wan$ ]（磁碗）

3. 增加 $uo$ 、 $ya$ 、 $yə$ 等复合元音。如 $dzunguo$ （中国）， $yan\text{ʂuai}$ （元帅）， $yəbiŋ$ （月饼）。

赫哲语汉语借词大部分保留了汉语音面貌，例如 $dzəŋ\chi ao$ （正好）， $dzəŋtʂə$ （政策）， $dan\chi an$ （党员）， $si\chi aŋ$ （思想）。

另外，从1929年凌纯声先生调查赫哲语（尽管有些失误）至1982年安俊先生调查赫哲语，这50年间音位系统所发生的变化，证明了借词分两个阶段是正确的。

通古斯语支的两种语言，汉语借词多是按自己的语音特点借入的。如鄂伦春语的 $\phi$ 作为独立的音位，只出现在汉语借词里。 $p$ 在早期汉语借词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f$ ，如 $puu$ 伏（天）。但随着汉语借词的不断增多，也发生了借词语音向汉语靠拢的变化，鄂温克语最能说明问题。

鄂温克语受汉语影响在语音方面发生了以下的变化：①

1. 出现了送气唇齿擦音 $fh$ 和舌尖后擦音 $ʂ$ 。如 $fhəjtʂi$ （飞机）， $kufhəntʂi$ （鼓风机）， $ʂaŋ\chi ai$ （上海）， $ʂəu\text{ʂu}$ （手术）。但这种现象多在青少年与部分中年人的口语中，而老年人和大部分中年人至今仍发不出这两个辅音，习惯地把 $fh$ 和 $ʂ$ 分别发为双

① 朝克：《汉语对鄂温克语的影响》，载《中国民族语文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

唇送气的塞音ph和混合舌叶清擦音ʃ。在鄂温克语中，这两对辅音并不区别词义。

2.增加了复合元音。鄂温克语原来没有复合元音，早期借词均把复合元音读作长元音。随着含有复合元音的汉语借词大量涌入，增加了a<sup>o</sup>、ou、eu、ua、uo、ue等复合元音，这样就改变了老借词的语音特点。现在，青年人或一些中年干部，几乎都能准确地发出汉语的复合元音。如tʃja<sup>o</sup>ʃaŋtʃi（照相机），thu<sup>e</sup>sue（托儿所），xu<sup>e</sup>tʃh<sup>e</sup>tʃaŋ（火车站），xua<sup>ə</sup>ʃaŋt<sup>ə</sup>u（花生豆）。这些复合元音不能当作独立的音节出现在词首。

3.腭化辅音逐渐增多。原来鄂温克语的腭化辅音只接E、E<sub>1</sub>、e、e<sub>1</sub>等元音。由于腭化辅音表示汉语借词中i行、y行韵的介音，而汉语借词的增多，现在腭化辅音后面出现了接a<sub>1</sub>、o<sub>1</sub>、e<sub>1</sub>、e<sub>2</sub>、u<sub>1</sub>、u<sub>2</sub>等元音的情况。例如：

汉语iao为腭化辅音接o<sub>1</sub>或e<sub>1</sub>：

tʃjo,phi胶皮 mje,tʃəŋ 秒针

汉语的iou为腭化辅音接u<sub>1</sub>或u<sub>2</sub>：

ju:tjentʃi邮电局 tʃj<sub>u</sub>:ʃje:球鞋

汉语ia为腭化辅音接a<sub>1</sub>、a<sub>2</sub>或E、E<sub>1</sub>：

tʃEŋpiŋʃjaŋ电冰箱 xuotʃjE:n火箭

汉语的ie为腭化辅音接e、e<sub>1</sub>或E、E<sub>1</sub>：

pje:tʃəŋ别针 tʃhjE:s茄子

汉语的ye为腭化辅音接e、e<sub>1</sub>或E、E<sub>1</sub>：

ʃjewəj 学位 tʃjE:ji决议

由于由元音i、y开头的复合元音在鄂温克语中除了带腭化辅音之外，很大一部分要变为长元音，从而使鄂温克语本身长短元音的对立有了新的内容。

据说在19世纪末叶以前，鄂温克人同其他民族交谈时完全用鄂温克语。那时，汉、蒙古、达斡尔等民族的许多人都会鄂温克语；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鄂温克人同别的民族交际时，

主要用蒙古语和达斡尔语,有时也使用鄂温克语和汉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渐渐转为汉语,说蒙古语和达斡尔语的人慢慢少了起来。现在,在鄂温克族中,老年和中年人约有60%、70%的人,青少年约有80%以上的人会说汉语。有的地方,如额尔古纳左旗、阿荣旗、鄂伦春旗、鄂温克旗南屯镇等地的二十岁以下的人不讲鄂温克语,而只讲汉语了。有的不仅不会说,听的时候也是处在似懂非懂的状态。有这么多的人懂汉语说汉语,距离汉语借词多用直接音译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即使是鄂伦春族,不同的团体因居住环境的不同,有的借用汉语词时已经是直接音译或接近音译了。如生活在黑龙江省逊克县的鄂伦春族中,很多青年人就是这样。

元音和谐是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的共同特点。满一通古斯语族诸语言的元音和谐,有的比较严整,有的不太严整,但基本特征是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词的词干或附加成分中。早期的汉语借词也多顺应这个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汉语词的借入,直接音译借词的增多,再加上其他因素,打乱了原有的元音和谐秩序,而建立了新的和谐规律,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从满语和锡伯语书面语所反映的元音和谐规律来看,最大的特点是阳性元音 $\alpha$ 和阴性元音 $\text{ə}$ 一般不能出现在一个词的词干和附加成分中。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借词中 $\alpha$ 和 $\text{ə}$ 同时出现在一个词中,就是固有词中 $\alpha$ 和 $\text{ə}$ 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词中。例如:

满语书面语	现代满语	汉义
abalambi	avuləmie	狩猎
baita	pait'ə	事
anala	amAlə	然后
banjiha	pantəiyə	生了
wajiha	vətšəyə	完了

锡伯语大体上也是如此。产生这样的变化,使锡伯语的元音

和谐同书面语比较，其规则变得复杂了，并发生了新的组合。

鄂温克语的元音和谐是很严整的，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基本上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词里。以前从汉语借入的复合词，人们为使其适应本民族语言的元音和谐律，采用改变借词中元音的方法。如jo:sok（钥匙），jo:tho（小偷儿）。汉语复合词的大批借入，在复合词中发生了阳性元音与阴性元音在一个词中共存的现象。如tatʃhəjjaŋ（大车箱），xuɔʃəŋtəu（花生豆）。这种使元音和谐受到破坏的情况，不仅使老借词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而且影响到一些固有词，使其也出现了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共存的现象。如在敖鲁古雅方言中，“祖父”一词，中年人发为xəkka，老年人发为xəkka或akha，就是明证。<sup>①</sup>

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满一通古斯语族的五种语言中，有四种语言即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的元音和谐，均发生了原先两个对立的元音，即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混用的现象，似乎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规律性。汉语借词的增多，引起元音和谐的变化，无疑是原因之一。但是，这里边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超音段音位中的轻重音的变化，引起非重读音节的元音弱化，从而使对立的元音混用呢？由于材料不足，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然而，只要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加强跨界民族语言的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 四、语法方面的影响

满一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在长期与汉语的接触中，语法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异。但是，由于与汉语接触的时间、广度、深度等因素的差异，各个语言所受汉语影响程度的大小也不同。同时，五种语言只有满族有文字，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没有

<sup>①</sup> 柯克：《汉语对鄂温克语的影响》。

文字，锡伯族在习用满语满文之前所用的语言和文字，目前还停留在传说阶段，个别的词语遗留对语法的变化的研究无能为力。目前，仅凭现有的资料，还很难对整个语族的语法变异做出令人信服的探讨。

满语受汉语影响在语法方面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如某些语法形式的消失，语序方面的一些变化，引入汉语的“是”等等。<sup>①</sup>此外，在句子类型上也有受汉语影响而引起变化的例子。在满语书面语中，表示“听说……”、“传说……”、“相传……”等一类句子，前边一定要用donjimbi（听）和ulandume gisurembi（传说）等词及其各种类型的变体，后边一定要用sembi（说）及其过去时与其呼应，以表示听说、传说到此为止。现代满语中此种类型已大为改观。试比较下边两个句子：

1. 听说黑龙江冬季特别冷。

书面语 donjihade, sahaliyan muduri ulai tuweri  
听 黑 龙 江 冬  
forgon jaci šahūrun sembi。

季 很 冷

口语 tontsiye ningge, xailongtšiang t'uirī erin  
听 的 黑 龙 江 冬 时

kiak'ə piq'ωn。

很 冷

2. 听说赵家、孟家是从长白山过来的，富家是从松花江一带过来的。

书面语 donjihade, gioro hala i boo jai mengjir  
听 赵 姓 家 和 孟  
haha i boo golmin šanyan alin ci duleme jihe, fuca  
姓 家 长 白 山 从 过 来 富

<sup>①</sup> 季永海、白立元，《三家子村满语与汉语的关系》，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增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研究》，1990年。

hala i boo sunggari ulai emu girin baci jihe sembi.  
姓 家 松花 江 一 带 地方 从 来

口语 kitsirə pə tontšiyə ningə, kiələ ʒaləningə,  
说 听 的 赵 姓 的  
məntšir ʒaləningə ʒiəngin əlin teri tšiyə, futš'a  
孟 姓 的 白 山 从 来 富  
ʒaləningə soŋxua tšiaŋ teri tšiyə.

姓 的 松花 江 从 来

以上两个句子的书面语中,除用donjihade之外,还可以用donji-me、donjihangge等,sembi还可以用sehe等替代。口语中只用tontširə ningə,句末已不用sembi与其呼应。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满语和鄂温克语受汉语影响最大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引进了汉语的判断动词“是”。①满语是ɣl,直接音借;鄂温克语为ʒi,按照自己的语音面貌引入。满语书面语中,判断动词分别用oci或inu,或二者合用,这可能是受汉语影响所致;更多的是不用判断动词,这大约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鄂温克语过去用判断动词pikkhiwi,而现在已很少使用,常常使用借自汉语的ʒi(是)。例如“我是辉河林场的工人”一句话,过去是这种说:

pi bikkhiwi xoj to:n mo:ni pokni kəppəʒiŋ.

我 是 辉 河 的 树 的 地 的 工 人

现在这种说:

pi ʒi xoj do: liŋtʃhaŋni kəppəʒiŋ.

我 是 辉 河 林 场 的 工 人

又如“他是我在北京的儿子”一句话,鄂温克语和满语有以下说法。鄂温克语现在是:

thri ʒi muni pətʃiŋtə pitʃir uth.

他 是 我 的 北 京 在 儿 子

① 朝克:《汉语对鄂温克语的影响》。

鄂温克语过去是：

thari pikkhiwi mini pətʃiŋtu btʃir uth。

他 是 我的 北京 在 儿子

满语书面语按理应有四种说法：

①tere mini beigingde bisire jui

他 我的 北京 在 儿子

②tere oci mini beigingde bisire jui。

他 是 我的 北京 在 儿子

③tere oci mini beigingde bisire jui mu。

他 是 我的 北京 在 儿子

④tere mini beigingde bisire ji iunu。

现代满语中有三种说法：

①t'ərə min kiŋ xətʃ'ən tə pitʃirə xaxatʃie。

他 我的 京 城 在 男孩

②t'ərə ʃl min kiŋ xətʃ'ən tə pitʃirə xaxatʃie。

他 是 我的 京 城 在 男孩

③t'ərə otə'i (或 inə) min kiŋ xətʃən de pitʃirə

他 是 我的 京 城 在

xaxatʃie

男孩

## 第五节 汉语对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

蒙古语族属阿尔泰语系。现代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东乡语、保安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以及莫戈勒九种语言。这些语言主要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前和阿富汗。我国境内操用蒙古语族语言的民族分布、人口（1990年）以及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如下：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青海省。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地也有少量散居的蒙古族，总人口为4806849人。蒙古族有自己的文字。现在通用的文字是13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并经过屡次改革已规范化的蒙古文。历史上曾一度使用过“八思巴字”，并用此记录过元代文献。目前，新疆等地的蒙古族使用一种叫作“托忒”的蒙古文。蒙古语分内蒙古、巴尔虎——布里亚特和卫拉特三大方言。绝大多数蒙古族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主要交际工具，少数散居的蒙古族则转用了汉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

**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境内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郊一带，另有少部分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人口总数为121357人。没有文字，历史上曾使用满文、蒙文，目前通用汉文。聚居区的达斡尔族内部使用本民族语言，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兼通汉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散居区的达斡尔族大多转用了汉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

**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同仁县、大通县，还有一些散居于青海省、甘肃省的其它县、市，总人口为191624人。没有文字，历史上曾使用汉文或藏文。目前，正试验推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取得了一定成效。土族大多数仍使用本民族语言，由于长期同汉、藏人民频繁接触和交往，有些人兼通藏语、汉语。大通县的土族人基本转用了汉语。同仁县的一部分土族居民（约四千人）使用的是保安语。

**裕固族（东部）：**主要分布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的黄泥堡裕固族乡，总人口为12297人。裕固族分别使用东部裕固语（又称“恩格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又称“尧呼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汉语。使用三种语言的人数各占三分之一，彼此间交际用语为汉语。操用东部裕固语的居民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东部地区，没有文字，通用汉文。东部裕固语在语音结构上同土族语、东乡

语、保安语有共同性，而在词汇、语法上则同蒙古语保持较多的一致性。

东乡族：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其中以东乡族自治县较为集中，其余的则分布于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及附近各县。少数散居在甘肃省兰州市、定西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为373872人。没有文字，通用汉文。东乡族中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壮年都兼通汉语，一部分人已基本转用汉语。

保安族：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内大河家、刘集一带，少数散居于州内其它各县和青海省循化县，总人口为12212人。没有文字，通用汉文。大多数保安族居民仍使用本民族语，并有相当一些人兼通汉语，其中大河家乡梅坡村的保安族已转用汉语。

## 一、蒙古语族中的汉语借词

蒙古语族各语言都受到了汉语的影响，但由于历史、文化、分布环境及人口数量等诸因素的不同，其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据五十年代语言调查材料的统计，蒙古语1167个词中，汉语借词的比例约为1—2%<sup>①</sup>；达斡尔语2566个词中，汉语借词的比例为5.4%；土族语1845个词中，汉语借词的比例为19%；东乡语1593个词中，汉语借词的比例近50%；东部裕固语2093个词中，汉语借词的比例为23.9%；保安大墩话3020个词中，汉语借词的比例为40.4%；保安下庄话的3032个词中，汉语借词的比例为14%。<sup>②</sup>

① 引自确精扎布《对蒙古语新词术语问题的几点意见》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② 引自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13页。另据笔者根据《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近3000条基本词的统计，各语言中汉语借词的比例分别为蒙古语1.2%、达斡尔语3%、土族语3.7%、东部裕固语4%、东乡语25%、保安语12%。

近三十多年来，蒙古族各语言又从汉语吸收了大量的词汇，估计目前在各语言中汉语借词的比例肯定大大超过上述比例。

汉语借词从借入的时间上可分为早期汉语借词和近期汉语借词。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吸收的早期汉语借词一般是一些日常生活词语，其普及面广，发音稳定，具有一定的构词能力。如（例见176—178页表）。①

有些早期汉语借词部分保留了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以达斡尔语为例：②

gin 斤（现代汉语tʂin斤）

gjab 家谱（现代汉语tʂiapu家谱）

kjau 桥、轿（现代汉语tʂhiau桥tʂia轿）

kja:ntw 拳头（现代汉语tʂhuan tou拳头）

paŋxai 螃蟹（现代汉语phaŋɕie）

有些早期汉语借词已经加入基本词汇的行列，并作为派生新词或构词的基础。如达斡尔语：

punturje: -努力 < puntu-(奋斗)+r:je:

pənpi:l-装入信封 < pənpi:(封皮)+-l

biso:l-溜须、拍马屁 < bi:so:(婊子)+-l

dæ:tʃ 第二、老二 < dʒe:(再)+-tʃ

ginne- 称 < gind- < gin(斤)+d

bəy dæ: -染墨 < bəy(墨)+-dæ:

tʃoŋk uitʃa:s 窗户纸 < tʃoŋku(窗户)+tʃa:s(纸)

tʃoŋk uiti:k 窗户台 < tʃoŋku(窗户)+ti:k(台)

tʃoŋkuimətʃi 窗户架 < tʃoŋku(窗户)+mətʃi(架)

tʃoŋk uiturun 窗户框 < tʃoŋku(窗户)+turnu(框)

① 本文除注明出处的例词外，其它例词均系笔者根据《蒙古语族语言词典》及有关材料整理和统计所得。

② 例引自恩和巴图《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504—507页。

蒙古语	达斡尔语	东部裕固语	土族语	东乡语	保安语	汉义
bandəŋ	bandən	bandəŋ	bandaŋ	dandən	bandəŋ	板凳
baʃ	ba:ʃi	ba:ʃi	ba:ʃi	baɕi	baɕi	把戏
bəʃaŋ	baiʃaŋ	baiʃaŋ	bi:fan	baifan	bəfan	白矾
benʃ-deu:s binʃi	dʒiodzi	dʒiodzi	benɕi	biansu	biansl	扁食(饺子)
bans	ban	ban	bamba:r	banba	ban	板子
biʃ	pufi	pufi	puxi:	puʃu	ɕi	不是, 否
bu:s	badzi	badzi	dəŋlu:r	mantan~ baodzu	mantəŋ	包子
dəŋlə	dəŋlu	dəŋlu	dəŋlu:r	dəŋlə	dələ	灯笼
bə			bi	bu		不
di:s	panzi	panzi	de:dze	dʒiedzu	dʒiedzɿ	碟子
dəns	duŋzi	duŋzi	dəndu:r	duŋzu	duŋzɿ	墩子
guju:	gouje	gouje	goujo:	gaoje	gojɕ	膏药
gəŋ	gun	gun		gun	gun	公(爵位)

蒙古语	达斡尔语	东部裕固语	土族语	东乡语	保安语	汉义
xo:boŋ	ko:bun	xuepeŋ	xo:pen	xuepen	xopen	火盆
xul	kot	xule	xulu	xulu	xolo	葫芦
dʒa:dz	dʒia:s	dʒa:dzi	dʒaŋ	dʒiadzw	dʒadzɿ	架子
dʒoŋ	tʃindʒa:n	dʒaŋ	dʒaŋ	dʒian	dʒaŋ	酱
dʒld	giad	dʒeda	dʒida	dʒuwa		扎枪
dʒandʒiŋ	dʒaydʒun	dʒaydʒun	dʒandʒun	dʒiandʒin	dʒaydzun	将军
dʒe:	dʒe:	dʒi:	dʒe	dʒə	sen	侄儿、外甥
dʒiŋ	gin	tʃiŋ		dʒin		斤
laŋ	lian	laŋ	liaŋ	liam		两
la:bəŋ	lo:b	lu:be		tuma-lobu		萝卜
la:s	lu:s	lu:sa	lausa	laosa	lusɿ	骡子

蒙古语	达斡尔语	东部裕固语	土族语	东乡语	保安语	汉语
man	manu:	manou	ma:nau	manen	mano	玛瑙
mantu:	mantu:	mantu: ~bursaG	mante	dzenme		馒头
mod	mo:d	mu:den	mo:de	mutun	eiu~mortoŋ	木头(树)
mudza:ŋ	madzin	mudzaŋ	motei	mudzan	mudzaŋ	木匠
pu:dʒəŋ	pauɟzin	po:dʒandzi	pauɟzandə	paodʒandzu	podʒandzɿ	爆竹
tʃe	tʃe:	tʃa	tʃa	tʃa	tʃa	茶
su	dʒusu: ~gausu:	su	su:	tsu~su	su	醋
sompəŋ	sampan	suanpan	suanpan	suanpan	suanpan	算盘
soeŋgoŋ		soŋ	sungunaG	sunGuna	sonoG	葱
βa:r	war~wa:r	wa	wa:dʒaG	ua~uadzə	va	瓦
ʃagnex	ʃanagu	ʃe:liog-	ʃaŋal-	ʃandzi-	ʃange-	赏给
ʃin	ʃinkin	ʃəne	ʃine	ʃuni	ʃine	新
jaməŋ	ja:men	ja:mən	jamən	jamən	jamən	衙门

tʃoŋkuitarak 窗户棧 <tʃoŋku(窗户)+tarak(棧)

tʃoŋkuiʃultʃuy 窗户横撑 <tʃoŋku窗户+ʃultʃur(横撑)

近期汉语借词主要是解放以后吸收蒙古语族各语言中的。其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既有日常用语，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术语。如蒙古语：①

ʃuudʒi	书记	ʃeɛn	县
gunʃəə	公社	naŋxoo	热水瓶
dʒəəlʒn	照像	kəedʒii	会计
ʃəəbiə	手表		

在蒙古语族其它五种无文字的语言中，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词术语几乎全部是汉语借词。例如：

达斡尔语	东部裕固语	土族语	东乡语	保安语	汉义
mindzu	mindzu	miŋdzu	mindzu	mindzu	民主
gan	gaŋ	gaŋ	gan	gaŋ	钢
tʃəŋfən	tʃəufən		tʃənfən	tʃəŋfəŋ	成分
gəəmiŋ	gəmiŋ	ge:miŋ	giəmin	gemiŋ	革命
gaofɿ		gausə	gonʃu	gəuʃɿ	告示
dʒu:dʒi:	dʒudʒi		dʒudʒu	dʒudʒɿ	组织
daŋ	daŋ	daŋ	dan	daŋ	党
pəndʒian	fuŋdʒian	fuudʒan	fuudʒian	fəndʒan	封建
dʒintʃa	dʒintʃa	dʒinsa:	dʒintʃa	dʒintʃa	警察
budʒaŋ	budʒaŋ	budʒaŋ	budʒan	budʒaŋ	部长
ti:mu:	ti:mu:		təimu	təimu	题目
za:zi	dʒadʒi		dʒadʒu		杂志
dʒu:ʃi	dʒuəi	dʒuəi	dʒuəi	dʒuəi	主席
guntʃa:n	guntʃaŋ	guntʃaŋ	guntʃan	guntʃaŋ	工厂

①例引官道布《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140页。

在蒙古语族各语言中，早期和近期汉语借词或汉语借词与固有词并用的现象比较常见。

达斡尔语例：① 早期汉语借词      近期汉语借词

jinxua 印花——jəupiau 邮票

pəsəl 铺子——santian 商店

xo:lis 火犁——to:la:tʃi 拖拉机

在使用过程中早期汉语借词有一种被淘汰的趋势。

东部裕固语和东乡语中汉语借词和固有词并用的现象比较普遍。

东部裕固语例：②

汉语借词	固有词	汉义
dʒendʒendzə	—dʒyyr	尖尖子
dʒəŋ	—naGda	真
dʒaa	—Gudal	假
suan	—sarəmsaG	蒜
dʒiunen	—xuudʒən hon	旧年
tʃəuboula	—əʃkyy	报仇
louduŋla	—ulee bar	劳动
dʒe jyele	—tʃewerde	节约
pəila	—tələ	赔
loobu	—turma	萝卜
nenguolo	—tʃaxaala	过(新)年

东乡语例：

汉语借词	固有词	汉义
badzu	—tʃwGen	把子、柄

①塔娜，《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3、4期。

②照那斯图，《东部裕固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83页。

tøindzu	—Gomæi	裙子
janşə	—ungie	颜色
sowu	—buru	错误
uifun	—aili	威风
milin	—əmuri	命令
dun	—nokien	洞、穴
şinfu	—futam	幸福
xuimian	—otşuraku	会面
gua	—notşu	瓜
dzainan	· · · bəlia—Gədzəbu	灾祸、灾难
tşianşia	—duja—janşm	天下

汉语借词同固有词并用后，彼此有些分工，发展成为近义词，进一步丰富了词汇。如蒙古语中属于耙子一类的工具名称就有：maltoor“搂草用的耙子”、sabār“拾粪用的耙子”、gaapaa“刮雪用的耙子”、paas“打场用的耙子”。其中后两种耙子的名称是汉语借词。又如打扫尘土、垃圾的用具名称有juur“扫帚”

(固有词)和toodʒoo“笤帚”(汉语借词)，二者用途有别。①达斡尔语中əfka(固有词)和ju:ju:(汉语借词)都指“叔叔”，并用后，前者成为泛称，后者则特指父亲的弟弟；aşək(固有词)和pa:s(汉语借词)都含“法子”之义，但并用后，前者指“法术”，后者则指“办法、门道”，②şorgul(固有词)和mwəəs(汉语借词)都指“磨”，并用后，前者指可用手转的小磨，后者指大磨。③

有些汉语借词经过长期使用，意义有所变化。如达斡尔语例：

①道布：《蒙古语简志》140页。

②塔娜：《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③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23页。

汉语借词	原义	现义
jin	升	斗
ko:lo	葫芦	①葫芦②头颅
duil	堆	垃圾堆、灰堆
suil-	罪	①折磨②拷打
xanf	行市	价钱
pautul	跑腿	①光棍汉②嫖夫
pi:	皮	①皮的②不要脸的
pi:sdø:-	皮子的	不要脸的、耍赖
gwangui	光棍	①赌徒、二流子 ②游手好闲者
di:s	底子	①基础②家底③病根
jenjin	先生	医生、老中医
səb	师傅	师傅、老师

又如dʒoudzɿ“饺子”在东部裕固语中是“包子”的意思；baos“包子”在保安语和东乡语中为“馒头”的意思；dundzɿ“墩子”在土族语中是“臀部”的意思<sup>①</sup>。此外，在保安语（干河滩话）中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人称之为“谐音假借转义词”；<sup>②</sup>除借汉语“千”“万”用tʂan、van分别表示外，还采用这一转义法表示：“千”在当地回族所操汉语方言中谐“天”音，而“天”在保安语中读udər，保安语即借udər音表“千”义，“万”在当地回族人所操汉语方言中谐“碗”音，而“碗”在保安语中读ajGə，保安语即借ajGə音表“万”。

蒙古语族语言借用汉语词语的方式以音译为主，同时也兼用音译加注、半音译半义译、仿译等多种方式。因蒙古语族各语言简志对此多有详细介绍和例释，在此不再赘述。

① 例引自《蒙古语族语言词典》16页。

② 引自陈乃雄《保安语的演变轨迹》，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

## 二、汉语对蒙古语族语音的影响

汉语对蒙古语族语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加了某些原来没有的音位或音位组合形式。象 $ɿ$ 、 $ʅ$ 、 $y$ 等单元音和 $ya$ 、 $ye$ 等复合元音是蒙古语族原来没有的，而现在某些语言已经出现并相对稳定。如： $/ɿ/$ ：

土族语例：

guns $ɿ$	公司	dzəndz $ɿ$	砧子
xəŋdz $ɿ$	杏子	ne:dz $ɿ$	镊子
idz $ɿ$	椅子		

东乡语例：

xats $ɿ$	匣子	ts $ɿ$	次
əaŋdz $ɿ$	箱子	ʂɿdz $ɿ$	狮子
baodz $ɿ$	包子		

保安语例：

ʂuadz $ɿ$	刷子	ʂədz $ɿ$	骰子
tʂəandz $ɿ$	纤子	li dz $ɿ$	栗子
mudz $ɿ$	模子		

东乡语例	保安语例	汉义
laos $ɿ$	los $ɿ$	老师
əis $ɿ$	əis $ɿ$	喜事
dzantʂɿn	dzəntʂɿn	章程
tʂus $ɿ$ n	tʂus $ɿ$ n	出身
danʂ $ɿ$	danʂ $ɿ$	但是
kotʂɿn	kuotʂɿn	课程
xuaʂɿn	xuaʂɿn	化身
dzɿʂɿ	dzɿʂɿ	指示

ɣindzɿn	ɣindzɿŋ	行政
dzudzɿ	dzudzɿ	组织
ʂɿn	ʂɿŋ	省
tʂaŋtʂɿn	tʂaŋtʂɿŋ	长城
ɕiəʂɿn	ɕueʂɿŋ	学生
dəudzɿn	dəudzəŋ	斗争
dzɿndzɿ	dzɿŋdzɿ	政治

/y/、/ya/、/ye/:

达斡尔语例:

tʃy:teŋ	取灯	iəutʃy:	邮局
i:yan	医院	yanʃye	元帅
tanʃyan	党员	wəiʃəŋyan	卫生院
wəiyan	委员	yepin	月饼
dʒuŋʃye	中学		

保安语例:

koʂye	科学	ɕyengə-	选举
ijyen	医院。		

蒙古语族某些语言由于长期受汉、藏语的影响，增加了一些象dz、ts、f、dz、tʂ、ʂ、z、dz、tɕ、ɕ等辅音音位。但由于影响程度不同，它们在蒙古语族各语言中的出现情况和稳定状态也各异。如达斡尔语中出现了f、dz、tʂ、ʂ、z、等专用于拼写汉语借词的音位:

fen	分	fənxuŋ	分红
fəitʃi	飞机	fa:yan	法院
fəŋxwaŋ	凤凰	fu:	伏
fangə:miŋ	反革命	fa:l-	罚
dzuuʃii	主席	mindzɿuu	民主
tʂəədʒan	车站	dzuuʒən	主任
ʂəuʂuu	手术	guŋʂəəl	公社

sæxan            社员            zænwei            人委

但它们并不算十分稳定，有些人（尤其年龄较大的人），一般多以p、dz、tʃ、ʃ、r等音代之。东部裕固语中，dz、ts相对稳定。如：

dzui	罪	dzundzao	宗教
dʒiodzi	饺子	dandzi	担子
dzu	组	pandzi	盘子
dundzi	墩子	dʒa:dzi	架子
juandzə	原则	wadzi	袜子
kuaidzi	筷子	jidzi	椅子
miŋdzu	民族	tsai	菜
tentsai	天才		

但有些人也把ts读作s。

在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这三种语言中，f、dz、ts、dz、ts、ʃ、z、dz、tʃ、ʃ等音位比蒙古语族其它三种语言来说更稳定，甚至在这三种语言的固有词中也可见到这些音位，这可能是这三种语言长期受邻近的汉语影响较深的结果。例如：

土族语	东乡语	保安语	汉义
/f/:			
fa:fu	fa	fa	法术
fa:dzə	fadzɿ	fadzɿ	筏子
fu:	fu-	fu-	腐化
bi:fan	baifan	befan	白矾
dzənfu	dzənfu	dzənfu	政府
/dz/:			
dzu	dzu	dzu	组
ne:dzə	niədʒɿ	niədʒɿ	镊子
daŋdzə	xaibandʒɿ	baŋdzɿ	鞋帮
idzə	jidʒɿ	jidʒɿ	椅子
xu:rdzə	xəudʒɿ	xəndʒɿ	痃子
/ts/:			
tsovu	tsowu		错误

səntsən	tsunmin		生产 聪明
	tsu		醋
	tsoji-		搓
		tsaigə-	裁剪
		tsəŋku	仓库
		tʰintsai	芹菜
/dz/:			
dzəŋ	dzənbu	dzəŋ	帐
dzəŋnau	dzəanno	dzəanno	樟脑
miŋdzu	mindzu	mindzu	民主
budzəŋ	budzəŋ	budzəŋ	部长
paudzəŋdzə	paodzəndzɿ	podzəŋdzɿ	炮仗子
/tʃ/:			
tʃənla-			成长
	tʃəndu	tʃəŋdu	程度
	tʃənfen	tʃəŋfəŋ	成分
	dzəntʃən	dzəŋtʃəŋ	章程
	kotʃən	kuotʃəŋ	课程
/ʃ/:			
kuaŋʃən	kuaŋʃən	kuaŋʃən	矿山
ʃəndian	ʃəndʒian		商店
	maʃən	maʃəŋ	马上
	xuaʃən	xuaʃən	化身
ʃənma	ʃənma mori		骗马
/z/:			
zənʃən	zənʃən	zənʃən	人参
zənmin	zənmin	zəŋmin	人民
	zənwu	zənvu	任务
/dʒ/:			
dʒəŋ	dʒən	dʒəŋ	酱
dʒəŋdzun	dʒiəndʒun	dʒəŋdzun	将军

dʒe:tʃi	dʒidʒie	dʒidʒe	阶级
dʒinsa	dʒintʃa	tʒintʃa	警察
dandʒa	dandʒia	dandʒa	担架
/tʃ/, /ʃ/:			
tʃi	tʃi	tʃi	棋、象棋
ʃi	ʃi	ʃi	戏剧
ʃanfa	ʃanfa	ʃanfa	宪法
dʒuʃi	dʒuʃi	dʒuʃi	主席
ba:ʃi	baʃi	baʃi	把戏
baʃan	baʃian	baʃianggu-	保险

此外，考察我国境内蒙古语族各语言的元音和谐现象，可以发现，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比较严格完整，达斡尔语和东部裕固语处于不稳定状态，土族语、东乡语，只具有残存的元音和谐现象，而保安语元音和谐现象已不复存在。<sup>①</sup> 这些变异现象可以认为是由于受邻近语言影响的程度不同所致，其中汉语影响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

### 三、汉语对蒙古语族语法的影响

汉语对蒙古语族语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各语言都吸收了若干汉语虚词，有的语言因此增加了一些词类。各语言都普遍使用汉语的“是”或“不是”构成判断句式，如蒙古语（划横杆的词为汉语借词，下同）：<sup>②</sup>

bifee, tærtʃin manɛ uxər bifee ʃoo

不，那不是我们的牛。

tər ʃobɔ galɔ bifee, togrɔ jim。

那鸟不是雁，是鹤。

① 喻世长：《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民族出版社，1983年，34—35页，另见《蒙古语族语言词典》85页。

② 例引自道布《蒙古语简志》78页。

ən bus dʒugəər, ɛɛxtər ɔlaā biʃee.

这种布还可以，不太红。

ən dʒɔrāg dʒɔrsā biʃee, xəbālsā jim.

这幅画不是画的，是印刷的。

达斡尔语：①

ənʃinj ʃiɣ bait biʃin.

这不是件大事。

ənəʃinj minj bitəyminj biʃin.

这不是我的书。

təd asa: aru:kun xu: biʃinsul.

他们简直不是人。

awə:minj əimər dauti: biʃin.

我妈声音不是这样的。

ʃi lwa:tʃda: sain ʃinʃi(biʃinʃi)jə:ʔ

你的俄语不是很好吧？

东部裕固语：②

əŋgədzə bolGə ʃə wai.

不能这样。

odo lə ɛɛsɛ bə saa-Gə-κə ʃ(ə) we.

如果现在不来，我就不等了。

ene emə uusa toloɣuri wed-gə ʃ(ə) wai.

吃这个药头就不痛了。

təŋgəse ende-ɣə ʃ(ə) wai.

那样不会做错的。

tʃə namin tanə-κə ʃ(ə) u?

你不认识我吗？

① 例引自恩和巴图《达斡尔语和蒙古语》439页。

② 例引自照那斯图《东部裕固语简志》39页。东部裕固语puʃə“不是”往往省作ʃə，有时ʃə中的元音ə脱落。

土族语：①

təŋgə-gu-nə puʒa.

那样是不对的。

te deel aama-nə puʒa, tenə va.

这件衣服不是妈妈的，是他的。

ne munə puʒiisa tʂənə ii

这个如果不是我的，那就是你的。

东乡语：②

ənə ʂl dʒiu mini ud zədan wo.

这就是我的看法。

ʂudzi (ʂl) niə nəngan kuu wo.

书记是一个能干的人。

hə (ʂl) mini gajidziao wo.

他是我的弟兄。

ənə ʂl noGosun Gala giəsənni wo.

这是用羊毛做的。

irəkuni (ʂl) həni biəri wo.

要来的是他的妻子。

保安语：③

tʂi (ʂl) baonaŋ kuŋ mbl (i) u?

你是保安族吗？

ənə ʂl guŋsəne tʂitʂə o.

这是公社的汽车。

məsdz (i) igu ʂl ted məsgu o.

穿得是藏族服装。

①例引自照那斯图《土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61，63，70页。

②例引自刘照雄《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86，88，89，90页。

③例引自布和，刘照雄《保安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54，65页。

此外，蒙古语族各语言都引入了汉语的一些副词、连词、情态词等主要起语法作用的词。

蒙古语：①

en gətül tər gətlas gən ix.

这双靴子比那双靴子更大。

tjil jabbāl gən see.

你去更好。

tjooxō irdʒ, sej arāb ʃaxāmχā been.

来的人不多，才(只有)十来位。

soraad sej mädən, soraagəgaar jaadz mädən?

学习才知道，不学习怎么能懂呢？

bii xanjil jabsa dær.

我还是去好些。

minii sana:ga:r xanjil əniig abjaa.

我的意思还是要那个。

达斡尔语：②

xajil ənə suyw baityud sain.

还是这把斧子好使。

bi: i:dən ərinne:itʃwəi.

我一定按时去。

ta:l itʃibta:, ba: kəʃ itʃidʒ ul ʃadənba:.

你们去吗，我们可是去不了。

ʃinii əlgu-ʃinj xəd sain, kəʃ bii ul dwardləŋ-bii.

你说的虽好，可是我不喜欢。

bi: je:ʃ ul mädənbi.

我也是不知道。

① 例引自道布《蒙古语简志》87、89、93页。

② 例引自恩和巴图《达斡尔语和蒙古语》417、429、447页。

morj je:ʃ bolbæi, xukur je:ʃ bolbæi, tædzə:ʔə:linj  
xo: aiʃti:.

马也好，牛也好，饲养了都有好处。

东部裕固语：①

seergə abdʒə ereme talʁanə gedʒə(u)ʁur, xuudʒən  
talʁanə [en uuja.

把刚拿来的面粉存放起来，先吃原有的。

ene ʃer(e)in an mudʒaŋ tʃəsadʒ(ə) wai, jəu batə  
jəu saixGan bai.

这个桌子是安木匠做的，又结实又好看。

东乡语：②

dziəxun giədənə Guala iən hantu unʃɪdzɪwo.

结了婚以后，俩人仍在一块儿读书。

ənə dziaoni lin quridzɪ godʒia saowo.

他的这个弟弟单另（分居）自己住了。

bi futʃuyudu oʔəiku ʃɪxoudə sai hunturawo.

我昨天快天亮时才入睡。

tʃɪ ʃiən jawu!

你先走！

tʃɪ bu udzə!

你别看！

保安语（干河滩话）：③

nənə suŋ vul-sɪ keʃɪ dzunbigədʒo.

从冬天开始就为此做准备。

① 例引自那斯图《东部裕固语简志》52, 56页。

② 例引自刘照雄《东乡语简志》77, 78页。

③ 例引自陈乃雄《保安语的演变轨迹》。

suŋ nə lajuE-s<sub>1</sub>-nə xərGənə tsirgədzo.

从腊月起就拉粪。

dzəŋ bi bu-s<sub>1</sub> ondor.

他比我高。

bu nuədə bi s<sub>1</sub>gudə-s<sub>1</sub> la nəgə səŋ.

我今天比昨天稍好一些。

bidzo xuəəŋnə lEvəŋ guanəi səŋ jis<sub>1</sub> s<sub>1</sub>kui jE dagə-dzo.

相互间关系好的话，也有送十元钱的。

蒙古语族中的某些语言由于长期受汉语的影响，从汉语中引入了某一类词。如东乡语的数词中，除十以下的数词是本民族固有词外，十以上的数词全部借自汉语，而且十以下的数词同样也可以与汉语借词通用或并用。例如：

s <sub>1</sub> ji	十一	s <sub>1</sub> er	十二
s <sub>1</sub> san	十三	s <sub>1</sub> s <sub>1</sub>	十四
s <sub>1</sub> wu	十五	s <sub>1</sub> liu	十六
s <sub>1</sub> təi	十七	s <sub>1</sub> ba	十七
s <sub>1</sub> dziu	十九	əy <sub>1</sub>	二十
san <sub>1</sub>	三十	s <sub>1</sub> s <sub>1</sub>	四十
u <sub>1</sub>	五十	liu <sub>1</sub>	六十
təi <sub>1</sub>	七十	ba <sub>1</sub>	八十
dziu <sub>1</sub>	九十	bə	百
təian	千	on(wan)	万

东乡语专用量词绝大多数借自汉语；用量词组合成数量词时习惯采用汉语借词；表示年、月、周、日时，也主要采用汉语借词。

保安语在数词的活用中采用汉语借词的情况十分普遍。在保安语（干河滩话）中凡出现数量或数量词结构的地方，几乎全都舍弃本民族语而借用汉语。而且它们的使用也使这个数词所限定

的静词或动词受到一定的影响。如：①

jidzuE sgaldi 踢了一脚

jixuan to jixuan 一环套一环

tosuŋ jEŋ s|ŋ|dzin do voŋdzin nantur nəgə kəŋdzo.

油也需要四十斤到五十斤

ndəgis| jE xanŋ jierŋdziu kəŋdzo.

蛋也还是需要一二十斤。

nə janəinə təan liŋ san təansinə dAmu təinadzə.

举办宴席前两三天起就炸馍馍。

jido ŋ|ərđzan do jiləŋdzanne ŋ|xuədə ɣavu hanə  
rəntəiqnə dagələ rədzə.

一到十二点到两点，下午大家都来送礼。

xuədəzE ɣajjuEnə tšuvu xuədəzEŋ ɣajjuEnə tšnŋ|.

或者下月初五，或者是下月初十。

保安语（干河滩话）在原有的语法形式的基础上还吸收了汉语的“了（lio）”，作为过去时的又一种形式（原有-wa、-o）；吸收了汉语的“了者（liodzE）”，作为让步副动词的又一种形式。

汉语对蒙古语族某些语言的句法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固有句法结构形式同汉语句法结构形式并存或趋向于后者结构特点的现象。如保安语（干河滩话）中“哈比卜哈乞木他在做什么”这样一句话，既可以用固有的联系动词结构形成说成：②

xabibu xakimudə dzəŋ jəŋ jAsdzogədzi.

也可以采用汉语句法结构形式说成：

xabibu xakimudə asGədzi dzəŋ jəŋ jAsdzə.

“我知道哈比卜天天在地里干活”这样一句话按保安语固有

① 例引自陈乃雄《保安语的演变轨迹》。

② 例引自陈乃雄《保安语的演变轨迹》。

的句法结构应说成：

xabibu tʂan tʂan Gədzirdə lEgədziɣnə bu mA-  
dəm.

可现在也有按汉语句法结构形式说的：

bu mAdzi xabibu tʂantʂan Gədzirdə lEgədzɔ.

一些汉语借词（尤其是虚词）在句子中的使用也使保安语的句法结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如：

dzuəŋ dzidə tʂi məjɯ dzinjan

你对庄稼没有经验。

tʂintʂi smdzi gəs| na tʂintʂi liəŋdzɔ d jo pinxəŋ.

结亲的话，这结亲的两家要门当户对。

dA guapu ʂiɣətəɣwɣi, dA tʂəu ʂmdzE dəŋ vutʂəŋ.

现在没有打什么主意，袖手等死呢？

səŋ tʂi səŋjE ba səŋs|

蚕吃桑叶拉蚕丝。

dui nə juEfanəŋə gui dzuəŋ, dui nəmas|nəjiji, var-  
dz|, dzəŋgəziɣɯ xanʂi ʂəŋʂio.

对这个斋月的重要性，对礼拜的意义和经义，讲得还是很详细的。

上面句子中的məjɯ“没有”jo、“要”、dəŋ“等”、tʂi“吃”、ba“属”按照保安语固有句法结构形式应分别出现在dzinjan“经验”、pinxəŋ“门当户对”vutʂəŋ“无常”，səŋjE“桑叶”、səŋs|“蚕丝”后面的，最后一句中使用了汉语的“对”、“对于”这样的语法词，把原句中应有的宾格附加成分省略了。

有些操保安语的人习惯采用一种前半句是本民族语固有句子结构形式，后半句采用汉语句式结构的言语形式，如：

xabibu bəidziŋ(-də) ʂis| ʂuəbuxa.

哈比卜也许去北京。

tcintəi smdʒi gəsɿ kEʂɿnəʂɿjigə gvaudʒan.

要结亲的话，开始是一个关键。

na ʂgədʒigwɿ guŋəy du ʂɿ jijəŋ.

这犁地的工序都是一样的。

东乡语和保安语由于借入了大量的汉藏语借词，尤其是那些专门表示某种语法意义的虚词，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两种语言在语法上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从而使这两种粘着型语言逐渐具有了某些分析型语言的特点。

#### 四、汉语对蒙古语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

汉语对蒙古语族的影响除了表现在语言结构方面以外，也表现在语言使用功能方面。如前所述，蒙古语族各民族中均有一部分兼通汉语的双语者和转用汉语者，但其人口数量及语言使用情况由于地理条件、居住环境、人口分布、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诸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各异。即使同一民族的成员内部也因上述条件的不同而存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如蒙古语分为内蒙古、卫拉特和巴尔虎布里亚特三大方言。其中内蒙古方言使用的人数最多，约四百万人，是蒙古语中心方言。较之其它方言区操用本民族语交际的人数最多，尤其是草原牧区或蒙古族聚居区的蒙古族居民一般使用蒙古语，呈单语型。而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黑龙江省境内的蒙古族由于很早就与汉族接触并杂居，较之该方言区其它地区的蒙古居民来说，兼通汉语的双语者数量较多。1987年黑龙江省民委语文处对省内蒙古族聚居的五个市县22个乡镇98个村屯的33112人进行了语言调查。调查人数占全省蒙古族人口总数的34.5%。调查结果表明，能够使用蒙古语的人数应为24298人，占调查人数的73%；只能听懂蒙古语而不能说的人数为4650人，占14%；已经转用其它语言的人数为4164人，占13%。其中能够使用蒙古语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兼通汉语或其它民

族语的双语者。调查者认为，在调查的总人数中已有13%的人转用其它语言，就连母语环境较好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也有十分之一的人不会讲蒙古语了。尤其是富裕、肇源、大庄等市县，转用其它语言的人数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全省还有14%的蒙古族人只能听懂蒙古语而不能会话，处于双语型向单语型（转用型）过渡阶段。<sup>①</sup>根据1987年对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区之一的内蒙古自治旗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双语情况的抽样调查材料，在莫旗的达斡尔族中有48%的人口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呈单语型。这部分人大多生活在交通不便，文化尚落后的边远山区；兼通汉语的人数约占47%，这部分人主要生活在多民族杂居区，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兼通两种以上的语言。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双语区域和广泛的双语现象。此外，还有5%的人由于长期散居于汉族地区，已基本转用汉语或主要使用汉语。调查结果表明，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这个达斡尔族自治地方已有一半以上的达斡尔族人兼通或转用汉语。<sup>②</sup>裕固族中使用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和汉语的人数各占三分之一，其中使用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的居民中，也有一部分是兼通汉语或其它民族语的双语者。这两部分人之间相互交往时也使用汉语。由此看来，裕固族中，使用汉语的人数估计已超过一半以上。蒙古语族其它三种语言的使用情况目前尚无调查材料，但从这三种语言中汉语借词的比例、汉语对这三种语言结构的深刻影响和渗透情况看来，兼通汉语或转用汉语的人数也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总之，汉语和蒙古语族各语言交叉使用，在社会功能方面相互补偿，共同构成了蒙古语族的语言交际网络系统。

---

① 张亚光、波·少布：《黑龙江蒙古族失掉母语的状况及其原因》，载《民族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

② 丁石庆：《莫力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双语情况调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1期。

## 五、小结

1. 蒙古语族与汉语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相互影响方面，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蒙古语族对汉语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而汉语对蒙古语族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全方位的，既表现在语言的结构方面，也表现在语言的社会功能方面。

2. 操蒙古族语言的各族人民，由于彼此间在人口数量、分布格局、地理位置、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受汉语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总的情况是：汉语对东乡语、保安语影响最深，土族语和东部裕固语次之，达斡尔语再次之，蒙古语受汉语影响最小。

3. 汉语对蒙古语族的影响，无论就其结构还是功能上讲，都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概括地说，在词汇方面影响较大，语音次之，语法上受影响较小；就汉语对蒙古语族语言功能的影响来说，也因各族成员内部之间在居住环境、地理条件、文化发展状况、同邻近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关系，以及每个成员的文化程度、职业、民族文化心理乃至性别等多方面存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 第六节 汉语对突厥语的影响

突厥语族是突厥诸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我国现在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裕固等七个民族，使用八种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和图瓦语。

我国的八种突厥语族语言分布地区和使用人口（1990年）如下：

维吾尔语	新疆南部为主	721.44万人
------	--------	----------

哈萨克语	新疆北部为主	111.17万人
柯尔克孜语	新疆西南部及伊犁地区	14.15万人
乌孜别克语	乌鲁木齐、喀什、伊宁等地	1.45万人
塔塔尔语	乌鲁木齐、伊宁等地	0.48万人
图瓦语	新疆东北部哈巴河、布尔津等县	约1万人
撒拉语	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等地	8.77万人
西部裕固语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约5000人

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的使用人口与民族人口有较大差别，因为有一部分人已使用其他语言。西部裕固语是裕固族的两种本民族语之一，另一种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说图瓦语的人，其民族成分为蒙古族。

根据现有材料，突厥语族的书面语言可分为：（一）古代突厥语。以7—9世纪的古代突厥文碑铭为代表，其中《雀林碑》建于7世纪，为已发现最古老的古代突厥文碑铭。（二）中古突厥语。又可分为①东部高昌回鹘语。9—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新疆东部至甘肃一带，使用回鹘文。代表文献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玄奘传》等。②西部哈喀尼耶语。使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代表文献有《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等。（三）近代突厥语。分为三支：①在乌古斯基础上形成的西支，包括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等；②以钦察语为基础形成的北支，包括哈萨克语、塔塔尔语等；③以回鹘—葛逻禄语为基础形成的东支，包括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等。这一支又被称为察合台语。（四）现代突厥语。近现代突厥各民族逐渐形成，随之也就形成了突厥语族各现代语言。

我国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们曾在我国北方建立过突厥汗国（公元552—744年）、回鹘汗国（公元744—840年）、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1250年）、黑汗王朝（10—13世纪）等国家或地方政权，与中原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

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的突厥语族各民族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与其他各民族团结一致，为建设祖国的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尽管突厥语族语言与汉语是系属不同的语言，在语言结构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民族间的长期接触和社会影响，突厥语族语言在词汇、语音、语法和语言使用功能上都受到汉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地域表现为不同的状态。

## 一、汉语对突厥语族词汇的影响

汉语对突厥语族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即突厥语族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借词。这些汉语借词从借入的时间来看，可以分为早期汉语借词和近期汉语借词。早期汉语借词是指现代突厥语形成以前的汉语借词，主要是出现于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以及阿拉伯字母老文字文献中的汉语借词。近期汉语借词是指现代突厥语形成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吸收的汉语借词。

突厥语族各语言中的早期汉语借词是相当多的。例如，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beg	伯克	tutuq	都督
sengyn	将军	wapji	法师
tʃaj	茶	bejsej	白菜
manta	包子	jamul	衙门
puntoza	粉条	dzado	铡刀
mek	墨	maxo	马号，马厩
dzaŋ	丈	mo	亩
tʃin	真	jim	严
tiŋla-	听	toŋla-	冻，冻结
syjle-	催	deŋse-	掂量

哈萨克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ʃaj	茶	indziw	珍珠
sæj	菜	dʒəŋ	斤
dʒusaʃ	韭菜	tunʃə	通事, 翻译
lobə	萝卜	dʒozə	桌子
borməj	苞米	kensej	棺材
dʒozə	桌子	gəzir	瓜子
qasəŋ	花生	sələŋ	司令
lazə	辣子	genzi	馆子
jaŋjəw	洋芋	ʃentʃi	橡子
dʒambe	元宝	kəŋ	炕

乌孜别克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dʒimbil	蒸篦	podʒaŋzæ	鞭炮
ʃaməl	衙门	mʌχo	马号
lim	檠	tʃæjdo	切刀
dʒaŋdʒɔn	将军	dʒiŋ	真
mənta	包子	dʒa	假
dopɔ	豆腐	dʒæŋ	仗
pɔntozæ	粉条	dʒado	铡刀
bæjʃæj	白菜	tʃaj	茶
sæjpɔŋ	裁缝	mɔ	亩
lævmæn	拉面	tʃi	尺

柯尔克孜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dʒygyn	鞠躬	χu jli	会立
dʒaməl	衙门	ʃianli	县立
turʃu	通事, 翻译	boo	捆 < 把
loja	老爷	dʒəŋ	斤

sej	粟	ʃəŋ	升
tʃaj	茶	dʒadʒaŋ	甲长
dʒanbə	元宝	toŋ-	冻
darən	大人	təŋʃa-	听
tetej	太太	tʃən	真
potej	炮台	dʒotu	馒头

#### 塔塔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tʃej	茶	kamzul	坎肩儿
lɛgmen	拉面	kyj	曲
tawar	缎子	simtʃej	清茶
sibu	市布	su jambu	粗洋布
sər	漆	kan	矿
keŋ	宽	laŋfun	凉粉
qɛxɛz	纸 (< 毅纸)	tʃin	真
ʃiŋ	升	daden	石 (< 大石)
menti	包子	dʒiŋ	斤
taŋʃir	糖稀	sola-	关押 (< 锁+la)

#### 撒拉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jamun	衙门	t'am	淡色
jinxua	印花	p'ansen	盘缠(路费)
xanse	咸菜	k'oten	搅团(食品)
tʃ'a	茶	k'an	件
jaŋzi	样子	kaŋ	间
xej	鞋	t'ala-	拓
ku	鼓	sola-	锁
ʃykun	毛巾	zele-	接
tʃoŋke	庄稼	sefun	裁缝

ketʃir

戒指

taŋp'u

当铺

## 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ulu	龙	ʃotin	慢慢地(<消停)
xuar	花	tʃəŋ	斤
behge	墨	tʃizi	尺(<尺子)
liŋzi	檫子	tʃa	茶
saj~səj	菜	dʒo	轿
xaj~qaj	鞋	ʃele-	谢
loʃi	老实的	dʒinne-	敬
gue	奇怪的	dejla-	带
ʃaŋ	香的	bedʒele-	拜节
dʒaŋ	刚才(<刚)	bola-	包

突厥语族语言中的早期汉语借词不是同时出现的。由于汉语的语音一千多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所以这些早期汉语借词保留了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例如：

## 1. 入声字塞音韵尾：

qap 甲（咸开二入押见）

likʒir 历日（历，梗开四入锡来）

tutuq 都督（督，通合一入沃端）

## 2. 鼻音韵尾-m：

kimbaɣ 金箔（金，深开三平侵见）

lim 檫（深开三上寝来）

## 3. “见、溪、群”等声母：

sengun 州将军（军，臻合三平文见）

quntʃuj 公主（公，通合一平东见）

kɕg 曲（通合三入烛溪）

## 4. “端、定”等声母：

tojin 道人（道，效开一上皓定）

tajto 大唐（大，蟹开一去泰定）

titsi 弟子（弟，蟹开四上荠定）

5. “章、昌、初”等声母：

gotʃo 高昌（昌，宕开三平阳昌）

sitʃi 四至、（至，止开三去至章）

tʃao 钞（效开二平肴初）<sup>①</sup>

突厥语族语言中的早期汉语借词除了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历法术语、官职名称以外，还有一大批佛教术语。

突厥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佛教，从汉文翻译过大量的佛教著作，受中原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宗教文化传播的动态过程，形成一种有规律性和方向性的文化流。突厥语族语言在这一文化流中，借用了一大批汉语佛教术语。例如：

tojin	道人	saŋ	僧
burxan	佛（<bur佛+xan）	tajjiŋ	大乘
tajʃi	大师	sawjiŋ	小乘
buʃi	布施	ʃabi	沙弥
samtso	三藏	pusar	菩萨
tawtʃu	道场	xuaʃin	化身
quanjiim	观世音	saw	婆婆

突厥语族语言中的早期汉语借词大多是名词，而动词很少。汉语的动词借入后，往往附加由静词构成动词的附加成分-la、-le、-na、-ne等。例如：

维吾尔语

jala-押

sola-锁

tiŋla-听

tonla-冻

pala-罚

tʃilla-请

<sup>①</sup> 参阅陈宗振《关于维吾尔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511—513页。

### 撒拉语

sala-擦

zele-接

sola-锁

tamna-担

t'aŋna-淌

baŋna-帮

### 西部裕固语

gula-雇

dzila-质(抵押)

dzele-借

suanna-算

tʃyenne-劝

jenne-验

早期汉语借词的出现，丰富了突厥语族语言的词汇。早期汉语借词，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虽曾使用过一段时间，但早已消失了；而另一些则沿用至今，并且还有构成新词的能力，已不为本民族视为外来借词了。这说明一个借词是否能在借入语言中“生根”，关键在于它是否能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是否适应借入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

到了近现代，突厥语族各语言随着民族接触的日益增多，社会影响的不断加强，又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例如：

### 维吾尔语

gowuɟuɛn

国务院

biŋtuen

兵团

luɟɟen

路线

ganben

钢板

ʃudʒi

书记

daʃɔ

大学

zuŋli 总理

quŋɟe 公社

benzi 班子

zimadʒjaŋ 芝麻酱

suljaw 塑料

tʃjuɟɛj 球鞋

### 哈萨克语

gontʃandaŋ 共产党

gonɟe 公社

ʃudʒiɟi 书记

daʃɔ 大学

zuŋliɟi 总理

ʃinxuaɟi 新华社

pipan 批判  
gəmiŋ 革命

luŋjen 路线  
lantŋju 兰球

柯尔克孜语

guŋsandaŋ 共产党  
gowu juen 国务院  
ŋudzi 书记  
puɖzurən 副主任  
daŋiφ 大学

ŋiandzaŋ 县长  
guŋ 工  
juen 元  
ɖzuŋi 主席  
ŋiφjuen 学院

乌孜别克语

gowəjæn 国务院  
dʌŋw 大学  
ŋwɖzi 书记  
ɖzəŋi 主席  
lojɪŋɖzi 录音机

gʌŋbi 钢笔  
gəænto 罐头  
lʌbʌ 喇叭  
ŋʌŋɖzo 香蕉  
hogo 火锅

塔塔尔语

ɖzuŋiŋ 主席  
ɖzurən 主任  
linsiguŋ 临时工  
ɖzysej 韭菜

mu 亩  
ɖzotu 镢头  
kan 矿  
tuŋ 桶

撒拉语

guodza 国家  
dujɖzoŋ 队长  
jinxoŋ 银行  
ŋyeŋo 学校  
sunzi 孙子

ɖzuŋi 主席  
guŋse 公社  
guŋfun 工分  
loŋi 老师  
ɖzizi 侄子

tujxun	离婚 (退婚)	jaŋjy	洋芋
ʃendzɔŋ	县长	dienjin	电影
funie	副业	dzomun	教门
vunxua	文化	bozi	包子
xujji	会议	tundzi	同志

#### 西部裕固语

guodza	国家	goŋʃandaŋ	共产党
ʃudzi	书记	zoŋli	总理
goŋtʃaŋ	工厂	jinxaŋ	银行
dzixua	计划	goŋʃə	公社
ʃyeʃo	学校	zadan	炸弹
loʃi	老师	ʃueni	水泥
xuotʃə	火车	tʃitʃə	汽车
biŋgan	饼干	gaŋbi	钢笔
pipiŋna-	批评	dzənʃəla-	建设
veda	伟大	ʃendein	先进

#### 图 瓦 语

suŋ	寸	laŋ	两
dzaŋ	墙	kvmin	革命
tijgaŋ	提纲	gyŋsə	公司
dzoozi	桌子	ʃvʃandzaŋ	县长
kuluu	葫芦	ʃedow	菜刀

近期汉语借词在突厥语族各语言中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既有日常用语，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术语。从词类上看，以名词、量词为最多，还有形容词、动词、副词、助词等等。

因地域和文化特点的不同，突厥语族各语言中的汉语借词数

量也有所不同。裕固族和撒拉族长期以来与汉族毗邻，其语言与同语族的其他语言相比较，所吸收的汉语借词较多，是突厥语族语言中受汉语影响较大的两种语言。例如：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汉语
azat	azat	tʃefoŋ	dʒefaŋ	解放
mɜktep	mektep	ʃyeʃo	ʃyeʃo	学校
adalɜt	ædilet	gundo	guŋdo	公道、正义
amma	køpʃilik	tʃyndʒun	tʃyndʒuŋ	群众
anar	anar	ʃiliu	ʃiliu	石榴
ajrupilan	ajropəlan	fidzi	fejdzɜ	飞机
banka	banke	jinxoŋ	jinxaŋ	银行
bølym	bølim	koʃi	kəʃi	科室
gilem	kilem	ɖitan	ɖitan	地毯
xiʃ	kirpiʃ	zuan	dʒuan	砖
ittipaq	əntəmaq	tuandʒe	tuandʒe	团结

由于吸收的汉语借词越来越多，就出现了本语固有词与汉语借词并用、不同的汉语借词并用以及同音汉语借词并用的现象。

以西部裕固语为例：<sup>①</sup>

本语固有词与汉语借词并用：

本语固有词	汉语借词	汉义
tysendʒəq	ʒuzi	褥子
dahrtgəʃ	tʃəŋ	秤
jiyaʃdʒi	mudʒaŋ	木匠
demərdʒi	tiedʒaŋ	铁匠
tisi eʃek	soly	草驴、母驴
oht pørek	somozi	草帽

<sup>①</sup>参见陈宗振《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中国突厥语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00—302页。

不同的汉语借词并用:

botʃi	簸箕	botʃizi	簸箕子
tʃenlijen	千里眼	vanjyendziŋ	望远镜
pantʃan	盘缠	dʒofe	脚费
la	蜡	jaŋla	洋蜡
botʃəula-	报仇	tʃəu bola-	仇、报(报仇)

同音汉语借词并用:

ba	1. 把(量词)	2. 耙	3. 吧
kaŋ	1. 炕	2. 糠	
xuar	1. 花儿	2. 画儿	
ʃaŋ	1. 乡	2. 相片	3. 香的
jizi	1. 椅子	2. 胰子	
duela-	1. 对(遇见)	2. 堆	3. 对(核对)
xuala-	1. 花(花费)	2. 画	3. 化(募化)
	4. 划(划拨)		

在汉语标准语没有普及的时代, 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都是借自邻近地区汉语方言土语的。从突厥语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来看, 它们大都具有汉语西北方言的特点。以西部裕固语为例: ①

1. 汉语普通话的ai, 当地汉语为ej, 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读为ej或e。如:

dejla-带 (<dej带+la)

bedʒele-拜节 (<bedʒe拜节+le)

bejla-摆 (<bej摆+la)

与此相应, uai成为uej或ue。如:

gue 怪      guejla- 拐 (<guej拐+la)

①陈宗振:《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中国突厥语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97—298页。

2. 汉语普通话的ao, 当地汉语为o, 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也读为o。如:

dʒo 轿      lodzo 老照(执照、证书)      bola-包

与此相应, iao读为io。如:

pio 票(执照)      tiola-挑

3. 当地汉语有混用鼻音韵尾n和ŋ的现象, 故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有时与普通话的读音相反, 有时两者均可。如:

vapəŋ 瓦盆      tʃinmin~tʃiŋmiŋ 清明

dʒəŋ 真的      fəŋtiozi~fəntiozi 粉条子

fəŋ 分      jendun 烟墩(烽火台)

4. 汉语普通话中jie[tɕie]的一部分(古见系字)当地汉语读为ge, 在西部裕固语的汉语借词中读为gəj或gə。如:

gejmen 街门      gejmo芥末      getʃizi 戒指

5. 汉语普通话中x[ɣ]的一部分(古见系字)当地汉语读h[x], 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也读为[x]。如:

xaj~xei 鞋      xabazi 下巴子(下颏)

6. 汉语普通话的er, 在张掖话中读音接近yə, 酒泉话与普通话基本一致。故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有两种不同的发音。如:

tor~toyə 桃儿      bi'er~ber~biyə被儿(被子)

7. 汉语普通话的zh、ch、sh拼合口呼时, 在张掖话中变为g、k、f, 西部裕固语中的一些汉语借词也读为g、k、f。如:

ʃigu 食箸(筷子)      futan 舒坦

linfej 临水(地名)      fetʃizi 水池子

8. 当地汉语有zh、ch、sh与z、c、s混用现象, 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也大多混用。如:

dzado~zado 铡刀      dʒala~zala- 铡

tʃa~sa 茶      futʃa~fusa 伏茶

ʃenʃən~ʃensən 先生      bəŋʃɪ~bəŋsi 本事

突厥语族语言吸收汉语借词时，一般采用下列四种方式：

1. 音译 按照当地汉语方言的读音和意义借入。以这种方式借入的汉语借词占大多数，尤其是新词术语。如：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tʃaj 茶	ɡoŋʃə 公社	ʃazi 沙子	ʃensən 先生
sej 菜	ɡəmiŋ 革命	tʃefoŋ 解放	dejfu 大夫
maɣo 马号	ʃudʒij 书记	jaŋzi 样子	fɪtan 舒坦

2. 半音译半意译 即以本语固有词与汉语借词构成合成词。

如：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qara tʃaj 伏茶		tas ʃaj 砖茶	
petir manta 薄皮包子		en kyj 歌曲	
javatʃ tuŋ 木桶		tʃaŋ tas 石碾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ot zanzi 火剪		jyŋ qejdʒi 羊马剪	
ʃazi jer 沙地		jerlama ʃazi 留声机	
qara ʃatoŋ 红糖		taŋ doŋzi 山洞	

3. 音译借词加本语固有的构词附加成分构成新词。突厥语族语言用这种方式吸收的汉语借词也比较多。如：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maɣotʃi 马夫		pijle- 批准	
keŋlik 宽广的		ɡoŋʃelan- 公社化	
tiŋla- 听		pipanda- 批判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sefuntʃi 裁缝		bəŋʃiləŋ 有本事的	
tʃenʃe et- 建设		dʒele- 借	
sala- 擦		datiŋna- 打听	

4. 音译借词加本语固有词的通称。如：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moden gyl	牡丹	tuŋ jelek	桶
tjenjen teŋi	天山	ʃifen aʃ	稀饭
dadur purtʃaq	大豆	zijen temeki	纸烟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jyʃi taʃ	玉石	ʃigtʃizi kun	星期日
oxəl sunzi	孙子	jyʃi das	玉石
vavaku iʃten	婴儿裤	jizsamsi	衣料

综上所述，汉语对突厥语族语言词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借词上，并出现了本语固有词与汉语借词、不同的汉语借词及同音汉语借词并用现象。突厥语族语言的汉语借词具有以下特点：

1. 突厥语族语言中的早期汉语借词保留了许多中古汉语语音的特点。这是我们研究中古汉语音韵的珍贵材料。

2. 汉语借词大多借自当地的方言土语，反映了西北方言的特点。

3. 从汉语借词的分布范围来看，早期汉语借词多为名词、量词，近期汉语借词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而且数量明显增多。

4. 早期汉语借词大多已消失，而有一部分则在突厥语族语言中生根，在语音上已适应突厥语族的语音规律，也有一定的构词能力，已不被本民族视为外来语借词。而近期汉语借词，特别是时代性很强的名词术语，还没有完全被全民所接受，并且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和随意性。

5. 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在词汇上受汉语的影响更大，其汉语借词多于其他突厥语言。

## 二、汉语对突厥语族语音的影响

随着汉语借词数量的不断增加，突厥语族各语言的语音也受到了汉语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随着汉语借词的借入，增加了一些原来没有的音位。以维吾尔语、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为例：

维吾尔语里原来没有(f)音位，它是随着借词一起进入维吾尔语的，在书面语中专门用来拼写借词，但在口语中还没有完全被接受下来，常用双唇清塞音(p)来代替。如：

fuy~puŋ      分              mofaŋ~mopaŋ      磨坊  
faŋzi~paŋzi      房子              fintoza~pintoza      粉条

撒拉语中的(dʒ)、(tʃ)、(ʃ)是随着汉语借词的不断增加而逐渐渗透进来的。如：

dʒijen      纸烟      tʃezi      车子      ʃazi      沙子  
dʒənfu      政府      tʃazi      叉子      tʃense      建设

另外，在撒拉语的汉语借词中还有舌尖后浊擦音ʒ，由于颤音r不出现在词首并带有摩擦成分，在音位标音上我们以辅音r代替。如：

run(ʒun)      绒              rənmin(ʒənmin)人民  
rino~reno(ʒino~ʒeno)热闹

西部裕固语中原来也没有(f)音位，它是随着汉语词的借入而增加进来的，只在汉语借词中出现。如：

fudʒurən      副主任              dəufu      豆腐  
futʃa              获茶              fəŋtiozi      粉条

2. 突厥语族各语言因吸收汉语借词而增加了一些复合元音。以维吾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为例：

维吾尔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gowu juen	国务院 funie	副业 jyjjen 永远

biqtuen	兵团	bio	表	luoŋila-	落实
fajuen	法院	guodza	国家	biendan	扁担
dzoŋxua	中华	kuedzi	会计	mentiozi	面条

3. 因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突厥语族各语言的音节结构也随之增加了一些类型。如：

	哈萨克语		柯尔克孜语		撒拉语
BAA型	jinhuəsi 新华社	ʃiodzaŋ	校长	bio	表
	dzoŋxua 中华	tuu	旗	guodza	国家
BAAB型	tuen 团	wejjuen	委员	dienjin	电影
	ʃøjyen 学院	ʃianwej	县委	japien	鸦片

4. 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的塞音、塞擦音无浊音，但分为送气与不送气两套。在我国其他突厥语族语言里，塞音和塞擦音区分为清音和浊音两套。汉语借词强化了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送气与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的对立。如：

#### 西部裕固语

bo宝—po枪、炮	bela-摆—pela-排、赔
gaŋ缸—kaŋ炕	banna-板—panna-盘
dzo轿—tʃo桥	dejla-带—tejla-抬
dʒuan砖—tʃuan船	dele-得—tele-贴
digna-钉—tiŋna-听	guala-刮—kuala-挂

### 三、汉语对突厥语族语法的影响

汉语对突厥语族语法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是微弱的，但对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汉语的词组和词组的翻译形式进入到突厥语族各语言中，对这些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仅以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为例：

维吾尔语

teifən tevidinmu ekir, haŋgirt pejidinmu jenik.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

qoşunlarni xil, memuri оруnlarni ixtjam qilmaq.

精兵简政

jer inqilawi uruşi 土地革命战争

ikki jyzlimtji 两面派

keŋtjilik bilen bir terep qilmaq 宽大处理

哈萨克语

xaləq goŋjəse 人民公社

stil durəstaw qozyaləse 整风运动

sajasate qolbasjə etiw 政治挂帅

barləq gylder tegis şəjek atsən, dǰalpə dǰarəsa  
yn qatsən.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 突厥语族语言的量词历来很不发达，由于汉语的影响，各语言都借入了大量的量词，在汉语借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量词与突厥语族语言的数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数量词词组，修饰中心语。如：

维吾尔语

bir dǰiq gøj 一斤肉      on mo jer 十亩地

tøt koj pul 四块钱      ikki tji rext 两尺布

ytj li jol 三里路      bir suŋ resim 一寸照片

撒拉语

bər bun ʃu      一本书      igi fun ʃin      两封信  
 udə tʃizi boz      三尺布      diot mu jer      四亩地  
 on dzaŋ ɣaxəd      十张纸      bər to begəraɣ      一套衣服

西部裕固语

uʃ due sərGa      三对耳环      bər tuŋ su      一桶水  
 ʃigə dzaŋ keyde      两张纸      uʃ to gezyə      三套衣服  
 diort bien oŋʃəhdə      读了四遍      ʃigə do madzi      两刀草纸

3. 由于受汉语的强烈影响，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的一些语法范畴已经退化或消失，逐渐丧失了一些粘着语的特征，而向分折语过渡。

撒拉语名词领属人称附加成分中数的区别基本消失了，同一人称的单、复数只有一种附加成分。如：

ana 姑娘 +	{	-m	anam	我（我们）的姑娘
		-ŋ	anaŋ	你（你们）的姑娘
		-si	anasi	他（他们）的姑娘
baʃ 头 +	{	-im	baʃim	我（我们）的头
		-iŋ	baʃiŋ	你（你们）的头
		-i	baʃi	他（他们）的头

撒拉语的动词丧失了人称和数的范畴。如：

men (piser) va (r) -xə.	我（我们）去。
men (piser) et-gi.	我（我们）做。
sen (selar) jyr!	你（你们）走吧！
sen (selar) mali gel!	你（你们）快来！
u (ular) va (r) -xə.	让他（他们）去吧！
u (ular) oj uteba (r) .	他（他们）正盖房。

西部裕固语的名词人称附加成分已退化。如：

bu menəŋ(məsɔŋ)Goj dro. 这是我(我们)的绵羊。

bu senəŋ (selernəŋ) Goj dro. 这是你(你们)的绵羊。

bu onəŋ (olarnəŋ) Goj dro. 这是他(他们)的绵羊。

西部裕固语的动词也丧失了人称和数的范畴。如：

men (məs) bahrɔə. 我(我们)去。

sen (seler) barəp dro. 你(你们)去。

gol (golar) barəp dro. 他(他们)去。

#### 四、汉语对突厥语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

突厥语族各语言在使用功能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汉语的影响。汉语的社会职能在日益增大，它对突厥语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不仅在不同的语言上，而且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阶层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级别，呈现出多层次的语言功能。

##### 1. 汉语在突厥语族不同语言中的功能不同。

我国突厥语族的八种语言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和青海三个省区。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受汉语的影响比其他突厥语言更大，在语言使用功能上所受的影响也更强。撒拉族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文，裕固族分别使用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和汉语三种语言。说不同语言的裕固族人民，相互之间以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其他的突厥语言则是本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

##### 2. 汉语在突厥语族同一语言的不同地区有不同功能。

突厥语族语言分布地区较广，就是在同一种突厥语言的不同地区，汉语的使用功能也有所不同。维吾尔族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全境，主要聚居于新疆南部。各城镇及新疆北部的维吾尔族多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杂居，会汉语的人多，使用汉语的频率也高。哈萨克族主要分布于新疆北部，多与汉族杂居。与草原牧场的哈萨克族相比，居住在城镇或与汉族杂居的哈萨克族大都兼通汉语。塔塔尔族人口较少，而且居住分散，许多塔塔尔人已经不会说塔塔尔语，而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或汉语。乌孜别克族多聚居在城镇，在本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一般使用乌孜别克语，而在其他社会交际场合多使用维吾尔语或汉语。柯尔克孜族的情况与乌孜别克、塔塔尔族基本相同。图瓦人主要居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由于社会语言环境、家庭成员的职业和民族组成等方面的影响，可以同时使用图瓦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汉语等多种语言。裕固族居住的地区不同，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同。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大河区、明花区的明海、莲花和皇城區金子滩、西城等地的裕固族，使用西部裕固语，而居住在明花区前滩和酒泉县黄泥堡等地的裕固族使用汉语，说不同语言的裕固族人民，彼此以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总的来说，汉语在突厥语族同一语言不同地区的使用功能呈现出城镇大于农村、牧场，杂居区强于聚居区的状态。

3. 汉语在突厥语族语言使用者不同年龄层次上的功能不同。

同一种突厥语的使用者在不同年龄层次上使用汉语的情况是不同的。一般说来，青少年的接受能力强，而且在学校大都学习过汉语文，兼通汉语的人要比他们的长辈多，使用汉语的能力也强于长辈们。西部裕固语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裕固族的大部分青年人都已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

4. 汉语在同一突厥语言使用者的不同阶层的功能不同。

同一种突厥语言的使用者在不同阶层使用汉语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城镇居民等使用汉语的能力和频率要大于农民、牧民。

## 五、结 语

通过汉语对突厥语族语言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 语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最先从词汇即借词开始，并在词汇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语言影响的不断加强，借词的数量逐渐增多，进而对语言的语音、语法及使用功能产生影响。语言影响呈现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2. 语言所处的地理环境对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有直接关系。地域相邻相近的语言，其影响较大，而地域不相邻或相隔较远的语言，其影响就小。同理，从一个语族或一个语系的语言来看，原来地域相邻的地区，受到不同语言的影响，那么这些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就会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其差异首先明显地反映在词汇的发展上。

3. 语言影响是民族接触、社会影响在语言上的反映，它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民族接触越多、社会影响越深，其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越大，反之亦然。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要存在民族的接触和社会的影响，那么语言影响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掌握语言影响的规律，是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那种无视于语言影响而片面地强调“纯化语言”、人为地制造“纯语言”的作法是错误的。同时，那种无视于语言内部规律而滥用或强加外来语言成分的作法也是错误的。

## 第七节 汉语对孟高棉语的影响

### 一、社会、语言概况

我国境内属孟高棉语族的语言有：布朗语、德昂语、佤语、克木语、不辛话、克蔑话、宽话、芒话、户话等，总人数大约50多万；其中布朗族、德昂族、佤族人数共有449716人（1990年统计）。

布朗族自称为“本人”、“蒲满”、“花蒲满”、“满”、“乌”、“陆娃”、“依娃”、“翁拱”、“波朗”、“波巴朗”等。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为和思茅、临沧等地区。少数散居在大理等地。布朗族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绝大多数使用自己的语言。分散在思茅、临沧的内地区，除少部分使用本民族语言外，其他人都已经通用汉语。此外，与傣族毗邻的傣族接触的会讲傣语，与汉语或别的民族毗邻的会讲一些汉语或别的少数民族语言。

德昂族自称为“冷”、“汝买”、“梁”、“布雷”、“饶进”、“饶可”、“饶波”、“昂”、“尼昂”、“纳昂”的等，散居于云南省德宏为以及保山、临沧，思茅地区所辖的各县。绝大多数使用自己的语言，分有布雷、若买、纳盎三种方言。由于他们散居在傣族、景颇族、佤族、阿昌族、汉族地区中间，和当地民族共同劳动，经济贸易相互往来，因此，成年人一般都兼通毗邻民族的语言，有的人甚至兼通多种其他民族语，其中以懂傣语的人居多。

德昂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男孩子从小就进佛寺读傣文，念傣文经书。所以，很多成年男子不仅会讲傣语，而且还懂傣文，有的佛爷还相当精通傣文。民间记事，书信往来，多用傣文。有的个别村寨，已经不会说本民族语言，而改用傣语。解放后，德昂

族同各族人民，特别是同汉族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密切，交往日益频繁，会讲汉语，会写汉文的人数不断增多。

佤族自称为“布饶克”、“布敖克”、“布劳克”、“阿佤”、“阿卧”、“拉佤”、“阿佻尔”、“龚佻”、“勒佻”和“佻”。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思茅、临沧地区所辖各县以及保山地区的腾冲县，西双版纳内的勐海县。有自己的语言，新中国成立后创造了佻文。佻文除了大部分在布饶克方言区使用外，其他地区尚未推广使用。部分地区的佻族与汉族、傣族、拉祜族等民族毗邻或交错杂居的，彼此间交往频繁，兼通这些民族的语言。解放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佻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事业不断发展，45岁以下的佻族中青年会汉语、汉文的人数逐渐增多。

总之，40年来，我国孟高棉语族兼用汉语的人数大幅度地增长，特别是干部、知识分子中，双语人占有很大的比例。在一些杂居区，年青一代转用汉语的人数比过去有所增加。在语言影响上，布朗族、德昂族、佻族解放前主要从傣族语中吸收一些语词。解放后，借词主要从汉语中吸收。从汉语对孟高棉语族语言的影响范围看族主要表现在语言、词汇方面。

## 二、孟高棉语族中的汉语借词

我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中的借词，有傣语借词、汉语借词两类。傣语借词，包括经文中的借词在内，属早期借词。汉语借词，主要是解放后借入的。

布朗语中的汉语借词，主要是解放后吸收的新词术语。例如：təŋ<sup>2</sup> ko<sup>24</sup>（中国）、koŋ<sup>1</sup> tə<sup>4</sup>（工作）、taŋ zian<sup>4</sup>（党员）、təŋ<sup>4</sup> tɛi<sup>4</sup>（政治）、kai<sup>2</sup> tɛi<sup>4</sup>（阶级）、so<sup>4</sup> siau<sup>4</sup>（学校）、saŋ tian<sup>1</sup>（商店）、noŋ<sup>4</sup> nie<sup>4</sup>（农业）、mei<sup>4</sup>（煤）、

su<sup>2</sup> tɕi<sup>4</sup> (书记)、tɕi<sup>24</sup> tɕi<sup>24</sup> tɕu<sup>2</sup> (自治州)、koŋ<sup>2</sup> sv<sup>4</sup> (公社)、vui<sup>4</sup> seŋ<sup>2</sup> (卫生)、tɕiŋ<sup>2</sup> tɕi<sup>4</sup> (经济)、tɕuoŋ<sup>2</sup> (砖)、tɕhu<sup>1</sup> (醋) 等。

德昂族分布地域较广，和汉、傣、佤、景颇等民族杂居，长期相互交往。因此，德昂族中有不少人会说这些民族的语言。解放前，德昂族和傣族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德昂语从傣语中吸收了大量词汇。新中国成立后，德昂族与汉族的关系日益密切，因而使德昂语从借傣语词转向借汉语词。基本情况是：

1. 借汉语词的速度比借傣语词的速度快。借傣语词时间至少有几百年，借汉语词时间只有四十多年，但从借入词的数量上看，汉语借词已超过傣语借词。

2. 借汉语词的面要比借傣语词的面宽。傣语借词多是名词，其次是动词、形容词，很少借用虚词，多借生活上日常用词，很少借政治术语。汉语借词不仅有大量的名词，而且也借入了一部分虚词。除一般日常生活用词外，政治术语占有很大的比例。

3. 过去傣语借词单音节的占多数。例如：

tɕu	辈	thu	篾
lv:n	月	sut	蚊帐
mug	万	heŋ	千
phra	佛	thai	梨

现在汉语借词则多音节的占多数。例如：

kuŋ	ɔv	公社	khuai	tɕi	会计
tɕuŋ	ɔo	中学	phi	phin	批评
jin	haŋ	银行	kuŋ	liɑŋ	公粮
kuŋ	tɕhaŋ	工厂	khyn	tin	肯定

佤语不论是基本词汇或一般词汇，都包含了一些外来成分。

佤语、德昂语和布朗借词方式，大多数是音译和音译加注，也有采取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

1. 音译

佤语	德昂语	布朗语	
kon <sup>2</sup> təhantəŋ	kuŋ <sup>2</sup> təhantəŋ	koŋ <sup>1</sup> təhan <sup>2</sup> taŋ <sup>4</sup>	共产党
ka <sup>2</sup> ifaŋ	kaifaŋ	kai <sup>2</sup> faŋ <sup>4</sup>	解放
təŋ <sup>2</sup> fɯ		təŋ <sup>2</sup> fu <sup>4</sup>	政府
phi <sup>2</sup> phiŋ	phi <sup>2</sup> phin	phi <sup>2</sup> piŋ <sup>4</sup>	批评
sehuit <sup>2</sup> zuzi		sv <sup>1</sup> hui <sup>1</sup> təu <sup>4</sup> zi <sup>2</sup>	社会主义

2. 音译加注

佤语:

krə <sup>2</sup> təh <sup>2</sup> lu	公路
路 车 路	
teu <sup>2</sup> pəu <sup>2</sup> təhai	包包菜
菜 包 菜	
ne <sup>2</sup> la <sup>2</sup> ru <sup>2</sup>	腊肉
肉 腊 肉	
man mau ni <sup>2</sup>	毛尼
布 毛 尼	

德昂语:

s'to ma kua	马褂
衣 马 褂	
bah khi təiu	汽酒
酒 汽 酒	
ban ŋi ruŋ pu	尼龙布
布 尼 龙 布	
?um sui khu	水库
水 水 库	

### 3. 音译和意译相结合

佉语

pak ta tɕhiu	球场
场 打 球	
zuh tɕhau	做操
做 操	

德昂语:

svy mɿʔ	墨线
线 墨	
nai thuŋ phau	铜炮枪
枪 铜 炮	
var tian	电线
绳 电	
n'dɛŋ pɿ jiu	柏油路
路 柏 油	

4. 德昂语中，汉语合成词的语素，大都是按汉语词序，语音是德昂语，语法是汉语。如：

ŋa:i tɕam	眼镜
眼 镜	
pu;t mɔ;ʔ	吹牛
吹 牛	

### 三、汉语对孟高棉语族语言的影响

汉语的ts、tsh这两个音位，在布朗族老年人，妇女都按本民族语言系统借入，读为tɕ、tɕh；而干部、青年人一般直接借汉语语音。读为ts、tsh。例如：

	干部、青年人	老年人、妇女
共产党	koŋ <sup>1</sup> tshan <sup>2</sup> taŋ <sup>4</sup>	koŋ <sup>1</sup> tshaŋ <sup>2</sup> taŋ <sup>4</sup>
政府	tseŋ <sup>2</sup> fu <sup>4</sup>	tseŋ <sup>2</sup> fu <sup>4</sup>
政治	tseŋ <sup>2</sup> tsi <sup>1</sup>	tseŋ <sup>2</sup> tsi <sup>1</sup>
工厂	koŋ <sup>2</sup> tshaŋ <sup>2</sup>	koŋ <sup>2</sup> tshaŋ <sup>2</sup>
政策	tseŋ <sup>2</sup> tshe <sup>4</sup>	tseŋ <sup>2</sup> tse <sup>4</sup>
检查	tsian <sup>2</sup> tsha <sup>1</sup>	tɕian <sup>2</sup> tsha <sup>1</sup>

德昂语借词语音，只有个别保留汉语语音特点，增加了新的成分，例如复元音ɣu。

佤语中原来没有ts、tsh两个音位，过去借入汉语的ts、tsh时，往往读成tɕ、tɕh，但随着汉语借词的增加，一部分群众已会发ts、tsh这两个辅音。如：

tsɿ liu <sup>2</sup> ti	自留地
tshɿ <sup>2</sup> tiŋ	词典
tsɿ tu	制度
tshɿ <sup>2</sup> tɕiu	持久

这些新增加的音位，成为佤语语音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佤语的汉语借词在语音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 在不带韵尾的高元音i、u、iu、io后面一般都要带喉塞音-ʔ，如pi<sup>2</sup>（笔），tɕhiu<sup>2</sup>（球），tsi ziu<sup>2</sup>（自由），tɕv<sup>2</sup> io<sup>2</sup>（哲学），在其他不带韵尾的元音后面，有时也带有-ʔ。如：tɕia fa<sup>2</sup>（加法），tɕiau thiau<sup>2</sup>（教条），tɕiŋ tɕie<sup>2</sup>（坚决）。但相对而言不如高元音i、u、iu、io带-ʔ的现象多。当然，还得根据说话人的年令、文化、水平和说汉语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2. 在佤语中-n和-ŋ韵尾是分得很清楚，并以此区别词义的如：tɕon（小勺儿），tɕoŋ（伞）。an（那），aŋ（不）。tin（远），tiŋ（三弦）。son（运气），soŋ（二）。但在汉语借

词，-n韵尾全部变成-n韵尾。如“产、县、粉、电”分别读成tʂhaŋ、siŋ、fʋŋ、tiŋ。

3. 侬语中松紧音对立很严，并以此区别词义，如tau<sup>h</sup>（爆炸），təu<sup>h</sup>（救）。lai（书），lai（松鼠）。gou（山），gou（茎）。但在汉语借词中，一律不分松紧，也不以此区分词义。可以自由读紧音或松音。

（本节参考和引用了李道勇等同志的编著的《布朗语简志》，陈相木等同志编著的《德昂语简志》，周植志等同志编著的《侬语简志》中的一些材料。）

## 第八节 汉语对高山语的影响

台湾高山族公认有22种语言，其中包括平埔人使用的10种语言和狭义的高山族使用的12种语言。<sup>①</sup>平埔人从17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地接触汉族移民文化，通过杂居、贸易、通婚，逐步实行民族大融合，至19世纪后期光绪年间，平埔人的大部分族群已转用汉语闽南话（详第四章第六节“高山族转用汉语”）。高山族除少数已不使本族语言之外，大多数使用双语，即在聚居区内使各自语言，社会交际主要使用“国语”（即汉语）或汉语闽南话。这种双语关系，从清代初步形成，经过抗日战争特别是近40多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而日益密切起来。

汉语对高山族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借词，即高山语向汉语借词。台湾是典型的汉移民社会，移民主要成分来自福建闽南地区。据估计，清代时漳泉籍闽南移民已占台湾人口的80%以上，遍布台湾平原与丘陵山区。从郑成功收复台湾至清代统一台湾约250年间，闽南人与高山族接触、交流日益广泛。高山族从

<sup>①</sup>平埔人使用的语言有噶玛兰语，凯达加兰语，路易朗语，道卡斯语，巴布拉语，巴布萨语，洪雅语，语邵；西拉雅语；高山族使用的语言包括阿美即阿眉斯语，泰雅语，赛德克语，曹语，卡那卡那富语，沙阿鲁阿语，排湾语，布农语，卑南语，鲁凯语，赛夏语，雅美语等。

南人那里引进农耕器具、生产技术、生活用品等，有关农耕生产、生活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借词，随之大量产生。

高山语中的闽南话借词有其独特特点。从语言系属与类型上看，高山语属南岛（即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是粘着型语言；闽南话是汉藏语系汉语的一个方言，属孤立语类型。闽南话词语借入高山语后，在服从高山语语音及语法规律的前提下加以简化，成为高山族语言的有机部分。

### 一、闽南话借词语音特点

台湾的闽南话声韵调系统比较复杂，共有声母14个、韵母77个、声调7个。高山族语言音韵系统相对简单，音位有16个（如卡那卡那富语）至27个（如排湾语）不等。辅音中没有送气音，浊音不多，有的语言如阿眉语斯语甚至没有浊的塞音、塞擦音。元音多系单元音，音节结构是辅音与元音的组合，每一个音节含一个元音，多音节词有重音，重音一般在最后或倒数第二音节。因此，有声、韵母加声调的闽南话词语借入高山语后，按照母语的语音规律被大为简化。

下面以阿眉斯语（Amis）、布农语（Bunun）、排湾语（Paiwan）为例，予以说明。

#### 阿眉斯语

语音对应	例 词		词 义
	借 词	闽 语 词	
p p	pawtaw pajsin	pǎt'au pàisin	斧 头 拜 神
p p'	apian pawa	ap'ian p'au'a	鸦 片 爆 竹

续表

语音对应		例 词		词 义
阿	闽	借 词	闽 语 词	
p	b	tiŋpaʔ	tībāʔ	肉 脯
m	b	əmi	béʔ	麦 子
		mua	būa	麻
f	b	faktsiw	bák' tsiū (目珠)	测 量
		fanta	bāŋta	蚊 帐
t	t	taŋluj	taŋlui	铜 钱
		tiŋtiŋ	tiŋ (戥)	称、斤
t	t'	tawki	t'auke	老 板
		tana	t'an'a	毯 子
t	ts	tiŋsi	tsiānsi	锅 铲
s	s	siŋsi	siānsī	先 生
		timsim	tīŋsim	灯 芯
s	ts'	sajtaw	ts'ai't'au	萝 卜
		siwtu	ts'iu'tō (手刀)	菜 刀
ts	ts	tsiwkəŋ	tsuikŋ	水 缸
ts	ts'	tsajna	ts'ainá	菜 篮
l	l	lamlam	lām	搀 混
		kulitsaj	kōlets'ai	洋 白 菜
ɬ	l	ɬitaw	luet'au	犁 头
k	k	kuŋkuan	kōŋkuán (公馆)	学 校

## 续表

语音对应		例 词		词 义
阿 闽	借 词	闽 语 词		
k k'		taŋkuj	tāŋkue	冬 瓜
		kiam	k'iam	欠 债
		kapua	k'āpuā' (脚钵)	瓦 盆
h h		huŋti	hōŋtē	皇 帝、头人
		huŋtiŋ	hōŋtiŋ	风 灯
x h		mixun	bihun (米粉)	挂 面
ʔ g		paŋxuj	p'aŋhē	香 火
		ʔukaŋ	gúkāŋ	公 牛
a a		apian	ap'ian	鸦 片
		kaa	ka?'a (背心)	坎 肩
i i		isiŋ	isiŋ	医 生
		tawsiw	tāusi (豆豉)	黑 豆
i e		emi	bē'	麦 子
u u		pawti	bōtē	麻 袋
		kuntaw	kunt'au	拳 术
u o		sajxu	sāihū	师 父
		kuŋpaj	koŋpaj (公牌)	证 书
u ɔ		satu	tǎ	斗
		etu	tō'	桌 子

说明：

1. 辅音基本上是同部位对应。其中闽南话的送气音变成不送气音，如P' > P、t' > t、ts' > ts、k' > k等；浊音变清音，如b > p。有些音尤其是闽南话有而阿眉斯语没有的音，用相近的音代替，如ʔ代g，f、m代b等。

2. 主要元音对应是：a/a, i/i, e, u/u, o, ɔ。闽南话里含有介音的韵母，在阿眉斯语里一般分解为单元音，分属不同的音节，如tūasōʔ > tu-a-su(大绳子)、kuā(瓜) > ku-aʔ(木瓜)等，或仅保留其中一个主要元音，如kaubūʔe(狗母锅) > kafuuj(沙锅)、p'au' a > pawa(爆竹)等；带[-i]、[-u]韵尾的，除被分解为单元音i、u外，也有演变为半元音j、w，如tuā kuī(大柜) > tuakuj(大衣柜)、t'auke > tawki(老板)等。含有介音与韵尾的韵母简化途径是：鼻音尾[-m]、[-n]、[-ŋ]与塞音尾[-p]、[-t]、[-k]、[-ʔ]等，一般被保留下来，如lām > lamlam(搀混)、puat'āŋ > paetaŋ(吊水桶)、t'anyiu > taŋjiw(桐油)、tāipak > tājpak(台北)、bāk'kiaʔ > fakiaʔ(木屐)等；含元音尾[-i]、[-u]一般变成半元音[-j]、[-w]，如puá'kiaŋ(跋九) > pakijaw(赌博、古钱) iŋts'ai > iŋtsaj(薤菜)等。

3. 闽南话单音节词一般变成双音节结构。演变手段是：前加弱化元音ə，如bēʔ > əmi(麦子)、tōʔ > ətu(桌子)等；前加构词成分sa，如tō(斗) > satu(斗)，或重迭如tiŋ(戥) > tiŋtiŋ(称、斤)、kaw(钩) > kawkaw(钩/镰)、ám(饮) > əaʔam(米汤)等。

4. 借词失去声调，加上重音。多音节词的重音在最后音节，如kāʔə > ka'a(坎肩)、bāŋtə > fan'ta(蚊帐)、t'ān > ə'tan(赚钱)、p'ua > pu'ak(剖开)等。

5. 借词词义有扩大、缩小与转移等情况。扩大的如：kafuuj“沙锅”原义“狗母锅”(沙锅之一种)、kapua“瓦盆”

原义“脚钵”、tuami“面条”原义“大面条”等；缩小，如kua<sup>?</sup>“木瓜”、原义“瓜”，?a<sup>?</sup>am“米汤”、原义“饮”，hugti“皇帝、头人”原义“皇帝”等；转移，如kaa“坎肩”原义“背心”、kugkuan“学校”原义“公馆”、siataw“车站”原义“火车头”、pakiaw“赌博、古钱”原义“跋九”等。

布农语

语音对应		例	词	词	义
布	闽	借词	闽语词		
p	p	pan	pán	瓶	子
p	b	piŋ	bīn	脸	颊
b	p	bataŋ	pua <sup>?</sup> t <sup>?</sup> áŋ	背水	桶
b	b	banta	báŋta	蚊	帐
		bintaŋ	bīnt <sup>?</sup> áŋ	面	盆
m	b	miahun	bihūn	面	条
			(米粉)		
t	t	taipak	taipāk	台	北
		tiŋhui	tiŋhue	灯	盏
	t <sup>?</sup>	bintaŋ	bīnt <sup>?</sup> áŋ	面	盆
d	t	daŋkuga	taŋkōŋ <sup>?</sup> a	罐	子
			(铜罐子)	弹	壳
s	s	simsi	siānāi	先	生
		sabun	sāpbūn	肥	皂
			(雪文)		
ɬ	l	tauɬu <sup>?</sup>	tāiliúk	大陆	人
			(大陆)		
		ɬiŋkiŋ	liŋkiŋ	龙	眼
k	k	kim	kim	金	子
		kuapiŋ	kúapiŋ	军	队

续表

语音对应	例 词		词 义
布 闽	借 词	闽 语 词	
ʔ h	ʔunti	(官兵) hóngtè	皇 帝 头 人
a a	ʔam	ám	米 汤
i i	isiŋ	yisiŋ	医 生
u u	sabun	sāpbún	肥 皂
o	ɔunti	hóngtè	皇帝、头人

说明:

1. 辅音基本上同部位对应, 其中闽南话送气音变成不送气音, 如  $t' > t$  等。

2. 主要元音基本对应: a/a、i/i、u/u、o 等。闽南话的复韵母一般分解为两个分属不同音节的元音, 如  $kuapĩŋ$  (官兵)  $>$   $ku-a-pĩŋ$  (军队), 或被简化, 仅保留一个元音, 如  $tāiliúk >$   $tauɬuʔ$  (大陆人)、 $siānsī >$   $simsi$  (先生)、 $puáʔt'āŋ >$   $bataŋ$  (背水桶) 等, 含有辅音尾的一般保留下来, 如  $bĩnt'āŋ >$   $bin-taŋ$  (面盆)、 $taipak >$   $taipak$  (台北) 等。

3. 借词失去声调。多音节词不但失去声调, 而且加上重音, 重音在最后第二节, 例如  $pan >$   $pan$  (瓶子)、 $bĩnt'āŋ >$   $bintaŋ$  (面盆)、 $lĩŋkĩŋ >$   $'tĩŋkiŋ$  (龙眼)、 $taŋkoŋ' a >$   $daŋ, kuŋa$  (罐子、弹壳) 等。

4. 借词词义有扩大、缩小与转移三种情况。扩大, 如  $daŋ, kuŋa$  “罐子、弹壳”原义“铜罐子”等; 缩小, 如  $ʔunti$  “皇帝、头人”原义“皇帝”等; 转移, 如  $tĩŋhui$  “灯盏”原义“灯火”,  $tauɬuʔ$  “大陆人”原义“大陆”、 $kuapĩŋ$  “军队”原义

“官兵”、miahun“面条”原义“米粉”等。

排湾语

语音对应		例		词	词 义
排	闽	借	词	闽 语 词	
p	p	puŋki		pũki	畚箕
		putsi		potē	麻袋
p	p'	luŋpaw		liŋp'au	龙袍
p	b	paʔetsiw		bak'tsiu	目测
				(目珠)	
b	b	baŋtʔa		baŋta	蚊帐
		bakia		bak'kiaʔ	木屐
m	b	ma		ba	麻木
v	b	vitaj		bit'ai	筛子
t	t	taŋkuj		tāŋaue	南瓜
				(冬瓜)	
t	t'	tana		t'an'a	毯子
t	tʔ	tʔiam		tiām	店铺
t	ts'	tajtsav		ts'ait'au	萝卜
ts	ts'	tsan		ts'an	水田
s	s	susi		sosi	钥匙
		siwtu		siuto	菜刀
				(手刀)	
l	l	laja		lai'a	梨子
k	k	kun		kun	裙子
g	k	gingin		kiŋkiŋ	龙眼
ʔ	k'	ʔapua		k'apuāʔ	陶钵
				(脚钵)	

续表

语音对应		例 词		词 义
排 闽	借 词	闽 语 词		
ʔ	g	ʔugaŋ	gúgaŋ	公牛
ʔ	h	ʔikav	híkāu	耳环
q	h	qunʔsuj	hūnts'é	烟斗
a	a	ma	bá	麻木
i	i	kim	kim	金子
u	u	kun	kún	裙子
u	o	susi	sósi	钥匙
u	ɔ	putʔi	pətʔi	麻袋

说明:

1. 辅音基本上同部位对应, 其中送气音变成不送气音, 如  $p' > p$ 、 $t' > t$ 、 $ts' > ts$  等。

2. 元音基本对应,  $a/a$ 、 $i/i$ 、 $u/u$ 、 $o/o$  等。闽南话的复韵母一般分解为单元音, 分属不同的音节, 如  $tiam > tʔi-am$  (店铺)、 $bāk'kiaʔ > ba-ki-a$  (木屐) 等, 有的元音尾变成半元音  $[w]$ 、 $[j]$  或擦音  $[v]$ , 如  $taiwán > tajwan$  (台湾)  $bit'ai$ 、 $> vitaj$  (筛子)、 $bāk'tsiu > paʔetsiw$  (目测)、 $tāŋkue > taŋkuj$  (南瓜)、 $híkāu > ʔikav$  (耳环)、 $ts'ai't'au > tajtsav$  (萝卜) 等, 辅音尾一般保留下来, 如  $kim > kim$  (金子)、 $táipak > tajpak$  (台北) 等。

3. 单音节词失去声调, 多音节词失去声调并加上重音, 重音在最后第二音节。例如,  $be > ba$  (马)、 $bá > ma$  (麻木)、 $púnki > 'punki$  (畚箕)、 $liónp'au > 'lunpaw$  (龙袍) 等。

4. 借词词义有扩大、转移等情况。扩大, 如  $ʔapua$  “陶钵”原义“脚钵”, 转移, 如  $siwtu$  “菜刀”原义“手刀”、 $taŋ$

kuj “南瓜”原义“冬瓜”、pa<sup>2</sup>ət<sup>1</sup>siw “目测”原义“眼珠子”  
quntsuj “烟斗”原义“熏吹”等。

综上所述，高山语的闽南话借词在音义上的共同特点是：

1. 借词是历史上福建闽南移民文化的产物，内容涉及农耕生产工具，如锄头、犁、畚箕、斧头、钩镰、耕牛；农作物尤其是果蔬栽培，如麦子、凤梨、洋白菜、蒜苗、南瓜、木瓜、萝卜等；生活用品，如锅、钵、盆、锅铲、毯子、蚊帐、裙子、烟斗、木屐、肥皂、水桶、米粉、筛子、桌子、罐子、瓶子、篮子、钥匙、灯火、提灯、水缸、菜刀；商业贸易及货币，如店铺、铜钱、斗、升、秤儿等；文化、宗教、娱乐，如学校、先生、医生、证书、庙、拜神、香火、赌博、鸦片、拳术等。

2. 借词的音系被大为简化。主要表现为：辅音中的送气音变成不送气音，浊的塞音、塞擦音在有的语言（如阿眉斯语）变成清音。复元音一般分解为单元音，分属不同的音节；元音韵尾[-i]、[-u]等一般变成半元音[-j]、[-w]，辅音韵尾[-m]、[-n]、[-ŋ]、[-p]、[-t]、[-k]、[-ʔ]等，处于词终时通常保留下来。

3. 借词失去原有声调，多音节词失去声调的同时，获得重音。

4. 词义一般全借，还有扩大、缩小和转移等情况。

## 二、借词语法方面的特点

### （一）构词

闽南话借词构词上的重要特点是：可以附加词缀或重迭，构成大量的新词，这是原来语言所不具备的派生动功能。例如，阿眉斯语前加ni-、ma-、pa-、tsi-、ha-、nisa-、nipa-、nili-、kala-、hatu-、tala-、masa-等，后加-ən，前后加ni--an，布农语前加ma-、ka-、pa-、min-、mat-、tis-、tin-、kat-

kan-、pis-、pan-、masu-、maku-等，排湾语前加<sup>?</sup>i-、su-、pa-、pu-、<sup>?</sup>ipu-、sanə-等，构成动词。举例如下：

阿眉斯语

- ni-tiqtiq (称) 称东西  
pa-tiqtiq 使称、给称儿  
ma-puak (破) 破开  
tsi-taqluj (铜钱) 有钱、带钱  
ha-fitsiq (米升) 当米升使用  
nisa-kafuuj (沙锅) 制造沙锅  
hatu-kaa (坎肩) 象坎肩  
kala-paətaŋ (吊桶) 当吊水桶用  
tala-tajpak (台北) 到台北去  
pala-tanjiw (桐油) 化成桐油  
masa-ɬitaw (犁头) 形如犁头  
nili-ətan (赚钱) 盈利、盘剥  
əmi-ən (麦) 把麦子割了  
ni-əmi-an 麦子被割完了、割好的麦子

布农语

- ma-tiqtiq (称) 称东西  
pa-tiqtiq 使称、给称儿  
ka-bintaŋ (脸盆) 做脸盆  
min-kuapiŋ (官兵) 服兵役  
tis-bataŋ (吊桶) 背水桶  
si-tiqhui (灯盏) 手拿灯盏  
ik-miahun (面条) 吃面条  
kau-taipak (台北) 去台北  
kan-tana (毯子) 踩毯子

排湾语

ʔi-gingin (龙眼) 摘龙眼  
pa-paʔətsiw (目测) 使目测、使测量  
pu-ʔapua (陶钵) 放陶钵  
ʔipu-susi (钥匙) 带匙钥  
sanə-kun (裙) 做裙子

借词附加表手段、时地、类别等意义的词缀，构成名词、动词。例如：

阿眉斯语

sa-pitaw (锄头) 锄地用的  
sapi-puak (破开) 破开某物的用具  
pawa-an (爆竹) 属爆竹一类的东西  
pi-əmi-an (麦子) 割麦子的时间 (地点)  
sa-kutsaj-an (韭菜) 韭菜园

布农语

is-tiqtiq (称) 称东西的用具  
pa-bintaŋ-an (面盆) 放面盆的地方  
bataŋ-að (吊桶) 背水桶一类

排湾语

pu-ba-an (马) 马圈  
pu-kutsaj-an (韭菜) 韭菜园  
papu-tiqsi-an (锅铲) 放锅铲的地方

借词通过部分音节或全部音节的重迭，或重迭后加词缀，派生新词。例如：

阿眉斯语

ʔukaʔukaŋ (ʔukaŋ公牛) 公牛群  
pajapaja (paja牌子) 每一张牌子  
nisa-kun̄kuakuan (kun̄kuakuan学校) 盖了一幢幢学校

布农语

tititiq (tiqtiq称) 称儿

simsisimsi (simsi 先生) 许多先生

is-titiŋtiŋ 当称儿使用

排湾语

kukun (kun裙子) 许多裙子

ʔikaʔikav (ʔikav 耳环) 许多耳环

lajalaja (laja 梨) 许多梨

pa-pangu-in (pangu放牛) 放牧的牛

## (二) 句法

闽南话词语借入高山语后，从缺乏形态变化变成有丰富的形态，句法手段从语序与虚词的窠臼摆脱出来，通过自身的形态及结构助词的帮助表示语法功能。最明显的例子是动词的时态变化。

借词构成的动词，有一套完整的表时态变化。拿阿眉斯语来说，借词pitaw（锄头）派生的动词有3种语态：ni-pitaw（用锄头挖，主动态）、ma-pitaw（被锄头挖，被动态）、pitaw-ən（拿锄头把…挖了，处置态）3种语态各有4个体的范畴，它们借助附加成分和词首部分重迭表示，分述如下：

### (1) 主动态

ni-pitaw 用锄头挖（一般体）

nani-pitaw 要用锄头挖（将行体）

ni-pitaw-aj 用锄头挖了（已行体）

nani-pitaw-aj 用锄头挖过（经验体）

### (2) 被动态

ma-pitaw 被锄头挖（一般体）

mama-pitaw 即将被锄头挖了（将行体）

ma-pitaw-a, 被锄头挖了（已行体）

na-mapitawaj 被锄头挖过了（经验体）

### 《3) 处置态

pitaw-ən 用锄头把地挖（一般体）

pa-pitaw-ən要用锄头把地挖了（将行体）

ni-pitaw-an用锄头把地挖了（已行体）

nani-pitaw-an曾经用锄头把地挖过（经验体）

布农语与排湾语以借词派生的动词时态，同样具有完整的形态词缀。布农语动词包括2种语态（主动态、被动态），各具9个时态变化；排湾语有2种语态（主动态、被动态），各具7个时态变化，这种丰富的时态功能特征，是汉语闽南话不具备的。

高山族语言属vos型语言，谓语一般在句子前面，主要依靠自身形态变化发挥句法功能，而主语、宾语、表修饰关系、表领属关系等成分，通过前加或后加结构助词表示。阿眉斯语、布农语、排湾语主要结构体系，如下表所列：

语种	助词	成分			
		表主语	表宾语	表修饰	表领属
阿眉斯		前加ku	前加tu	后加a	前加nu
布农		前加a	前加mas	后加tu	前加tu
排湾		前加a	前加ta	后加a	前加na

举例如下：

(1) 表主语

① awaa j ku safun. (阿眉斯)

没有了 肥皂

② ukain a sabun. (布农)

没有了 肥皂

③ nəʔa aŋa a sabu. (排湾)

没有 了 肥皂

肥皂没有了。

(2) 表宾语

① niatsa<sup>?</sup> kaku tu safun. (阿眉斯)

买 我 肥皂

② mabaɬivik mas sabun. (布农)

我买 肥皂

③ vənəli a<sup>?</sup>ən ta sabun.

买 我 肥皂

我买肥皂。

(3) 表修饰

① niatsa<sup>?</sup>an a safun (阿眉斯)

买的 肥皂

② binaɬivun tu sabun (布农)

买的 肥皂

③ vinəli a sabun (排湾)

买的 肥皂

买来的肥皂

(4) 表领属

① luma<sup>?</sup> nu siŋsi (阿眉斯)

家 先生

② ɬuma<sup>?</sup> tu issimsi (布农)

家 先生

③ umaq na sinəsi (排湾)

家 先生

由上所述，借词通过结构助词作为句法功能的形态标记，具有闽南话所缺少的句法手段，表现出一目了然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 第九节 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

朝鲜语是我国朝鲜族使用的语言，也是朝鲜半岛和其他国家的朝鲜族使用的语言。目前，世界上使用朝鲜语的人口大约有7千万人，除朝鲜半岛的6千多万外，朝鲜族人口比较多的国家有我国和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除了朝鲜半岛以外，我国是朝鲜族人口最多的国家，据1990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朝鲜族有1,920,597人，比8年前的1982年(1,766,439人)增长8.73%。

朝鲜语的系属关系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属阿尔泰语系。它与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的语言有很多差别，而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有许多共同点。如朝鲜语是一种粘着语，有元音和谐现象，用附加在词后的词尾（一般称为助词）表示格、数、态、时、式、尊称、阶称等语法范畴，语序上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前动词在后等。

在朝鲜语的发展过程中，汉语对朝鲜语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汉字和汉字词在丰富朝鲜语的词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长期以来，汉民族相对发达的语言和文化，对邻近地区朝鲜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起了多方面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源远流长，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即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时期。

第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语是朝鲜族的书面语。汉民族的文化通过其语言文字等形式，影响并促进朝鲜文化的发展，迄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朝鲜族的文字“训民正音”创制于1444年。在训民正音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朝鲜族把汉语借来作为自己的书面语；有了训民正音以后的400多年，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官方文书和文学作品有不少仍用汉语写成。朝鲜族用汉语写下的大量的诗歌、散文、官方文书、断代史、王朝实录和文言小说等，都是朝鲜族自己的宝贵文化遗产。这里有“广开土王陵

碑”（建于公元414年，现存吉林集安）、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往五天竺国传》残卷（作者为8世纪游历印度和中国的新罗高僧慧超）、金富轼撰《三国史记》（1145，三国指朝鲜的新罗、高句丽、百济）、一然撰《三国遗事》（写于13世纪）、纪传体的《高丽史》（1451，郑麟趾等撰），编年体的《高丽史节要》（1542，春秋馆撰，历时500年陆续编纂的《李朝实录》（实录厅撰，共1,763卷，5,000多万字）等。

这种书面语，是和朝鲜族自己的口语相脱节的。现在要考证训民正音以前朝鲜语的状况，难度很大。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些文人留下了可资参考的若干资料。北宋译官孙穆于12世纪崇元年间从使高丽，撰写《鸡林类事》。该书用汉字转写353个朝鲜语词，如：水曰没（现代音为[mul]，下同）、井曰乌没[umul]）、花曰骨（[kot]）、木曰南记（[namki]，现代音为[namu]）、后日曰母鲁（[moŋe]）等。于明朝1389年刊行的《华夷译语》收录了600多个朝鲜语词，对研究14世纪的朝鲜语，也有一定的帮助。《华夷译语》中的不少词语，是和《鸡林类事》相一致的。

由于朝鲜族长期把汉语当作书面语，朝鲜语就有可能较多地吸收汉语成分，以丰富自身的语汇。这样逐渐影响的结果，朝鲜语里便形成了汉字词体系，它在朝鲜语词汇体系中，占有仅次于固有词的重要位置。《鸡林类事》收录了当时使用的不少汉字词，如：

羊曰羊	鹤曰鹤	万曰万
兵曰军	吏曰主事	游子曰浮浪人
茶曰茶	绣曰绣	印曰印
瓶曰瓶	墨曰墨	旗曰旗
卓子曰食床	盘子曰盘	櫟曰櫟至
帽水曰帽	幞头曰幞头	东西南北同

也有与固有词并存的汉字词，以《鸡林类事》为例：

人曰人（固有词为 [saŋam]）

铜曰铜（固有词为 [kuŋi]）

黑曰黑（固有词为 [kəmta]）

死曰死（固有词为 [tsukta]）

年春夏秋冬同（固有词依次为 [hε]、[pəm]、[njəŋwum]、[kawJ]、[kjəul]）在现代有同义、近义关系的汉字和固有词。朝鲜语中大量存在着。

除了有文字可考的史料外，汉朝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所涉及的年代，最近已被证明可以上溯至公元1至2世纪。1991年12月7日在庆尚南道全海郡酒村面良洞里歌谷村出土的两件汉代“内行花文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韩国日报》1991年12月8日）

第二，吏读的产生与使用，当归功于汉字。吏读是从7世纪新罗时代起用到本世纪初李朝末年的一种汉语朝鲜语混合文字。字面上都是汉字；实词多用汉语而“虚词”多用朝鲜语，在后一种情况下，汉字只是记音的手段；句法从朝鲜语。吏读多用于官方文书，故有吏读之称，实际上也用于书信、契约等民间文书。它是借用汉字书写的朝鲜文，虽然不能算作理想的书写形式，但作为从汉语书面语过渡到“训民正音”（完全的民族文字）的中间阶段，有其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朝鲜民族文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吏读中使用的实词，后来大都作为汉字词留了下来”成为朝鲜语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吏读中的“虚词”则对研究古代朝鲜语的词法和句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用吏读形式写下的文学作品，如《新罗乡歌》、《高丽乡歌》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书写或解读吏读文，需要有相当的汉语功底，会识别实词和“虚词”。虚词部分的念法，又有训读与音读之别，如同日本人念汉字有训读音读之分一样。因此，现代人要弄懂吏读文，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国在明朝初年颁行《大明律》，朝鲜对它作了译解，用的是吏读形式，称作《大明律直

解》。举例如下：

[大明律原文]

凡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罪各等者，从一科断。若一罪先发，已经论决，余罪后发，其轻若等勿论，重者更论之，通计前罪，以充后数。

[大明律直解]

凡二件罪亦一时俱发为去等，从重论罪齐。二罪亦相等为去等，从一科断齐。一罪先发为，论罪已决后良中，余罪亦后发为，后发罪亦其轻戈只先发罪以相等为去等勿论遣，重为去等更良论罪为，前罪乙导良后罪良中并计论齐。

译文中不打着重号的是实词，词义与汉语相同；打着重号的是虚词，不可以照汉语的字义来理解。如，“亦”表示主格，“为去等”表示条件关系，与汉语的“若”、“如果”相同；“齐”是终结词尾，表示一个句子的结束，等等。

第三，自从训民正音创制以后，一直到如今的现代朝鲜语，汉语仍然给朝鲜语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词汇方面：(1) 从“汉语书面语”和“吏读”中筛选下来的为数不少的汉语词语，已在朝鲜语词汇中站住脚跟，成了朝鲜语中的汉字词；(2)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产生的汉语新词和术语，其中一部分有可能被吸收过来，成为朝鲜语汉字词的新成员；(3) 到了近现代，日本首先使用的许多汉字词，也被朝鲜吸收过来，成为朝鲜语汉字词中的新词术语。这种从日本转借过来的词语，朝鲜语要比汉语多一些。这些词语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广一些；(4) 朝鲜族自己也新造了一些汉字和汉字词，也成了朝鲜语汉字词中的一部分。上述四种情况，以汉语的影响而言，(1) (2) 属于直接影响，(3) (4) 属于间接影响。

颁布训民正音的文告是用汉文写的，并附上朝文译注。这里

仅举该文告“序文”部分的译注，看当时直读的方法、译文和注解（注解文字中只举汉字词的用例）：

[训民正音序]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

这段文字的朝鲜式直读法添加的朝语成分用音标转写如下：

国之语音[i] 异乎中国[haja]与文字[ɾo] 不相流通  
[haɾsse] 故[ɾo]愚民[i]有所欲言[hajato] 而不得  
伸其情者[i]多矣[ɾa]。 予[i] 为此悯然[haja] 新  
制二十八字[hanonni] 欲使人人[wɾo]易习[haja] 便  
于日用耳[niɾa]。

这段文字的译文除汉字词外，均用音标转写如下：

naɾat malssami 中国e tafa, 文字waɾo  
səɾu samatti ani halssɛ, iɾən  
詮次ɾu. əɾin 百姓i niɾukotsjə halpe  
isjəto mats'amne tse ttutəl siɾə p'jəti  
motəl nomi hanɾa. ne iɾuɾ 为  
haja əjətpi nəkjə sɛɾo sumuɾl jətəlp  
字luɾl meŋkanoni, saɾammata hejə  
suBi nikjə nallo ssurne 便安k'wi hakotsjə  
hal ttəɾaminila。

序文注解中使用的汉字词

中国	皇帝	常谈（常用的说法）
字	文字	詮次（原因）
百姓	为haja(为了)	便安（便利）

训民正音序的原文，一看便知是地道的文言文。“直读”对语序不作变更，只是为了便于理解，加了些朝语的词尾和辅助动词。它不是吏读文，因为吏读文须符合朝语语序，不过也可以看

作是汉语书面语和吏读之间的中间形式。译文完全是朝鲜语，多用固有词，少用汉字词，以便老百姓看懂。借用汉语作书面语也好，吏读文和朝鲜文也好，汉语的影响始终是很明显的。

在具体考察汉语对朝鲜语影响的时候，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词汇方面。而朝鲜语的汉字读音体系，则具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

朝鲜式的汉字读法，起初是模仿汉语古音的，后来经过千百年的变化和改造，逐渐形成了适合朝语语音体系，明显地有别于汉语语音体系的独特的体系；这个体系对于汉语而言又是封闭的，不再为汉语语音的变迁所左右。无论是元音还是辅音，朝鲜语的汉字读音，既保留着汉语的痕迹，也保留着汉语中业已消失的一些语音现象。

朝鲜民族使用汉语当作书面语，始于“三国”时期。（三国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先后建立，7世纪中叶，三国中的百济与高句丽为新罗所灭，后者延续至10世纪上半叶。接之而起的是高丽，到了14世纪末，高丽为李朝取代。）当时的汉字读音，应该说是非常接近于汉语原音的。一些学者认为，朝鲜形成独特的汉字读音体系，是在10世纪前后。其主要依据是北宋译官孙穆所著《鸡林类事》。元朝时期陶宗义编的《说郛》收录有《鸡林类事》的语言资料，即用汉字转写的朝鲜语单词350个。15世纪中叶，朝鲜创制民族文字“训民正音”，为准确表达汉语汉字和朝语汉字读音，提供了可靠的标音手段。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如何规范朝语的汉字读音。因为有两种倾向即两种标音方法，前者主张更多地遵循汉语的读音，后者则主张约定俗成，不一定拘泥于汉语的读音，而承认经过某些改造、更适合朝语语音体系的那种读法。训民正音创制初期编纂的《东国正韵》，是前者的代表，实际上不大可能行得通。以后的汉字读音的变化，诸如《训蒙字会》（1527年）、《千字文》（1583年）、《汉清文鉴》（1770年代）等文献所记载的汉字音，说明约定俗成的作法逐渐

占上风。现代的汉字读音体系，正是不断地把汉音加以民族化的结果。汉字的朝鲜式读法，来自于汉语，但它又是经过改造，服从于朝鲜语语音体系的那种读法。它与汉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为了便于比较，介绍一下现代的汉字读音是必要的。下面是朝鲜语里的汉字读音用音标转写，括弧里边是例字。

ka (家)	kjəl (决)	køk (截)
kak(角)	kjəm(兼)	køŋ (宏)
kan(肝)	kjəp (夹)	kjo (交)
kaI(葛)	kjəŋ (京)	ku (久)
kam(甘)	kje (界) 实发ke	kuk (国)
kap(甲)	ko (高)	kun (君)
kaŋ(江)	kok (谷)	kul (屈)
ke (改)	kon (困)	kuŋ (弓)
kək (客)	kol (骨)	kwən(权)
keŋ(坑)	koŋ (工)	kwəl (阙)
kə (去)	kwa (果)	kwe (轨)
kən(巾)	kwak(郭)	ky (贵)
kəl (杰)	kwan(官)	kju (规)
kəp (祛)	kwəl(刮)	kjun (均)
ke (揭)	kwəŋ(光)	kjul (橘)
kjək(格)	kwe (挂)	kwk (克)
kjən(犬)	kø (怪)	kwun (斤)
kwm(今)	kkik(喫)	
kwp(及)	kin (紧)	
kwŋ(肯)	kil (吉)	
ki (其)	kim (金) 金又音kwm	

这只是辅音[k]起头的音节，即“初声”为[k]的音节。可以充当初声的，还有n、t、r、m、p、s、ts、ts'、k'、t'、p'、h等辅音。另有零声母，即直接从元音起头的音节。举例如下：

a (我)	jaŋ (羊)	jəm (炎)
ak (岳)	ə (鱼)	jəp (菜)
an (安)	ək (抑)	jəŋ (水)
al (斡)	ən (言)	je (艺)
am (暗)	əl (孽)	o (五)
ap (压)	əm (严)	ok (玉)
aŋ (央)	əp (业)	on (温)
ɛ (哀)	e (殒)	ol (兀)
ek (液)	jə (如)	oŋ (拥)
eŋ (櫻)	jək (逆)	wa (卧)
ja (夜)	jən (延)	wan(完)
jak (药)	jəl (阅)	wal(臼)
waŋ(王)	wən(元)	wəŋ (应)
wɛ (倭)	wəl(月)	wi (衣) 实发 <sup>1</sup>
ɸ (外)	y (位)	i (二)
jo (要)	ju (有)	ik (翼)
jok (辱)	juk (肉)	in (人)
joŋ(容)	jun (允)	il (-)
u (右)	juŋ (融)	im (任)
uk (旭)	un (银)	ip (入)
un (运)	wl (乙)	iŋ (剩)
ul (蔚)	wm (音)	
uŋ (雄)	wp (邑)	

把现在的朝鲜汉字读音，拿来与现代汉语语音作比较，是不合理的。因为难以保障比较之共时性，朝鲜语现在的汉字读音并非来自于现代汉语，而是几经变迁之后，才形成的。尽管如此，作这种比较，对于了解朝鲜语汉字读音的现状，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仅以上边举例的126个汉字为限，考察其元音结构：

元音基本相同的，有18个字，占14.3%；  
 一种单元音变成另一种单元音的，有36个字，占28.6%；  
 单元音变成二合元音的，有11个字，占8.7%；  
 二合元音变成单元音的，有31个字，占24.6%；  
 一种二合元音变成另一种二合元音的，有23个字，占18.25%；  
 三合元音变成二合元或单元音的，有7个字，占5.55%。

基于上述统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变与不变，前者多后者少；“繁变简”与“简变繁”，前者多后者少；同一结构之间的变化（如一种单元音变成另一种单元音，一种二合元音变成另一种二合元音）占相当大的比重；朝语没有三合元音，二合元音中原先有过的前响二合元音，现在已经消失了，变成单元音（如哀位等）。

辅音的对应关系，则比元音单纯得多，且有明显的规律可循。这里只作结论性的交代。

朝语没有唇齿音，在语念唇齿音的，朝语一律念成双唇音。如：

[pal]发	[pəp]法	[pəl]罚	[pən]翻
[pan]反	[pem]范	[paŋ]方	[pi]非
[p'an]贩	[p'e]废	[p'uŋ]风	[p'ip]乏

朝语没有卷舌音，汉语的zh、ch、sh在朝语分别属于[ts]、[ts']、[s]等音位，汉语的r则在朝语里变成零声母，即无对应的音位可讲。如：

① [tsap]杂	[tsa]资	[ts'y]醉	[ts'an]钻
[tsəm]占	[tsaŋ]帐	[kap]闸	[sa] 诈
② [ts'ε]彩	[ts'o]草	[sa] 辞	[tson]存
[ts'a]车	[ts'uŋ]充	[si] 柴	[tso] 潮
③ [sa] 思	[san] 伞	[sam]森	[ts'uk]缩
[sa] 沙	[san] 山	[saŋ]上	[ts'o]哨
④ [jən]然	[jaŋ]让	[in]人	[il] 日

[juk] 肉 [jun] 润 [je] 锐 [juŋ] 融

瑞念[sə],这是例外,但此字在汉语某一方音中可能有声母[s]的成分,故有“瑞典”、“瑞士”等写法。这两个国名的外文写法通常是sweden和suisse。

现代汉语中以j、q、x为声母的字,在朝语中一般以[k]、[h]为其初声,为追寻古汉语的发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

- |   |         |         |          |           |
|---|---------|---------|----------|-----------|
| ① | [ke] 鸡  | [kil] 吉 | [ka] 家   | [tse] 济   |
|   | [kun] 军 | [kak] 觉 | [tsəl] 绝 | [tsaŋ] 将  |
| ② | [ki] 起  | [ke] 启  | [kok] 曲  | [ts'ən] 千 |
|   | [kə] 去  | [kun] 群 | [ts'y] 取 | [ts'u] 秋  |
| ③ | [hi] 希  | [ha] 下  | [ham] 咸  | [hjaŋ] 乡  |
|   | [hju] 休 | [sim] 寻 | [səl] 雪  | [sən] 旋   |

汉语中以lʃ为声母的字,朝语以[ʃ]代之。

如: [ʃa] 罗 [ʃe] 来 [ʃo] 路 [ʃi] 利  
[ʃjaŋ] 良 [ʃjən] 练 [ʃjək] 力 [ʃan] 乱

赁是例外,该字在朝语里念[im]。

在朝语汉字读音中,以[k]、[l]、[p]为终声的,其汉语占音必定是入声。如:

- |   |         |          |          |           |
|---|---------|----------|----------|-----------|
| ① | [kak] 角 | [tsək] 积 | [puk] 北  | [kwk] 极   |
|   | [sək] 石 | [tok] 独  | [sik] 息  | [tsak] 作  |
| ② | [jəl] 热 | [ʃəl] 烈  | [kul] 屈  | [səl] 设   |
|   | [mal] 末 | [hjəl] 血 | [tsil] 秩 | [tal] 达   |
| ③ | [jəp] 叶 | [səp] 涉  | [lip] 立  | [pcip] 乏  |
|   | [kap] 甲 | [nap] 纳  | [tap] 答  | [ts'əp] 捷 |

朝语的汉字读音,就其音节类型而言,有人统计有515个,约占朝鲜语常用音节的三分之一(从理论上讲,朝鲜语可以有3,192个音节,日常使用的只占其中一半)。汉字读音的这515个类型,比起现代汉语的音节来(指不考虑声调因素的音节)、还是多出100个。其原因之一、就是朝语中以辅音收尾的“终声”比较发

达。除了类似汉语的[n]、[ŋ]外，朝语的汉字读法中还有[k][p<sup>h</sup>][l][m]等可以在终声位置出现。

由于汉字读音的影响而改变朝鲜语传统的语音习惯，这些现象在一些地方正在出现。例如在朝鲜语固有词中，[ɸ]是不在词头出现的，[n]与[i]或半元音[j]结合的音节，也不在词头出现。但是对于汉字词，在北方允许这种音节在词头出现，而南方则沿用固有词的习惯。

汉字词除了在语音方面具有区别于汉语语音的一系列特征外，在词义、构词方式以及词的搭配等方面，也有不同于汉语的一些显著特征。现代朝鲜语词汇中的汉字词，包括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从其来源看，有来自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有转借于日语的，也有朝鲜族自己独创的。来自汉语的，数量最多；其次是来自日语的，多与近代文明有关，朝鲜族自己独创的汉字词，数量较少。

汉字词的使用频率在不同的文体里是不一样的。口语中的汉字词要比书面语少，文艺作品里的汉字词要比论说文少，自然科学论著里的汉字词要比社会学论著少，等等。关于汉字词的使用频率，以及汉字词在词义、构词方式、词的搭配等方面的特征，可以拿一份文件来作具体的分析。笔者最近对朝鲜北方和南方《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作了词汇方面的统计。

这个文件的总字数为1,719个字。为了准确地作出统计，没有把空格和标点符号计入字数。在这个文件中出现的汉字词共有261个，其中81个词是反复出现的，反复出现的次数，累计达285次。这样，汉字词所占字数即达1,132字，占全文总字数的56.85%。汉字词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谓词，须和固有词的词根连为一体出现，这种合成词，也算汉字词，但其固有词词根及附在后面的词尾，没有计入汉字词的字数之中。这种类型的汉字词，累计出现92次。固有词所占字面，包括附着在汉字词的格助词和

上述合成词中的固有词词根及其词尾等，共580字，占全文总字数的33.74%。其他外来词只出现两次，7个字，占全文总字数的0.41%。

这种文体，是汉字词用得较多的文体。在其他类型的文体和口语中，情况不会是这个样子。相对而言，越是生活化了的语言，汉字词出现的频率就越小。

关于汉字词的词义和构词特征等的分析，仍以上述文件为例，简述如下：

词义与现代汉语相同的汉字词，当然占相当大的比例。如：会谈、和解、交流、祖国、统一、共同、声明、阐明、原则、政治、军事、状态、民族、武力、侵略、冲突、紧张、缓和、保障、实现、利益、繁荣、关系、过程、形成、特殊、成就、努力……

词义与现代汉语不尽一致的，如：家族（家属，亦可指家庭）、亲戚（亲族与姻亲）、军缩（←军费缩小，即裁军）、节次（步骤）、向上（提高、增加，如“福利向上”即“增加福利”）、段阶（阶段；汉语的阶梯，朝语用阶段表示）、多角的（多方面的）、新闻（报纸；汉语的新闻，朝语则用汉字词“消息”或外来词[njusu]来表示）……

词义自明，但用字不尽一致的，如：念愿（愿望）、解消（解除）、协力（合作）、志向（向往）、成就（实现）、除去（消除）、图谋（谋求）、分野（领域）、讲求（谋求）、书信去来（书信往来）、对决（对峙、对立）、纷争（纠纷）、移动（转移）、统制（控制）、检证（检查验证）、各己（各自）、只今（现在）……

词与词组的划分，词的词类所属，体词转成谓词等，均按朝语本身的规则处理，因而呈现区别于汉语的一些现象。如：民族的、军事的、均衡的，等均作名词，而不是词组。这里的“的”是附在词根的后缀，而不是词尾（助词）。这些词是作为定语，而

同其后边的名词发生关系。只有“比较的”是例外，因为它是修饰其后边的形容词，作为副词充当状语。又如“巩固”这个词，它在朝语中可以作形容词（[koŋko hata]）、副词（[koŋko-hi]），但不能充当动词。词的词类所属，在汉语里是靠它的句子中的位置及其功能而确定的，不要求附加别的手段。而在朝鲜语里则要附加一些手段。如名词，一般要加格助词，动词、形容词要加[hata]（作动词时含有“做”的意思，作形容词时含有“肯定判断”的意思），副词则要附加[hi]、[i]等后缀。如：

- 干涉 [kansəp hata] (动)
- 努力 [noljək hata] (动)
- 紧密 [kinmilhata] (形)
- 紧密 [kinmilhi] (副)

名词性合成词组的构成，朝语的习惯用法与现代汉语不同，至少其中一部分词的用字与汉语不相一致。如：北南经济交流、协力共同委员会，北南军事分科委员会，合议书（协议书）、共同声明（联合声明），当局者（指有关当局的负责人）、构成员（成员）、相对方（对方）、暂定的（临时性的）、不可侵（不可侵犯、互不侵犯）、部门别（以部门为单位……）、高位级会谈（高级会谈；最高级会谈则用“顶上会谈”来表示）、北侧代表团（北方代表团）……

与近代文明相关联的词语，汉语和朝鲜语往往从日本转借过来。这种借自日语的词语，朝语要比汉语多一些。如郵便（邮政）、铁道（铁路）、道路（公路）、连络事务所（联络办事处）等。

在汉字词内部，朝语允许汉语式的语序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如动词在前，宾语在后，被修饰语在前，修饰语在后，但整个的汉字词，仍须遵循朝语的语法规则，即朝语将整个汉字词当作一个词，而不管其内部有无语序之颠倒。如：卧薪尝胆、切齿腐心、有名无实、缄口无言、背恩忘德（忘恩负义）、以身作则、颜面不知（素昧平生）、四顾无亲（举目无亲）、坚如磐

石、易如反掌（亦作“易反掌”）……

以上例词中，除最后一类外，均取自于最近的朝鲜北南协议书。这个文件，汉字词用得很多，但它们是北南双方共用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朝鲜族也是如此，所以有代表性。如果比较一下北南双方和中国的朝文报纸，就不难发现它们在汉字词的使用上，是有不同的习惯用法的。北方，用通俗易懂的汉字词多一些；南方，则往往用比较生僻的词，此时加括弧注明汉字或干脆用汉字排印出来；我国的朝文报纸，则直接译自汉语的新词术语多一些。由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产生的这些汉字词的异化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汉字词所覆盖的词汇领域，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通俗易懂的固有词所替代，词汇规范方面也明确地提出要求，让人们少用那些生僻难懂的汉字词；二是新词术语的来源多样化，来自印欧语系方面的外来词明显地多了起来，如大多数化学元素的名称和化工产品的名称，有关尖端科技的新词术语等，多从国际通用的外语形式引进，而不再从汉语重译过去。另外，书面语中不再夹写汉字，汉字词都要用朝文书写，这也制约着汉字词的滥用。

汉字词在朝鲜语词汇体系中，其不稳定因素显然大于固有词，但它不可能彻底消失。因为有一大部分汉字词包括在常用词和基本词汇之中，成为须臾不可或缺的语言材料。人们熟悉它，就像熟悉固有词一样。这是汉字词中最富生命力的一类。与此相对照的，是生僻难懂的汉字词，它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生命力不强，难免要遭淘汰。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而出现的一部分汉字词的消极化现象，也为汉字词的新陈代谢创造了条件。如旧社会较常用的汉字词，现在就不大用了，而现在常用的一些汉字词，在旧社会则不会是常用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1、汉语和朝鲜语虽然属于不同的语系，但汉语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对朝鲜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语曾经是朝鲜族的书面语，汉字又是书写吏读的工具，朝鲜族在使用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之后，仍在使用着大量的汉字词，汉字词在朝鲜语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外来词。

2 汉字的朝鲜式读音体系，是在吸收和消化汉语语音后产生的独特的体系，既照顾朝鲜族的语音规律和习惯，也保留了汉语古音的一些痕迹，对汉语古音的考证和溯源，无疑会有一些帮助。

3、汉字词在词义、构词和词与词的搭配等方面，均服从于朝鲜语的词法、句法规范，而不再受汉语的制约。汉字词既可以直接借自汉语，也可以借自于日本，朝鲜族自己也可以造词。汉字词内部存在优胜劣汰的现象，生僻难懂的汉字词往往被固有词或其他外来词所取代。汉字词的整理和规范化工作，是跨国界的一项现实研究课题。

## 第四章 少数民族转用汉语

### 第一节 满族转用汉语

#### 一、满族历史、语言概况

满族的先民可上溯到商周时的肃慎、汉至两晋时的挹娄、北魏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北宋至明时的女真。明代的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大部，其下又各分成许多小部落。当时的女真社会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不相统属，“皆称王争长，相互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sup>①</sup>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起兵，用了三十多年时间统一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金国汗。天聪九年（1635），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废除旧有“诸申”族名，改称“满洲”，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正式产生。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又改国号“后金”为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满族也由东北走向全国，并上升为统治民族。宣统三年（1911）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由于反动军阀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许多人错误地把满族人民与清政府相提并论，满族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清代末期，满族人口约四、五百万，到了民国年间，满族人隐瞒民族成分，人口锐减到15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民族成分返祖归真，满族人口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趋势。1978年人口普

<sup>①</sup> 《满族实录》，华文书局本，第20页。

查，满族人口为265万多人。1982年上升到429万多人。到了1990年，则达到980多万人，成为仅次于壮族的第二大少数民族。满族人口的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全国各地都有满族人居住，其中人口较多的省份是东北三省及北京、河北、新疆、甘肃、宁夏等省区。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由女真语发展而来的。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借用蒙文字母创制满文，俗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皇太极于天聪六年（1632）命达海对老满文进行了改进，俗称“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乾隆年间，统治者对满文进行了大规模的规范化，目的是排斥满语中的汉语借词，以消除汉语的影响。规范以前的满文，被称为“旧清语”。规范后的满文称为“新清语”。乾隆十三年，命傅恒等人依仿汉文篆字创制了三十二种满文篆字。同年，命允禄等人在原有满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十多个用来拼写梵文的新字母。满文在清代主要用来撰写各类文书及翻译汉文典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仅档案一项，全国有关档案馆就存有二百多万件。此外，清代还编撰了多种满文辞书。

## 二、满族转用汉语的情况

### （一）转用过程

#### 1、清代初期的单语阶段

这一段历史时期是指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三朝。入关前，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政权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其社会性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及奴隶社会阶段。渔猎经济在满族人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位置。虽然农业经济在汉族经济的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迁入满族地区或在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沦为满族贵

族的奴隶。满族和汉族的大量接触刚刚开始，因此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深，仍保持着浓郁的民族风貌。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满族上升为统治民族。随着对南明政权及农民起义军战争的不断胜利，八旗兵丁也不断向广大的汉族地区推进。由于生活在汉族的海洋中，满族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许多满族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现了许多兼通满汉语的双语人。但是，语言的转用毕竟是长时间的渐进过程，加上连年战争，民族矛盾仍很尖锐，因此，大多数满族人仍不会汉语，满语做为母语，仍是他们唯一的交际工具。可以说，在顺治朝后期以前的满族只通晓满语的单语人占多数的社会。

关于满族转用汉语的情况，尽管在清代遗存下来的各类史料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统计式的确切记载，但我们仍可以借助一些史料的片断记述，对满族转用汉语的过程，划分出大致轮廓。在努尔哈赤时期，不仅满族人通晓汉语文的人极少，即使在汉族人中，也很难找到粗通文墨之人。“当时女真人中无一通文墨者，唯被掠之汉人龚正陆粗识文字，被努尔哈赤视为上宾，让他掌管文书，参与机密，教诸贝勒读书。初期一些外交文书皆出自龚正陆之手”。<sup>①</sup>又据朝鲜《申忠一图录》记载：“歪乃本上国（指明朝）人，来于奴酋（指努尔哈赤）处，掌文书云，而文理不通。此人之外，更无解文者，且无学习者。”<sup>②</sup>到了皇太极时期，通晓汉语、汉文的满族人多了起来，出现了一批通晓满汉语言文字的知识分子，如达海、库尔缠、尼堪等人。但绝大多数满族人仍不通晓汉语。面对“满大臣不解汉语”的情况，皇太极不得不“每部置啓心郎（翻译官员）一员，以通晓国语（满语）之汉员为之”，<sup>③</sup>以解决满、汉人语言不通的问题。为了提高本民

①赵志辉：《满洲的勃兴与民族的融合》，载《满族研究》，1980，4。

②转引自肖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5年，卷上，第。

③（清）昭桂：《雍享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41页。

族的文化素质，皇太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满族人学习先进的汉文化。但他“患人不认汉字，罔知治体”，因此，“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sup>①</sup>到了顺治年间，学习汉族语言文化的人迅速增多，汉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如顺治皇帝的汉文化水平，已远非努尔哈赤、皇太极可比。他14岁始学汉文，不但“博览史书，无不贯通”，而且“尤善绘事”，并且喜欢用手指作画，所绘的《牧牛图》，被誉为笔“意生动，虽戴嵩莫高焉”。<sup>②</sup>他还崇尚儒学，开设了“日讲”制度，将皇上研读儒家经典当作制度固定下来。此外，他还御撰《牛戒》、《内则衍义》、《御注孝经》、《劝学文》、《劝善要言》等书。皇帝如此，满族官吏也纷纷效法，积极学习汉族语言文化。正如乾隆皇帝所说：“满洲等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统一以来始学汉文。”<sup>③</sup>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崇尚汉文化的风气，只流行于贵族子弟之中，对于广大八旗兵丁来说，一是没有条件学习，二是多数人长年效命疆场，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小。尽管通晓汉语的人多于汉语、汉文兼通的人，但在满族人口中仍是少数，即使是王公贵族，仍然“无不弯弓善射，国语纯熟”，<sup>④</sup>保存着古朴的遗风。只不过在他们中间，满汉语兼通的双语人较多而已。因此，这一时期，仍然是只通满语的单语人占多数的时期。

## 2、清代中期的双语阶段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发展的中期，也是清王朝的全盛时期。随着八旗军队消灭了残存的南明政权，以及对西藏、新疆、台湾等地的有效统治，全国出现了大一统局面。早在皇太极时期，清政府便派遣八旗兵丁对占领地区实行驻防。到了乾隆年间，全国的驻防体系基本完成。考虑到驻防的长期性，清政府

<sup>①②</sup>(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396页。

<sup>③</sup>《清高宗实录》，卷443，第28页。

<sup>④</sup>(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允许八旗兵丁携眷驻防，从而形成了满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经济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东北一些地区的满族人之外，关内的满族已抛弃了世代相延的落后渔猎经济，步入了更先进的农业经济。“骑射”，做为满族渔猎经济生活中赖以生存的技艺，现在已成了娱乐消遣活动。由于居住环境、经济生活的改变，以及生活在汉族的海洋中，受汉文化的日益侵染，这一时期的满族社会，已成了兼通满汉语的双语人占多数的社会。满族步入了转用汉语的双语时期。

· 这一时期，满族贵族仰慕汉文化，附庸风雅，以文士自居蔚然成风。“世家胄子，暨闲散俊秀，涵濡教化。陶泳文章，彬彬乎贤材蔚起矣。”<sup>①</sup>受王公贵族的影响，满族平民也纷纷效法。“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满族不仅普遍通晓汉语，而且汉文化的修养，也明显提高。康熙时，八旗子弟应院试，考取六十多人。当时有人说：“初谓旗下无文章，不意成章二百多卷，取之不尽，尚有三十多卷，皆遗珠也。”<sup>③</sup>面对满族已普遍通晓汉语的局面，康熙皇帝于十年正月下令，悉罢在京各部院及在各将军衙门之译员。<sup>④</sup>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乾隆朝中后期，满族不仅普遍通晓汉语，而且出现了放弃本民族语言的趋势。这种情况，使统治者深感不安。从现存史料来看，乾隆时期，有关强调“国语骑射”“为满洲根本”的谕旨明显多于康熙、雍正二朝。说明这一时期的满语，已面临着被汉语取代的关键时期。清代规定，满官俱奏，必须用满文，到了乾隆末年，由于许多满官已不通晓满语文，因此，不得不“俱准其用汉字缮写，庶声叙较可明晰，不致牵混”。<sup>⑤</sup>正如《八旗文经》所载，入关前后，“综满洲、蒙古、汉军皆通国语。……百年以后，已不能人人尽通”<sup>⑥</sup>了。如果说，康熙朝满族皆通满

①②③转引自张国昌《满族教育在清代》，《满族研究》，1986，3。

④《清圣祖实录》卷35，第5—6页。⑤《清高宗实录》，卷1477，第9页。⑥《八旗文经》，光绪二十七年刊本，卷97，第4页。

语，其中大多数人是满汉语兼通的双语者的话，到了乾隆中后期，情况却恰好相反，即满族已普遍通晓汉语，多数人仍通晓满语。尽管如此，由于双语人仍占多数，因此，乾隆中后期，仍是满族转用汉语的双语时期。

### 3、清代后期的单语阶段

这一时期，是指从嘉庆初年到清王朝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语言的转用，步入了由满汉双语到以汉语为主要交际工具，满语逐渐消亡的演变过程。清王朝由乾隆后期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八旗兵丁在清代初期的那种弯弓强射、豪气干云的民族进取精神已荡然无存，代之以骄逸自安、萎靡不振。八旗制度中的弊端更加暴露无遗。清王朝统治者为了保持八旗兵丁旺盛的战斗力和防止受汉文化的影响，采取各种严厉措施，不许八旗兵丁和汉人接触，不许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而粮饷有限；从而导致“八旗生计”问题的产生。正如时人沈起元痛切指出的：“甲不能遍及，而徒使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以内。于是其生日蹙，而无可为计，非旗人之愚不能为生也。”<sup>①</sup>随着“八旗生计”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清代后期各种禁约的不断废弛，八旗兵丁不断冲破各种束缚，与汉民杂居，从事生产劳动。如北京地区的“八旗满洲官员、兵丁，旧制不得在南城居住，而乾隆十八年在外城居住者已400余家。奉旨严饬禁止。至道光年间，以生齿日繁，移居逾众，遂弛此禁。”<sup>②</sup>“八旗生计”问题使满族旗人冲破各种禁令，与汉族频繁交往，学习汉族的生产技术，这在客观上，加速了满族转用汉语的进程。嘉庆年间，满语的社会交际作用已很小，放弃满语改操汉语已成为定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语人不断减少，以汉语为唯一交际工具的单语人逐渐增多。到了咸丰、

①《皇朝经世文编》，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卷35，第17页。

②(清)吴振城：《养吉斋丛录》，卷25，第294页。

同治年间，会满语的人已很少，绝大多数人已完全成为只会汉语的单语人。到光绪年间，全国除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外，会满语的人已寥寥无已了。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时期满语已基本消亡。

这种情况在现存的满文档案中有明显的反映。清代满官上奏，必用满文，这一规定执行到嘉庆初年就很难执行下去了。由于满族官员大多数人已不会满语文，因此题本、奏折多延请通晓满文的人来写。因此，嘉庆朝的满官奏折中，满汉合璧的明显增多，甚至有直接用汉文上奏折的。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中关于嘉庆七年已形成“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sup>①</sup>的记载，正是这一时期满语文衰落真实写照。同治、光绪年间，连这种满汉合璧的奏折都越来越少，许多满族官员只用汉文撰写奏折。即使在满汉合璧的奏折中，满文也只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满语文的衰落，不仅表现在满文文书的大量减少，还表现在用满文撰写的文书中错误较多。清代后期，满文奏疏中的错误时有发生，而行文于各级衙门之间的官府往来文书中的错误现象更是随处可见。

从翻译情况看，清代初期的翻译活动，都是将汉文译成满文，满文译成汉文的情况极少。原因是满文产生的时间很短，用满文撰写的书籍很少。另一原因就是当时的满族人通晓汉语文的人较少，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主流是汉译满。到了嘉庆朝以后，情况却恰好相反，满译汉或采取满汉合璧的形式再版满文原书的情况多了起来。如顺治皇上御撰的《劝善要言》一书，最初是以满文刊行的，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不得不译成汉文，以使满族官民能够读懂。

再从科举考试方面来看，清代科举中，设有翻译科，其目的是选拔翻译人才。清代中期无论考生人数还是考生的满文水平，都是这一时期所不能比的。仅以乾隆十六年翻译会试与道光八年翻

<sup>①</sup>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47《八旗都统·公式》。

译乡试为例，乾隆十六年会试参加者达500多人，而道光八年参加者只有130余人。前者共取中进士16名，而后者中试举人仅8名，而且“复试时因文理不通，错误太甚，被罚停科者四名。”<sup>①</sup>会试本比乡试规格要高，即便如此，仍很难找到合格人选。这一时期满语文的衰落，于此可见一斑。

## （二）转用的地域层次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清代较早转用汉语的是驻防在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及中原等关内地区的满族人。如广州现有满族3000多人，他们多是清代八旗满洲兵丁的后裔。为了消灭南明绍武政权，八旗满洲兵丁于顺治四年首次涉足广州。乾隆二十一年首次正式派八旗满洲兵丁驻防广州。此后不断增派驻防满洲旗兵，并允许携带家属，从此满族人便在广州定居下来。由于驻防旗兵在未来广州之前即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何况驻防旗人与当地民人的交往比较自由和频繁。因此，“八旗满洲子弟闲时经常出入于广州城内的茶肆、酒楼、书馆、武场，迅速接受了不少汉人的习俗和文化。到粤驻防不久，对外交往中，满语便逐渐被汉语所替代”。<sup>②</sup>道光七年，皇上因广州将军竟找不到会写满文奏折的人十分恼怒，伤曰“深染汉习殊为可笑！”可见，最迟至嘉庆中后期，广州满族已完全改操汉语文了。

其次为京畿地区。这一地区尽管在天子脚下，统治者不断“申饬”、“晓谕”，但到乾隆时，满语文的衰落已使统治者深感忧虑和不安。乾隆六年三月皇上因“近见满洲子弟，渐耽安逸，废弃本务，宗室章京侍卫等，不以骑射为事，亦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而大为恼怒，下令“不谙清话者，定治以重

<sup>①</sup>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518页。

<sup>②</sup>马协弟：《清代广州满族述略》，《满族研究》，1988，1期。

罪。”<sup>①</sup>第二年，又训谕：“满洲人等，凡遇行走齐集处，俱宜清语，行在处清语尤属紧要，前经降旨训谕。近日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俱说汉语，殊属非是。……嗣后，凡遇行走齐集处，大臣侍卫官员以及兵丁俱著清语。将此通行晓谕知之。”<sup>②</sup>乾隆二十六年上谕中指出，一些官员“不唯清话生疏，甚至不能说者，……由此而推，则衙门各员内不能清语者，当复不少。”<sup>③</sup>由此可见，乾隆初期，一些满族人不愿说满语，而到了中期，一些人已不通晓满语。虽然这一时期京畿地区的满汉双语者仍占多数，但满语文衰落速度之快，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道光十七年上谕中指出：“朕因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人数众多，其能否通晓清文末能概知，是以特命分日进内考试。其中翻译通顺及稍有错误者不过十之三四，竟有不能落笔者过半……。”<sup>④</sup>这一时期虽然仍有一些满汉双语者，但多数满族已成只会汉语的单语者了。至清末，“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邈无闻。”<sup>⑤</sup>

再次为东北地区。该地区满族转用汉语，除辽沈地区外，其它地区要晚于全国各地。肖一山先生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满洲人固皆在旗，而旗人（指关内满人）之生活，则不必尽同于满洲（指关外之满人）。”即生活状况不同所造成的。因此“八旗人丁，无论驻防外省或居京师者，皆略染华风，其仍住满洲（指东北），从事耕牧者，则犹存古道。”这一论述，较早指出了东北满族较晚转用汉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又认为“至满洲旗人，多良而醇，率不轻与汉人交，故虽流入迁客，充斥东北，而各自为俗，绝不相类。”<sup>⑥</sup>则未免过于笼统而有些失之偏颇。事实上，由于东北不同地区与汉族大量接触的先后有别，各地区满族聚居

<sup>①②</sup>《清高宗实录》，卷127。

<sup>③</sup>佟永功、关嘉录：《论满文的使用及其历史作用》，《满学研究》，1987，3。

<sup>④</sup>《清宣宗实录》，卷78。

<sup>⑤</sup>（清）震钧：《天咫偶闻卷10，》第208页。

<sup>⑥</sup>肖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上，第60页。

程度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不同等原因，使东北不同地区的满族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满族转用汉语的过程也有先后之别。

转用汉语较早的是辽沈地区。盛京虽然是“龙兴重地”，清代统治者对此地区的“国语骑射”尤为重视，但由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较早，与汉人的大量接触早在清军入关前就已开始，因此东北地区满族转用汉语首先在这一地区显露端倪。乾隆十二年引见盛京补放新满洲佐领时，发现“清语俱属平常”。乾隆吃惊地说：“盛京系我满洲根本之地，人人俱能清语，今本处人员竟致生疏如此。”<sup>①</sup>乾隆四十年上谕：“今见吏部带领引见之盛京兵部送到指缺补放户部笔帖式，果翁，除履历外，询以清语全然不能。果尔敏系考取帖笔式，又系盛京本地之人，清语自然熟练，乃至全然不能，实出意外。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风气日下至于此极，尚可向呼！”<sup>②</sup>由此可见，盛京地区满族转用汉语在乾隆年间已相当严重。到了光绪年间，“此地（指福陵、永陵）尤多满人，散在各处，如盛京则只居住满人，然不闻话满语者。”再从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清代盛京内务府同北京总管内务府来往的文书档案情况来看，顺治、康熙两朝的满文档案文件占绝大多数，雍正、乾隆两朝的满、汉文档案文件参半，而嘉庆朝以后的汉文档案居多，同治、光绪朝几乎看不到满文档案文件。尚应指出，嘉庆朝以后的满文档案，书写错误较多，词法和句法也多舛错。<sup>③</sup>可以推测，盛京地区满族转用汉语与京畿地区相仿，甚至略早于京畿地区。

其次为吉林地区。这一地区开发较晚，与汉族的大量接触始于道光年间，因此转用汉语明显晚于盛京地区。成书于道光年间

<sup>①</sup>转引自梁志忠《清代东北满族“国语骑射”的保存与衰微》，《满族研究》，1987，第3期。

<sup>②</sup>《奉天通志》，卷34页。

<sup>③</sup>（日）小越平隆《满洲旅行记》，第7—8页。

的《吉林外记》中记载：“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近数十年流民（指汉人）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然满洲聚族而处者，犹能无忘旧俗。”<sup>①</sup>此外，书中还指出汉人云集、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里，其语言的转用要比满族聚居的村屯要快得多。“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乃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惟赖读书仕宦子弟之家，防闲子弟无使入庄岳之间，娶妇择屯中不解汉语者，以此传家者，庶能返淳朴不改乡音（指满语）乎？”<sup>②</sup>到了咸丰年间，这一地区的满族才基本上转用汉语，进入了以汉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单语时代。”<sup>③</sup>

最后为黑龙江省。该省在清代开发最晚，当地居民以满族、达斡尔族及其他通古斯民族为主体，直到清代末期这里的汉族移民仍不多。和全国一样，黑龙江省满族转用汉语在不同地区也有先后的区别。较早转用汉语是该省东部地区及哈尔滨市附近地区。如嘉庆八年五月，引见宁古塔（今宁安县）防御色克金保时，因他不能清语而遭到皇上的训斥。另据《呼兰府志》记载：“呼兰旗营档案，自乾隆初年至咸丰末年，皆用清文，汉军、官庄壮丁虽操汉语，而文字仍用满洲文，公牍作汉语者，鲜能通其音训。同治以后，清汉文俱有之。光绪中叶，语言文字俱从汉俗。近日满洲人能通清语者，不过百分之一，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之一二人而已。”<sup>④</sup>居住在黑龙江省北部黑龙江流域及西南部嫩江流域的满族，至今仍有少数满族老人在使用满语。不过语言的使用，仅局限在家庭内部，公共场合已基本不再使用了。

### （三）满族转用汉语的几点结论

#### 1. 单语→双语→单语

<sup>①②</sup>《吉林外记》，卷三。

<sup>③</sup>赵展：《满族的文化类型及其演进过程》，载《满族研究》，1989.3

<sup>④</sup>转引自杨学琛《略论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

从前文可以看出，满族转用汉语的过程，经历了由单一满语满汉双语再到汉语单语三个阶段。

## 2. 社会→家庭→消亡

清代满语丧失其社会交际功能约始于嘉庆初年，当时统治者反复强调“国语骑射”，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交往中，满族使用满语进行交际正在大量减少。社会交际功能的逐步丧失，使会满语的满族人只能在家庭内部等较小的圈子里使用满语。黑龙江省现存的满语在50年代就已基本上丧失了社会交际功能，只在部分满族家庭内部使用满语的情况也已很少了。一种语言，一旦失去了社会交际功能，也就注定了它消亡的命运。

## 3. 江南→京畿→东北

八旗满洲兵丁在驻防江南地区后不久即开始转用汉语，此后满族转用汉语呈现出由南向北推移的趋势。由于江南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尽管八旗兵丁在康熙、雍正时期才正式在这一地区驻防，但由于这些八旗兵丁在此地区驻防前就已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加上驻防兵丁在人数上占极少数，因此，在不长一段时期就迅速转用了汉语文。此后这种语言的转用又推移到中原及西北地区。之后又推移到京畿及辽沈地区，再后是吉林及黑龙江地区。这种由南向北的逐步推进表明，满族转用汉语的先后，是和受汉文化影响的先后及与汉族交往的频繁程度、满族聚居程度密切相联系的。

# 三、转用汉语的社会历史成因

## (一) “满汉联合”的国策

满族做为东北的一个渔猎民族，在入关之前，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远远落后于汉族。满族统治者若仅靠本民族的力量，以一个人口不满百万的落后民族，推翻明王朝，统治幅员辽阔、数以亿万计的汉族及其他民族，是十分困难的。满族统治者

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清太祖努尔哈赤虽有压迫汉族的一面，但为形势所迫，重用了大批汉族官吏及知识分子。如抚明顺游击李永芳率领兵民归降，努尔哈赤升他为副将，并将孙女嫁给他。到了皇太极时期，则发展成“满蒙联盟”、“满汉联合”的国策。所谓“满汉联合”，就是以满族贵族为主，拉拢汉族地主官僚及知识分子，实行联合专政。如原驻皮岛的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投降，则加官进爵，不但没有解散其原来的编制，还在八旗制度容许的情况下，另作优待处置，称之为“天佑军”和“天助军”。同时，采取联姻的方式，将宗室之女下嫁给他们。皇太极这种对待汉族的政策，引起了许多满族贵族的不解与不满。如《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一段满人语：“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sup>①</sup>对此，皇太极曾解释说：“朕对于早归及新降之汉官，皆不惜衣服、财帛、马匹、牲畜加以恩养，又每天三次赐宴，这岂不是件麻烦事？但我就要使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sup>②</sup>这段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提高各级官吏的文化素质，清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网罗汉族知识分子。早在皇太极时期，后金政权就对沦为包衣和奴隶地位的汉族知识分子实行开科生员考试，凡中试者，皆免其奴籍任用。对此，皇太极曾诏谕诸见勒说：“朕思自古及今，俱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朕欲兴文教考取生员，诸见勒府以下，及满、汉、蒙所用生员，慎令赴考，家主不得阻挠，考中则以丁偿之。”<sup>③</sup>因此，自1629年开始，以后1634、1636、1641年又继续举行科举考试，先后吸收了大批文士充实各级机构，改变了原来重武轻文的风尚，为入主中原储备了人才。顺治二年，范文程提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

<sup>①</sup> 赵志辉：《满洲的勃兴与民族的融合》，载《满族研究》，1989，第4期。

<sup>②</sup> 《清太宗实录》卷22，第22页。

<sup>③</sup> (清)汪先谦：《东华录》，转引自《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03页。

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sup>①</sup>尽管当时对南明政权及农民军的战争仍很激烈，摄政王多尔衮还是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顺治三年，首次开科取士，录取进士300名，第二年会试，又取进士300名。从此，开科取士成了清王朝网罗人才的重要手段，许多汉族文士，成了清王朝运筹帷幄的名臣。

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在客观上，却对满族吸收汉族的语言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满汉官吏共同处理政务，文檄往来，耳濡目染。由于汉族知识分子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因此出谋划策，远非满族官吏所能及，致使满族大臣逐渐由鄙视汉人，转而热衷于学习汉文化。科举考试不但使汉族官吏不断增多，同时也使一些满族子弟得到晋升之阶。许多满族人弃“国语骑射”，而专心学习汉语文。自天聪八年考取了恩格德依、尼勤、查布海等满族习汉文的举人以后，满族人通过学习汉文而科甲及第的不断涌现。这种现象一度引起了清统治者的关注与不安。对此，顺治十四年上谕中分析说：“我国家创兴，全赖治兵有法。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即汉学），怠于武事。详究其原，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即得升用。各部院衙门，考取博士及笔帖式，徒以文字，由自身优提士官，得邀俸录，未几又升副理事，主事等官，得免从军之役……”<sup>②</sup>科举考试，做为晋升之阶，是促使大批满族人特别是平民子弟学习汉语文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到了清代中期，出现了大批精通汉文化的满族知识分子。

## （二）倡导汉文化

满族兴起初期，满族贵族虽然勇武过人，但大多数人却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太宗皇太极越发感到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提高本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天聪五年闰十一月，他召集贝勒大臣们说：“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不学无

<sup>①</sup>《清史稿·洪承畴传》。

<sup>②</sup>《清朝文献通考》，卷64。

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吃，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sup>①</sup>基于这一主导思想，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学习汉族文化，并且以身作则。努尔哈赤熟悉汉语文，在少年时期就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皇太极更是“天资敏捷，虽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sup>②</sup>为了吸收汉文化，他还多次下令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汉译满大规模翻译活动，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皇太极死后，其妻博尔吉济特氏孝庄文皇后辅助其嗣子福临（顺治）亲政。她继承皇太极遗志，首先要求福临努力学习汉族语言文化，精通治国安邦之术。在清军入关作战中，曾以顺治的名义诏谕清军统帅多尔袞，并通过他谕知各路征伐的将领、官兵，要求他们在作战中注意保护中原各地的图书、档案等文化设置。奖励兴办学校，提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到了康熙乾三朝，不仅提倡学术不遗余力，而且三朝皇帝的汉文化修养，也远非皇太极可比。康熙皇帝不仅精通汉文化，而且爱好自然科学，尤其在天文、算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多次与天主教传教士合作，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乾隆皇帝雅好诗文，不仅精通满、蒙、汉语言文字，而且对唐古特语、回语亦颇有造诣。<sup>③</sup>

在思想上，大力提倡儒家思想。顺治皇帝即“笃好儒术，手不释卷。”<sup>④</sup>康熙皇帝更是“敬法至圣，景仰宫墙，向往之诚，弗释寤寐。”<sup>⑤</sup>清统治者入关后，即大修孔庙，封孔子六十五世孙孔允植为“衍圣公”，加孔子以“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谥号。皇上不仅每年祭祀孔子，甚至每次南巡，都举行祭孔大典，听取孔氏后裔讲经，并亲制孔子、孟子、周公庙碑文及孔、颜、曾、思、孟赞文。为了表示“遵孔重儒”之致诚，康熙皇帝不仅在宫中特

①《清史稿·太宗本纪一》，卷二。

②（清）昭槤：《啸亭杂录》，第1页。

③《五体清文鉴序》。

④（清）吴振域《养吉斋丛录》，余录卷之三，第298页

⑤《清圣祖实录》，卷130，第14页。

建传心殿，专祀孔子，而且于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后经雍正皇帝润色、阐释，成了后来流传较广的《圣谕广训》。此外，还大力提倡满族官吏诵读儒家经典。过去皇上祭孔，仅汉官斋戒陪礼，康熙十二年七月复准：“嗣后祭祀文庙，满官三品以上，亦应前期斋戒二日陪祀。”<sup>①</sup>

儒学的提倡，使清代经学等汉学得到空前的发展。“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即，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sup>②</sup>肖一山先生也指出：“康熙六十余年提倡学术，不遗余力。而乾隆承其遗风，亦颇以稽古右文自命。是以搜集遗书，编纂巨籍（指《四库全书》），上好下甚，举世向风。且当时学者颇为社会所尊崇，故皆自甘终老于编摩之业。”<sup>③</sup>

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浓郁的学术空气，使满族上到贵族下至旗兵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掀起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正如昭槠所说：“国朝自入关后，日尚儒雅，天潢贵胄，无不操觚从事。”<sup>④</sup>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满族中出现了大批学者与作家。如满洲正白旗人阿仕坦，顺治九年进士，曾译有《大学》、《中庸》、《孝经》等书。康熙帝曾称赞他为“此我朝大儒也。”<sup>⑤</sup>到了清代中期，满族已发展成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民族。乾隆时著名诗人袁枚说：“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sup>⑥</sup>

自满文创制颁行以来，主要用来书写文书、记载政事，编写历史、翻译汉文典籍。有清一代用满文撰写的著作及文学作品是很少的，这与清代初期满族积极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用汉文进

①《清圣祖实录》，卷49，页23。

②（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十年。

③肖一山《清代评论》，上册，第940页。

④（清）昭槠：《柳不杂录》，中华书局，1954年卷十，317。

⑤《清史稿》八野，页13335页1153336页。

⑥（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页18483页。

行创作是紧密相关的。满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面对做为被征服者的汉族，他们没有固步自封，傲睨一切，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学习汉文化。上至皇帝下至八旗将士的这种刻苦学习的风气，对于本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产生了明显效益。正因如此，也使他们放弃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了学习满语文的热忱。可以说，他们转而热衷于操汉语汉文，是使满语文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三）经济形态的变革

直到明代中期，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处于“唯知射猎，本不事农业”<sup>①</sup>的渔猎经济形态。当时建州及海西女真由于向南迁徙，接壤于汉族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辽沈地区，因此首先接受了汉族经济生活的影响。早在明嘉靖六年（1527）明监察御史卢琼滴戍辽东时，了解到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海西女真“俗尚耕稼。”<sup>②</sup>可见嘉靖到万历年间，满族已改变了过去的迁移无定所，以采集、渔猎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经济形态，形成了“室居田食”<sup>③</sup>的农耕经济形态。尽管如此，渔猎经济仍占有很大比重。女真人喜爱狩猎，采集也颇流行。当时东北地区盛产人参、珍珠和各种毛皮，是卖与汉族的主要货物。为了便于商品交换，明朝在开原、抚顺等地设有“马市”。由于手工业很落后，女真人用狩猎、采集所得的人参、貂皮等物，换取汉族的铁制农具、耕牛、盐、布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这种频繁的大量交易，极大地加强了民族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女真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女真人学到了冶金、手工业、农业等汉族的生产技术，刺激了女真社会从经济形态到社会制度的飞跃发展。为了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及便于商品贸易，许多女真人在交易中逐渐学会了汉语。

<sup>①</sup>转引自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清史论文选集》1979，1。

<sup>②</sup>（明）卢琼：《东戍见闻录》，载《辽东志》卷七。

<sup>③</sup>《明世宗实录》，卷134。

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将自己采集到的人参等物，频繁地到“马市”交易。当时的马市中，汉人、女真人、蒙古人熙熙攘攘，融汇一市。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与汉人、蒙古人有了广泛的接触，使他不仅学会了蒙语、蒙文，还粗懂汉语，识汉字。黄道周曾说他“好看三国、水浒传，自谓有谋略。”<sup>①</sup>

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女真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到了明万历年间，女真社会已由原始社会末期迅速发展到了奴隶社会。为了发展生产力，解决生产上人力不足的问题，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在对明朝的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汉族人口。他们被编为降户，多数人沦为奴隶。汉族人口的大量输入，带来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对那些有技术的汉人，努尔哈赤给以格外优待，并派大批满族人员充当甲匠、箭匠、弓匠、冶匠，向汉人学习各种生产技术。为了学习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他还“曾著满汉人等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自此以后，满洲人与汉人合舍而居，计口合粮而食，所有田地，满汉人等务宜各自耕种。”<sup>②</sup>

由于上述原因，后金政权的农业和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工业上的开采、冶炼、锻造，不但改变了原来完全向明朝、朝鲜购买的局面，能自给自足，而且技术水平上也不亚于关内的汉族地区。农业生产到了明万历中期，已到了“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sup>③</sup>“农人与牛，布散于野”<sup>④</sup>的局面。使农业生产成为后金政权占统治地位的部门，达到了努尔哈赤所说：“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的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及奴隶的不断反抗，到了17世纪30年代，满族社会迅速由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

<sup>①</sup>（明）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附》，卷20，第15页。

<sup>②</sup>转引自赵志辉：《满族的勃兴与民族的融合》，载《满族研究》，1989，4

<sup>③</sup>（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sup>④</sup>（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

从上述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转变过程可以看出，处于野蛮落后时期的满族，其社会制度及经济形态的飞速发展，都是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是仿照汉族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由于民族间经济的交流及向汉族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需要，使满族人大量接触汉族的语言文化。因此，入关前满族受汉族经济的强有力的影响，为入关后迅速转用汉语奠定了基础，也拉开了序幕。

#### （四）人口因素

##### 1. 满汉人口的比较

王钟翰先生认为，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人口为三、四十万，皇太极时期为八十万。康、雍、乾时期为二百六、七十万。道光初年为三、四百万。<sup>①</sup>而全国人口，据估计在明朝万历年间，全国实际人数为15000万左右。到了乾隆二十七年，为20047万余人。道光十四年已超过40000万。<sup>②</sup>上述全国总人口数应包括一些少数民族人口，即使排除少数民族人口数，满族人口也仅是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而且满族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北及京畿地区，其他地区的满汉人口比数，差距会更悬殊。

##### 2. 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

清军入关后，派遣八旗官兵驻守全国各军事重地。这些驻防官兵允许携眷，从而使满族在全国各地形成一个个小的聚居区。入关初期，驻防旗兵与当地汉族杂居相处。由于旗民矛盾时有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驻防旗兵受汉人的影响，清政府于顺治七年下令“驻防兵营另立一处……筑城而居，俾兵民判然各不相扰。”<sup>③</sup>这另立之城便是满城。清代先后立有满城二十座，一般都置于直省都会或府州重地。此外，还有大量的驻防城，不仅关内

①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满族史研究集》，1988，第206页。

②郭松义：《清代人口的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九辑。

③转引自马协弟：《清代满城考》，《满族研究》1990，第1期。

有，东北也有。清政府多次严令各地驻防旗兵不得与当地汉人来往，但由于各地满城及驻防城孤处于广大汉族的包围之中，无论处理政务，还是日常生活，都难免会与当地汉人进行接触。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后期，由于“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靠粮饷已很难维持生活，各地驻防旗兵纷纷另谋生路，从而冲破了清政府的各种禁令，多数地区出现了“况我国家百八十余年，旗民久已联为一体，毫无畛域”，<sup>①</sup>“旗民杂处，并无旗界、民界之分”<sup>②</sup>的现象。

### 3. 满汉人口的流动

早在明中叶以后，随着女真人不断向南迁移，与辽沈一带的汉人交往日益密切。此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不断发展，满族不断由北向南推进。努尔哈赤时期据有辽沈，皇太极时期占有锦州。清军入关后，满族以扇射状迅速向全国各地推进，甚至深入新疆、西藏、四川、云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此相反，大量的汉人却不断向北移动。早在后金政权建元天命以前，建州女真地区就招去许多汉族的工匠、商贾和农民。随着后金政权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大批明朝官吏及兵丁纷纷投降。如在攻取大凌河时，一次就招降汉官达百数十员之多。此外，也有大量的辽东汉民，“因避差役”，自愿“逃入建州”。<sup>③</sup>而满族统治者对明朝的人口掠夺，更是汉人流向满族腹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仅皇太极时期的五次入关战争中，就掠夺汉族人口100多万。可见，皇太极时期，由于汉族人口的大量流入，满族聚居的东北地区汉族人口已大大超过了满族人口。清军入关后，汉人流入东北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在“三藩”平定后，曾将大批原“三藩”的士兵发往东北地区。此外，还将大批触犯刑律的汉族知识分子流放到东北，即所谓“流人”。这些人入东北后，十之八九成了满族子弟

①《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

②《清高宗实录》，卷七十八，第23页。

③《明神宗实录》，卷455，1页。

的家庭教师。到了清代中后期,大量为谋生而“闯关东”的汉人,已成洪流决堤之势。尽管清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汉人流入东北,以保存“满洲根本之地”的民族纯洁性,但已无回天之力了。总之,满族人口向南深入广大汉族地区,汉族人口向北流入满族故地,增加了满汉语言接触的机会,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对满族转用汉语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 4. 民族交融

满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族成员。首先是满汉通婚。清代初期,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宣扬“满汉官民,俱为一家”的民族政策,清政府并不禁止满汉通婚。皇太极时期,满汉通婚现象已十分普遍。如对大批归降的汉族官吏,皇太极曾下令:“凡一品官,以诸见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园中大臣女妻之;……复察各牛录下寡妇,给配各官。”<sup>①</sup>顺治年间,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者甚至提倡满汉通婚。如顺治五年八月二十日,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皆朕赤子,欲其各自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sup>②</sup>由于政府提倡,当时满族与汉族通婚者有很多,他们的后代,也多自报满族。此外,对明朝战争中俘获的大批汉族妇女,赐给八旗兵丁为妻、为奴也十分普遍。因此,清代初期,满族中已含有大量的汉族成分。清代中期,由于满族汉化日趋严重,清政府才严厉禁止满汉通婚。清代末期,随着清政府各种禁令的废弛,“满汉不通婚”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民间满汉通婚的现象又得以恢复。满汉人种间血统方面的广泛融合,出现了大量满汉语兼用的家庭。由于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大量运用汉语,对满族转用汉语,特别是对这些家庭后世子孙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其次是改旗、抬旗。八旗制度正式建立于1615年(明万历43

<sup>①</sup>转引自赵志辉《满洲的勃兴与民族的融合》,载《满族研究》1989,4。

<sup>②</sup>《清世宗实录》,卷40,第11页。

年)，它是“以旗统民，兵民合一”的军政组织。八旗制度最初只建有满洲八旗，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又先后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满洲八旗又有“上三旗，下五旗”的区别。所谓“上三旗”是直接隶属于皇上所有的镶黄、正黄、正蓝（入关后改为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下五旗”是指隶属于王公宗室所有的其它五旗。旗籍的变动一般分为抬旗和改旗两种。所谓抬旗，是指下五旗的成员改隶上三旗。改旗是指同等旗分的成员互相改换。清代汉军旗人及满洲旗人互相改隶旗籍的情况是很多的。对此，吴振域在《养吉斋丛录》中写道：“国初各部落及汉人归附者，分隶满、蒙、汉旗。亦时有改易，如华善本隶汉军正白旗，其先苏完人，因改入满洲籍，此汉军改满洲也。……王国光先世为满洲，姓完颜，其父初为明千总，归附后隶正红旗汉军，乾隆十八年命其子孙及同族仍改入满洲正红、镶白二旗，此改隶后，继又复改也。佟国纲先世本满洲，后率明人来归，隶汉军，国纲请仍隶满洲，部议以佟姓官多，应仍留汉军，国纲一支改隶满洲，此又或改或不改也。似此者不可枚举。”<sup>①</sup>事实上，八旗满洲在初建过程中，就吸收了大量的汉族。如1615年八旗满洲正式建成时，已包括16个汉军牛录。以每牛录300人计，共有汉军兵了4800人。据统计，附载满洲旗分内的汉族姓氏，共有247姓之多。<sup>②</sup>因此，可以断言，八旗满洲就其民族成分来讲，包括了大量的汉族成员。

由于频繁改旗、抬旗，及满汉八旗中民族成分的复杂性，促进了民族间的接触与融合。八旗制度，使不同民族融于一个组织形式下，无疑为满汉文化的交互影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过去北京有句土话，叫做“无论满汉，但问旗民”，正是这种民族融合现象的真实写照。

<sup>①</sup>（清）吴振域：《养吉斋丛录》，卷25，第267页。

<sup>②</sup>《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80。

## （五）几点结论

首先，满族转用汉语是由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决定的。即满族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迅速转用汉语，是在汉族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其次，在上述诸多方面因素中，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及占有绝对优势的人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清朝统治者称满语为“国语”、“清语”，称满文为“国书”、“清文”，并在清代初期企图使满语文成为代表国家的全国通用语言文字。为此曾一度强迫八旗汉军及汉族官吏学习满语文，但这一政策不久就失去了作用。随着满族受汉文化影响的日益深重，到了清代中期，统治者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各种措施，运用行政命令手段，力图使“国语骑射”得以保持，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因此，军事上的征服及统治者对语言的种种限制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一段时期内起作用，但决不能长久。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断由落后走向先进的进程。满族为了学习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而导致语言的转用，是由人类社会不断谋求进步的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较高文化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sup>①</sup>此外，汉族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满汉人口上的悬殊差异，使满族以少数地位在汉族人海中生活，各方面都必须依赖汉人，为了和汉人交往，便不得不习用汉语文。社交场合汉语的经常运用，使满语的社会交际功能减弱，从而导致满族人不愿学或没必要学习满语文。而会满语的人越少，其社会交际功能就更加减弱，如此恶性循环，加速了满语文的消亡。这种现象连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八旗满洲“平日屯居，该处汉人居多，故未谙清语。”<sup>②</sup>

<sup>①</sup>转引自赵志辉《满洲的勃兴与民族的融合》，载《满族研究》1989，4。

<sup>②</sup>《清仁宗实录》，卷113第10—11页。

再次，民族间的人口流动、杂居相处、血缘融合等因素，为满汉语言接触，进而导致语言的转用，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点，仅从满族在不同地区语言转用的先后，就可以得出结论。江南及中原地区由于民族交往较早及交流频繁，因而率先转用汉语。京畿及辽沈地区，虽然满族聚居程度较高，但由于较早与汉族广泛交往、融合，因此，语言转用，紧随其后。而黑龙江省由于与汉族大量接触最晚，因此语言转用至今尚未彻底完成。对此，雍正皇帝曾分析说：“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惟赖乌拉、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sup>①</sup>

最后，清统治者重视本族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重视儒家思想教育以及满族仰慕汉文化的心态，也是促成语言转用重要因素。

## 第二节 回族转用汉语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人口为8602978人（1990年），主要聚居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此外，在甘肃、青海、云南、新疆、河南、河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人口多少不等的聚居区，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散居全国、分布最广的民族。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境内的回族除海南岛三亚市回辉、回新两乡尚使用一种“回语”以外，<sup>②</sup>全国各地的回族通用汉语，居住在某些边疆地区的回族还兼通当地别的少数民族语言。

<sup>①</sup>《清世宗实录》，卷22，第21页。

<sup>②</sup>郑贻青：《海南岛崖县的回族及其语言》，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欧阳觉亚、郑贻青：《海南岛崖县回族的回辉话》，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郑贻青《再谈回辉话的地位问题》，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6期；倪大白：《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载《民族语文》1988年第2期。

在前苏联、中东地区、东南亚一带的某些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中还有部分回族居住，他们大多数是在清朝末期由我国境内先后迁去的。在国外居住的回族内部仍使用汉语并兼通居住国通用语。苏联境内的回族被称作“东干”人，自称“老回回”、“中原人”，据1989年人口统计，在前苏联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居住着80000东干（回族）人，其中94.3%的人说东干语，①东干语是在汉语陕西话和甘肃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一、回族的先民及其语言

回回民族形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先民来源的多元化。②根据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回回民族的第一个来源，也即主要来源是13世纪初开始东来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③其中，早在唐宋时期来华定居的穆斯林番客是最早的回族先民。第二个来源则是曾经久居中国对外贸易港口的阿拉伯商人。这部分人远在7世纪中叶就开始到中国来，先是在广州和扬州，后来在广州、泉州、杭州一带经商和居住。④此外，宋代开封的犹太人（也里可温），元代大批的中亚、西亚穆斯林，南洋、南亚穆斯林也是先后汇入回回民族的先民成分。其中南洋穆斯林颇具特色，其后裔现今至少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海南省的崖县，那里的回族先民是由于海上遭遇风浪被迫避居于岛上的，原来是占城（越南）穆斯林；另一是山东德州，明成祖时苏禄国国王来贡，卒于此地，为他守墓的后代因信奉伊斯兰教而汇入回回民族的行列。⑤

①M·R·苏三洛著，速来蛮·黎达译：《东干（苏联回族）：历史—民族学概述》载《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胡振华：《回族与汉语》，载《民族语文》1989年第5期。

②⑤许宪隆：《试论回族形成中的语言问题》，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③④白寿彝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1957年，3—6页。

此外，由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联姻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内地的土著民族如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等也有不少先后加入了回回民族先民的行列。<sup>①</sup>因此，可以说，“回族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分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sup>②</sup>

回族先民来源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语言的多元性。他们初到中国内地时都使用自己的母语，根据史料和有关民间传说，回族先民至少使用过以下几种语言：

### 1. 阿拉伯语

唐宋元时期来华的穆斯林番客中有许多人的名字是阿拉伯语词。如赛典赤瞻思丁、阿合马、阿里、合散、马合谋、纳速刺丁、忽辛、乌马尔、亦不敦金、马忽思、你咱马丁、别都鲁丁等。<sup>③</sup>《新唐书·大食传》中所载“蒲罗死，弟阿蒲茶拂立”以及《宋史》卷490《大食传》介绍宋初来中国的大食人如“蒲希密、蒲思那、蒲罗、蒲押陀黎、蒲加心”等均为阿拉伯语人名之译音。在泉州等地发掘的墓碑多用阿拉伯文书写。另外，现今回族人使用的汉语中仍然有许多阿拉伯语词都证明回族先民们曾使用过阿拉伯语。

### 2. 波斯语

波斯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波斯文化曾征服或深刻影响到中亚细亚各族的民族文化。波斯语在历史上曾是中亚地区各族人民兼通的书面语言，尤其到元代，波斯语的使用范围极其广泛。元朝在北京设置的回回国子学（后改为回回国子监）所教授的“亦思替非文”即为波斯文。《回回药方》中的许多药名除阿拉伯语音译外，还用波斯语加注。明代设立的四夷馆（后改为四译馆）中有回回馆。当时编出的《回回馆杂志》中所译释

<sup>①</sup>白寿彝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5—6页。

<sup>②</sup>《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82页。

<sup>③</sup>胡振华：《回族与汉语》。

的义类词汇有波斯文，汉字音译和汉义。现今回族人民使用的汉语中还保留一些波斯语词。这些都说明回族先民的一部分曾使用波斯语。

### 3. 古代维吾尔语

13世纪初叶蒙古人西征，葱岭东喀什噶尔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纥（回鹘）人的后裔，同葱岭西的中亚及波斯、阿拉伯广大地区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大批签发或自行迁居到东方来，这部分人迁到内地以后，逐渐地融合于回回之中，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古代维吾尔语。

### 4. 印尼语

目前海南岛三亚市郊区的回族所使用的语言经过有关学者的考证研究，认为与南岛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语言同源。三亚回语是占语自公元986年到现在1000年中演变的结果。从占语到今天的三亚回语，在汉语的影响下，已从粘着语变为词根语，发生了“语言的类型转换”。<sup>①</sup>

### 5. 其它语言

元、明以来，不少蒙古贵族及其士卒因接受伊斯兰教而逐渐同化于回回之中。如明代哈密地区的哈刺灰人，原是蒙古人，正德（1506—1521）以后由哈密迁到肃州，到万历年间已经“不食猪肉，与回回同俗”。<sup>②</sup>他们最初使用的是蒙古语。另外，回回中不断吸收了许多汉族成分，他们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境内某些地区的回族有若干别称，如“青海卡力岗藏回”、“云南傣回”等，<sup>③</sup>这些别称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回回先民使用语言的多元性。

①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出版社，1990年，343—354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83页。

③许宪隆：《试论回族形成中的语言问题》。

## 二、回族的形成及转用汉语的过程

回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回族形成中伊斯兰教起了十分重要的纽带作用。正是由于各种来源的回族先民们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在心理素质、生活习俗、社会制度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加上相同或相似的经济特点，才使他们最终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

回族除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外，还日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明代回族的衣着已逐渐与汉人相同。元末明初，就开始使用汉族的姓和名。如明初大将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兰玉、冯胜、丁德兴，明代文学家丁鹤年、航海家郑和等回回人都采用了汉族的姓名。<sup>①</sup>到了明代晚期，回族人已经“士农工商通与汉人相同”。回族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变化，其主要标志就是伊斯兰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以汉文译释伊斯兰教教义的作品，如王岱舆的《正教真途》、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马注的《清真指南》、金天柱的《清真释疑》等。这些作品大多采用以儒诠经的方式，既适应了对内回族人民学习传统文化的特点，也便于对外向非穆斯林人宣传教义、释疑和求得谅解。<sup>②</sup>

共同语的形成对一个民族的形成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伊斯兰教是回族共同体形成的精神、心理纽带，那么，汉语则是回族共同体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一些学者认为，回族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他们普遍使用汉语的过程，回族把汉语作为共同语言了，也就意味着回族的形成。如果没有汉语作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回族是形成不了一个民族的。”<sup>③</sup>“回回民族的形成以有了以汉语为共同语言为一个标志”<sup>④</sup>

<sup>①③</sup>胡振华：《回族与汉语》

<sup>②</sup>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84页。

<sup>④</sup>马汝邻：《亦思替非是一种什么文字？》，《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

回回民族选择汉语为共同语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原因。

回族先民们从不同的方向进入中国内地，在伊斯兰教的共同文化背景下居住，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便是语言问题，在回族先民们分别使用的分属闪、含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及南岛语系四大语系的语言中选择一种共同语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语言之间彼此差别很大，既无发生学上的联系，也没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以具有多方面优势地位的汉语作为共同语则成为回回先民们的历史选择和共同心愿。当然，也不排除历代统治者在语言政策上实行的强制手段等因素。此外，与中原女子联姻，与汉族建立的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也是回族使用汉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回族先民普遍使用汉语的结果，加速了回族的形成，在客观上也对开阔文化视野，提高回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促进回族人民的文明进程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多种语言演变成一种语言，是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回族从先民使用的多种语言到完全统一使用汉语，大约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曾有过以下几个语言使用阶段：

#### （一）不同来源的回族先民各自使用母语阶段

不同来源的回族先民初到中国时，分别使用着各自的母语，如唐宋时期来华定居的穆斯林番客使用的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13世纪初迁到内地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操伊朗语族和突厥语族的语言；北宋至明朝年间从越南占城分几批由海路来到中国海南的南洋穆斯林使用的是印尼语；此外，后来逐渐汇入回回民族行列的中国土著民族也都在这个时期分别使用着蒙古语、突厥语、汉语等自己的母语。

#### （二）双重语言使用阶段

使用着不同语系语言的回族先民们在到中国内地后，在居住上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由于长期和汉人接触和交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逐渐学习和掌握了汉语。他们在各自的聚居区内使用自己的母语，而在与其他来源的穆斯林和汉人交往时使用汉语。长此以往，形成了普遍的双重语言使用现象。

### （三）转用汉语阶段

回族先民中的双重语言现象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过渡后逐渐趋于衰亡。明代以后，汉语也基本进入回族家庭，回族先民们的后代由于土生土长在中国，从小习得汉语，逐渐遗弃了母语，最终普遍使用了汉语。也就在这个时期，回回的经济条件、地域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已达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程度。同时，回回逐渐习惯于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sup>①</sup>即在他们普遍使用汉语作为共同语的同时，回回民族共同体也最终形成。

## 三、回族共同语的特点

回族以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但他们在使用汉语时却又有一些区别于汉族所使用的汉语的若干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sup>②</sup>

### （一）保留了回族先民的“语言底层成分”

在回族人民目前使用的汉语中有许多阿拉伯语、波斯语词，如：

阿拉伯语词：

imany	信仰、信德	alin	有知识的人
elim	知识	donya	现世
ahlite	末世	behiai	吝啬

<sup>①</sup>白寿彝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18页。

<sup>②</sup>胡振华：《回族与汉语》《谈谈回族人民常用的一些词语》，载《语言与翻译》1989年第3期；刘楨《对回族语言的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马耀圻、马永真：《试论回族语言的特色》，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yetime	孤儿	alan	宇宙、世界
maoti	死亡	looha	灵魂
matian	死人、尸体	halam	非法的、禁戒的
mkloohe	可憎之物	mszhide	清真寺
iblays	恶魔	momen	信仰伊斯兰教者
kaffir	异教徒	zhuma	主麻（星期五）
belekite	吉祥	halali	合法的
edai	尔代节	werzu	劝善止恶
imam	掌教	duwa	祈祷
taigdile	前定、预定	saden	撒旦、魔鬼
halifa	哈利发（接班人）		
hadji	朝觐天房的穆斯林		
niter	念啣（指每个人的动机或所施济之财物）		
chakati	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的天课，即按教法规定所征的赋税		
fefole	开斋节穆斯林所缴的人丁税		
fatiha	《古兰经》首章开端章		

波斯语词：

luzai	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的礼拜		
nimaese	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的斋戒		
dosti	朋友	abdith	小净
huda	胡大（真主）	dushman	敌人
xianshenby	星期二		

在回族的习惯语和某些特殊仪式或场合使用的交际用语中也常用一些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例如：

- 讲“瓦尔兹”（教义）
- 接“都瓦”（诵经祈祷）
- 作“讨白”（自己的忏悔）
- 您“撒瓦卜”，或“撒瓦卜”您（谢谢您）

洗“阿不代斯”（小净）

洗“勿素里”（大净）

缠“太斯塔拉”（缠头巾）

念“尼卡罕”（证婚）

“改必勒图”（同意）

达单（同意）

色兰（你好）

安赛俩木，尔来库木！（安拉的安宁赐予你！）

吾尔来库门赛俩木，吾莱哈买同郎希，吾白菜咯土乎！

（安拉的安宁、慈惠、幸福亦赐予你！）

俩衣俩亥，仰赖郎乎，穆哈买冬，莱素伦郎希。（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安拉乎，艾克白勒！（安拉是最伟大的！）

此外，有许多回族人至今还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起名。如“优素福、阿里、阿卜顿拉、穆萨、哈桑、法马、哈里发、衣玛木、珠玛、穆哈麦德”等。

## （二）使用与汉语原词词义不同的汉语词

在回族使用的汉语中，有些词虽然是汉语词，但意思与汉语原义有所不同，也可看作是回族在汉语基础上的独创词。如：

拿散（施舍）

很教门（很虔诚）

口唤（遗嘱、嘱托之语）

口到（谗）

开学（阿訇就职）

归真、无常（死亡）

汤瓶（穆斯林礼拜前沐浴用的水壶）

穿衣（为念经的学生举行毕业仪式）

油香（回族节日食用的一种圆形油炸饼）

清真古教（寓意“清洁真实”有伊斯兰教的“清心寡欲”，和“清净、清正、真主真一”等多重含义）

涤虑处（北京牛街浴池男屋上方砖刻榜帖，其含有“净身、清除杂念、涤净心灵”多重含义）

此外，回族在使用一些词时，由于宗教忌讳心理所制约，而改用相应的同义词或委婉词。如“酒”说成“原封儿”，“猪肉”说成“大肉”，不说“杀”，改说“宰”或“下刀”等。

## 四、小 结

1. 回族先民来源上的多元性决定了回族先民语言的多元性。而今回族共同语中所保留的先民语言的多种底层成分又反证了回族来源上的多元性。

2. 回族先民曾使用过分属闪—含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四大语系的语言，并经历了单语（各自使用母语）阶段—双语（各自的母语并逐渐以波斯语为主和兼用汉语）—新的单语（汉语）阶段这样几个语言演变过程。

3. 回族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的，在回族的形成中汉语其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回族的形成过程和回族转用汉语的过程同步，回族的形成是以汉语作共同语为重要标志的。汉语是回族的母语。

4. 回族以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

5. 回族所使用的共同语—汉语有其十分显著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部分保留了先民语言的底层成分和在汉语基础上“独创”出一些具有特殊含义的并且具有宗教文化色彩的词语。

## 第三节 土家族转用汉语

### 一、土家语的使用现状

土家族自称pi<sup>36</sup>tsi<sup>56</sup>kha<sup>21</sup>（毕孜卡）。现有人口5704223人（1990年）。主要分布在湘、鄂、川、黔四省毗邻地带，即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保靖、永顺、古丈、桑植、泸溪、

大庸、花垣、凤凰、吉首等县，湖北鄂西自治州的巴东、建始、利川、咸丰、宣恩、鹤峰、来凤、恩施和宜昌地区的长阳、五峰等县，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德江、印江、务川等县，贵州铜仁地区的松桃、沿河等县。土家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据1986年以前的调查统计，90%以上的土家族分布区，土家语已经消失，土家族人转用了汉语。<sup>①</sup>个别地方土家、汉已难以分辨，分辨也不依赖是否说土家语。如湖北省长阳县是土家族聚居县，长阳土家族的传统民歌内容十分丰富，对这里土家族传统民歌的分类与识别是通过民俗、与土家人民生活有关的内容、民歌腔调与方言语调、行腔基调、调式、流行区域和演唱者等几项判断的。<sup>②</sup>而不是依据是不是用土家语唱的，或民歌中是否夹有土家语词汇。土家语在长阳土家族地区的土家传统民歌的识别中，已不作为一项条件。

部分尚使用土家语的地区，已不是单语区，而是土家、汉语兼用的双语区。操土家语的约有17万人，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以及泸溪等县的土家族聚居区内。在操土家语的17万人中，90%以上是土汉兼通的双语人，他们可以自由交替使用汉语和土家语。鄂西自治州的来凤县河东乡和川东南的酉阳有极少数土家人能讲土家语。<sup>③</sup>

双语的使用，在不同的年龄层、文化层、职业层以及不同的性别都有各自的特点。以使用土家语人中最、最集中的龙山县为例<sup>④</sup> 年龄15至34岁的青年，生活中常讲的是土家话，兼能讲熟

①何天贞：《略论土家族的双语现象》，《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②陈洪：《长阳土家族传统民歌的分类和识别略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③何天贞：《略论土家族的双语现象》，《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④谢志民：《龙山县土家族双语情况调查》，载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练的汉语，使用汉语的频率也较高，对汉语语词的运用较为准确。这个年龄段以上和以下的土家人，汉语水平均低于这个年龄段的土家人。在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四个文化层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汉语水平最高，他们都能讲流利的土家话，兼能讲流利的汉语，对汉语的理解能力较高，运用较准确，日常生活用语也多以讲汉语为主。只有当交谈的对方讲土家话时才讲土家话，对土家话中一些不常用的语词往往记忆不清，在讲土家话时常夹杂较多的汉语词。教师、干部、工人、农民四种职业中，教师使用汉语的频率最高。教师所讲的汉语，在用词造句上比较准确，带土家语特点较少。但所讲的土家话中，用汉语词则较少。农民的汉语水平最低。女性居民的汉语水平低于男性居民，女性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来往交际中，讲的多是土家话，大部分人不会讲汉语，但可以听懂一些简单的汉语句子，只有少部分上过学，出外工作过的女性居民才能顺利地听懂汉语。而男性居民在成年男子中不会讲汉语的人是较少的。在较小范围内，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汉语程度也有所不同。笔者曾调查过一位1972年就读于龙山县岩冲乡中心小学的土家族学生，他谈到，入学前，坡上坡下虽只差一公里，但坡上的土家族学生，上学前不能用汉语从1数到5。

土家语同汉语长期接触，受汉语的深刻影响，大量的汉语词汇输入了土家语。早期借词以日常生活缺乏的用品名词居多；近期借词则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几乎各种词汇都有。如土家语自十以后的数词和序数词都从汉语里输入，没有一个例外。土家语固有词里的鼻化韵不多，因受汉语的借词影响，增加了大量的鼻化韵。如“胆”。

土家族没有文字。历史上曾有人用汉字作为记音符号将土家语记录下来。当代土家族学者彭秀模、罗安源各设计过一种记录土家语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分别在湘西自治州的龙山县和永顺县进行过试验教学，尚未成为正式文字。

## 二、土家族先民及其使用的语言

土家族的先民与古代的巴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土家族是以古代巴人的一支为主体，融合了其他的一些族类而形成的单一民族。关于土家族先民的主体，史学界认识尚不统一：一种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定居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巴人与其他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即所谓巴人主体说；一种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定居在湘、鄂、川、黔边境的土著，融合了巴人而形成的，即所谓土著主体说；一种认为土家族是隋唐之际，一支乌蛮进入湘鄂川黔接壤地区，融合了土著、巴人而形成的，即所谓乌蛮主体说。随着对土家族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家族先民的巴人主体说逐渐得到认可。有关“巴”的记载，最早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自此以后，有关土家族先民活动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唐宋年间土家族先民被称为“廩君种”和“賨人”。宋代土家族先民有时也被称为“土”，但是在当时“土”也可以称呼其他少数民族，“土”不是土家族的专称。明代土家族先民经常被称为“土蛮（或土夷）”、“土人”、“土民”。明末清初改土归流之后，大量汉人迁入土家族地区，为区别于“外来人”（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称汉人为“客家”，称“本地人”为“土家”，“土家”也就作为族称沿用下来。1956年10月，土家族被正式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并以“土家”为其族称。

虽然历史上土家族长期没有确定的族称，但是这个以巴人的一支为主体形成的单一民族始终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据徐中舒先生研究“巴有语言，文字很不发达，仅停留在象形文字的表意阶段。”我们在西汉扬雄《方言》一书中，可以见到若干用汉字记录的巴语词汇。如：

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方言》卷八）。现代土家语称虎为li<sup>35</sup>，公

虎为li<sup>55</sup>pu<sup>56</sup>，母虎为li<sup>55</sup>ni<sup>22</sup>ka<sup>22</sup>。

船：“舟，短而深者谓之船。”（《方言》卷九）按，船，薄故切。今土家语“船”读作pu<sup>55</sup>。

好：“鲜好也。南楚之外通语也。”（《方言》卷十）按，好，测革切。今土家语“好”读作tsha<sup>35</sup>。

仅从这几个词汇当然不能就认定巴语就是土家语，但是我们可以推知，以巴人为主体的土家族先民所讲的语言与巴语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现在的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土家人使用的是汉语，土家语已基本消失。然而历史上这里的土家族先民使用的语言不是汉语。从现存的史料看，《隋书·地理志》载：“荆州多杂蛮左，其僻居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住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提到：“施之地……乡者则蛮夷，巴汉语相混。”清嘉庆年间《恩施县志》写道：“里籍老户中，多夷獠，刀耕火种，男不冠，女不妆，乡谈多不可解。”引文中所谓“蛮左”、“蛮夷”、“夷獠”指的就是土家族人。①可见直至清中叶，鄂西土家族聚居区仍使用“乡谈多不可解”的语言。从现在鄂西土家族聚居区的地名来看，这里保留了大量用土家语才能解释清楚的地名。这些地名是用汉字记音的。如果抛开土家语，用汉语难以理解，勉强释意与地理实体无甚关联。比如，以湖泊的“湖”命名的“舍米湖”，地处一块斜坡上，并无湖泊。这里的“湖”就是土家语表示“处所、地点”一词的汉字记音。“舍米湖”意为天然富裕的地方。以车子的“车”命名的“洗车”，也不是“车”意，因这里到处是深沟险壑，而且土司时代这里的土家人刀耕火种，渔猎为生，没有车。“车”是土家语“河流、水”一词的汉字记音，“洗车”意思为“草河”。②土家族先民根据自己对生息环境的认识，按本民族的习惯，用自己

①参见《鄂西土家族简史》

②张兴文《来风土家语地名浅析》，原载《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五期。

独特的语言，为许多地理实体命了名。遗憾的是，土家族始终没有自己的文字，使我们不能把握土家族先民所使用的语言的全貌。但是可以肯定，不论是今天转用了汉语的鄂西土家人，还是仍在使用土家语的湘西土家人，他们共同的先民在历史的进程中，始终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土家的族称，是在清代改土归流以后相对固定下来的，我们姑且称这时土家人使用的语言为土家语。

### 三、土家族的语言转用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为2834732人，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为5704223人，8年内土家族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在增长的人口当中，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外，主要原因是许多转用了汉语的土家族人恢复了民族成份。《纪要》<sup>①</sup>把土家族分成三种类型：(1)土家族语言比较完整，民族特点比较显著；(2)土家族语言基本消失，只保留称谓和少数词汇，程度不同地保留着民族特点；(3)土家族语全部消失，民族特点已基本消失，但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后两类土家人是指丧失了传统母语土家语而转用了汉语的土家人。许多人认为语言是构成民族性的最重要部分，甚至有人认为是唯一的因素。事实上，语言即使是构成许多族体的重要因素，却不一定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更不能说是构成民族性的唯一因素。一个失去传统母语的族体很可能并没有失去民族感情。民族意识并不一定单独取决于保留了传统母语。一个民族能否保留其传统的母语取决于很广泛的因素。土家族在其广大聚居区丧失了土家语，因而确定土家族的族称时，除了考虑现存的土家语外，重点是根据有关族源的史料、宗教、

<sup>①</sup>1982年3月国家民委派出工作组到湘鄂川黔边作了调查，4月召开了四省边境邻近地域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谈会，并写了《纪要》”

风俗习惯、民间文学、文物古迹、语言残留、民族感情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确定的。这样，土家族中，使用汉语的人数占90%以上。我们把土家族的语言转用归入“主体转用型”。<sup>①</sup>

导致土家族语言转用的原因多种的。首先来看看政治上的原因。公元前361年，秦灭巴，并在湘鄂川黔巴人活动区，先后置巴郡、南郡、黔中郡加以统治。从此以后，几易朝代，各代君主都没有放弃对土家族先民聚居区的统治。汉代对巴人采取笼络手段借其军队，免其赋税。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利用巴及其他少数民族抗拒蜀汉。宋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立县州，采取“树其酋长，树其镇抚，始终蛮夷适之”的办法来进行统治。元代伴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大，元统治者在这一地区采取土司制度进行统治。明清时代，这种土司制度得到完善，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管理得到加强。<sup>②</sup>

土家族与汉族始终同处一个政治机体之内，随着对土家族地区政治上联系的加强，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也进一步发展。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其先民的聚居区又与中原大地毗邻，因而上层人士主动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最早接受汉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汉族统治者为加强对于土家族的文化影响。从东汉起，就在武陵“兴学校，举侧陋”。<sup>③</sup>元明王朝为了巩固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采取了“开科取士”、“兴办义学”等设学考试的办法，首先使土家族上层分子及其子弟汉化。元大德建中，在建始西北隅建起学宫，明洪武年间于施州兴起卫学，土司彭元锦也在永顺的司城福石坪中建立起若干书院。明廷要求“诏诸土司皆立儒学”，并进一步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

<sup>①</sup> 参见戴庆夏、王远新《论我国民族语言转用问题》，载于《语文建设》1987年第3期。该文把语言转用分为“整体转用型”、“主体转用型”、“局部转用型”。

<sup>②</sup> 参见段超《巴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sup>③</sup> 《东观汉记》卷九

如不入学，不准承袭”。<sup>①</sup>土家族上层为了“世传印绶”也就不得不力求汉学。元明时，土司们送子弟到邻近的湖北宜昌、湖南的澧州、辰州等地求学，还有的延聘汉族儒士入峒讲学。当时出现了一批汉文化水平较高的“士人”，有的被录取为进士、贡生，被派往全国各地做知府、知县等职。随着汉文化水平的提高，土家族土司中的文人写出了不少名著，尤以文史最多。容美司田氏一连数代都能阅读汉文经典，能用汉文写作，成为早期用汉文写作的土家族文人文学作家。田氏中的田元著有《金潭令意笔草》，田舜年著有《二十一史纂》、《清江纪行》、《欢余吟》、《许田射猎传奇》等书。田舜年尤为博学，史书称他“博洽文史，工诗古文，下笔千言不休”。<sup>②</sup>土司还规定：“每月初二十六日为诗会期”，聚众题诗，而且“风雨无废”。参加诗会的人不但有土家族文人，还有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文人，这当中，容美土家族诗人最多。土家族上层及其子弟、亲属习汉语文，这是一批转用汉语的文化人。土家族与汉族始终在一个政治机体之内。土家族上层接受汉文化，转用汉语，是土家语消失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来看看地域的原因。恩施地区土家语消失较早，北部较之南部土家语消失更早些，现在南部边沿地带，部分地区尚存土家语。恩施城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恩施地区北部有长江及川楚大道，是川鄂两省交通要道。早在宋代，朝廷曾一度指定施州为王朝接纳贡物的一个地址。这样西南通往施州的道路就成为宋朝的一条重要贡道，也是当时宋廷联系南方少数民族世酋的枢纽。有史料这样描绘明代鄂西的社会面貌：城镇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官师所群集，环城内外，仍是汉官威仪”，“士绅文学子弟彬彬”。离城镇远的地方就处于“不华不夷之列”。可见，城镇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土家人的汉化程度比偏僻的深险溪

<sup>①</sup>《永顺府志》卷九《土司》

<sup>②</sup>《容美州特游》

峒高，转用汉语的时间早、人数多。

湘鄂川黔边很早以来就是土、汉、苗等多民族杂居地区。如明代《寰宇通志》卷一百一十四于思南府项下用前人《郡志》专说土人之外，还说府城东郎溪蛮夷长官司有洞（侗）和仡佬，于铜仁府项下则引前人《铜志仁》说有仡佬、洞（侗）人、苗人、土人。《思南府志》卷一说境内有土蛮、南蛮、伴僮（即扬荒，由播州即遵义一带迁入），仡佬、木摇（莫瑶的另一记音，即瑶人）、苗人。在这诸民族杂居的湘鄂西山区，历代都有汉族迁入。宋廷南迁以后，鄂西依然是地广人稀的溪峒。这时，南宋的豪强地主继续大肆兼并土地，不少汉族农民纷纷破产，无以为生，有的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有的不得不逃奔荒远地方，以谋生存。鄂西的封建领主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地盘和收益，需要更多新的劳动力去垦种他们所辖的大量荒地，因此宋代就有不少汉农“举室迁去”。元明朝廷曾明文规定“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但是为了生活，土家先民中总是有人不顾明令，迁徙内地，如弘治间，忠路、忠孝等司的土民，已迁到施州都亭等地。施南、唐崖等司的土民，迁徙到黔江境内的夹口等地。“徙民于内地”就土家族来说，较之于其他民族更甚。据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族与古代巴人》中统计，自汉到南北朝，朝廷大规模地迁徙巴人于内郡竟达八次之多。迁徙地点远至渭南、豫东南、皖西南等地，较小规模的就不计其数。同时，汉人也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溪峒。如容美土司境内，“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技艺来，……久不愿去者，即分田授室”。元末、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一方面湘鄂西的土家、苗家、汉民等纷纷响应，加入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不少汉民起义军随军来到鄂西，有的后来就定居溪峒。明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率军经湖广巴东、建始入川时，鄂西汉民、土家人参军的多达数万。在湘鄂山区还有一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形式——贡赐。土家领主为了扩展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争先恐后地增加入贡人数和贡品。朝廷

为笼络土家上层人士，往往换取更多的“回赐”。如嘉靖七年仅容美宣抚司、龙潭宣抚司朝贡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人，使明廷感到难以对付，“引以为患”。这种特殊的“贡赐”贸易也成为汉区先进技术经验和产品进入溪峒的一种渠道。<sup>①</sup>我们看到历史上汉人与土家人你来我往，土家人内迁，投入了更大范围的汉语圈中，汉农、商人、技工迁居到原本就是土家、苗、汉杂居的湘鄂川黔边，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短缺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带来了传授技艺的媒介——汉语。在这里使用汉语交际的范围扩大了，人数增加了。主动地学习和掌握一门对自身发展有益的语言，是每一个求生存、求发展的族体或个体的共同愿望。在这样长期的杂居共处中，有一部分土家人成为双语人，进而转用了汉语。所以说，与汉民族杂居使一部分土家人转用汉语，是土家语消失的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的改土归流，使土家族主体的语言转用初步完成，这是土家族语言转用的原因之一。土司制度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一般认为是从元代开始，但就土家族地区而言，如从各大姓酋长确立了对各自地域的统治算起，则早在五代时期，土司制度在这一地区已初具规模，宋时得以发展。元在此基础上，对土司官制、等级及与中央王朝关系等，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修改，完善了土司制度。明代则是土家族土司最强盛的时期。清代经“改土归流”，土司制终结。在土家族的历史发展中，土司制度对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深刻的影响。而主要在清代进行的“改土归流”，废除了各据一方的土司，改委流官，建立起清王朝的直接统治。<sup>②</sup>这一场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必然使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机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当代的《土家族文学史》的编纂者把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作为土家族文学发展的一大断限，这不无道理，文

<sup>①</sup> 参见刘孝瑜《古代鄂西土家族与汉族的关系述略》，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sup>②</sup> 参见王承尧、罗午著《土家族土司简史》，中央民学院出版社。

学实绩是与社会性质更迭所带来的各种反映同步的。土家族地区大规模改流时间比较晚，但延续时间比较长。“改土归流”的方式是和平的，“改土归流”也比较彻底。

“改土归流”以后，政治上打破了原土司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结束了土司制度对土家族地区长达八百余年的统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政治机构。“改土归流”以后形成的政治统一的局面有利于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为土家族人成为双语人进而转用汉语提供了客观条件。

“改土归流”后，治政府鼓励土民开垦，并招募汉族农民前往垦种。大批汉族农民和商人源源不断地迁入土家族地区，各类工匠也不断迁入土家族地区的城镇和乡村，改变了土司时期“自安朴陋，因鲜外人踪迹”的状况，土家族地区人口骤增，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种植已基本上和汉族地区一样，使土司时期的“刀耕火种”、“不用灰粪”的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大为改观。一批汉族手工业者入山以后，带徒授艺，帮助土家族手工业者的成长。汉族此次大批迁出土家族腹地，大大改变了土家族地区的土家、汉人数比重，使更多的土家人有条件成为双语人，进而转用汉语。

“改土归流”以后土家族地区的贸易空前发展，外地商人纷纷进入土家地区进行购销活动。各府、州、县所在地和水陆交通要道的集镇，已成为商旅云集、百货齐全的重要市场。有史料这样记载此时的施南市场：“商贾多是江西、湖南之人，其土之苧麻药材以及诸山货，概负闽粤各路，市花布绸缎”。“贾人列肆所卖汉口、常德、津沙二市之物不一；广货、川货四时皆有；京货、陕货亦以时至”。这里的土家、苗家以桐油、茶叶、茶油、木材、麻、蓝靛、竹类、药材等农业副业土特产品与汉区汉民互通有无。这个大市场构画了一个购销两旺的有声画面。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的人进行贸易，需要以一种族际共同语言来交流，在这里，这个共同语的主要是汉语。

经济贸易的发展，提高了土家族的生活水平，也改变了过去

“土民不事商贾的状况，“出现了土著亦能贸”，“负土出境”的局面。据乾隆《永顺府志·卷六》记载：川、陕、滇、黔、湘、闽、粤等省，都有永顺等地商人足迹。为了实现贸易，学习和使用汉语已成为普通土家人的迫切的自觉行为，而不再囿于土家族的上层。

土司时期，汉语文的学习和使用主要限于土家族上层的范围内，受教育者是有产之家的子女。而“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设立了“府学”、“县学”、“书院”、“学官”、“家塾”等各级学校。教育面相应地扩大了；入学人数逐渐增加，甚至“寒仵之家，亦以子弟诵读为重”。清政府还以“土三客二”的录取原则，鼓励“土童入学”。随着学校的兴办，土家族中具有文化知识的人数日益增多，如乾隆年间的永顺“虽新辟之地，而汉土子弟读书应试无殊内地”。“风土边鄙，人物朴固”的利川“习诗书，与郡城大率相同”。

通过学校教育，大批的较为系统地学习汉语文的土家人成长起来，这些不同程度的双语人、双文化人也成为土汉文化交流的纽带。汉族仕人带去的汉文典籍，逐渐在土家溪峒流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历代的传奇小说、故事、词曲等也为土家人民所喜爱，孔尚任的《桃花扇》，这部在京邸曾受冷遇的禁戏，在万山隔绝的楚地容美传演不绝。汉族民间流行的“孟姜女哭长城”被土家民间改造成富有本民族特点的“孟姜女与范七郎”，汉区流行的“张果老故事”，在土家的原始戏剧毛古斯的表演中，也有相似而具有土家特色的唱词。土家族特有的“哭嫁歌”也有了土家、汉两种唱词，两种语言的“哭嫁歌”互有异同，各显自己语言的神韵。在与汉文化日趋广泛的接触中，土家人的汉语文水平、汉文化水平逐渐提高。

“改土归流”以后，不论是“半路出家”，还是科班学习汉语的土家人，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以往，特别是这当中有一小部分是科班出身的寒仵之家的土家子弟。同时，转用汉语的土家人

的汉语文水平、汉文化水平也比以往普遍有所提高。至此，土家族主体的语言转用初步形成。

经历了民国、抗战、解放战争之后，土家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此后，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新闻、广播等各项事业迅猛发展。但由于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学校教育使用的语言是汉语文。这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土家族使用汉语文的水平。以目前使用土家语人口最集中、最多的龙山县的教育为例，看土家人转用汉语的情况：“小学：1950年共14所，在校学生930名，1951年恢复到209所，在校学生10559名，1956年发展为216所，在校学生23881名。后几经曲折，多次调整，至1983年全县有小学529所，在校学生58808名，学校所数和学生人数均为建国前夕的二十多倍。中学：1950年仅有初中一所，在校学生185名。1983年全县计有高中3所，在校学生2225名，初中19所，在校学生9110名。三十多年来，共为国家输送大专、中专学生千余名。此外还办了一些的农校、农业技术学校和其他专业学校，为全县各条战线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在中小学不断发展的同时，各地还办起了幼儿园46所，幼儿班63个，入园儿童1889名。农村中的扫盲教育，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业余教育，均取得了显著成效”。<sup>①</sup>引文中所谈及的各级各类受教育者包括全县汉、土家、苗等各个民族的学生。龙山县土家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44.99%（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按这个比例计，受教育者中，至少三分之一以上是土家族。入学前习得了土家语的学生，经过学校教育，成为不同程度的双语人。

社会主义的民族语文政策使土家族地区的土家、汉自然双语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然双语制也促进了土家、汉人民的团结及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发展。

<sup>①</sup>参见《龙山县志》第三章，教育，1985年版

## 第四节 畲族转用汉语

畲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的80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人口63万（1990），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福建和浙江，占畲族人口的96%以上。畲族居住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乡以上的聚居区很少，一般是几户或几十户聚居成村，周围则是汉族村落，彼此交错杂居。有些村落则是畲族和汉族在一起。

畲族现在使用两种语言：汉语客家话和畲语。<sup>①</sup>使用客家话的畲族占全民族人口的99%以上，而使用畲语的畲族仅分布在广东莲花山区的海丰、惠东和罗浮山区的博罗、增城等县的十几个山村，人口近两千，而且有不少人已经变成使用客家方言和畲语的双语人。畲语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尤其与广西都安一带的布努语较为接近。

畲族现在主要使用客家话，这是历史上放弃母语之后转用的结果。促使畲族放弃母语的主要因素是他们迁徙途中接触到客家人。

### 一、畲族从武陵山区到粤赣闽交界的迁徙

对畲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畲族是东南广东、福建的土著民族，另一种则认为这个民族是从外地迁徙到这一地区的。外来一说认为畲族源于汉晋时期分布在湖南西部的“武陵蛮”，与苗族、瑶族同源。有些人则进一步上推到先秦时期居住在江淮地区的“东夷”（其中的徐夷），认为东夷一支

---

<sup>①</sup>为了区别客家人的客家方言和畲族的客家方言，本文称畲族的客家方言为“客家话”。

迁到武陵地区与三苗、氏羌相融合，然后才迁徙到广东、江西、福建等地。持土著说则认为畬族是越人（其中的山越）后裔，或是福建土著闽族的后裔。<sup>①</sup>

畬族的“畬”得名于这个民族早期的刀耕火种经济方式，如清初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的说“澄海山中有峯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而死，以为肥，曰火燬。是为畬蛮之类。”汉字“畬”作为一个族称大约出现在南宋末年记载广东、福建等地的畬族生活习俗的文献中。如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六：“吾闽山中有一种畬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九册：“潮州府畬瑶，……我朝设土官以治之，循回‘峯官’，所领又有‘峯’。‘峯’当作畬，实录谓之畬蛮。”刀耕火种的经济方式使他们逐山而居，耕山吃饭，从一地迁向另一地，寻找新的刀耕火种地。《福建通志》风俗志：“畬民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另一方面是为了逃避徭役和赋税，正如畬族《高皇歌》所唱的“自种林土无税纳，没有税纳多清闲。”这种迁徙不仅是他们从广东迁往福建、江西、浙江，还是使他们更早的时候从武陵山区迁到广东北部、东部一带。

证明畬族从武陵山区迁到广东、福建等地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和民俗。

有材料表明，除了广东海丰、惠东等地的畬族使用畬语外，现在已经使用客家话的畬族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畬语。如修于明弘治年间（15世纪末）的广东《潮州府志》记载，当地畬族称“火”为“桃花溜溜”，称“饭”为“拐焮”，这一材料与惠东畬语的“火”*tho<sup>42</sup>*、“饭”*kwei<sup>36</sup>*相同。<sup>②</sup>说明至迟在明弘治时这一带的畬族还没有完全放弃母语。又如现今福建省福安甘棠的客家话

<sup>①</sup>施联朱：《解放以来畬族研究综述》，《畬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

<sup>②</sup>毛宗武、蔡朝吉：《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7。

中称“蜈蚣”为khiu<sup>53</sup>、和“杀、宰”为lo<sup>25</sup>，①广东潮安的客家话也称“杀”为lat<sup>66</sup>，②这两个词在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中都找不到来源，却在畲语以及苗瑶语中找到它们相同相近的形式。如：

	黔东南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布努语	畲语	瑶语
蜈蚣	khu <sup>7</sup>	—	—	chvu <sup>5</sup>	kho <sup>6</sup>	—
杀	ta <sup>5</sup>	fa <sup>5</sup>	tua <sup>5</sup>	to <sup>5</sup>	ta <sup>5</sup>	tai <sup>5</sup>

畲族和瑶族都广泛流传槃瓠传说，并把槃瓠看作是民族的始祖。所谓槃瓠，即以犬为图腾，传说中的犬名为槃瓠。而有关槃瓠传说的记载，多认为是来自武陵山区（又叫“五溪”）。《后汉书·南蛮传》中对这个传说记得最详细，而晋·干宝的《搜神记》中记得较接近其原型。基于这个传说，“畲民至今不杀狗，不吃狗肉。据史博图的调查，畲民现今尚忌呼狗。关于‘家狗’、‘家狗骨’等名词，多严禁出口，甚至图腾名的槃瓠亦讳而不言，改称‘龙期’或‘龙麒’。”③由槃瓠传说而使瑶族和畲族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姓氏，如盘、蓝、钟、雷等。许多畲族地区没有了盘姓，但说中另有解释。

武陵地区是苗族、瑶族和畲族的集散地。他们由长江中游迁到这里，又从这里迁向其他地方，向西成为苗族，向南成为瑶族，向东则成为畲族。造成这种迁徙，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的缘故。

畲族从武陵山区迁到今广东、江西、福建交界山区，时间大约在公元7世纪隋唐之际。从这里继续往福建中部、北部、浙江再迁徙，时间则从宋代开始。④

①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10, 1。

②黄家教、李新魁：《潮安畲话概述》，《中山大学学报》，1963, 2。

③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1947。

④施联朱：《畲族的来源和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33, 2。

## 二、畬族转用客家方言的过程

畬族来到广东东部一带后，以凤皇山为中心形成一个聚居区，一直到公元13、14世纪前后。<sup>①</sup>在这一时期，客家人大批进入广东东部，畬族大量接触到客家人和客家方言，使畬族的语言使用情况发生巨大变化，经过单语(畬语)到双语(畬语和客家方言)，最后过渡到单语(客家话)，畬族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放弃母语而转用了客家方言。

客家人从中原南迁时有几次高潮，第一次在晋永嘉之乱到隋唐，来到江西中部；第二次是在唐末至宋，到达闽西和赣南；第三次是宋末，到达广东东部和北部。客家人第二第三次南下，与已居在那里的畬族接触。从现在畬族和客家人的人口比例来估计，那时畬族的人口也是远远少于客家人的，这种人口比较悬殊的分布格局，使畬族人基本上处在客家人的包围之中，因而畬族人放弃母语改用客家方言是很自然的事。

宋元以后，畬族向江西、福建迁徙，而客家人则继续南下。在福建，畬族与客家人还长期居住在一个地域内，如长汀、上杭、武平、宁化、邵武、光泽等县。<sup>②</sup>明清时，畬族已大量遍布了闽东，浙南等地。畬族在客家人分布地区内迁徙，之后又远离这种环境，使客家话变得与客家方言有一些不同。如在广东潮州(黄家教等，1963)和福建福安(罗美珍，1980)的客家话中就多具闽语成分。另外，畬族作为一个放弃母语而转用客家方言的民族，在转用客家方言之后，就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客家人的客家方言的“语言社团”，脱离原来转用客家方言时的客家方言系

<sup>①</sup>因此现在各地畬族都以凤皇山为民族发祥地，传说始祖罗洪在这里，可见从这里迁出去的畬族之多。

<sup>②</sup>详见伯詹慧《现代汉语方言》第53页所列客家方言比较集中的县分，以及施转朱1983同本文第307页注<sup>④</sup>所列畬族再迁线路。

统，在迁徙路上发生变化。从现在掌握的三份材料来看，畲族使用的客家话在语音上与客家人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同，突出的地方是：

帮组字没有f、v声母。而客家方言各地多少都有f、v声母。

如：

	客家话		客家方言	
	福建宁德	福建福安	广东潮安	广东梅县
风	pyŋ <sup>33</sup>	—	puŋ <sup>33</sup>	iŋ
饭	phuan <sup>31</sup>	phuan <sup>31</sup>	phan <sup>32</sup>	
放	piag <sup>33</sup>	pioŋ <sup>32</sup>	—	
正	pui <sup>33</sup>	pui <sup>33</sup>	—	fi(文), pi(白)
斧	pu <sup>35</sup>	pu <sup>35</sup>	—	pu
肥	—	phui <sup>22</sup>	phui <sup>11</sup>	
治	pin <sup>33</sup>	phiu <sup>33</sup>	—	
妇	phui <sup>31</sup>	—	phiu <sup>33</sup>	
吹	phui <sup>31</sup>	phiu <sup>31</sup>	—	fi

### 三、畲族转用客家话之前接触汉语情况

畲族还在长江中游和刚到武陵山区时，就接触了汉语，不过那时仅仅是受到影响而借用语词。畲语的汉语借词分两部分：客家方言和比客家方言更早的汉语词。这两部分借词在语音有上明显的不同：来自客家方言的借词如果带-k、-t辅音韵尾，就分布在入声调，而非客家话的入声借词则分布在阳去调。①这是因为早期汉语借词在失去辅音尾时，恰好借了客家方言，原来的入声词排挤阳去声的词，使它并入阴上。入声在失去辅音韵尾时并到去声，是苗语支语言中常见的现象，而畲语则让入声全部涌

①毛宗武、黎朝吉：《畲语简志》第21页。

入阳去。畲语的老借词如：

	畲语	黔东南苗语	川黔滇苗语	瑶语
漆	tshe <sup>6</sup>	shei <sup>7</sup>	tsha <sup>6</sup> t	shjet <sup>5</sup>
鸭	ɔi <sup>6</sup>	o <sup>7</sup>	o <sup>7</sup>	aap <sup>7</sup>
狭	kwei <sup>8</sup>	ŋi <sup>8</sup>	Nqe <sup>8</sup>	hep <sup>8</sup>
豆	tho <sup>6</sup>	təu <sup>8</sup>	tou <sup>8</sup>	top <sup>8</sup>

畲语中带-k、-t的借词如：

kit <sup>7</sup> 急	pit <sup>7</sup> 笔	phak <sup>7</sup> 魄
nit <sup>8</sup> 立	mak <sup>8</sup> 脉	phak <sup>8</sup> 白(吃)

畲族从武陵山区到或广东部、北部，沿途经过湖南南部和广西东北部。而在湘南和桂东北的苗族和瑶族大部分已转用了汉语（属于老湘语）。这部分苗族和瑶族当年也是和畲族一道从武陵山区迁出来的，中途停在湘南和桂东北，只有一部分继续往东，变成畲族。这一带的苗族和瑶族何时转用汉语还不太清楚，从这一带的“飞山蛮”被攻打的历史来看，大约在唐宋时期。另外，明代湖南邵阳地区的苗族，被征发到贵州，使用的是汉语，同时使用一种篆体字，<sup>①</sup>这说明代他们在明代之前就已转用汉语。城步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使用的湘语有一些苗瑶语底层，<sup>②</sup>如：

	城步湘语	黔东南苗语	川黔滇苗语	畲语	瑶语
屎	ke <sup>42</sup>	qa <sup>5</sup>	qua <sup>3</sup>	ka <sup>3</sup>	gai <sup>5</sup>
哭	kai <sup>42</sup>	ken <sup>2</sup>	qua <sup>2</sup>	—	—

但是，这一地区仍有一部分瑶族（操布努语）还未放弃母语，说明已放弃母语的苗族、瑶族较早就接受汉文化，后来才那么快就转用汉语。因此，畲族从这一带经过时也会受到的汉语的影响。

<sup>①</sup>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八普安县：“有老巴子，亦苗类，由湖南移居于此，其服饰与汉民同语言稍异。”民国《郎岱县访稿》卷二“(土人)惟文则类大篆，湖广人之文则多象形。”

<sup>②</sup>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第5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 畬族客家话中的古汉语成分

	广东潮安	福建福安	福建宁德
楼(房子)	(楼)	lau <sup>22</sup>	lau <sup>21</sup>
皓(亮)	hau <sup>43</sup>	hau <sup>32</sup>	hau <sup>31</sup>
行(走)	haŋ <sup>11</sup>	haŋ <sup>22</sup>	haŋ <sup>22</sup>

畬族客家话中阴去并入阴平情况:

	广东潮安	福建福安
阴平	ke <sup>33</sup> 鸡, tshoi <sup>33</sup> 菜	ei <sup>33</sup> 诗, ei <sup>33</sup> 四
阳平	phui <sup>11</sup> 肥	phui <sup>22</sup> 肥
阴上	tsi <sup>24</sup> 纸	sji <sup>35</sup> 屎
阳去	tshi <sup>53</sup> 字	sji <sup>31</sup> 字
阴入	tsek <sup>55</sup> 叔	tap <sup>53</sup> 答
阳入	io <sup>222</sup> 药	lat <sup>21</sup> 辣

## 四、畬族客家话与闽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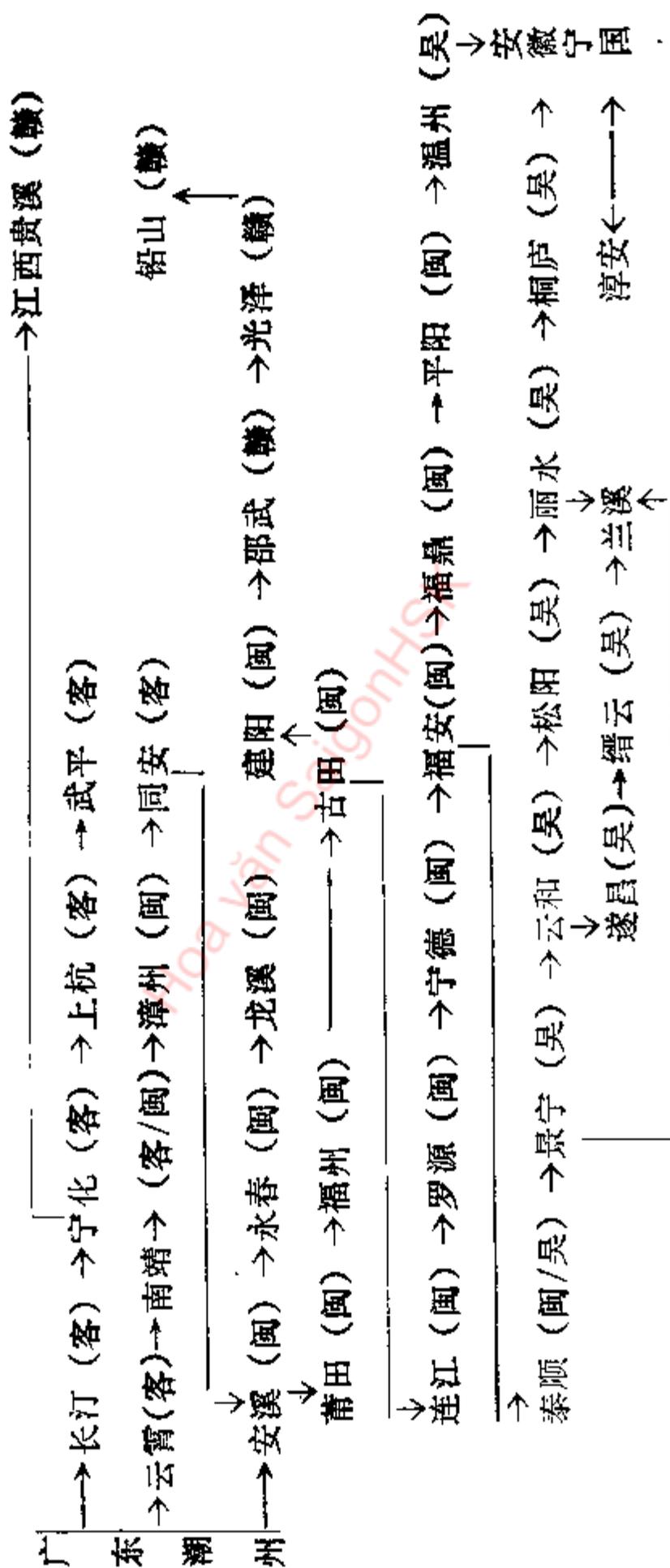
宋元以后,畬族从广东往福建、江西迁徙的时候,客家人却继续南下,畬族人越出客家方言地域,接触闽语以及吴语和赣方言(见下页《畬族转用客家方言后迁徙及接触语言表》)。

因为接触闽语时间长,客家话受到闽语的一些影响,如在广东潮安,畬族成年人女都能讲闽语(潮州话),在民族内部用客家话,对外则使用闽语(黄家教、李新魁,1963),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也都有这种情况。福建福安甘棠的客家话就具有闽北话特点(罗美珍,1980)。各地畬族的客家话的共同点多与闽语有关。如:①

闽南话	闽东话	潮州客家话	
phi	pei	phi <sup>43</sup>	嗅(鼻)

①闽东、闽南话材料见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295—230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

畲族转用客家话后迁徙及接触语言表



参考资料: 施联朱, 1983, 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1988, “客家方言”条)

khia                    khie                    khi<sup>43</sup>                    站 (企)  
 —                    tso<sup>2</sup>tsheiq tso<sup>233</sup>than<sup>11</sup> 种田 (作田)

从广东潮州畬族客家话与客家方言和闽语的比较，可以看出闽语对畬族客家话的影响。①如：

畬族客家话特点	闽语	客家方言
1. 帮组没有f、v	+	-
2. 知组多为ts，少数为t	[t]	+
3. 日母字主要是ŋ，少数为dz	[dz]	[ŋ/n]
4. n、l对立	-	+
5. 全浊声母变清送气	-	+
6. -k变-ʔ	+	-
7. 阳去并入阴平	-	-
8. 阳上与阳去合流	-	-

## 五、畬族客家话中的苗瑶语底层

畬族客家话中有一些词汇和语法现象，不论在客家方言或其他方言以及古汉语中都找不到它们的来源，却在苗瑶中发现。这不能不说是苗瑶语尤其是畬语的底层。这也充分说明畬族是放弃母语之后转用客家话的，畬族的来源与武陵蛮有关。

福建福安甘棠畬族客家话中的lo<sup>253</sup>（杀、宰），khiu<sup>33</sup>（蜈蚣）和广东潮安畬族客家话中的lat<sup>55</sup>（杀）、lo<sup>33</sup>（找）在苗瑶语的渊源关系如：①

客家话	黔东南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布努语	畬语	瑶语
杀 lo <sup>253</sup>	ta <sup>5</sup>	ta <sup>5</sup>	tua <sup>5</sup>	to <sup>5</sup>	ta <sup>5</sup>	tai <sup>5</sup>

①黄家敦、李新魁，1963。

②“臭虫、稻子、茅草、快”的客家话材料不知收集于什么语点，见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第4页。

蜈蚣	khiu <sup>33</sup>	khu <sup>7</sup>	ʂo <sup>3</sup>	so <sup>1</sup>	chyu <sup>7</sup>	kho <sup>6</sup>	sap <sup>7</sup>
找	lo <sup>33</sup>	—	—	—	—	—	lo <sup>4</sup>
臭虫	kun <sup>33</sup>	pi <sup>22</sup>	—	—	—	kon <sup>3</sup>	pji <sup>3</sup> pie <sup>1</sup>
稻子	bo <sup>22</sup>	na <sup>2</sup>	nu <sup>2</sup>	mple <sup>2</sup>	ntle <sup>2</sup>	pja <sup>2</sup>	bau <sup>2</sup>
茅草	goi <sup>31</sup>	qe <sup>1</sup>	—	Nqen <sup>1</sup>	ŋku <sup>1</sup>	—	gaan <sup>1</sup>
快	sjai <sup>33</sup>	xhi <sup>6</sup>	ʂaŋ <sup>6</sup>	ʂuai <sup>6</sup>	—	hi <sup>6</sup>	siep <sup>7</sup>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现象是福建福安甘棠畲族客家话中，指示代词分近、中、远三个。这种现象在汉语中是少见的，而在苗瑶语中却并不罕见，黔东南苗语甚至分为五级。把客家话的这三级指示与苗瑶语（尤其是黔东南苗语）比较，可以看出甘棠话的“级”向前移动一位。如：

	这	那（近中指）	那（远指）
甘棠话	kuai <sup>1</sup>	nai <sup>3</sup>	maŋ <sup>3</sup>
黔东南苗语	noŋ <sup>3</sup>	moŋ <sup>2</sup>	ɛ <sup>1</sup> /a <sup>3</sup>
湘西苗语	nen <sup>5</sup>	—	zi <sup>1</sup> /a <sup>3</sup>
川黔滇苗语	na <sup>3</sup>	zi <sup>5</sup>	i <sup>3</sup>
布努语	nau <sup>3</sup>	kau <sup>2</sup>	iŋ <sup>3</sup>
瑶语	naai <sup>3</sup>	naai <sup>4</sup>	uo <sup>3</sup>
畲语	ne <sup>3</sup>	va <sup>4</sup>	ɣ <sup>3</sup>

甘棠话由于kuai<sup>1</sup>取代了原来畲语的“这”，使甘棠话的nai<sup>3</sup>不再指“这”，而向前移动一级，指“那”（近指），nai<sup>3</sup>又排挤如黔东南苗语的“那”近指（moŋ<sup>2</sup>），使甘棠话的maŋ<sup>3</sup>又向前移动指“那”（远指）。

## 第五节 仡佬族转用汉语

### 一、仡佬族与仡佬语

仡佬族是祖国大家庭中古老的一员，自古生息繁衍于云贵高原。据1990年统计，仡佬族约有人口43万多，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贵州省的务川、道真、正安、仁怀、大方、关岭、黔西、六枝、遵义、织金、普定等县和特区，其余散居在清镇、平坝、安顺、镇宁、水城、晴隆、贞丰、兴仁、纳雍，云南省的富宁、广南、马关、麻栗坡、文山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隆林等县和特区。此外，越南北部也有一千多仡佬族的散居（1982）。从人口分布的情况来看，仡佬族的主要居住特点是大杂居，大分散，呈点状分布。散居在各地的仡佬族与当地的汉、布依、苗、壮、彝等民族形成交错杂处的局面。

由于居住分散，内部缺乏联系，长期以来，各地仡佬族在服饰、风俗等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支系较多。过去有人就仡佬族服饰颜色、习俗、职业等不同特点，将仡佬族分为青仡佬、红仡佬、白仡佬、花仡佬、皮袍仡佬、锅圈仡佬、剪发仡佬、卷毛仡佬、打牙仡佬、彝仡佬、打铁仡佬、蔑席仡佬等。而仡佬族内部则有“仡佬”、“葛佬”、“褒佬”、“哈佬”、“稿”、“普伏”、“埃审”、“佬”等若干自称。解放后才统一成“仡佬”这一族称。

古代的仡佬族是云贵高原东北部、川南及湘西一带的土著居民，与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我国中南和西南地区的濮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历史上，云贵高原曾是百越族群（骆越）与百濮族群交错杂处之地，由于长期接触、相互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发生了融合，到了秦汉时期，一种新的兼有两个族群文化特点的族类——僚，在这一地区产生，尔后又向桂北、川南一带扩

展，形成了汉晋直至隋唐时期遍布我国南方乃至中南半岛北部的庞大的僚系族群。这一族群中靠南的部分较多地继承了百越的文化特征，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今天的壮、布依、侗、水等壮侗语诸民族。而云贵高原东北部及川南、湘西一带的僚人则承袭了较多的濮人文化特征。由于长期他们处于汉、楚文化与百越文化之间，同时也受到了汉、楚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族群中的绝大多数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汉族，有的融入了属于氏羌族系的彝族。其中的一支在唐宋期间逐渐形成了仡佬族。<sup>①</sup>“葛佬”族称最早见于唐代史籍。

仡佬族的民族语言——仡佬语属汉藏语系，与壮侗语族语言有一定数量的共同词汇（由于其中同源词和借词之间的界限无法划清，故暂称“共同词汇”），但在语音上与苗瑶语族语言却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一些共同词汇。

由于居住分散，仡佬语内部方言差别的较大，各地仡佬族之间无法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际。根据语音和词汇的差别并参考语法的异同情况，仡佬语可分为四个方言。

## 二、仡佬族的语言转用及其类型

仡佬族虽然有本族的语言，但目前用这种语言进行交际的仡佬族已不多。据统计，操仡佬语各方言的总人数仅占仡佬族人口总数的1.5%左右（仡佬族总人口43万，使用仡佬语的将近6000人）。这一数字是本世纪50年代末期进行语言调查时所统计的。近几十年来，随着民族间交往的日渐频繁，汉语作为族际语的功能大大增强，随着农村汉语文扫盲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农业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和商品市场的繁荣，50年代所统计的数字到今天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这表明，在今天的43万多仡佬族中，已有98.5%以上的人转用了汉语或别的语言。

<sup>①</sup>翁家烈：《仡佬族散论》，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4

仡佬族所转用的语言主要是汉语西南官话。此外，散居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仡佬族也有兼通或主要使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完全转用汉语；（二）转用汉语并兼通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仡佬语除外）；（三）转用汉语并兼通两种或两种以上少数民族语言（仡佬语除外）；（四）转用别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

在今天仡佬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贵州省北部和中西部的道真、务川、仁怀、遵义，大方、黔西，六枝等县和特区，是贵州省汉族人口平均密度较高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有的县份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以上，如仁怀县。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仡佬族在生活习俗方面与当地汉族已经没有多大差别，局部地区甚至与汉族完全相同。在语言方面也基本上转用了汉语。50年代末期进行语言调查时，只有遵义、仁怀、大方等县的部分地区尚有少数人掌握仡佬语。地处贵州省最北部边缘的务川、道真、正安等县，仡佬族人口在20万以上，<sup>①</sup>是贵州省仡佬族人口较多的几个县份，但50年代调查时，这里早已没有了仡佬语的痕迹，已经全部转用了汉语。由于失去了语言这一要重的民族区别性特征，在解放初期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这一带的仡佬族多申报汉族。近年来，通过史学家及考古学家对流行于该地区的一些古老习俗，尤其是悬棺葬、岩穴墓葬以及大石板墓葬等古老殡葬习俗进行深入的考查和研究，确定了这些习俗的族属，恢复了这些古老习俗的保存者们本来的民族成份。<sup>②</sup>50年代调查时仍通行仡佬语的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仡佬语的使用人数也正日趋减少，如到了80年代中期，遵义县的仡佬语已基本消失，只在当地的汉语中保留下极个别的仡佬语词汇。<sup>③</sup>大方县百纳区普低乡的仡佬族，

<sup>①</sup>根据1990年统计，三县的仡佬族人口分别为务川8万多，道真7万多，正安约6万。

<sup>②</sup>雷广正、郑继强：《道真县悬棺、岩棺、大石板墓葬族属问题探讨》，载《贵州民族研究》1986、1、

<sup>③</sup>翁家烈：《道真仡佬族考察》，载《贵州民族研究》1985、1、

16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会用母语（即仡佬语）进行交际的只占全乡仡佬族总人口（452人）的30%，16岁以上的成年妇女会用母语进行交际的只占25%<sup>①</sup>。

安顺地区各县也有较多的仡佬族居住，50年代语言调查时，各县仡佬族均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但人数已经不多，并且只通行于仡佬族较为集中的村寨，如安顺的湾子寨，平坝的大狗场。居住分散的仡佬族绝大多数已转用汉语。该地区的关岭、镇宁是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份，尤以布依族和苗族居多，仡佬族大都散居在布依族或苗族村寨，或汉族、布依、苗杂居的地区，除部分老年人和居住较为集中的村寨仍使用仡佬语外，其余都已转用汉语，有少数还兼通布依语和苗语。<sup>②</sup>

贞丰县的仡佬族主要分布在布依族聚居的百层区皎贯乡的那丫、后山、磨岂以及鲁贡区鲁贡乡的洛半等布依族村寨，这一地日常交际主要使用布依语，只有在集市贸易中与城里来的商贩打交道时才使用汉语，因此，这一带的仡佬族除少数人（主要是老年人）在特定场合偶尔使用本民族语而外，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布依语，但也兼通汉语。<sup>③</sup>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隆林是一个较典型的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县份，散居在这里的仡佬族与汉、苗、壮、彝等民族杂居在一起，其中与苗族关系极为密切。分布在该县三冲、磨基等地的仡佬族近年来尚保存本民族语言，其中三冲仡佬语至今仍很完整，而磨基仡佬话已逐渐消失了。该县的仡佬族与汉、壮、彝等民族通婚，除转用汉语外，部分人还兼通壮语和彝语，与苗族虽不联姻，但由于彼此关系密切，因此，其中也有兼通苗语的。<sup>④</sup>

<sup>①</sup>张济民：《仡佬话在民学研究族中的地位》，载《贵州民族研究》1986，2

<sup>②</sup>《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第34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

<sup>③</sup>周国炎：《贞丰县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载《语言关系与语言工作》第33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sup>④</sup>胡积德：《清初以来仡佬族居住区域的改变和民族融合》，载《贵州民族研究》1984，1。

滇南麻栗坡、马关、广南、富宁、砚山、文山等地的仡佬族是二百多年来陆续从贵州省的遵义、大方、安顺等地迁来的，与当地的汉、彝、壮、瑶等民族杂居，其中麻栗坡特区的马波老寨、月亮湾、杨万等村寨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老寨和月亮湾尚有人能讲仡佬语，但现在已经全部转用汉语了。滇南仡佬族由于长期杂居，有的已经开始融合于别的少数民族。如马波老寨的仡佬族不仅与当地彝族有联姻关系，还加入了他们的“火把节”等节日生活中，自己独特的习俗已经逐渐改变。<sup>①</sup>与此同时，当地彝语也成了部分仡佬族的第二语言。

综上所述，占本民族人口总数95%以上的仡佬族在放弃本民族语言之后，主要用当地汉语，尤其是在汉语分布密度较高的贵州省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多民族杂居地区的仡佬族除在多数场合使用汉语而外，由于交际的需要，也有兼通或略知当地某些少数民族语言的，但这种情况在仡佬族中人数并不多，散居在距离汉文化中心（如县城，汉族居住较集中的小镇或乡村集市贸易中心等）较偏远的某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仡佬族，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当地通行的少数民族语言，也兼通或略知汉语，但与前两种情况相比，在仡佬族中，这种主要使用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就更少了。总而言之，汉语是今天绝大多数仡佬族的母语。

### 三. 仡佬族转用汉语成因分析

仡佬族中的绝大多数人放弃本民族语言，转而使用汉语，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大致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从今天仡佬族的分布状况来看，散居在各地的仡佬族均以自己的绝对少数处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绝对多数的包围之中，这种人数上的绝对悬殊是仡佬族转用汉语的主要原因。其

<sup>①</sup>柯积德：《清初以来仡佬族居住区域的改变和民族融合》。

次，对先进文化的崇尚、仰慕是所有后进民族所共有的心理特征。仡佬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但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原因，与汉族相比，其文化相对落后，在与汉族接触、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包括语言在内的先进文化，最后实现了语言的转用。

从社会条件上看，导致仡佬族转用汉语的原因多种多样，这里主要从仡佬族的社会历史和家庭结构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1. 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对仡佬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尤其是在近代史上，清朝政府疯狂的政治迫害，致使仡佬族人民背井离乡、四处迁徙，形成了零星散居的局面，割离了仡佬族民族内部的联系。长期以来，散居在汉族中间的仡佬族，逐渐失去了包括语言在内的自己的民族特征。

仡佬族的先民——古代僚人的一支，最早活动于云贵高原东东北部及湘西一带，汉晋时期，这一地区大部分为牂柯郡辖所蜀。公元3世纪初期（三国蜀汉建兴年间），诸葛亮部将马忠派遣张嶷攻打牂柯郡，不仅掠夺了当地人民的财富，而且还将自古生活在这里的仡佬族先民（僚人）两千多人强行迁往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地区）。<sup>①</sup>西晋太安元年至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02年——347年间），封建统治者又多次派军队在那柯郡内的仡佬族先民（僚人）居住地区大肆进行人口掳掠，致使大批僚人流入四川，散布在川中及川南地区，即今阆中、西昌、广汉、简阳、资阳、宜宾和梓潼一带，杂处于汉、彝等民族之间。封建统治阶级的征服、掠夺，不仅将大批僚人迁入汉族中心地区，置于他们的直接统治之下，还将大量僚人转卖各地为奴。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及内地奸商恶民对仡佬族先民（僚人）的疯狂掳掠，加之部分僚人因逃避灾难而被迫向外地迁徙，与此同时，大批汉人也相继移入，使原先聚族而居于云贵高原东东北部及湘西一带的仡佬族先民（僚人）

<sup>①</sup>陈寿：《三国志·蜀志》卷十三《张嶷传》。

逐渐形成分散居住，与汉人杂处的局面。

汉晋以来陆续迁入四川的仡佬族先民（僚人）人数虽然很多，但居住却很分散，其名称也因住地和习俗的不同而多达20余种，如南平僚、剑南僚、巴州僚、益州僚、罗定僚、葛僚等。随着封建统治的加深，封建王朝对仡佬族先民（僚人）的压榨愈加严重，僚人不堪忍受，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到公元7世纪中期，僚人的反抗斗争愈加激烈，唐王朝将其视为所谓“僚患”而大肆征剿。在进行残酷的武力镇压、征讨之后，便疯狂地掳掠僚人男女，转运各地卖为奴隶。在唐代的官书中所记“征僚”、“剿僚”之事，不是以斩首若干级来叙功，而是以生俘多少口来论赏。

唐代以来，四川等地有关僚人的记载很少，原因有三：一是僚人与当地汉族融合了；二是被掳掠贩卖到外地，僚这个族名不再使用了；三是有的僚人迁徙其它的地方去了。

宋以后，四川僚人基本上融入汉族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宋至明清之际，贵州北部和湘西一带的僚人则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史籍相继以“葛僚”、“仡佬”、“佶僚”、“仡佬”等名称称呼这一时期的仡佬族。在这一时期内，仡佬族居住地区虽曾出现过多次社会动荡，但并未造成仡佬族的大量外迁。不过，局部地区仡佬族与当地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新补贵州通志》和《黔书》（田雯）记载，在石阡苗民司，黎平八舟，古外（今榕江县）曹滴司均分布有仡佬族，清平（今凯里市）的仡佬族还不通汉语。而乾隆以后，这些地区的仡佬族已逐渐失去了包括语言在内的本民族特征，融入当地汉族和苗族。<sup>①</sup>

清康熙初年，吴三桂平水西土司叛乱，贵州大方、遵义一带的仡佬族慑于官兵征剿，开始遁逃外乡。嘉庆二年（1797年），

---

<sup>①</sup>胡积德：《清初以来仡佬族居住区域的改变和民族融合》。

以韦朝元,王囊仙为首的布依族农民起义遭镇压失败后,兴义府一带,地旷人稀,黔北、黔西北一带农民携眷前往租垦荒山者甚众。其中也有不少仡佬族农民,或为逃避当地封建地主的敲榨勒索,或因本地遭受天灾而随众向黔西南各县迁徙,有的辗转迁徙进入云南、广西以及国外的越南北部地区,并在这些地区逐步形成了仡佬族居民点。

自古居住在湘西龙山、保靖、永顺、古丈、凤凰等县的仡佬族,清初以来,通过婚姻的缔结,“在土村为土民,在苗寨为苗人”,逐渐与当地汉、苗、土家等民族发生了融合。

综上所述,历史上仡佬族饱受灾难,生活极不稳定,由于迁徙并不断与别的民族发生融合,到了清末,人口锐减。明清时期的滇黔桂毗连地区,早已有汉、布依、壮、苗、彝等民族居住,因此,仡佬族迁来之后大都零散杂居在其他民族之间,为了与外界交往,他们只能学习别的民族的语言,或使用当地各族通用的汉语。留居本地的仡佬族,一方面因本族人的不断大量外迁而人口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汉族不断迁入原来的仡佬族地区,与留居本地区的仡佬族杂居在一起,如明洪武年间的“调北填南”使大批汉族迁入贵州,其中有不少进入仡佬族地区,清道光年间,大量四川客民(汉族)向黔西南地区迁徙,有的中途留居贵州北部和中部一带,与仡佬族杂处。这样,本来居住就不太集中的仡佬族便形成了“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仡佬族日常交际对象主主要是汉族,而这一时期(即明清以来)这一带的汉族在人口上较之仡佬族已处于绝对优势,加之汉文化本身所具备的优越地位,以及长期以来,汉族作为统治民族和大民族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民性的藐视其他一切民族的心理,因此,仡佬族在与汉族交际时无条件地只能使用汉语,同时,散居的局面也限制了仡佬族本族语的使用范围,从而加速了语言转用(转用汉语)的步伐。

## 2. 家庭组成结构的变化也是仡佬族语言转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以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造成了今天的仡佬族居住分散和人口稀少的局面，多数地区的仡佬族都是一两户或十来户杂居在其他民族（多数情况为汉族）的村寨之中，而居住在同一村寨或邻近村寨的仡佬族又大都是同姓同宗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支近派，这就给婚姻的缔结带来了不少麻烦。有的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不得不与远在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同族联姻。有的是两个村寨的同族（无血缘关系）保持长期联姻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并不能长久维持，因为经过几代人的联姻，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村子里的仡佬族也变得有血缘关系了，或为姑表关系，或为姨表关系，再不能继续通婚了。因此，为了生息繁衍，零星散居各地的仡佬族只能打破民族的界限，与外族通婚。这种情况在仡佬族历史上早已普遍存在，如贵州中北部地区，历史上曾是仡佬族先民集中居住的地方，但历经千百年的社会变迁，汉族成了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仡佬族反而成了杂居其中的少数民族。长期的相互接触，使仡佬族与汉族之间的互通婚成了普遍现象，从而也导致了这一地区大批的仡佬族融入汉族。其他散居各地的仡佬族不仅与汉族通婚，还与当地苗、侗、彝、布依、土家、壮等少数民族缔结婚姻。

仡佬族与其他民族联姻，一方面限制了本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汉语（或当地一种主体民族的语言）进入了仡佬族家庭。

贵州北部遵义、道真、务川、大方一带的仡佬族主要杂居在汉族之中，历史上有过自己的民族语言，这是可以肯定的。汉族由于人口上处于优势地位，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学习其所在地的民族语言的。因此，仡佬语只能在本民族内部和家庭内部使用，而仡佬族为了进行必要的社交，不得不掌握汉语。由于与汉族通婚，汉语从社会进入仡佬族家庭。比如，一个不会说仡佬语的

族女子嫁到仡佬族家中，她与丈夫、公婆以及这一家庭中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流只能使用汉语，而仡佬语则只能在除她以外的家庭成员中使用。多数情况下，有她在场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交谈也只能使用汉语。这样，在家庭中便形成了既使用仡佬语又使用汉语的双语制。随着家庭中男性成员与汉族联姻的人数的增加，使用汉语的场合越来越多，而掌握仡佬语的人数和使用仡佬语的场合则逐渐减少，当家庭成员中再没有人掌握和使用仡佬语时，家庭双语制消失，过渡到只使用汉语的单语制，也就是实现的语言的转用。

向外地迁徙的仡佬族，除了与汉族通婚以外，还与别的少数民族通婚。因此，在有些地区的仡佬族家庭中，不仅出现双语现象，还出现了多语现象，有的家庭中的双语，不是仡佬语与汉语，而是仡佬语与当地某种少数民族语言。

仡佬族放弃本民族语而转用汉语，除上述原因外，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商品市场的繁荣，农村汉文扫盲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普及等对仡佬族人民学习和使用汉语汉文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身利益，曾多次限制甚至禁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也是仡佬族语言转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 第六节 高山族转用汉语

高山族从使用母语到转用汉语闽南话，是同台湾的发展史特别是汉族闽粤籍移民的开拓史联系在一起的。

据文献记载，台湾的汉族移民始于三国时代，历经隋、唐、五代至宋元，大陆汉族先后不断向台湾迁移，但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入垦，则在明末清初。资料统计表明，1624年荷兰侵占台南之前，台湾的大陆移民仅万人，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军屯移民共10万余众。从康熙统一台湾至嘉庆年间，台湾汉族移民达

200万余人，已形成汉族移民社会的格局。台湾移民80%以上，来自闽粤省籍，称福佬系或台湾人；20%左右是粤籍移民称客家系或客人。此外，尚有少数其他省籍的移民。闽籍移民以福建漳、泉人民为主体，所操闽南方言，俗称台湾话。

17世纪之前，高山族与大陆沿海之间的文化交流，多限于渔民商贾的贸易。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陈第《东番记》载：“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说明双方语言交际主要靠汉族翻译。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吸引大陆移民入垦以发展农耕，因而在平埔西拉雅族群的肖垅社“有土人懂汉语”，<sup>①</sup>所谓“汉语”估计是闽南话。此外，史籍文献上未见汉语与高山族任何一种语言大面积接触与交流的记录。可见，在明清大规模移民之前，台湾高山族以各自的民族母语做为交际工具。

高山族转用汉语，从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揭开序幕，清代进入高潮，国民党统治时期跃上新台阶，大致经历4个阶段：

### 1. 郑氏政权时期（1662—1683年）

是平埔人转用汉语闽南话的始发期。转用主要发生在军屯中心区，即台湾西南部，尤其是西拉雅族群聚居地，例如文献上著名的四大“番社”（新港、目加溜湾、肖垅、麻豆），率先使用闽南话，母语逐步退居家庭用语。这时期，军屯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受到汉语的波及。

### 2. 清朝统治时期（1683—1895年）

是平埔人全面转用汉语闽南话的关键期。清朝统一台湾212年间，经康雍、乾嘉、光绪，平埔人实现封建化，大部分转用闽南话。据称，光绪年间，使用10种语言的平埔人中，使用凯达加兰、路易朗、道卡斯、巴布拉、巴布萨、洪雅、西拉雅等7种语言的人转用汉语，使台湾西部平原从多民族语言区变成统一的汉

<sup>①</sup>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1923年。

语区。此外，光绪元年（1875）实施“开山抚番”，又使汉语闽南话在台东地区得到立足点，为后来的推行汉语奠定基础。

### 3.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1945年）

是高山族语言发展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所谓“日语中心运动”，强迫高山族放弃民族母语与汉语，使用日语为统一交际语。但是，日寇的语言同化政策不但没有动摇汉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反而促进平埔人转用汉语进程的加速发展。据日本学者1935年的调查，平埔人转用汉语之后，原来的7种母语，在这个时期“最多只依稀存在记忆之中”；尚存的3种语言，即邵语、巴则海语、噶玛兰语，已退居家庭用语，“日常使用的是台湾话（即闽南话）”。<sup>①</sup>在“隘勇线”以内的高山族封锁区，刚刚兴起的汉语转用受到遏止，但民族母语却得到延续与发展，客观上为后来高山族“双语”的形成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 4. 国民党统治时期

是高山族普及“国语”（汉语）的时期。平埔人转用汉语已趋稳定，推广汉语的中心由西部平原向中部山区以及东部纵谷地带推移。台湾当局推行“国语”与“山地语”（高山语），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使高山族各语言在各自聚居区通行的前提下，接受汉语或台湾话作为超族际的共同交际语。至此，高山族普遍成为“双语”人，既操民族母语，又操汉语或台湾话。汉语终于成为全岛性的交际语。

综上所述，平埔人转用汉语、高山族普及汉语先后不到300年。通过台湾先住民族转用汉语历史的回顾，可以归纳如下特点：

第一，高山族转用汉语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择。

高山族转用汉语，突出表现于清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清代平

<sup>①</sup>浅井慈伦、小川尚义：《原语料台湾高砂族传说集》，1935年。

埔人实现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阶段的飞跃，现代即本世纪50年代起，高山族开始迈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轨道，都是在汉族文化直接影响下世纪性的社会变革，也是导致语言转用的必然前提。

据文献记载，17世纪以前，分布台湾西部平原的平埔人，共4万人左右，分成10个族群，使用10种语言，因而有“种类各异，番语侏僂”之说。<sup>①</sup>当时平埔人仍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从事粗放农耕兼草地逐鹿的经济生活。语言交际上自相分立、不通声气的特点，同原始落后的生产力与划地为牢、互不统属的社会生活状况是相适应的。17世纪中期之后，大规模的闽粤移民首先进入台湾西部平原垦殖，它们所代表的封建农耕稻作文化、先进的铁器农具、生产经验以及水圳灌溉技术，促使平埔人原始社会土崩瓦解，并越过奴隶社会阶段，直接跨入封建化进程。平埔人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甚至宗教祭祀等，处处模仿汉人，或半从汉俗，导致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在这场急速汉化过程中，平埔人纷繁分歧的语言，如同部落组织一样，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阻力，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打破自相封闭的语言壁垒，并尽快转用移民所操的汉语闽南话，就成为势在必行的时代潮流。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高山族社会，又面临资本主义化的转折。从50年代开始的“山地三大运动”（即生活改进，农业定耕与育苗造林，改进衣食住行和移风易俗），60年代统一规划“山地保留区”为宜农地、宜牧地、宜林地三这类型，实施科学经营；至70年代推行地权私有化，进一步加速高山族从游耕狩猎经济向定耕农业或林业经济发展。在实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型过程中，台湾当局注意到语言交际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从一开始就制订“国语”、“山地语”并重的方针，并采取实质性措施加强国语教育，使之成为

<sup>①</sup>丁绍仪：《东瀛识略》。

各族群众都接受的社交语言，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

高山族两次转向汉语，虽然历史背景与条件不同，但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择，它促使交际领域从纷繁复杂、自相封锁的独立状态，走向彼此沟通、交流的一统天下，从而加强与汉族文化的联系，加速高山族社会的发展。

第二，高山族转向汉语与大规模的汉移民运动同步。

17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经历了郑成功、清代与国民党时代三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浪潮。高山族急速转用汉语，同移民文化的冲击与渗透具有内在联系。

首先，移民改变了台湾人口结构。移民前，包括平埔人在内的高山族大约10万余人，是台湾历史舞台上人口最多的主导民族。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带去军屯移民共有10万余人，与当时的高山族人口大抵平衡。清代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二十八年（1684—1763），台湾人口达到七八十万，嘉庆十六年（1811）已增至200万余人，光绪十六年（1887）又突破320万。200多年间，高山族依然保持十余万人的规模，移民与高山族人口从大体相等，变成30:1的悬殊比例。到20世纪中期，国民党从大陆军事移民200万人，40年间台湾人口增至2000余万，高山族人口约40万，汉族与高山族之间的人口比例达到50:1左右，移民居于绝对优势。郑氏时期，垦区相对集中在台湾西南部及西部平原的零星垦点，清代垦区扩及南北，至光绪年间已达全省面积的80%。汉族移民大部分与高山族错居杂处，悬殊的人口比例，使高山族相对分散的居点村社长期处于移民分割、包围的状态，世代相袭的语言环境如同被打破的一面镜子支离破碎，因而失去昔日的凝聚力与光彩。

必须看到，汉族移民与台湾土著之间文化冲突的优胜劣败，不仅表现在人口数量的差距甚大，还表现在人口素质与中央集权支持等方面。闽粤移民许多人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与经验，富于开拓与冒险精神，而且其中有相当数量是驍悍的军旅隘勇。清代

移民虽然曾受到政府海禁的阻碍,但他们对台湾的垦殖由于符合、统治者的意图,因而长期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支持。这支以封建集权为后盾的移民大军,既是披荆斩棘、化丛莽为良田的急先锋,又是推进汉语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对高山族原始社会经济基础与部落制度摧枯拉朽式的破坏,对高山族母语的生存同样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从而为大面积地转用汉语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

移民文化不但实施物质力量的征服,也重视精神文化的建设。无论郑成功、清政府,还是国民党当局,都积极在高山族村社兴教办学。郑氏在平埔人地区“设立学校”,清代又立“社师”,国民党当局推广国语与义务教育,乡村设中、小学。这些教育措施对高山族转用汉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是移民浪潮叠起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平埔人转用汉语虽然不平衡,但进展普遍相当迅速。据文献记载,先行垦殖的台南地区,闽南话已普及,“有聪慧能通漳泉言语,间能作中州语者”,<sup>①</sup>甚至“有背诵诗易经无讹者,作字颇有楷法”。<sup>②</sup>同知年间,“大目降(今台南新化镇)至鸡笼(今基隆),……其居处、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器用半从汉俗,即谙通汉语者不过十之二三耳。”<sup>③</sup>而光绪初年,苗栗县苑里一带,平埔人风俗“一如汉人,通番语者百无一二”;<sup>④</sup>住在雲林县城郊的村社,“旧俗草除殆尽”,“言语一如漳人,询其番语奚若,率无以应”,即使当过头目的老人,“亦仅知一二”;<sup>⑤</sup>北部噶玛兰地区,康熙年间有汉人“兴通互市”,但移民入垦始于嘉庆元年(1796),15年后就出现“置办耕牛农具,渐通汉人语言”的新气象。最晚开发的台东地区,“开山抚番”后懂汉语闽南话的人也多了起来。不论开发早晚,汉语的推行与转用总是紧随移民垦

①蒋毓英:《台湾府志》卷五。

②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③陈培桂:《淡水厅志》。

④转引陈碧笙:《台湾地方史》。

⑤倪赞元:《雲林县采风图册》。

殖的后尘，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

总之，在移民文化经久不衰的冲击下，高山族转用汉语，郑氏时期主要在垦殖中心的台湾西南部地区获得“点”的突破，清代由“点”变成“面”的辐射；至光绪年间，平埔人大部分已放弃母语，转用汉语闽南话了。现代又借助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将汉语普及全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垦殖为原动力，高山族转用汉语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

第三，高山族除转用汉语这一主流外，还有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转用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

高山族中一种语言转用另一种语言，文献上有稽可查的，包括：

1. 平埔人转用高山族阿眉斯语，即清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与光绪四年（1878），部分噶玛兰人、巴布拉人和讲马卡道方言的西拉雅人，分别迁居花莲、台东等地，与阿眉斯人杂处，对外转用阿眉斯语。

2. 赛夏人转用泰雅语，居住新行县五峰乡的赛夏人，放弃母语赛夏语大隘方言，转用杂居的泰雅人母语。

3. 沙阿鲁阿人转用布农语，居住高雄县桃源、高中两个村子的沙阿鲁阿人，基本放弃母语，转用邻近的布农语。

4. 卡那卡那富人转用布农语，居住高雄县民权、民生两村的卡那卡那富人，转用周围的布农人母语。

高山族中由一种语言转用另一种语言的动机多数出于迁徙、杂居与交流的需要，转用语言通常是定居地原住民族的语言，他们在人数及总体实力上明显居于优势，为了友好相处与交流，迁居民族主动放弃母语，转用对方语言。如赛夏人转用泰雅语、沙阿鲁阿人与卡那卡那富人转用布农语，均属此类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噶玛兰等族群历史上的迁徙，多少是为了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不致被移民文化渗透而举族远征。这种消极回避的作法，虽然以放弃自己母语转用定居民族语言为代价，最终还是回归主流，转用汉语

或汉语闽南话。例如，除称加礼宛的一部分噶玛兰人仍操母语外，大部分人对外转用汉语、台湾话或阿眉斯语。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台湾西部巴则海人迁居埔里山地，最后大多数人转用台湾话，只有极少数老人坚持使用母语。台湾高山族转用汉语过程中这些有趣插曲，再次雄辩地说明，转用汉语是高山族语言发展史上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Hoa văn SaigonHSK

## 第五章 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

### 第一节 粤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粤语是现代汉语的一个方言,俗称“白话”。它分布在广东大部分地区(粤东闽语、客家方言区除外)和广西东南部及西部部分城镇如百色、平马、乐里等。此外港澳居民及大量海外华人也使用粤语,使用人口约在5000万以上。

海南北部儋县40多万居民所讲的儋州话可能也是粤语的一支,它与大陆地区粤语较接近,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声母中有带前喉塞音的浊塞音<sup>?</sup>b、<sup>?</sup>d; -k尾韵的字已弱化成-<sup>?</sup>;上声、去声不分阴阳,白读有6个调类,文读有5个,而大陆地区粤语一般平上去入分阴阳;具有部分独特语词。<sup>①</sup>此外有人认为平话也是粤语的一支。它流行于广西中部、北部及西部右江沿岸,可能是古代广西部分汉族居民使用的语言。目前使用人口约200多万。

在现代汉语方言群中,粤语以语音、语法、词汇上众多的特点显示其特殊地位。它具有一些与其它方言迥然而异的语音发展现象和语法规则,更有一批独特的方言语词。大量古汉语成分的保留是粤语的一大特色,另外岭南地区是清代海禁大开以来的中国南大门,形形色色的异域文化也给粤语打上了深深的印痕,众多的外语借词构成了粤语的又一特色。它的另一部分独特因素则与岭南地区的两千年民族融合史密不可分,这就是其中的少数民

<sup>①</sup>目前专文研究介绍儋州话的仅见吴英俊的《海南省儋州方言单字音表》,载《方言》1988年第2期。

族语成分。

史料记载，百越民族最早居住在岭南地区。先秦至秦汉时期这里有西瓯、骆越和苍梧等多个民族群体，与分布于今福建、浙江沿海的闽越、于越等同属百越民族。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并可能具有共同的语言。岭南百越民族集团在三国至唐宋间又被称为乌浒、俚、僚、洞蛮等，是现代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先民。（参看第三章第二节）

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流历史很久远，但两地之间的深入接触始于秦代。（参看第三章第二节）秦灭六国之后，于公元前214年发50万大军“南擒劲越”。秦王朝控制岭南没多久即告覆灭，岭南秦兵首领“南海尉”赵陀于公元前206年联合越族首领，据南海郡，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王，建南越国，控制岭南、海南岛及今越南北部地区，势力影响至今福建、湖南、贵州、云南地区。南越国共历五世主，经93年，其居民以百越为主。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征发东南沿海“楼船十万师”及巴蜀、夜郎“兵丁”、“罪人”组成“十万兵”攻陷南越国。自此历代中原王朝牢牢地统治岭南地区。秦汉时期从中原等地到岭南征讨百越、戍边的大批兵士多留在当地定居，此后历代因战乱、戍边、贬谪、经商等而到岭南的也源源不断。

古代岭南地区的外来人口是很复杂的，因而传入岭南的外来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中原汉语之外，不排除还有其它汉语方言甚至少数民族语言。岭南偏于一隅，山高水远，地理条件使之与中原地区的交流障碍重重，渐渐地，这里的汉语便与中原汉语的差别不断扩大。进入岭南地区的汉语非一时一地，再加上它与土著民族语言百越语的交融，于是发展成今天这么一个具有显著个性的方言——粤语。

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指出：“造成粤方言特殊地位的原因，固然主要应该从汉民族入粤的复杂过程中去寻找。但是，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另外一个对方言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因

素，那就是因民族杂居而产生的语言相互影响。”<sup>①</sup>秦汉以后中原王朝虽然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但这一地区的人口构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以百越及其后裔俚、僚人为主，汉族虽然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优势，但是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执行“和集百越”的政策。他们一方面联合百越首领共同管理岭南，如南越国的宰相吕嘉，桂林郡中监居翁、将领毕取都是越族。<sup>②</sup>一方面鼓励汉越人民往来，增进团结。南越王赵陀抛开歧视蛮夷的偏见，自称“蛮夷大长”并“弃冠带”以从越俗，仿效越俗“魃髻箕踞”（结发于头上和盘腿而坐），<sup>③</sup>表示与越族不为两家人。汉越通婚通商，互相学习文化，使得岭南地区社会得到不断发展。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基本途径，汉越人民的交流离不开语言的交流。古代岭南社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汉越双语制。据《文献通考》载，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广南东路（今广东省境）的主户（土著）有340 459户，客户（汉族和已汉化的土著）有218 075户，土著人口仍高于汉族。元明以后，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至今岭南东部土著民族已全部汉化，而西部仍有操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岭南土著民族。岭南东部为粤语集中地区，这里至少经历了秦汉到宋元一千多年的漫长的汉越双语制的语言使用过程。语言发展历史表明，深入、持久的双语现象会使语言之间产生相互影响。承传于百越语的现代壮侗语中众多保留古汉语读音的借词说明古汉语曾对百越语产生过巨大影响。（参见第三章第二节）”从总体上看，我国语言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即不管什么语言，它既能影响别的语言，也会受别的语言影响。”<sup>④</sup>有学者研究认为，百越语词在现代粤语里所占的比例约为20%。<sup>⑤</sup>这个统计不一定很准确，但粤语中

<sup>①</sup>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

<sup>②</sup>《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卷九五。

<sup>③</sup>《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

<sup>④</sup>戴庆夏：《论语言关系》，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sup>⑤</sup>李敬忠：《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问题》，载《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

存在一个份量不轻的百越语成分却是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以下从语音、词汇、语法几个方面来分析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或与百越语影响有关的成分。现代壮侗语源于百越语，因此，我们将通过对粤语和壮侗语的比较研究来探索这一问题。

## 一、语 音

语音虽具有较强的稳固性，但当某一种语言遇到外来因素的强烈渗透时也可能发生变异，产生一些背离该语言发展规律的现象。认真考察粤语的语言面貌，不难看出它是在古壮侗语的巨大冲击之下接受了某些壮侗语语音特点，致使原有语言系统发生紊乱，由此产生重组运动，进而发展成今天这样既保留了古代汉语语音的许多特点，又具备某些壮侗语语音性质的新的和谐体。

(一) 声调的分化。中古汉语的四声在粤语依声母清浊分化成阴阳8大调类，一般阴入又分成两个调值，有些地方阳入也分两个调值。这样调类总数共达9个或10个。这在汉语方言群中十分罕见，其它方言的分化没有这么彻底、完整、细致。调类较多的吴语、闽语一般也只有7个，个别达8个。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声调多到10个，它们由古壮侗语4个调类依声母清浊分化成8大调类，促声调7、8调又由于主要元音长短不同造成音值差异，各分成两个调，调类总数达10个。例如武鸣壮语：7(短)：nap<sup>5</sup>插tap<sup>5</sup>肝；8(短)：nap<sup>3</sup>束(纱)tap<sup>3</sup>蹬；7'(长)：na:p<sup>35</sup>挟ta:p<sup>35</sup>塔；8'(长)：na:p<sup>33</sup>纳ta:p<sup>33</sup>座。

粤语声调的发展很可能与壮侗语声调影响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粤语阴入、阳入的分化也是与主要元音长短有关。广州话阴入分上阴入、下阴入，念短a的入声字全部分布在上阴入调，念a:的入声字全部分布在下阴入调。如：

上阴入(短a)：jat<sup>3</sup>一、pat<sup>5</sup>笔、kwat<sup>5</sup>骨、tsat<sup>5</sup>质

下阴入(长a:)：pa:t<sup>33</sup>八、ka:k<sup>33</sup>格、ha:k<sup>33</sup>客、

kwa:t<sup>33</sup>括。

不难看出，粤语的入声调的三声或四声分化与壮侗语关系十分密切。

(二) 声母m、n、ŋ、l配调变化。m、n、ŋ、l是次浊声母，在现代汉语各方言中它们只与阳调字相配，粤语书面读音亦如此，唯独口语中却有大批的词是m、n、ŋ、l四个声母与阴调相配。例如南宁话：

阴平55	阴上35	阴去33	上阴入5	下阴入33
maŋ拉	mɛ歪	liŋ陡	mat什么	ma:k掰
haŋ敲打	lɔ拿	lam倒	ŋak骗	na:t烫

壮侗语族语言这四个声母与阴调、阳调都可以相配组词。粤语这几个声母配调的特殊现象当与壮侗语影响有关。粤语口语中部分声母为m、n、ŋ、l念阴调的词在壮侗语当中也存在与之音、义对等的语词，二者当同源于古壮侗语。

(三) 古心母读ɬ。西路粤语(包括广东西部和广西东南部)古心母字演化成边擦音声母ɬ(广州仍读s)，例如南宁话：ɬam心ɬi四ɬuŋ送ɬu嫂。这种特性不是古汉语语音的继承，而是古壮侗语影响的遗迹。粤语周边的壮语、黎语、布依语、瑶语等都有这个声母，汉语老借词心母字都念这个声母。例如田林壮语：ɬam心ɬu:n算ɬu苏ɬi:u硝ɬi:n仙。壮侗语这一读法可能影响了部分粤语地区心母字读音的变化，而出现心母字读音变化的这部分粤语地区正是越族较晚同化于汉族的岭南西部地区，并且直至现代这一地区操粤语的居民与壮侗语族各民族人民的来往仍很频繁，因此不难看出这部分粤语地区心母字声母变化的原因，那就是壮侗语族语言的影响。另有论者撰文指出皖南汉语黄山话也有这个声母，中古的“精、清、从、心、邪”等声母的字读ɬ或tɬ、tɬ'，认为这“是汉越语言融合的历史痕迹，……这些来自古越人的语言成分，今天作为黄山话的底层被保留下来了。”<sup>①</sup>此可作

<sup>①</sup>孟庆惠：《黄山话的tɬ tɬ' ɬ及探源》，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

旁证。

4. 古塞擦音字塞音化、擦音化。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10多个县市的粤语出现了这种现象，中古部分塞擦音声母字在这里变塞音或擦音声母。例如广西容县话古精、清、从母字分别读t、t'、ɬ，如宗tuŋ足tuk组ty子ti、醉tui（以上精母字）；促t'uk此t'i、七t'at、妻t'ei、催t'ui（以上清母字）；罪ɬui、秦ɬan自ɬi、在ɬɔi、才ɬɔi（以上从母字）。出现这种变化的粤语区与古心母字读ɬ声母的地区基本重合，都与壮侗语的影响密切相关。壮侗语缺乏塞擦音声母（现代部分方言的塞擦音声母是后起的），在汉语老借词的读音体系中，汉语塞擦音字往往念成塞音或擦音。例如侬佬语：təm<sup>5</sup>浸、tai<sup>6</sup>再（精），t'əu<sup>1</sup>秋、t'ət<sup>7</sup>漆（清），ti<sup>6</sup>字、teŋ<sup>2</sup>情（从）。又如武鸣壮语：ce:n<sup>1</sup>煎（精）、ci:n<sup>1</sup>（清）、qik<sup>7</sup>尺（穿）、cin<sup>3</sup>准（照）。壮侗语这种读法可能影响了粤语，致使其部分古塞擦音字演化成塞音、擦音字。

5. 清塞音声母字浊化。①发生古塞擦音字塞音化或擦音化的地区，同时也出现了古清唇塞音帮母字、舌尖清塞音端母字浊化成b、d的现象。例如容县话：波bo、巴ba、补bo、贝bui、摆ba:i、闭bei、悲bi、保bou、博bok、北bak（以上清母字）；多do、带da:i、帝dai、堆dui、倒dou、钩diu、端iin、得dak、的dik（以上端母字）。海南儋州话也发生了这种变化，并且带有前喉塞成分。例如：包<sup>2</sup>ba:u<sup>1</sup>、本<sup>2</sup>bən<sup>3</sup>、博<sup>2</sup>bo<sup>27</sup>（以上帮母字）；刀<sup>2</sup>dəu<sup>1</sup>、党<sup>2</sup>duŋ<sup>3</sup>、滴<sup>2</sup>de<sup>27</sup>（以上定母字）。这种由古清音字演变成现代浊音字的现象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属例外。粤语这种语音发展现象的引发点是塞擦音字的塞音化。粤语与《广韵》体系最接近，可见它在中古时期也和汉语的多数地区一样存在“帮p、滂p'、並b——端t、透t'、定d”这样的塞音声母格局。西

①详见李锦芳《华南地区语言清塞音声母浊化现象探析》，《汉语与少数民族语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增刊。

路粤语可能因后来和壮侗语发生密切接触，精母字演变成塞音声母t，在其内部发生音位系统的排斥现象，新起的念t的精母字排斥原先念t的端母字，使其另寻发展方向。音位变化不可能有太大的跳跃性，一般是尽量向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相近的音素发展。与t相近的粤语原有音位有t'、d，被排斥的端母字并没有向这两个音位靠拢，因为粤语原先念t'、d的是透、定母字，现代容县话等的端母字并没有与这两母字合流（透母字读t'，定母字读t），可见这三母字自古至今都不相混，分别念不同的声母。端母字受排斥后不会直接变成t'或d，由不送气清塞音直接演变成送气清塞音或浊塞音不符合汉语语音发展规律。端母字受排斥后的第一个发展方向是ʔd。因为t、ʔd同属清塞音（ʔd因前喉塞成分决定了其清音性质），而且在粤语是个新音素，不会抢占原有音素的位置。壮侗语中有这个声母，当粤语与它发生密切接触之时精母字读音发生了变化，音位系统发生紊乱，最后粤语也只能从壮侗语那儿索取补偿条件，那就是从壮侗语吸收ʔd音素作为端母字的读音发展方向。第二步才变成现代的d，这是前喉塞成分逐渐减弱，最后消失造成的，而今儋州话仍保留前喉塞成分。壮侗语前喉塞声母的发展亦如此，部分地区的前喉塞成分已减弱，个别地区已消失。粤语端母变ʔd后前喉塞成分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地区后来陆续迁入操珠江三角洲粤语的居民及闽语、客家方言居民，受这些方言及北方官话的影响，加上与壮侗语联系逐渐减少，于是放弃这个在汉语中显得很异常的音素。那么帮母字何以念b呢？这是语言的类化现象，或叫类推变化（analogical），为了使整个音位系统对称、和谐，端母字变ʔd，帮母字也变ʔb，最后一同变d、b。但这不是在每个地区都得以实现，广东西部化州话端母读d，但帮母仍念p。

6. 韵母介音消失与元音a分长短的现象。在汉语方言群中只有粤语出现这种特征。粤语整个语音系统与《广韵》很接近，它过去也应该有介音（韵头），但是现在消失了。另外，其元音

a有长短对立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广州话：街ka:i<sup>1</sup>——鸡kai<sup>1</sup>，考ha:u<sup>5</sup>——口hau<sup>5</sup>。这种现象也与壮侗语影响有关。壮侗语是韵母无介音的语言，它靠元音的长短对立和丰富的唇化、腭化声母弥补因缺乏介音而可能造成音位缺少的局面。壮侗语的a、o、u、i、e、w等元音都有长短对立现象。壮侗语这种韵母构造的特点影响了粤语韵母系统的发展，它的介音消失与元音a分长短相辅相成。另外，粤语还出现了两个唇化声母kw和k'w，例如广州话：瓜kwa<sup>1</sup>、果kwɔ<sup>5</sup>，夸k'wa<sup>1</sup>、亏k'wei<sup>1</sup>。这也是因介音消失而出现的一种补偿现象。

## 二、词 汇

词汇是语言结构中最活跃的成分，语言间的相互渗透在词汇部分表现最明显。粤语中有不少语词在古籍文献中没有记载，与其它汉语方言也没有联系，但是在壮侗语里存在与之语音对应、词义相当的词，我们认为这是古代漫长的汉越语言交融之中被汉语吸收的百越语成分。同时也是千百方百越及其后裔放弃自己的语言转用汉语后留下的语言底层。以下试分析广州话中部分来自古百越语（古壮侗语）的常用语词。限于篇幅不能逐个推考，以表格形式列出。①广州话材料依据《广州话方言词典》，②壮侗语材料依据《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③和《台语比较手册》。④“傣西”和“傣德”表示傣语西双版纳和德宏方言。为了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关系，将拟古音参照。壮侗语族中只拟台语支古音（依据《台语比较手册》），侗水、黎语支古音尚难构拟。广州话则根据现代各声韵与中古汉语音韵体系（《广韵》系统）对应规律拟

①详见李锦芳《粤语中的壮侗语族语言底层初探》，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6。

②饶秉才等著，香港商务版，1981年。

③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

④李方桂著，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英文版），1977年。

测，拟音按《汉字古音手册》。<sup>①</sup>例如广州话la<sup>5</sup>（寻找，摸索）的古音拟测：广州话声母l来自中古来母（中古音l），a韵来自中古麻、佳韵（中古音a、ai），广州话端系字（包括来母）只配麻韵，不配佳韵。因此广州话la<sup>5</sup>的中古音当为来母麻韵：la。又如广州话tam<sup>0</sup>（睬）的古音拟测：广州话声母t来自中古端、定母，而tam<sup>0</sup>属阳调，当来自中古定母（中古音d）。广州话韵母am来自中古覃、谈、侵韵（中古音ɒm、am、iǎm）。因此广州话tam<sup>0</sup>中古音当为定母覃韵（或谈、侵韵）：ɒm（ɒm、diǎm）。

以下将广州话与壮侗语相对应的词共同组成一组，带星号者为古音，少数不具备条件的不拟古音。

- ① { 广州la<sup>5</sup> \*la: 寻找，摸索  
 壮(田林)la<sup>1</sup>，泰、傣(西)ha<sup>1</sup>，侗、水la<sup>5</sup> \*xraA调：寻找
- ② { 广州ŋa<sup>6</sup> \*ŋa(ŋai、a)：占（地方），张开  
 壮、傣(西)?a<sup>3</sup>，黎ŋa<sup>3</sup> \*?a C调：张开
- ③ { 广州na<sup>3</sup> \*na: 雌性，母  
 壮、傣、泰na<sup>4</sup>：姨母，布依na<sup>4</sup>：舅母 \*nac调
- ④ { 广州ma<sup>1</sup> \*ma: 一对儿，双生  
 壮wa<sup>1</sup>，傣fa<sup>1</sup> \*fa A调（ma A调）：双生子
- ⑤ { 广州tam<sup>0</sup> \*ɒm（ɒm、diǎm）：睬（脚），睬  
 壮(田林) tam<sup>0</sup>，侗tam<sup>4</sup>，水tjam<sup>0</sup>，黎tom<sup>2</sup> \*dɒm B调：睬（脚），睬
- ⑥ { 广州lam<sup>6</sup> \*liǎm: 倒塌，破产  
 壮lam<sup>4</sup>，泰lom<sup>4</sup>，毛南lam<sup>6</sup>，水q'am<sup>6</sup> \*lem C调：倒塌
- ⑦ { 广州nam<sup>2</sup> \*nom（nam、niǎm）：软，烂  
 壮no:m<sup>2</sup>，泰no:m<sup>2</sup> \*nom A调：软，烂

① 郭锡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 ⑧ { 广州k'am<sup>1</sup>lou<sup>1</sup>\*k'om(kam, k'iem)lau<sup>1</sup>: 蜘蛛  
 壮(龙州)k'ja:ŋ<sup>3</sup>k'ja:u<sup>1</sup>, 傣(西)kuŋ<sup>3</sup>ka:u<sup>1</sup>, 毛南kuŋ<sup>4</sup>  
 ka:ŋ<sup>2</sup>; 黎k'om<sup>3</sup>k'u:ŋ<sup>1</sup>\*k'laŋ C调 k'lau A调, 蜘蛛
- ⑨ { 广州ŋa:m<sup>1</sup>\*ŋem(ŋam): 刚好, 合适  
 壮ŋa:m<sup>5</sup>; 临高、黎ŋam<sup>2</sup>\*ŋam B调(ŋem A调)刚好, 合  
 适
- ⑩ { 广州la:m<sup>5</sup>\*lom(lam, lem, lam): 跨越  
 壮ha:m<sup>3</sup>(ja:m<sup>5</sup>); 傣(德)xa:m<sup>3</sup>(ja:ŋ<sup>0</sup>); 水jo:m<sup>3</sup>;  
 黎hja:m<sup>1</sup>\*hlam C调: 跨越
- ⑪ { 广州na:m<sup>2</sup>\*nam(nom, nam, nam): 蟒  
 壮nu:m<sup>1</sup>; 临高nəm<sup>2</sup>; 傣(德)ləm<sup>1</sup>; 泰luam<sup>1</sup>\*hluem A调  
 原始北部台语试拟\*nuem A调: 蟒
- ⑫ { 广州jap<sup>7</sup>\*iəp(ɔp, ɔp): 眨(眼), 闪  
 壮、泰、侗、水jap<sup>7</sup>\*jəp D调: 眨(眼), 闪
- ⑬ { 广州k'ap<sup>7</sup>\*k'iəp(k'ɔp, k'ɔp): 罩, 扣, 盖  
 壮k'ap<sup>8</sup>; 傣jap<sup>8</sup>; 泰k'ap<sup>8</sup>; 毛南kəp<sup>8</sup>\*gəp D调: 罩,  
 扣, 盖
- ⑭ { 广州k'ap<sup>8</sup>\*giəp(gɔp, gɔp): (大口)咬  
 壮hap<sup>8</sup>; 傣(西)xop<sup>7</sup>; 泰k'op<sup>7</sup>\*xəp D调: 咬, 欺负
- ⑮ { 广州hap<sup>7</sup>\*k'iəp(k'ɔp, kɔp): 欺负  
 壮侗语同⑭
- ⑯ { 广州kap<sup>7</sup>\*kiep(kɔp, kɔp): 蛙  
 壮、傣(西)、泰kop<sup>7</sup>; 仡佬kəp<sup>7</sup>; 黎kaw<sup>2</sup>\*kop D调: 蛙
- ⑰ { 广州le<sup>5</sup>\*la: 揩擦, 蹭  
 壮yi<sup>2</sup>; 傣(西)le<sup>2</sup>; 泰、侗lja<sup>2</sup>\*dlie A调(lie A调): 舔
- ⑱ { 广州mɛ<sup>1</sup>\*ma: 背负  
 壮、仡佬ma<sup>5</sup>; 毛南<sup>2</sup>ma<sup>5</sup>: 背负
- ⑲ { 广州lou<sup>3</sup>\*lau(lu): 男性成年人  
 壮侗la:u<sup>4</sup>: 老者, 指人量词

- ⑳ { 广州 mou<sup>4</sup> \*mau(mu); 不, 没  
 壮<sup>2</sup>bou<sup>3</sup>; 傣(西)<sup>2</sup>bau<sup>6</sup> \*<sup>2</sup>bəu B调; 不, 没
- ㉑ { 广州 təŋ<sup>5</sup> \*təŋ(təŋ, tiaŋ); 竖立  
 壮、傣(西)、泰 taŋ<sup>3</sup>; 毛南 taŋ<sup>1</sup> \*təŋ C调; 竖立
- ㉒ { 广州 ləŋ<sup>5</sup> \*ləŋ(ləŋ, liaŋ); 垫, 架起  
 傣(西)ləŋ<sup>1</sup>; 垫; 水 laŋ<sup>5</sup>; 架起
- ㉓ { 广州 ləŋ<sup>3</sup> \*ləŋ(ləŋ, liaŋ); 洗涮, 漱  
 壮 yw:ŋ<sup>4</sup>; 泰 la:ŋ<sup>4</sup> \*dlaŋ C调; 洗涮, 漱
- ㉔ { 广州 ŋəŋ<sup>2</sup> \*ŋəŋ(ŋəŋ, ŋiaŋ); 傻, 呆  
 壮 ŋoŋ<sup>5</sup>; 侗 ŋa:ŋ<sup>5</sup>; 傻, 呆
- ㉕ { 广州 (kai<sup>1</sup>)həŋ<sup>3</sup> \*kaŋ(k'iaŋ); 小母鸡  
 壮 (kai<sup>5</sup>)ha:ŋ<sup>6</sup>; 傣 (kai<sup>5</sup>)xəŋ<sup>5</sup>; 泰 (kai<sup>5</sup>)kuaŋ<sup>5</sup>;  
 侗 (qa:i<sup>5</sup>)qa:ŋ<sup>6</sup> \*xwaŋ B调; 小母鸡
- ㉖ { 广州 mi<sup>4</sup>(mei<sup>4</sup>) \*mie(mi, miəi); 别, 不要  
 壮 mi<sup>6</sup>; 泰 mi<sup>3</sup>; 水 mi<sup>4</sup> \*mi(古调类存疑); 不, 别
- ㉗ { 广州 ni<sup>1</sup>(nei<sup>1</sup>) \*nie(ni, niə); 这  
 壮 nei<sup>4</sup>; 傣(西)ni<sup>4</sup>; 侗 na:i<sup>6</sup>; 黎 nei<sup>6</sup> \*ni C调; 这
- ㉘ { 广州 ti<sup>1</sup>(tit<sup>7</sup>) \*tie(ti, tiə, tiəi); 一点儿  
 壮 ti<sup>1</sup>; 水<sup>2</sup>di<sup>5</sup>; 一点儿
- ㉙ { 西路粤语 luk<sup>7</sup>puk<sup>7</sup> \*lukpuk(puok); 柚子  
 壮 luk<sup>3</sup>puk<sup>3</sup>; 白泰 puk<sup>3</sup> \*luk D调; 柚子
- ㉚ { 广州 (tsy<sup>1</sup>)luk<sup>3</sup> \*luk; (猪)圈  
 壮(田林)hok<sup>3</sup>; 临高 luk<sup>3</sup>; 傣西 xok<sup>3</sup>; 泰 k'ok<sup>3</sup> \*rok D调;  
 (猪)圈
- ㉛ { 广州 tuk<sup>7</sup> \*tuk(tuok, tiwok); 扎, 捅  
 壮(龙州)tək<sup>3</sup>; 临高 tsuk<sup>3</sup>; 毛南 zjak<sup>7</sup>; 黎 tok<sup>1</sup>; 扎, 捅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广州话中来自古壮侗语的部分语词。西路粤语中所含的这类语词比以广州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粤语更为丰富, 这无疑与岭南东部越族先于西部越族汉化有关。粤语中这部

分来自古壮语的词多为动词、形容词及部分亚热带地区特有的动、植物名称，使用频率很高。它们与粤语中固有的汉语语词共同构成了丰富的语库，增强了粤语的表达能力。比如有的与原有汉语词并存并用，构成同义或近义词，使语言表达更细腻、生动。例如me<sup>3</sup>（歪）和“偏”、ton<sup>5</sup>（竖立）和“立”。再比如有的与原有汉语词组合成新词或作为词根派生新词，丰富了词汇。例如：猪na<sup>3</sup>（母猪）、lat<sup>7</sup>手（失手）；lat<sup>7</sup>（脱）——lat<sup>7</sup>手、lat<sup>7</sup>鸡（丢失）。它们已经成为粤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三、语 法

语法是一个语言的组词、造句规则，是词句之间的组织网络，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排他力。一般说来，语言之间的渗透在语法方面表现最不活跃。汉语对我国少数民族语渗透很深，其中以词汇为甚，语音次之，语法又次之。那么像汉语这样历史悠久、使用功能极强的语言会不会在语法领域受到少数民族语的渗透呢？回答是肯定的。最近已陆续发现不少地方汉语中存在少数民族语语法成分。比较广海地方汉语由于受藏语的影响，产生了“谓——主——宾”等句法形式。<sup>①</sup>湖北地方汉语也存在某些土家语语法成分。<sup>②</sup>仔细分析粤语的语法系统可以看到其中一些特殊的规则既不是古汉语语法的继承，也不能与其它方言取得联系，但是在壮侗语中有类似语法规则。这是千百年汉越语言交融的产物。

#### 1. 状语后置

汉语动词、形容词中心语的修饰成分——状语，一般置于中心语之前，但是粤语有状语后置的现象。壮侗语状语的位置有在中

<sup>①</sup>戴庆厦：《论语言关系》，载《民族研究》1990·2。

<sup>②</sup>龙庄伟：《湖北恩施话中的一个土家语成分》，载《民族语文》1988·6。

心语之前的，也有在中心语之后的，个别副词可以放在中心语之前也可以放在后边，意义不变。粤语状语后置现象当与壮侗语影响有关。例如：

粤语 我行先。（我先走） 食碗添。（再吃一碗）

壮语 kou<sup>1</sup> pai<sup>1</sup> ko:n<sup>6</sup>.（我先走）

我 去 先

傣语 pai<sup>1</sup> ti<sup>1</sup> kaŋ<sup>1</sup> t'en<sup>3</sup>.（再去敲鼓）

去 敲 鼓 再

以上例句中谓词后的成分都是副词，对谓词作时间、程度上的限制，而不是补充说明，所以不能视为补语，而应看作后置状语。

## 2. 双宾语句直接宾语前置

汉语双宾语句一般是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但粤语双宾语句却是直接宾语在前，间接宾语在后。粤语这种双宾语句的位置形式与壮侗语相同，可能也是汉越语言融合的痕迹。例如：

粤语 畀件衫我。（给我一件衣服）

踢一脚佢。（踢他一脚）

壮语 kou<sup>1</sup> hau<sup>3</sup> ma:k<sup>7</sup> te<sup>1</sup>.（我给他果子）

我 给 果 他

水语 ju<sup>2</sup> ha:i<sup>1</sup> ti<sup>3</sup> lam<sup>1</sup> faŋ<sup>1</sup> ha:i<sup>1</sup> nu<sup>4</sup>.

我 给 一 个 桃 给 弟

（我给弟弟一个桃子）

## 3. 疑问句宾语前置

汉语和壮侗语都有一种利用肯定和否定方式表示疑问的疑问句，在这种句型中，如果出现宾语，汉语置于否定部分之后。如普通话“你喝不喝水？”而壮侗语置于肯定部分之后（在否定部分之前）。部分粤语地区（特别是西路）这种疑问句的宾语可置

于否定部分之后亦可置于肯定部分之后，此亦当与壮侗语影响有关。例如：

- 粤语 你饮水唔饮？（你喝不喝水？）  
你知我唔知？（你认不认识我？）  
壮语 te<sup>1</sup> ma<sup>1</sup> ra:n<sup>2</sup> ?bou<sup>3</sup> ma<sup>1</sup>?（他回不回家？）  
他 回 家 不 回  
布依语 tə<sup>2</sup>sa:m<sup>1</sup> kən<sup>1</sup> hou<sup>4</sup> mi<sup>2</sup> kən<sup>1</sup>?  
三 儿 吃 饭 不 吃  
（三儿吃不吃饭？）

#### 4. 比较句中心语提前

汉语比较句一般由“比字结构”做状语放在中心语前，如普通话“小郑比小许勤快”。但粤语比较句的形式是：主语+谓语（中心语+补语），与壮侗语相同，这可能也是汉越语言融合的痕迹。例如：

- 粤语 细李高过细张。（小李比小张高）  
佢大过老王。（他比老王大）  
壮语 na<sup>2</sup> muŋ<sup>2</sup> la:i<sup>1</sup> kwa<sup>5</sup> na<sup>2</sup> kou<sup>1</sup>.  
田 你 多 过 田 我  
（你的田比我多）  
僚语 man<sup>2</sup> kai<sup>4</sup> si<sup>1</sup> kau<sup>6</sup>.（他比我勤快）  
他 勤 比 我

#### 5. 量词单独修饰名词

汉语的量词一般要结合数词、指示代词才能修饰名词，如普通话“一头牛、这只鸭子”，只有在数量上为“一”时才能去掉“一”，量词直接修饰名词，如“来碗米饭”。粤语除了这种情况可以省掉“一”之外，一般也能省掉指示代词。壮侗语的量词能和数词、指示代词结合修饰名词，也可省掉数词“一”或指示代词，直接修饰名词，或者紧附于名词之前共同表达一个名称。粤语量词的特殊用法很可能是壮侗语影响的产物。例如：

- 粤语 只猪咁肥。(这只猪真肥)  
食个橙添。(再吃一个橙子)
- 壮语 ʔan¹ ma:k⁷ hau³ pou⁴ lau²? (这个果给谁)  
个 果 给 谁  
hen² ta² mi² ko¹ fai⁴.  
边 河 有 棵 树  
(河边有树。‘一棵或很多’。)
- 侗语 ki¹ na:i⁰ me² tu² kwe². (这儿有一只牛)  
处 这 有 只 牛

以上比较研究表明，粤语中存在古壮侗语成分，这是古代汉越语言交流的结果。与此同时粤语当中也存在一部分与苗瑶语<sup>①</sup>特别是瑶语相通的方言语词，其中有使用于粤语和苗瑶语的，更多的则是粤语、苗瑶语和壮侗语同时使用。例如：

	粤语	苗语	瑶语	壮语
吸吮	sək⁸	xhu⁷	so⁷	—
蟒	na:m²	—	nom¹·²	nu:m¹
竖立	taŋ⁵	tʂaŋ⁵	taŋ⁵/	taŋ⁵
拊	na:m⁵	—	na:m⁵	—
跨越	la:m⁵	—	la:m⁵	ha:m⁵
傻	ŋaŋ²	—	ʂoŋ⁵	ŋoŋ⁵
一些	ti¹	te²	tei⁵	ti¹
小母鸡	kai¹hoŋ⁵	qei¹yaŋ⁵	—	kai⁵ha:ŋ⁵
枯萎	leu¹	—	liau²	leu⁵
杀	t'əŋ¹	ta⁵	to⁵	—

①苗瑶语材料根据《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苗语包黔东南、湘西、川黔滇、滇东北4个方言，布努语，瑶语包括勉语、标敏瑶语。

歪	me <sup>8</sup>	—	ue <sup>1</sup>	—
扔	wen <sup>6</sup>	paŋ <sup>8·7</sup>	feŋ <sup>6</sup>	we:ŋ <sup>4</sup>
眨(眼)	jap <sup>7</sup>	shei <sup>7</sup>	dziep <sup>7</sup>	jap <sup>7</sup>
敲	haŋ <sup>1</sup>	koŋ <sup>4</sup>	—	—
拉, 扯	maŋ <sup>1</sup>	—	pe:ŋ <sup>1</sup>	peŋ <sup>1</sup>
钻	lyn <sup>1</sup>	len <sup>4</sup>	—	—
烫	luk <sup>7</sup>	l'u <sup>7</sup>	—	—
痒	han <sup>2</sup>	—	hin <sup>7</sup>	han <sup>2</sup>
找, 摸	la <sup>6</sup>	—	lo <sup>4</sup>	la <sup>1</sup>
想	nam <sup>3</sup>	—	ŋam <sup>3</sup>	nam <sup>1</sup>
拿, 扛	kat <sup>8</sup>	ku <sup>8</sup>	kut <sup>8</sup>	ku:t <sup>8</sup>
凹	map <sup>7</sup>	ma <sup>7</sup>	mo <sup>7</sup>	mo:p <sup>7</sup>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 粤语中部分方言词与苗瑶语、壮侗语构成犬牙交错的联系, 它们之间绝对不会是一种简单的借贷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可作如下解释: 一是历史上岭南地区除了发生汉语——古壮侗语对撞之外, 也出现了汉语——古苗瑶语(特别是古瑶语)的接触。史书记载, 岭南地区(尤其是西部)曾出现“无山不有瑶”的局面, 今粤西北地区仍有瑶族分布, 因此岭南汉语与苗瑶语是有接触条件的。二是古代百越民族以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为主体, 其中也包括部分苗瑶民族先民(特别是瑶族), 因此粤语中的古代百越语成分既能在壮侗语中得到印证, 同时也可以苗瑶语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三是历史上粤语和古苗瑶语没有发生过接触, 粤语和苗瑶语相通的这部分词是两者分别从古壮侗语吸收的, 只不过其中一些在现代壮侗语中没有继承下来, 而在粤语和苗瑶语中保存下来了。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以上讨论说明粤语中存在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壮侗语)成分, 这是形成其独特个性的重要因素。粤语是除北方方言之外使用人口最多、具有广泛影响的一支汉语方言, 同时也是目前已知的与少数民族关系最密切的一支汉语方言。因此, 加强粤语和少

数民族语关系研究有助于揭示汉藏语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揭示汉语发展轨迹中的疑点，进一步认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关系以及丰富我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同时，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历史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 第二节 闽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闽语是现代汉语方言中比较独特的方言之一，其内部也比较复杂，可分为五个次方言区：闽东（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以瓯田话为代表）、闽南（以厦门话为代表）、闽中（以永安话为代表）、闽北（以建瓯话为代表）。闽语分布地区除了福建省外，还包括广东省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海康徐闻地区、浙江省南部和舟山群岛、台湾省大部、海南省大部。此外，在广西、江苏、四川等省区的个别地区和海外许多侨胞也使用这种汉语方言。

由于在语音、词汇上与汉语其他方言差别较大，闽语和其他方言几乎不能通话。这其中既有继承古汉语的层次差别的原因，也有方言内部创造新词的原因。但是，在闽语中还有相当的成分，既无法在汉语本身找到来源，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方言内部创造的新成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应从闽语形成的历史中寻找线索。

### 一、闽语中的壮侗语成分

闽语在其形成的历史程中，与古越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考古材料和史籍记载来看，闽语的发源地（今福建省及相邻的省份部

分地区)最早的居民当是古越人。《周礼·夏官职方氏》：“掌四夷、八蛮、七闽、五戎、六狄之人民”。这里提到的“七闽”就是周代活动在闽地的七个部落。《说文》：“闽，东南越，蛇种。”明确地指出“闽”就是东南越。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继续有越人在这一地区活动，称闽越，属“百越”之一。秦时曾于闽地设闽中郡，但并未真正有大量北方汉民进入闽地，因为到汉初时汉高祖仍封闽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建闽越国，由其控制今福建省及相邻的赣、浙、粤部分地区。可见当时越人势力在这一地区仍占据优势地位。直至汉元鼎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灭闽越国后，大举迁徙越人往江淮间，这才有大量汉人进入这一地区。但必须说明的是，当时汉王朝只可能把越人中的贵族、官僚和军队迁往江淮间，而大量的越人仍留在当地，①到了三国时代，其中的一部分便被称为“山越”。

闽越国亡后，中州汉民就开始大量地迁入闽地，到晋永康、永嘉年间(约公元300年左右)达到第一次迁入高峰，及至隋唐五代，中州汉民或因“征蛮”，或因“避乱”，迁入闽地的活动又先后达到第二、三次高峰。这样，迁入的汉民，随着数量的增多，加上生产、文化技术水平较高，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土著越人，而大部分原来生活在这一带的越人也就被同化、融合了。

中州汉民的迁入，也带来了中州的汉语。在与越人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汉语方言——闽语。按照闽语语音“轻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的特点，其形成的年代应在晋“永嘉之乱”、“八姓入闽”至唐代以前这段时间里②。闽语在逐渐形成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同当地越人的语言接触，受到古越语的影响。因为：1、中州汉民进入闽地以前，这一地区流行的自然是古越人的语言，这一点可以从史书上记载的大量古越语地

①朱维干：《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

②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闽方言部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1。

名（主要分布在今浙、闽、赣等地）中得到佐证。中州汉民进入闽地，与留在当地的越交错杂居，语言上不能不受影响。2、大量留在当地的越人融入汉民后，他们的语言也会因此在某些方面被正在形成的闽语吸收，得以保存下来。这些从古越语中吸收过来的语言成分，自然不可能从汉语本身找到来源。

现代壮侗语族诸民族来源于我国古代的越人，这是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手法。

闽语中相当的词语及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很难从古辞书或其他书籍中找到来源，但却可在现代壮侗语中找到语音相应、语义相符的词语及类似的语法结构。这些语言成分只能解释为闽语从古越语吸收而来，是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

下面分别介绍闽语中词汇和语法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成分的情况。至于语音方面，因目前尚未有深入的比较研究，暂时无法作出结论，在此不予以讨论。

### （一）词 汇

闽语中有不少词比较特殊，在汉语古辞书中没有记载，在其他方言中也找不到相应的词，只好用同音汉字记录或创造方言俗字记录，甚至只有其音而无其字。把这些词同壮侗语比较，却可以找到语音相近、语义相符的对应词。这类词我们认为它们不是来源于汉语本身，而是来源于古越人的语言。

以下试举部分来源于古越人语言的闽语词。为利于比较，闽语的声调也一律标调类①。

〔舔〕

闽语：福州 lia<sup>27</sup>，古田 lei<sup>27</sup>，宁德 lep<sup>7</sup>，

① 此语材料取自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张振兴《台湾闽语方言记略》（福建人民出版社），侗语材料主要取自《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壮侗语族语言简志》（王均等编著，民族出版社），李方桂《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周宁 le<sup>7</sup>, 福鼎le<sup>27</sup>, 莆田liou<sup>5</sup>  
大田 le<sup>6</sup>, 尤溪li<sup>7</sup>, 永安la<sup>7</sup>  
建瓯 la<sup>7</sup>

壮侗语: 壮语ri<sup>2</sup>, lei<sup>2</sup> (南部); 布依语zie<sup>2</sup>,  
临高话lek<sup>7</sup>; 傣语 (西双版纳) le<sup>2</sup>、(德宏) le<sup>2</sup>,  
侗语lja<sup>2</sup>; 仫佬语ljam<sup>6</sup>; 水语lja:k<sup>7</sup>; 黎语zim<sup>2</sup>

〔螂蟑〕

闽语: 福州ka<sup>1</sup>la<sup>28</sup>, 莆田kɔ<sup>6</sup>ɬua<sup>28</sup>, 厦门ka<sup>6</sup>tsua<sup>28</sup>  
永安tsup<sup>4</sup>, 建瓯tsue<sup>8</sup>、福安sa<sup>28</sup>, 福鼎ka<sup>6</sup>sa<sup>28</sup>

壮侗语: 壮语tu<sup>2</sup>sa:p<sup>7</sup>; 布依语tuə<sup>2</sup>sa:p<sup>7</sup>; 临高话sia:<sup>2</sup>lap<sup>7</sup>,  
傣语 (德宏) meŋ<sup>2</sup>sa:p<sup>8</sup>侗语kwa:p<sup>8</sup>; 仫佬语<sup>2</sup>ɔəp<sup>7</sup>,  
水语la:p<sup>7</sup>

〔口水〕

闽语: 福州“喇”laŋ<sup>8</sup>, 莆田nua<sup>8</sup>, 厦门nuā<sup>6</sup>, 漳州nua:<sup>8</sup>,  
永安lum<sup>8</sup>, 建瓯luig<sup>8</sup>

壮侗语: 壮语mla:i<sup>2</sup>; 布依语na:i<sup>2</sup>; 临高话nam<sup>4</sup>mai<sup>2</sup>; 傣语  
(西双版纳) nām<sup>4</sup>lai<sup>2</sup>、(德宏) lam<sup>4</sup>la:i<sup>2</sup>; 侗语ŋwe<sup>2</sup>; 黎语  
nom<sup>3</sup>ɬo:i<sup>1</sup>

〔枝〕 (量词)

闽语: 福州ŋe<sup>1</sup>, 古田ŋe<sup>1</sup>, 宁德ŋi<sup>1</sup>

壮侗语: 壮语 (小的树枝) nje<sup>1</sup>、(大的树枝) ŋa<sup>1</sup>

〔抓 (一把)〕

闽语: 福州ma<sup>1</sup>, 莆田ma<sup>1</sup>, 厦门mi<sup>1</sup>永安mɔ<sup>1</sup>

壮侗语: 壮语ra<sup>4</sup>、<sup>2</sup>ba<sup>4</sup>,

〔看一下〕 (动词)

闽语: 福州ŋiau<sup>1</sup>

壮侗语: 壮语ŋaw<sup>6</sup>、<sup>2</sup>jaw<sup>6</sup> (天等); 布依语nen<sup>6</sup>,  
傣语 (德宏) jem<sup>3</sup>; 侗语naŋ<sup>6</sup>

〔柚子〕

闽语：福州“枹”p<sup>6</sup>au<sup>1</sup>，古田p<sup>6</sup>au<sup>1</sup>，宁德p<sup>6</sup>œŋ<sup>6</sup>，

周宁p<sup>6</sup>œuŋ<sup>6</sup>，泉州p<sup>6</sup>au<sup>1</sup>，龙岩p<sup>6</sup>au<sup>1</sup>

壮侗语：壮语ma:k<sup>7</sup>puk<sup>8</sup>、ma:k<sup>7</sup>pa;ŋ<sup>2</sup>；布依语m:<sup>6</sup>puk<sup>8</sup>；

临高话mak<sup>8</sup>ŋuk<sup>1</sup>；侗语p:au<sup>2</sup>

〔次、回、下〕（量词）

闽语：福州“摆”pai<sup>3</sup>，厦门“摆”pai<sup>3</sup>

壮侗语：壮语pai<sup>2</sup>；布依语pai<sup>2</sup>；临高话foi<sup>3</sup>；水语pai<sup>2</sup>

〔扔〕

闽语：福州kœ<sup>28</sup>，古田kœ<sup>28</sup>，周宁hœuŋ<sup>2</sup>

壮侗语：壮语kvey<sup>1</sup>；布依语veŋ<sup>8</sup>；仫佬语krən<sup>8</sup>；水语qheu<sup>5a</sup>

〔稠（指粥）〕

闽语：福州“渴”ky<sup>28</sup>，福清ky<sup>8</sup>，周宁kø<sup>28</sup>

壮侗语：壮语kut<sup>8</sup>；布依语kwut<sup>8</sup>；临高话kət<sup>8</sup>；黎语kwa:k<sup>8a</sup>

〔褪、脱落〕

闽语：台湾闽南话lut<sup>8</sup>，漳州lut<sup>8</sup>

壮侗语：壮语lo:t<sup>7</sup>；布依语lo:t<sup>7</sup>

〔吻〕

闽语：福州tsyŋ<sup>1</sup>，古田tsiyŋ<sup>1</sup>，厦门“斟”tsim<sup>1</sup>，

泉州“斟”tsim<sup>1</sup>，漳州“斟”tsim<sup>1</sup>

壮侗语：壮语ɕup<sup>7</sup>、tsop<sup>7</sup>；暹罗语ɕu:p<sup>7</sup>

〔饮〕

闽语：厦门话“淋”lim<sup>6</sup>，漳州“淋”lim<sup>6</sup>

壮侗语：壮语dum<sup>6</sup>、lim<sup>2</sup>；临高话lum<sup>8</sup>；傣语（西双版纳）dum<sup>6</sup>，

侗语wum<sup>4</sup>，水语rəm<sup>3</sup>

〔满〕

闽语：台湾闽南话tī<sup>9</sup>

壮侗语：壮语rim<sup>1</sup>、tim<sup>1</sup>；布依语zim<sup>1</sup>；傣语（西双版纳）tim<sup>1</sup>、

（德宏）tem<sup>1</sup>

〔缩、龟缩〕

闽语：福州kieu<sup>1</sup>

壮侗语（表示“弯曲”之意）：壮语kot<sup>3</sup>，傣语（西双版纳）kot<sup>3</sup>，  
（德宏）kot<sup>3</sup>

〔淹〕

闽语：台湾闽西话tɔ<sup>5</sup>

壮侗语：壮语tum<sup>6</sup>；水语tam<sup>6</sup>

〔裂〕

闽语：福州“必”pei<sup>7</sup>，宁德“必”pik<sup>7</sup>，厦门“必”pit<sup>7</sup>，  
大田“必”pe<sup>7</sup>，永安“必”pe<sup>7</sup>，建瓯“必”pi<sup>7</sup>

壮侗语：壮语rek<sup>4</sup>、p<sup>4</sup>ek<sup>7</sup>（南壮）；仫佬pik<sup>7</sup>；毛南语p<sup>4</sup>ik<sup>7</sup>

〔多〕

闽语：厦门tsue<sup>6</sup>，漳州tse<sup>6</sup>，尤溪tsi<sup>6</sup>，永安tse<sup>6</sup>，莆田tè<sup>6</sup>，  
建瓯tsai<sup>6</sup>，建阳lai<sup>6</sup>

壮侗语：壮语la:i<sup>1</sup>，布依语la:i<sup>1</sup>，傣语（西双版纳）lai<sup>1</sup>，（德宏）  
ja:i<sup>1</sup>，黎语lo:i<sup>1</sup>

〔问〕

闽语：莆田“勘”k<sup>4</sup>aŋ<sup>5</sup>，尤溪“勘”k<sup>4</sup>aŋ

壮侗语：壮语ga:m<sup>1</sup>、k<sup>4</sup>a:m<sup>6</sup>（南壮）；布依语ham<sup>5</sup>，  
傣语（西双版纳）t<sup>4</sup>am<sup>1</sup>，（德宏）t<sup>4</sup>a:m<sup>1</sup>，侗语ham<sup>5</sup>，  
黎语ga:m<sup>1</sup>

〔男阴〕

闽语：建瓯“屙”no<sup>3</sup>，松溪.nuei，政和.nue、洋墩nui<sup>2</sup>，建  
阳nui

壮侗语：壮语<sup>2</sup>dei<sup>5</sup>（南壮）；布依语nai<sup>5</sup>；水语qhai<sup>3</sup>；毛南语  
lai<sup>5</sup>

〔闭眼〕

闽语：永安 ŋi<sup>7</sup>

壮侗语：壮语<sup>2</sup>jap<sup>7</sup>，布依语<sup>2</sup>jap<sup>9</sup>，临高话ŋiap<sup>7</sup>，侗语jap<sup>7</sup>，  
仫佬语ɕap<sup>7</sup>，水语<sup>2</sup>jap<sup>7</sup>，毛南语djap<sup>7</sup>

〔蜘蛛〕

闽语：邵武k'yo<sup>1</sup>sau<sup>1</sup>，明溪 kir<sup>2</sup>sir<sup>2</sup>，顺顺 ko<sup>2</sup>ʃɔ<sup>1</sup>

壮侗语：壮语k'ja:ŋ<sup>3</sup>k'ja:u<sup>1</sup>（龙州），傣语（西双版纳）kuŋ<sup>3</sup>

ka:u<sup>1</sup>，毛南语kuŋ<sup>6</sup>ka:ŋ<sup>2</sup>，黎语kom<sup>3</sup>k'u:ŋ<sup>1</sup>

〔东西〕

闽语：福州“毛”nɔ<sup>27</sup>，永安xo<sup>3</sup>，沙县 xa<sup>3</sup>

壮侗语：侗语ho<sup>5</sup>，毛南语ho<sup>6</sup>

〔蚯蚓〕

闽语：厦门tɔ<sup>6</sup>un<sup>3</sup>，漳州tɔ<sup>6</sup>kin<sup>1</sup>

壮侗语：壮语tu<sup>2</sup>dw:n<sup>1</sup>，布依语tuə<sup>2</sup>di:n<sup>1</sup>，傣语（西双版纳）dyni

## （二）语 法

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固的成分，一般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在语法方面是很不显著的。但闽语在形成过程中，如上面所说的，与古越人的语言接触的历史是相当漫长的，它在吸收古越人的语言成分时，语法方面受到影响是很正常的，同样是在古越人活动地区形成的粤方言就是如此。<sup>①</sup>

通过把闽语语法和汉语其他方言语法及壮侗语言语法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某些特殊语法规则很难解释为是古汉语的继承，而可能是象粤语一样，受古越人的影响而产生的。

### 1、量词单独修饰名词

在汉语中，量词必须和数词、代词结合才能修饰名词，如两条鱼、那头牛、十个人等。而壮侗语的量词却可以单独修饰名词，闽语中的闽南话可能受这种结构的影响，量词可以单独修饰名词，这种情况也见于粤方言。

如：

闽南话：只牛肥绝。（这头牛很肥。）

<sup>①</sup>李锦芳：《论壮侗语对粤语的影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我捧着枝笔。（我捡到一枝笔。）

壮侗语：壮语ko<sup>1</sup> fai pja<sup>1</sup>ʔ

棵 树 谁

（这棵树是谁的？）

侗语 ki<sup>1</sup> na:i<sup>6</sup> me<sup>2</sup> tu<sup>2</sup> kwe<sup>2</sup>。

处 这 有 只 水牛

（这里有一头水牛。）

## 2、状语后置

在汉语中，状语一般是置于谓语前头，只有在古越人分布地区发展起来的方言如粤语、闽语中，才出现状语后置现象。壮侗语中，状语后置仍很普遍。如：

闽语：汝行在先。（你前面走。）

倚一下仔添。（再站一会。）

壮侗语：壮语kou<sup>1</sup> pai<sup>1</sup> kon<sup>5</sup>（我先走。）

我 走 先

僚语 xau<sup>1</sup> ma<sup>2</sup> eu<sup>5</sup> se<sup>7</sup> se<sup>6</sup>。

他 来 玩 常常

（他常常来玩。）

## 3、比较句谓语前提

汉语比较句的结构一般是“主语+（比）+谓语”，如：他比我高。闽语中的闽南话却仍有这样的比较句结构：主语+谓+补语，与壮侗语的比较句谓语前提特点完全吻合。这种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只见于受壮侗语影响的粤方言。如：

闽南话：即座山悬过许座山。

（这座山比那座山高。）

我担即担锤过汝许担。

(我挑的这个担子比你挑的那个担子重。)

壮侗语：壮语 ra:p<sup>7</sup> nei<sup>4</sup> nak<sup>6</sup> kwa<sup>6</sup> ra:p<sup>7</sup> te<sup>1</sup>

担子这 重 过 担 他

(这担子比他的担子重。)

布依语：za:p<sup>7</sup> ku<sup>1</sup> ni<sup>4</sup> nak<sup>7</sup> ku<sup>6</sup> za:p<sup>7</sup> muŋ<sup>2</sup> te<sup>1</sup>。

担子 我 这 重 过 担子 你 那

(我挑的这个担子比你挑的那个担子重。)

僚语：man<sup>2</sup> kai<sup>4</sup> si<sup>1</sup> kau<sup>6</sup>。

他 勤 比 我

(他比我勤快。)

## 二、闽语中的苗瑶语成分

苗瑶语包括苗语、瑶语、布努语、畲语，其中苗语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瑶语分布在广西、广东北部和海南，布努语主要分布在广西，畲语分布在广东。现在只有使用客家方言的畲族在福建与操闽语的汉族接触。但是在历史上，苗瑶语民族从江淮一带迁到洞庭湖和鄱阳湖周围时，有一部进入福建一带，被称为“闽”，后来随北方汉族的不断进入，才被融合。今天闽语中有些语言现象在汉语中找不到其对应形式，而与苗瑶语有关系。

### (一) 闽·蛮·勉·苗

“闽”在文献中是作为一个非中原华夏系统的民族出现的。《周礼·夏官司冠下》：“象胥掌蛮方、夷、闽、貉、戎、狄之国。”《周礼·夏官司司马下》又记：“职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帮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七狄之民。”可见当时的“闽语”需要翻译，而“七”则说明闽族的部落情况。

关于闽族，汉代郑玄注《周礼》时说：“闽，蛮之别种也”，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司马索隐：“蛮者，闽也”。后来涉及福建的史书中多有“蛮闽”、“闽蛮”、“桐蛮”、“苗人”等称呼。《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四库全书《百越先贤志提要》中说，越国为楚所灭之后，诸子散居，其中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瑤，所居地就在闽地。因此闽语底层中同时也有一些壮侗语（越）成分。

苗瑶语民族的自称如苗族的 $moŋ^1$ （川黔滇）、 $mhu^1$ （黔东南）、 $soŋ^1$ （湘西）、瑶族的 $mjen^2$ ，有共同的来源，其古音大略近于 $mlwan$ （平），被汉字记作“蛮”。①而“闽”的古音也是平声。“闽”与瑶族自称 $mjen^2$ （勉）的相近并非是偶然的。

“蛮”与“三苗”出自一系，《尚书·舜典》上记载的“窜三苗于三危”，一般认为“三危”在西北地区，但史书中关于“三危”地望矛盾较多，有人认为“三危”乃在南方山地，与一些记载也吻合，②如《韩非子》：“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彭蠡即在今天的鄱阳湖。如果说“闽”与“蛮”“三苗”有关的话，福建和闽阳湖并不遥远。

有人认为，“闽”的后裔是今天的畬族，③有人又认为畬族从武陵地区东迁，唐初始到闽粤交界，宋元以后才北迁到福建等地。④也许畬族先是闽人后裔，当越人入闽后又产生变化，最后转用汉语客家话。今天的畬族只有在广东仍使用畬语，99%以上已改用客家方言，不过不尽同于客家方言，而多具有闽语的影响

①李永燧：《苗瑶族的自称一兼说“蛮”》，《民族语文》，1983，6。

②马少侨：《“窜三苗于三危”新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2。

③陈元煦：《试论闽、越与畬族的关系》，《福建论坛》1984，9。

④徐规：《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杭州大学学报》1982，1。

和特点。<sup>①</sup>也许，畬族中既有从武陵迁来的成分，也有在当地转用了汉语的闽人后裔。

## (二) 闽语中的苗瑶语底层

### 1. 词汇

在闽语中有些词汇有音无字。<sup>②</sup>这些词汇与苗瑶语有关系。<sup>③</sup>如：

---

①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

②张振兴：《台湾闽南方言记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③王辅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毛宗武等：《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教研究室编：《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厝(房)	闽南	闽东	黔东南	湘西苗	川黔滇苗	畲	瑶
坏	tshu	tshw	tse <sup>3</sup>	pzu <sup>3</sup>	tse <sup>3</sup>	—	pau <sup>3</sup>
识	phai	phai	pa <sup>4</sup>	pa <sup>4</sup>	pua <sup>4</sup>	—	—
眨	bat	pai <sup>?</sup>	pu <sup>1</sup>	pu <sup>1</sup>	pou <sup>1</sup>	pe <sup>1</sup>	pei <sup>1</sup>
闭(眼)	sut	—	shei <sup>7</sup>	tse <sup>5</sup>	tshi <sup>7</sup>	tsi <sup>1</sup>	dziep <sup>7</sup>
躲	gap	khai <sup>?</sup>	qa <sup>6</sup>	ca <sup>3</sup>	qe <sup>6</sup>	—	dziep <sup>7</sup>
穿山甲	bi <sup>?</sup>	miŋ	mi <sup>3</sup>	—	—	—	piŋ <sup>6</sup>
披(衣)	la <sup>6</sup> li <sup>7</sup>	—	lo <sup>6</sup> yo <sup>6</sup>	—	zou <sup>6</sup>	ŋu <sup>4</sup>	lai <sup>6</sup>
蜘蛛	buā <sup>2</sup>	—	pa <sup>5</sup>	—	mpua <sup>6</sup>	—	—
背(负)	khē <sup>2</sup>	—	kaŋ <sup>1</sup> ya <sup>6</sup>	ku <sup>1</sup>	kaŋ <sup>1</sup> zua <sup>6</sup>	khu <sup>4</sup>	no <sup>6</sup>
跳	āi <sup>5</sup>	—	a <sup>7</sup>	—	—	—	—
湿	ta <sup>7</sup>	—	ti <sup>7</sup>	nte <sup>1</sup>	tɿha <sup>5</sup>	—	diu <sup>6</sup>
(在)	tam <sup>2</sup>	—	te <sup>1</sup>	nte <sup>1</sup>	nto <sup>1</sup>	taŋ <sup>2</sup>	don <sup>1</sup>
蜻蜓	tai <sup>7</sup>	—	to <sup>6</sup>	—	—	—	—
蚯蚓	—	mahu	ma <sup>4</sup> zo <sup>4</sup>	—	—	—	—
何处	—	ka uŋ	kaŋ <sup>1</sup> tsəŋ <sup>1</sup>	coŋ <sup>1</sup>	tseŋ <sup>1</sup>	ka <sup>1</sup> zoŋ <sup>1</sup>	dzuŋ <sup>1</sup>
	to <sup>3</sup>	—	tei <sup>6</sup>	—	tu <sup>6</sup>	tat <sup>8</sup>	—

此外还有只在黔东苗语中发现的如：“栗暴(曲指击人)”闽南话kue<sup>2</sup> / 黔在苗语ko<sup>3</sup>、“骂”thai<sup>1</sup> / tha<sup>6</sup>、“闪(电)”lā / lja<sup>3</sup>。

“在”是一个介词，如闽语“在先”tai san, 黔东苗语tu<sup>1</sup> to<sup>6</sup> pəu<sup>6</sup> noŋ<sup>3</sup> (放在这里)。

上列词的语音对应情况：

1) 声调对应

平 栗暴

上 坏、躲 (m-)

去 在(穿山甲)

入 眨、闭、躲 (p-)、闪、跳、

2. 声母对应。

苗语“坏”古属浊音，在清化过程还一度为浊送气，与闽语ph-相类。

“穿山甲”一词闽语、瑶语为l-, 苗语、畲语为ɣ-, z-, ŋ-。其对应情况可能与复辅音声母有关，详见本书《苗瑶语族与汉语》一节的讨论。

2、语法

1) 词法

闽语的名词性偏正式合成词的中心成分在修饰成分之前。这一点与苗瑶语同。壮侗语、粤语也有这种形式。如：

闽语 食早(早饭)、风台(台风)

人客(客人)、鞋拖(拖鞋)

历日(日历)、食昼(午饭)

黔东苗语 ka<sup>0</sup> əu<sup>1</sup> 野鸭

鸭 水

u<sup>3</sup> nei<sup>0</sup> 破衣

衣 破

瑶语 bjau<sup>4</sup> təu<sup>3</sup> 娃娃鱼

鱼 狗

ku<sup>2</sup> ga<sup>4</sup> si<sup>7</sup> 婴儿

小孩红

闽语表示动物雌雄性别的词素一律放在动物名词之后。苗瑶语族除苗语外，其他语言也是这种形式。如：

闽语 鸡母 鸡角（公鸡） 猪母 猪角（公）  
牛母 牛公 犬母 犬雄

布努语 ka<sup>1</sup> pu<sup>3</sup> 公鸡  
鸡 雄  
ka<sup>1</sup> mi<sup>8</sup> 母鸡  
鸡 母

瑶语 tɕai<sup>1</sup> koŋ<sup>6</sup> 公鸡  
鸡 公  
tɕai<sup>1</sup> nei<sup>4</sup> 母鸡  
鸡 母

畲语 kwei<sup>1</sup> ko<sup>3</sup> 公鸡  
鸡 公

壮侗语、粤语、吴语、赣语都有类似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在贵州、湖南的苗语、侗语、水语都把表示性别的词素放在前面。①这也许是后来的变化形式。对汉语的这种现象，桥本万太郎指出，有一条南北分界线，贵州处在南方型和北方形的共现区。②

## 2) 句法

闽语的“程度副词+形容词+量词”形式中，量词作形容词的补语，和苗瑶语同。如：

闽语 这卵最大粒。（这个蛋个儿真大）  
（这）（支）笔直细。③（这支笔很小）

①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②《语言地理类型学》第65页，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③括号内为有音无字词的意义代替字，下同。



## 一、贵州汉语中的民族语词汇底层

莽筒（苗族一种乐器）：苗语tɕi<sup>4</sup> maŋ<sup>4</sup>。

议榔／合榔（讨论议定地方乡规民约）：意译自苗语qəu<sup>5</sup> ɭhaŋ<sup>1</sup>，即qəu<sup>5</sup>（议定），ɭhaŋ<sup>1</sup>，音译为“榔”。

嘎老（男性老年人）：苗语qəu<sup>5</sup> lu<sup>4</sup>；侗语qaau<sup>2</sup> laau<sup>2</sup>。

ke<sup>3</sup>①（屎）：黔东南苗语qa<sup>3</sup>、川黔滇苗语qua<sup>3</sup>，侗语e<sup>4</sup>、水语e<sup>4</sup>、布依语e<sup>4</sup>、仡佬语qA<sup>5</sup>。

ka<sup>3</sup>（肉）：黔东南苗语ŋi<sup>2</sup>、贵阳青岩苗语Nqai<sup>2</sup>、高坡苗语Nqe<sup>2</sup>、凯里枫香苗语Nqe<sup>2</sup>。

鬼师（巫师）：黔东南苗语paŋ<sup>6</sup> ɭjaŋ<sup>1</sup>（匠+鬼）。明·郭子璋《黔记·诸夷·苗人》：“谓其巫曰鬼师。”《黄平州志·风俗》：“苗巫曰鬼师，汉巫曰端公。”

pa<sup>4</sup>（腿）：只出现在“鸡～腿”这个词中，指煮好的鸡腿。

“大腿”黔东南苗语pa<sup>1</sup>、川黔滇苗语pua<sup>1</sup>。“腿”侗语pa<sup>1</sup>、水语pa<sup>1</sup>。

a<sup>4</sup>（那）：黔东南苗语方位指示词ε<sup>1</sup>（那，极目处）、i<sup>3</sup>（那，视线以外）、川黔滇苗语o<sup>7</sup>（极目处）、i<sup>3</sup>（视线以外的地方）、湘西苗语a<sup>3</sup>（较近的地方）。

ha<sup>1</sup>（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川黔滇苗语、青岩、高坡、枫香苗语分别为hua<sup>7</sup>、ha<sup>7</sup>、ho<sup>7</sup>、ha<sup>7</sup>、ha<sup>7</sup>（抢）。

laŋ<sup>1</sup>（皮、肚子）：只出现在“肚～皮”一词中，有人写“肚郎皮”或“肚曩皮”。“皮肤”布依语naŋ<sup>1</sup>、（壮语naŋ<sup>1</sup>、傣语laŋ<sup>1</sup>、黎语noon<sup>1</sup>），仡佬语“肚子”luŋ<sup>1</sup>。

①本文用1、2、3、4标写汉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苗语材料来自王辅世《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侗、布依、水、仡佬语材料来自《壮侗语族词汇集》1983，贺嘉善《仡佬语简志》1983。

maŋ<sup>1</sup> (肥胖), 如“~子”, 布依语maŋ<sup>0</sup> (胖)、傣语man<sup>2</sup> (肥)、水语man<sup>2</sup> (肥)。

lja<sup>3</sup> (舔): 侗语lja<sup>2</sup>、水语ljaak<sup>7</sup>、仡佬语liu<sup>0</sup>、仡佬语ljam<sup>5</sup>、壮语li<sup>2</sup>、布依语zi<sup>2</sup>。

phai<sup>3</sup> (庹, 两臂伸长的长度): 土俗字写作“拿”。侗语phe<sup>5</sup>、水语phi<sup>5</sup>、仡佬语phaai<sup>8</sup>、毛南语phje<sup>5</sup>、傣语va<sup>2</sup>。

au<sup>2</sup> maŋ<sup>1</sup> (吃饭): 可分开使用, 如“au<sup>2</sup>饭”、“au<sup>2</sup>晌午” (吃午饭)、“煮maŋ<sup>1</sup>”“午maŋ<sup>1</sup>”。安顺湾子寨仡佬语“吃饭”xA<sup>1</sup> mpəu<sup>4</sup>。mp-在其他方言为m-, 如“饭”镇宁顶银哨mau<sup>4</sup>、织金龙家寨mau<sup>4</sup>、遵义青龙muŋ<sup>4</sup>。清徐家干《苗疆闻见录》中曾误作苗语: “固麦, 食食也。又努介, 亦食食。”其中“固麦”是仡佬语。

ləu<sup>1</sup> (偷): 仡佬语ləu<sup>4</sup>。

pha<sup>1</sup> (软): 土俗字写作“吧”。仡佬语piA<sup>4</sup>。又有piA pin<sup>1</sup> (软绵绵)。

## 二、贵州汉语民族语语音底层

### 1. 山摄合口韵的变读

在黔南汉语变为ɯn、黔东南不同地区有ue、ye、ye、yə和on多读。①ɯn与布依语有关, ue与黔东南苗语有关, on与侗语有关。如:

	官	拴	关	全	转	欢
麻江	kyə <sup>1</sup>	əye <sup>1</sup>	kye <sup>1</sup>	təhie <sup>2</sup>	təye <sup>3</sup>	—
凯里	kuæ <sup>1</sup>	sue <sup>1</sup>	kue <sup>1</sup>	təhye <sup>2</sup>	tsue <sup>3</sup>	—
丹寨	kyə <sup>1</sup>	əya <sup>1</sup>	kya <sup>1</sup>	təhie <sup>2</sup>	təye <sup>3</sup>	—

①蒋希文,《黔东南汉语方言》,载《方言》1990, 3, 刘光亚,《贵州省汉语方的分区》,载《方言》,1986, 3。都匀材料为李炳泽调查。

雷山	kuæ <sup>1</sup>	sue <sup>1</sup>	kue <sup>1</sup>	tɕyɛ <sup>2</sup>	fsye <sup>3</sup>	—
施秉	kuan <sup>1</sup>	suan <sup>1</sup>	kuan <sup>1</sup>	tɕhyɛ <sup>2</sup>	tsuan <sup>3</sup>	—
榕江	kon <sup>1</sup>	—	kuan	—	—	fon <sup>1</sup>
黎平	kon <sup>1</sup>	—	kuan <sup>1</sup>	—	—	fon <sup>1</sup>
都匀	kun <sup>1</sup>	ɕun <sup>1</sup>	kun <sup>1</sup>	tɕhun <sup>2</sup>	tɕun <sup>3</sup>	hun <sup>1</sup>

失去-n的地区都是苗族分布地区。历史上苗语借汉语词时，an、ian、uan都以en出现。如：ken<sup>7</sup>剪、en<sup>1</sup>鞍、fhen<sup>6</sup>魔术（“幻”）、shen<sup>6</sup>算。现代借词-n均脱落。侗语韵母中有on无uan，借入汉语词时以on代uan，如ɕon<sup>5</sup>转、ɲon<sup>6</sup>愿、thon<sup>6</sup>劝、kon<sup>1</sup>官、khon<sup>4</sup>款、hon<sup>1</sup>欢、son<sup>5</sup>算。除了黎平、榕江外，侗族分布的剑河、从江、锦屏、天柱等地的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客家方言中有，而贵州汉语只有到民族中去寻找。正是侗族地区侗语只有on，与uan相近，侗族人在使用汉语时把uan发为on，使当地汉语也变成on。

## 2、假摄开口韵在黔南w读

在贵州大部分地区，假摄开口韵以及曾、梗、山摄开口韵大多发e，而在黔南有e、w两读，其中假摄为w。如（都匀平浪）：

tɕe<sup>2</sup>得、tɕhe<sup>2</sup>特、le<sup>2</sup>勒、tɕe<sup>2</sup>责、tɕhe<sup>2</sup>侧、ɕe<sup>2</sup>色舌设、  
tɕe<sup>2</sup>折、tɕe<sup>4</sup>蔗、je<sup>2</sup>热

tɕw<sup>1</sup>遮、tɕhw<sup>1</sup>车、tɕhw<sup>3</sup>扯、ɕw<sup>2</sup>蛇、ɕw<sup>4</sup>射社、ɕw<sup>1</sup>除、jw<sup>3</sup>惹  
在贵州，只有布依语才有w、wn、wŋ等韵母。

## 第四节 突厥语对汉语的影响

### 一、突厥民族的社会语言情况

突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广义的突厥语，包括本语族古代碑铭语言和后来各个时期的文献语言以及现代几十种活的语言及其方言。狭义的突厥语仅指古代突厥碑铭语言。突厥语族的语言分

布在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纳河，南临阿拉伯半岛，北至新西伯利亚群岛这一广大地区。操突厥语的民族总人口约有8000万，分属于大约30种不同的民族；突厥民族分布在世界十多个国家，除我国外，还有土耳其、前苏联、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等国。

我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有八种：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图瓦语、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sup>①</sup>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地区，少数分布在青海、甘肃省境内和南山山脉一带。我国操突厥语的民族总人口约858.69万（1990年），分属七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和裕固族。

维吾尔语：维族人口721.44万（1990年），大多聚居在新疆南部，少数居住在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等地。现在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老维吾尔文。

哈萨克语：哈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乌鲁木齐县、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人口111.17万（1990年）现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老哈萨克文。

柯尔克孜语：柯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南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此外还分布在北疆特克斯、昭苏、额敏等县和南疆和田、皮山、塔什库尔干县和喀什等地。柯尔克孜族人口14.15万（1990年），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柯尔克孜文。

乌孜别克语：现在只在乌孜别克族的少数老年人中使用。乌孜别克族有1.45万人（1990年），散居在新疆伊宁、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中，一般居民通用维吾尔和哈萨克语言文字。

<sup>①</sup>《中国突厥语族语言概况》（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编辑组编）1983年披露，中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有九种，其中包括东北柯尔克孜语，即我国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语。

塔塔尔语：现在只在塔塔尔族的少数老年人中使用。塔塔尔族约有0.48万人（1990年），散居在新疆乌鲁木齐、伊宁、塔城等城市。一般居民通用维吾尔或哈萨克语言文字。

图佤语是居住在新疆阿尔泰山地区哈巴河、布尔津县的自称图佤人使用的语言，目前图佤人属哈萨克族克库孟恰克人，有一千多人，使用哈萨克文。

撒拉语：居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族使用的语言，撒拉族人口8.77万（1990年），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本族语，一般兼通汉语、汉文。

西部裕固语：居住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的西部裕固族使用的语言。裕固族总人口1.23万（1990年），东部使用属于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通用汉语文。

## 二、突厥语对汉语的影响

### （一）突厥语对新疆汉语的影响

突厥民族无论在漠北草原，还是西迁至新疆境内，都和汉族有着多方面的来往关系，语言上也一直处在彼此接触，相互影响的状态之中。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族关系的改善和语言接触的范围日益扩大，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更为突出。汉语对新疆境内诸现代突厥语的影响是主流，而突厥语对汉语的影响在各方面虽都不及汉语，但也有其特点。现分述如下：

#### 1. 语言结构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词汇方面，主要有借词、意译词、混合型词等形式。

##### ①汉语中的突厥语借词

汉语吸收突厥语借词一般采用译音、译音加表意成分等方式。

译音：

胡大：伊斯兰教信奉的神，认为是万物的创造者，人类命运的主宰。（维语xuda；哈语qudaj；柯语qadaj）。

乃麻孜：伊斯兰教教徒每日所做的五次礼拜。（维语namaz；哈语namaz；柯语namaz）。

亦都护：五代十国时西昌回鹘的首领。（古代突厥语idikut）。

巴依：财主（古代突厥语baj）。

袷袂：维吾尔等民族穿的对襟长袍（维语tʃapan）。

吾玛什：玉米面粥（维语umaj）。

皮牙孜：洋葱头（维语pijaz；哈语pejaz；柯语pəjaz）。

纳仁：用肉、葱头、面片拌成的一种面食。（柯语naren；哈语naren）。

坎土曼：新疆地区主要铁制农具之一（维语ketmen；哈语ketpon；柯语kentmen）。

索索：新疆沙漠中的一种灌木，用作柴禾（维语sölcsök）。

琥珀：古代突厥语xubix。

腾格：古代突厥、回纥地区使用的银币，约值半两至一两（古代突厥语tanga~täñha）。

查拉克：重量单位，相当于20市斤。（维语tʃarek）。

巴扎：集市（维语bazar）。

春吉：维吾尔族晾晒葡萄干的荫房。（维语tʃydʒe）。

达瓦孜：维吾尔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高空走绳（维语dar-waz）。

赛乃姆：流传于新疆各地的一种歌舞（维语senem）。

萨拉木：问候语（维语salam）。

雅克西：好（维语jaxji）。

冬不拉：哈萨克族拨弦乐器（哈语dombəra）。

译音加表意成分（以下加点的词为表意成分）：

巴达木帽：饰有巴达木核样花纹的典型维吾尔族小帽（维语

badam doppa)。

坎儿井：利用山上的雪水灌溉农田的水利设施，即从高到低挖成一连串的井，再把井底挖通，连成地下暗沟。(维语kariz)。

诺鲁孜节：哈萨克族传统节日名(哈语nawrəz)。

肉孜节：伊斯兰教开斋节(维语roza hejt; 哈语rozəajt; 柯语orozoajt)。

库木孜琴：柯尔克孜族的三弦弹拨乐器(柯语qomuz)。

线帕拉子：无绒头的毯子，线毯(维语palaz)。

莫合烟：一种烟味浓烈的颗粒状烟，用切碎炒过后的烟茎与碎烟叶混合制成(维语mohorka)。

汉语中的一部分早期突厥语借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族与突厥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历史背景。如汉语中来自突厥语的官职称谓，“~~酋~~、”、“汗”、“毕”等是中原政权对突厥民族实行政治统治的真实记录。而突厥民族音乐文化对汉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也在借词中有所反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中说：“汉代汉语中的乐器名称‘箜篌’来自突厥语的qūpūz(又作qūbūz)”这个词也曾译作“火不思”、“胡不思”、“和必斯”、“和不斯”、“虎拔思”、“琥珀词”、“虎拍词”、“虎拍思”、“浑不似”、“吴拔四”、“胡拔四”、“湖拔四”等，译名之多，足见这种乐器流传之广。琵琶也是一种拨弦乐器，在西域和中亚广为流传，维吾尔人称之为barbit。汉刘熙《释名·释乐器》中说：“批把(即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在一部属于公元8—9世纪的回鹘文经典残卷上画有一维吾尔男子在弹琵琶。管子是龟兹人首先发明的，这种古代簧管乐器，汉代时由西域传入中原，是唐宋燕乐中的重要乐器，又称作“觚栗”、“觚策”、“悲栗”、“悲策”、“箏策”、“必栗”、“啤唳”、“贝蠡”等，来源于突厥语bari, beri, 对于唢呐、喇叭，《西疆杂述诗》(第三卷,第36页)中有这样的记载：“唢呐、喇叭本龟兹所出，流传

汉地者至今形式相同，与鼓齐奏，放台彼中之大乐也。”刘正埭、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所收录的突厥语乐器名称有15个之多，它们都是伴随着突厥音乐文化的传入进入汉语的。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因功获罪，被流放到新疆，公务之余写了不少诗，其中有二十四首《回疆竹枝词》，堪称风俗画、风土诗。<sup>①</sup>诗中借用了不少维吾尔语词，现将其中两首抄录如下：

金谷都从地窖埋，

空囊楞腹不轻开。

阿南普作巴郎普，

秋久难寻避债台。

这首诗揭露高利贷者的怪吝欺诈和贪婪。其中的“阿南普”借自维语ana pul（本钱），“巴郎普”借自维语bala pul（利钱）。其中的“普”（pul）即“普尔”或“普尔钱”。

把斋须待见星餐，

经卷同繙普鲁干。

新月如钩才入则，

爱伊蒂会万人观。

这首诗写的是“肉孜节”，其中的“普鲁干”借自维语ko-ran（古兰经），“入则”借自维语roza（肉孜，封斋的意思）；“爱伊蒂”借自维语heit（开斋节）。

以林则徐在新疆的活动为背景来观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地汉族惯于使用突厥语词，而放弃可对译的本民族语词的情景。

《西疆杂述诗》（第三卷，第32—33页）“钱制”中说：“新疆境内钱式不一，其用制钱处皆用普尔钱，普尔红铜所铸……乾隆以前形式较制钱略小而厚，无轮廓眼孔，重一钱四、五分至二钱之间。……朝平定回疆经定边将军兆惠公奏请，于叶尔

<sup>①</sup>参见谢友规《林则徐多知维吾尔语》，载《语言与翻译》，1987年第1期

羌设局销毁原钱，改成制钱形式，重二钱，仍名普尔，一面用汉字铸乾隆通宝，一面用清字兼回文字铸叶尔羌字样。”《回疆风土记》中说：“回民过年之前一月即把斋起……至次月初一或初二，总以望见新月如钩则开斋过年矣，回语谓之‘入则’。”开斋之日竟夜鼓吹至辰刻”，阿奇木伯克在载歌载舞的人群簇拥下“入礼拜讽经，合城男女皆新衣喧阗，街巷群瞻阿奇木威仪，礼拜毕均随入阿奇木家拜年，阿奇木劳以牛羊之肉，葡萄之酒，男女跳舞歌唱，共饮尽欢而散，谓之“入则爱伊蒂。”“入则爱伊蒂’后数十日，其阿奇木又复仪仗入寺通诚喧乐，谓之‘固鲁班爱伊蒂’。”

时至今日，在新疆汉族群众的口语中除沿用部分早期突厥借词外，还吸收了许多新的突厥语借词。其中，有一部分还以其特殊的用法、较高的出现频率活跃在汉族群众的日常用语中。

如：①

白坎儿——此词<bikar，原为形容词，意思是“无事可做的”，“徒劳的”。在“他是新疆白坎儿”这句话中“白坎儿”作名词，意思是“土生土长的”。

塔西郎——此词<tafla-，原意是“扔掉”，借入汉语后表示“坏了”或“死了”的意思。例如：“这个东西塔西郎啦！”意思是“这个东西坏了。”“这人塔西郎啦！”意思是“这人不行或死了”的意思。

衣看——此词<iken，原为表示间接陈述语气的语法形式②使用频率很高。新疆的汉族儿童常常在一句话的末尾加上“衣看”或“看”，作用类似表示强调的语气词。如：“我们等了你半天了衣看！”“明天劳动去衣看！”

## ②汉语中的突厥语意译词

①李祥瑞：《维吾尔语对新疆汉语的一些影响》，载《语言与翻译》1988年第3期

②间接陈述语气表示说话人刚刚知道或事后才知道所叙之事，用特定的语法形式示，即在动词、形容词、名词后带iken。

新疆汉语中的突厥语意译词在沟通文化交流，满足交际需要方面与上述借词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用。如：

抓饭——维语中叫polo，是用大米、葫萝卜、油焖熟的一种饭食，里面有时放些木瓜、青杏、葡萄干、杏干等作辅助料。吃的时候按规矩冲洗三遍手，擦干，然后用姆指配合并拢的三指取出一撮放置大盘中的抓饭，送入口中食之。polo的汉语名称“抓饭”即由此得来。

烤羊肉串——维语中叫kawap，是用铁扦串上拌过调料的羊肉块放在炭火上烤熟的食物。

杏干——维语中叫gyle，是晒干的杏。

花帽——维语中叫doppa，是维吾尔族小帽，上面绣有各式花纹。

姑娘追——哈萨克族的一种传统的马上游戏。

### ③混合型词

汉语与突厥语没有亲属关系，语言类型相异，操这两种语言的人在大量的实际接触中，为满足交际的需要，创造出了一种混合着两种语言类型特点的词。例如：

操突厥语民族在男人名后加dʒan（江），在女人名后加xan（汗或罕）表示尊重或亲昵。如：exmetdʒan艾合买提江（男人），anarxan（女人）。在新疆少数民族招呼汉族，特别是他们的孩子时，也常常在汉族名字后分别加上dʒan（江）或xan（汗或罕）以示亲昵。如：

明明：明明江（男孩）。

钢钢：钢钢江（男孩）。

芳芳：芳芳汗（女孩）。

乐乐：乐乐汉（女孩）。

随着民族交往的加深，汉族逐渐习惯了这种亲昵的称谓。

在新疆，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无论是年长年幼，也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后迁来的人，都懂得“大当子”、“阿那子”、

“巴郎子”分别是“父亲”、“母亲”、“孩子”的意思，也知道“排当子”指的是“好处”、“洋缸子”指的是维吾尔族年轻妇女。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混合型词的构成：

大当子：dada（维语词父亲）+子（汉语构词后缀）

阿那子：ana（维语词母亲）+子（汉语构词后缀）

巴郎子：bala（维语词孩子）+子（汉语构词后缀）

排当子：pajda（维语词利益）+子（汉语构词后缀）

洋缸子：jenge（维语词嫂子）+子（汉语构词后缀）

以上这些可以归纳出一种混合型词的构词模式“突厥语词+汉语构词后缀‘子’”，这种模式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qil-（做）和bol-（成为）在突厥语中，是可以独立运用的动词，也作为构词语素与名词、形容词结合构成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它们还充当语法词与更大的语言单位结合。由于qil-和bol-词形简单，因此逐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所利用，创造出“汉语动词+qil-”构成及物动词，“汉语动词+bol-”构成不及物动词的模式。这种模式经常而且广泛地运用在双方交际的言语中。例如：

做了：做了qildi（及物动词）

打了：打了qildi（及物动词）

去了：去了boldi（不及物动词）

走了：走了boldi（不及物动词）

新疆汉语中还可见到一些特殊的混合型词。如：

二天：意思是明天，维语词ete明天+汉语的“天”。

ete中的te省略。

大家嘛家：意思是“大家伙儿”。汉语词+类似突厥语语音和谐音组的“嘛家”构成。①

①突突语中的谐音词很有特色，其中的一种构成方式是，“名词+语音和谐音组”，构成的名词，泛指一般。例如：t[ʌj]（茶）+pa[j]语音和谐音组→t[ʌ]-pa[j]茶点。

## 2. 语言功能方面的影响

### ① 历史上的语言融合现象

新疆地区很早就有汉族移居，其中也确曾有一部分人融合于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中。如公元399年至440年，建国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麹氏高昌国，是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建立的地方政权，他们的祖先原本是汉魏时屯垦的汉族士兵和晋朝时逃难到此的汉族难民的后代。但是在这个时期这些汉族都已经融合于当地的少数民族了，他们的服装语言等都改变了，虽然还读汉文典籍，但是“虽习诵之，而皆为胡语”了。<sup>①</sup> 另外，在《大唐西域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中也记述了在新疆境内的许多汉族人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民族融合必然会有语言的融合。语言融合是通过双语逐步过渡实现的，有人曾于1950年到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农村，碰到了几个维吾尔族青年正用维吾尔语讲《三国演义》，了解到他们的祖上男方都是清朝在疏勒县的汉族士兵，祖上的女方都是维吾尔族妇女。这类家庭的房屋建筑、庭院栽种花木、室内陈设、男女装束以及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待客方式都与其他维吾尔族家庭一样，只有在其中的一家看到了用汉文写的神主牌位表明这家是汉族人的后裔。这类情况表明新疆历史上确有不少能流利操某种或某几种突厥语和汉语的天然双语者。

### ② 特殊的混合型言语形式

在新疆的汉族最明显的感觉是置身于突厥民族语的包围中，为了交际自觉不自觉地要学说几句突厥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即使没系统地学过汉语，但也差不多都会说一些汉语日常用语，因此，在交际的过程中渐渐产生了一种混杂两种语言成分的言语形式。交谈时，汉族说的话中夹杂着少数民族语借词和混合型词，句子按少数民族习惯组织词序，语调也向对方靠拢，少数民族说的话中夹杂着汉语借词和混合型词，简化民族语语法，加进汉语

<sup>①</sup>《北史·西域传·高昌传》

的虚词表示语法意义，喜欢使用语气词来加强语调。请看下面对话片段：

少数民族：好嘛？ <jaxʃimusiz?

译文：你好吗？

汉族：雅克西！ <jaxʃi!

译文：好！

少数民族：散的巴郎子吗？ <bu sizniŋ baliŋizmu?

译文：这是你的孩子吗？

汉族：满的巴郎子。 <hee, meniŋ balam.

译文：是我的孩子。

少数民族：巴扎巴拉木杜？ sen bazarğa baramsen?

译文：你去集市吗？

汉族：巴扎去，海麦斯都去嘛！ <bazarğa barimen, hem-mimiz barajli.

译文：去巴扎，我们大家都去嘛！

少数民族：车子不骑嘛？ <welsipit minmemsen?

译文：不骑车吗？

汉族：车子塔西郎啦！ <welsipit buzulup qaldi.

译文：车子坏了。

少数民族：恰达克了？ ! tʃataq toptuma? !

译文：糟糕了吗？ !

有人把这种语言现象称为“混合语”现象，或“杂语”现象，我们暂时称之为一种特殊的混合型语言现象；从心理沟通的角度来看，这类话汉族觉得它接近少数民族语，少数民族觉得它接近汉语，双方运用自如，彼此心领神会。这类话不仅在集市买卖中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群众会上干部讲话也常使用，新疆的这种特殊的混合型言语形式有着不可缺少的职能，它是在汉语与突厥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汉语与突厥语民族语言双向影响的产物。

除此之外，当地汉族人的言语中还经常出现突厥语句子和汉语句子的合璧现象，即上半句突厥语，下半句汉语；或上半句汉语下半句突厥语。譬如问对方：“你去巴扎（集市）吗？”就常常按以下两种方式说：

A 散巴扎巴拉木杜，你去巴扎吗？

B 你去巴扎吗，散巴扎巴拉木杜？

这种现象在古书中也早有记载，《西疆杂述诗》（第三卷，第35—36页）中写道：“又有半回半汉之曲，如一昔克呀普门关上，契喇克央朵灯点上，克克斯沙浪毡铺上呀，享单朵喇铺盖盖上等类。则上半句回语，下半句汉语，每事重言，一番一译仿合璧之法也。”

这种突厥语句子和汉语句子的合璧形式，目的在于互译之中加强语势，以使对方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语意。

## （二）突厥语对甘青汉语的影响

### 1. 概述

当研究的视点移向甘肃和青海这片古老的土地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地方的汉语与汉语普通话相比不仅有方言的区别，还存在因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形成的特点。这使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上少数民族在这一带活动的踪迹。

公元7—8世纪时，回鹘人游牧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一带。回鹘取代了突厥后，在漠北建立了回鹘汗国（公元744—840年），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爆发内乱，在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的攻击下灭亡。回鹘各部四处逃散，一支到了今甘肃河西走廊，建立了甘川回鹘王国，分布在甘、凉、沙、肃、秦等州以及贺兰山、合罗川（今额济纳河）等地。另一支迁入新疆地区，还有一支迁入中亚，并分别融入前苏联中亚各族之中。由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伊斯兰化，又有许多回鹘人不愿接受伊斯兰教而东迁，从而加强了河西一带回鹘人的势力。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宋元时期回鹘语文成了

河西一带的通行语言，明清以后随同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也逐渐被忘却。今天生活在这里的裕固族，历史上曾有多种称谓：唐称“河西回鹘”、宋称“黄头回纥”、元明称“撒里畏吾”、清称“锡喇伟古尔”。目前，裕固族使用两种语言：东部裕固语（或称“恩格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或称“尧呼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在青海高原，数万年繁衍生息着众多民族，自夏商周至秦汉，南北朝时期为群羌驼牧之地。从公元前121年起，就有汉人在此地从事生产活动，间或有匈奴、鲜卑人移牧到此。自唐以来，又有羌人、吐蕃人、党项人、回鹘人、鞑靼人、契丹人、回人等在这一带活动。今天，这里仍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其中，主要与汉、藏、回、土、蒙古等民族杂居的撒拉族是由元代（13世纪）迁入青海省循化地区的撒马尔罕人（一说为土库曼人）与周围居住的汉、回、蒙古等族长期融合而成的。其祖先元时称“撒拉”、“撒拉儿”，明时称“沙喇”、“沙刺篾”，清时称“萨拉”、“萨拉尔”等。

## 2. 突厥语对甘肃地区汉语的影响

突厥语属于粘着语，语法特点是用不同的后缀粘附在词干上表示各种语法意义，譬如在名词词干上粘附“格后缀”表示各种格的意义，构成格范畴。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无所谓格范畴，但在河州话中却存在着类似格范畴的现象，这就是说名词在句中的作用是通过粘着后附语素的方法来表示的，下面请对比观察河州话和维吾尔语中的格形式：<sup>①</sup>

1) 河州话“名词+零形态”类似维语“主格”

2) 河州话“名词+xa”类似维语“宾格”和“与格”

3) 河州话“名词+ta”类似维语“从格”

<sup>①</sup>例子引自马树钧《汉语河州话与阿尔泰语言》，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2期。河州是甘肃临夏的旧称，河州话是当地汉族和回族所说的一种汉语方言，也是这一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相互交往的工具。

4)河州话“名词+xθt'θ”类似维语“从格”

5)河州话“名词+t'ala”类似维语“止格”

6)河州话“名词+la”类似维语“凭借格”

7)河州话“名词+'的'(ti)”类似维语“领格”

下面以实例说明河州话“名词+xa”类似维语的“宾格”和“与格”。

河州话(名词+xa)：

tāts|xa ke ve liə mu?

房子(把)盖完了吗

维语(名词+宾格ni)：

φjni selip boldimu?

房子(把)盖好了吗

普通话：房子盖好了吗？

河州话(名词+xa)：

ni k'ezēηmuxa suoklxa。

你客人们(向)说给下

维语(名词+与格ka)：

sen mehmanlarka tonu|turup bergin。

你客人们(向)介绍给

普通话：你给客人们讲讲。

河州话中除有系统的类似格的模式外，还有许多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语言现象酷似维吾尔语中的模式，就像维吾尔语语法结构的投影一般。所以说，汉语和河州话具有浓厚的粘着型语言色彩，显现出突厥语对其产生的影响。

### 3. 突厥语对青海汉语的影响

青海汉语的许多特点明显地显现出阿尔泰语言对其产生的影响。下面我们仅以青海汉语中的“哈”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①

①李克郁：《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载《民族语文》1987年第一期。

青海汉语中的介词“哈”用在名词、代词之后，起着将宾语提前的作用，与汉语普通话介词“把”、“向”、“对”的语法作用相当。我们将流行于青海河湟地区的一首《花儿》译成维语来对比观察其中的用法。

清茶不喝了奶茶哈喝，1) sintfaj itfmejdu,  
syttfaj itfidu。

渴死了凉水哈不要喝；2) ussizliqtin  $\phi$ lseŋmu,  
sovaqsu itfme。

你心里有了话我哈说，3) k $\phi$ ŋlyŋde gepiŋ bolsa  
maŋa digin。

亏死了旁人哈不要说。4) zijan tartsa, baŋqilar ka  
dime。

其中①和②的介词“哈”起着将宾语提前的作用。③和④的介词“哈”表示行为、动作的对象、客体。介词“哈”的分布与语法功能相当于维语中的“宾格”与“向格”，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情况相一致。

青海汉语介词“哈”还出现在“的”字结构后面。我们将青海汉语中的一些句子译成维语来对比其中的用法。

1) 轻的哈拿来，重的哈放下。

jenikni epkel, evirni qorqoj。

2) 走了的哈叫不回来。

k $\acute{e}$ t $\acute{i}$ p qalvinini tjaqiripkelgili bolmajdu。

3) 看过的哈不要看。

k $\phi$ ryp bolvinini qajita k $\phi$ rme,

jeŋini k $\phi$ r。

青海汉语介词“哈”的用法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形容词、动词用作名词时，其后附加客体格（宾格）作宾语用法相一致。

#### 4. 一点重要的启示

从以上例子我们看到河州话中的〔xa〕和青海话中的“哈”〔xa/xə〕语音上相近，还看到在甘肃河州话里和西宁东关的汉语中将“哈”读作〔a〕的现象，如“帽子阿拿来”（把帽子拿来），“有话了我阿说”（有话对我说），所以可以这样说，〔xa〕、哈〔xa/xə〕、阿〔a〕的分布与语法功能一致。从语音上看〔a〕与阿尔泰语系的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撒拉语、东乡语的客体〔ni〕不同，也不同于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土族语、保安语的客体格〔nə〕，但与萨哈克语的客体形式〔-ka/-ke〕楚瓦什语的客体格形式〔a〕语音一致。如果从句子的角度来观察，可以看到河州话和青海话中的一种句式“主语+宾语+xa/a或哈xa/xə+动词谓语”。句式的词序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句子成分的顺序完全一致。

一般地说，一个在整体上处于劣势，而在局部地区却在人数上相对居于优势的语言集团，当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而接受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往往会保留下比较多的本族语底层。河州话吸收其他语言结构模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只取表现手法而不取具体材料，即使用的仍然是汉语的材料，依据的却是“外来的”模式；另一种是在吸收其结构模式的同时，也借用其语言材料。

这一结论对我们认识突厥民族语言以至阿尔泰语系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有很大启示。如果我们从客体格（宾格）放眼于河州话中7种类似格的用法，从河州话和青海话中类似格的用法放眼于所调查到的其他各种语言现象并加以进行对比，譬如对比河州话中的“者”与维语中的“p”副动词的用法，对比河州话中的“是”和“说”与维语中的“说”〔de—〕的用法，对比河州语与维语中表示“需要”的句型，对比青海话名词后的“们”与阿尔泰语

系语言中的“数”范畴，对比青海话中表示动作发生条件或原因的“哈”与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表示相同语法意义的-sa/-sə/sə等，并以此为开端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发现突厥语族语言以至阿尔泰语系语言对汉语影响的更多迹象，很可能在甘肃汉语中挖掘并展示出突厥语族语言乃至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底层。

Hoa văn SaigonHSK

# 附 录

## 一、中国语言系属表

	汉语
汉 藏 语 系	藏语支：藏语、错那门巴语、仓洛门巴语、白马语
	羌语支：羌语、嘉戎语、普米语、木雅语、道孚语、史兴语、 尔苏语、贵琼语、扎巴语、却域语、纳木义语
	彝语支：彝语、哈尼语、纳西语、拉祜语、基诺语、 傣僮语、怒苏语
	缅语支：载瓦语、阿昌语、波拉话、浪连话
	景颇语支：景颇语、独龙语、崩尼—博嘎尔语、达让语、 格公语、苏龙语、阿依语
	语支未定的：白语、土家语、柔若语、义都语
	苗瑶语族
	苗语支：苗语、布努语
	瑶语支：勉语、畲语
	壮侗语族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临高话	
侗水语支：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 标语、佯黄语、莫话	
黎语支：黎语、村话	
仫佬语支：仫佬语、拉基话、普标语	

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	东匈语支：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图瓦语 西匈语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
	蒙古语族	蒙古语、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 保安语、土族语、东乡语
	满—通古斯语族	满语支：满语、锡伯语、赫哲语 通古斯语支：鄂温克语、鄂伦春语
	南亚语系	孟高棉语族：佉语、布朗语、德昂语、克木语、羌语、户语
南岛语系	高山族诸语	泰雅尔语群：泰雅尔语、赛德克语 邹语群：邹语、沙鲁阿语、卡那卡那布语 排湾语群：阿眉斯语、排湾语、布嫩语、鲁凯语、田卑语、雅美语
	印欧语系	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塔吉克语 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俄罗斯语
系属未定的语言：		朝鲜语、京语

## 二、中国的语言与文字简表

### 说明

1. 表中只收录曾有过文字和现有文字的语言及文字。
2. 括号内为文字创造时间。
3. 白字、汉字注音式布依文、谚文、汉字注音式侗文、汉字注音式哈尼文、喃字、古丈苗文、板塘苗文、女真文、契丹字、水书、西夏字，汉字注音式瑶文、壮字等受汉字启发而产生。
4. 注音字母式苗文、彝文的符号为汉字注音字母。

语 言	1950年以前使用的文字	1951年以后使用的文字
白 语	白字 (唐——明)	白文 (1982)
布努语		布努文 (1988)
布依语	汉字记音或布依文(清?)	布依文 (1956)
朝鲜语	谚文 (朝鲜文) (1444)	朝鲜文
傣 语	傣 文(版纳傣文,1277) 傣哪文 (德宏傣文, 14 世纪) 傣端文 (?) 傣绷文 (?)	傣仂文 傣哪文 傣端文 傣绷文
侗 语	汉字记音或侗文(清?)	侗文 (1958)
俄 语	俄文	俄文
哈尼语	汉字记音或哈尼文(清?)	哈尼文
哈萨克语	突厥文 哈萨克文 (13世纪)	哈萨克文 拉丁字母哈萨克文 (1959—1982)
汉 语	汉字 (前1000年) 八思巴字(1260—1352) 教会罗马字 (1850) 拉丁化新文字 (1929)	汉字
京 语	喃字	
景颇语	景颇文 (1869)	景颇文

语 言	1950年以前使用的文字	1951年以后使用的文字
柯尔克孜语	突厥文 柯尔克孜文	柯尔克孜文
拉祜语	拉祜文 (1930)	拉祜文 (1957)
黎 语		黎文 (1955)
傣傣语	汪忍波傣傣文 (1924) 六字母傣傣文 (1912) 玻拉傣傣文 (1905?)	傣傣文 (1936) 六字母傣傣文
满 语	满文 (1599)	
蒙古语	回鹘蒙古文 (1225) 八思八字 (1260—1352) 托忒蒙古文 (1648)	蒙古文  托忒蒙古文
苗 语	玻拉苗文 (1905) 古丈苗文 (1907?) 板塘苗文 (1920?) 注音字母苗文 (1916?)	玻拉苗文 苗文 (1950, 4种)
纳西语	东巴文 (12~13世纪) 哥巴文 (12世纪前?清?) 玛丽玻都文	纳西文 (1957)
女真语	女真文 (1119)	
普米语	丁巴字	

语 言	1950年以前使用的文字	1951年以后使用的文字
契丹语	契丹字 (10世纪)	
水 语	水书 (清?)	水文 (1985)
土族语		土文 (1979)
佤 语	撒拉佤文(1912)	佤文 (1957)
维吾尔语	突厥文 回鹘文 察合台文 八思巴文(1260—1352) 维吾尔文	维吾尔文 拉丁字母维吾尔文 (1965—1983)
西夏语	西夏字 (11世纪)	
锡伯语	满文 (清) 锡伯文 (1941)	锡伯文
瑶 语	汉字记音式瑶文(清?)	瑶文(1982)
彝 语	彝 文 玻拉彝文 (1905?) 注音字母彝文 (1918以后?)	彝文 规范彝文 (1957)
载瓦语		载瓦文 (1957)
藏 语	藏文 (7世纪) 八思巴字(1260—1352)	藏文
壮 语	壮字 (唐)	壮文 (1955)

### 三、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分布表

汉语方言	少数民族语言
官话	
北方官话	蒙古语、达斡尔语、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朝鲜语
西南官话	苗语、勉语、布努语、壮语、布依语、侗语、傣语、水语、毛南语、仡佬语、拉加语、仡佬语、黎语（美孚、军语）、藏语、彝语、纳西语、拉祜语、羌语、哈尼语、傈僳语、载瓦语、景颇语、基诺语、独龙语、怒语、珞巴语、白语、土家语、嘉戎语……
中原官话	土族语、撒拉语、藏语（青海）、蒙古语（青海）……
兰银官话	保安语、裕固语、藏语（甘肃）、土族语、藏语（甘肃）……
新疆汉语	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蒙古语……
粤方言	黎语（本地方言）、京语、壮语、勉语（敏藻方言）
闽方言	黎语（俸方言、杞方言、加茂方言）、（台湾高山族的）泰雅语、布嫩语、阿眉斯语、排湾语、赛夏语、邵语、邹语、卑南语、鲁凯语、雅苏语
（闽南话）	
客家方言	畲语、壮语

## 后 记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研究课题之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研究》的终结成果。其阶段成果，我们已写成《汉语与少数民族语关系研究》一书，于1990出版。

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既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一个课题，也是汉语研究中的课题。前人在这一领域里曾经有过一些零星的探讨，但是还没有全面地论述过。本书试图比较系统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在理论上进行可能的概括。

由于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所立的框架和所提出的问题，肯定会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编写的，大多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的中青年教师。

具体分工如下（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戴庆厦：第一章及第三章第一节（一）

傅爱兰：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一节（三）

覃小航：第二章第二节

李炳泽：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二节（二）、第三节及附录二、三

李锦芳：第三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一节

季永海：第三章第四节

丁石庆：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二节、附录一

张铁山：第三章第六节

赵福荣：第三章第七节

曾思奇：第三章第八节、第四章第六节

崔宰宇：第三章第九节

白立元：第四章第一节

关辛秋：第四章第三节

周国炎：第四章第五节

赵 加：第五章第二节（一）

喻 捷：第五章第四节

最后，我们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经费，使这项工程得以顺利进行。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的领导及其他教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书中的英文翻译由吴和得先生担任。本书责任编辑马加林副教授在编辑、加工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此也表示感谢。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研究》课题组

1992. 1. 15日于中央民族学院

（邮政编码100081）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

作者 = 戴庆厦

页数 = 384

SS号 = 10330125

出版日期 = 1992年12月第1版

Hoa văn SaigonHSK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语言关系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节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

第二章

汉藏语系语言的亲属关系

第一节 汉语与藏缅语的亲属关系

第二节 汉语与壮侗语的亲属关系

第三节 汉语与苗瑶语的亲属关系

第三章

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第一节 汉语对藏缅语的影响

第二节 汉语对壮侗语的影响

第三节 汉语对苗瑶语的影响

第四节 汉语对满—通古斯语的影响

第五节 汉语对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

第六节 汉语对突厥语的影响

第七节 汉语对孟高棉语的影响

第八节 汉语对高山语的影响

第九节 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

第四章

少数民族转用汉语

第一节 满族转用汉语

第二节 回族转用汉语

第三节 土家族转用汉语

第四节 畲族转用汉语

第五节 仡佬族转用汉语

第六节 高山族转用汉语

第五章

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

第一节 粤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第二节 闽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第三节 贵州汉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第四节 突厥语对汉语的影响

附录

一、中国语言系属表

二、中国的语言与文字简表

三、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分布表

后记